張深切全集

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下）

全12卷 卷2

主編：陳芳明・張炎憲・邱坤良・黃英哲・廖仁義

監製：張孫煜　策畫：吳榮斌

文經社



文經社



文經社



文經社



張深切全集

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下）

全12卷 卷2

主編 陳芳明・張炎憲・邱坤良・黃英哲・廖仁義　策畫 吳榮斌

監製 張孫煜

文經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張深切全集〔卷2〕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下）/張深切著，陳芳明、張炎憲、邱坤良、黃英哲、廖仁義主編，吳榮斌策劃，張孫煜監製--台北市：文經社，1998（民87）
面；　公分
ISBN 957-663-166-1（一套：精裝）
ISBN 957-663-16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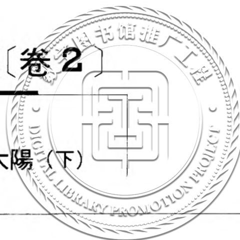
848.6　　86014334

文經社

張深切全集〔卷2〕

里程碑

——又名：黑色的太陽（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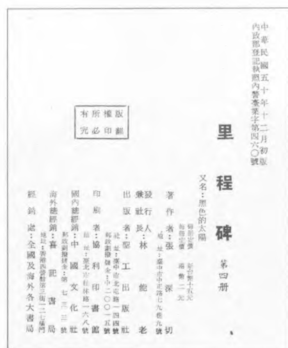


著作人——張深切
著作權人／總監——張孫煜
主編——陳芳明・張炎憲・邱坤良・黃英哲・廖仁義
策劃——吳榮斌
發行人——趙元美
出版所——文經出版社有限公司
・總公司——台灣・104　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66號11F-1
phone：02-2517-6688　FAX：02-2515-3368
・業務部——241　台北縣三重市光復路一段61巷27號11F-A
phone：02-2278-3158　FAX：02-2278-3168
登記證——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424號
郵政劃撥——0508880-6　文經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刷所——松霖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發行日——1998年1月1日
Printed in Taiwan



▲《里程碑　又名：黑色的太陽》書影。

本書於1961年12月，分一、二、三、四冊，由台中聖工出版社出版。



中華民國五十年十二月初版
內政部登記執照內警臺業字第四六〇號

里程碑　第四冊
又名：黑色的太陽

每冊定價　新台幣十五元
每冊定價　港幣二元

著作者：張深切
地址：臺中市中正路七九巷九號
發行人兼社長：林能老
出版者：聖工出版社
社址：臺中市北屯路一四四號
郵政劃撥儲金：中二〇〇一五號
印刷者：協利印書館
廠址：臺北市桂林路一六八號
國內總經銷：中國文化社
郵政劃撥儲金：第七三三號
海外總經銷：喜記書局
地址：香港西營盤第三街一二七號門
經銷處：全國及海外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里程碑》初版權頁。



▲張深切生前所出版之著作書影。

歲月照



1963年（60歲）



1935年（32歲）



1932年（29歲）



1948年（45歲），張錫卿先生作

張深切簽名式



張深切畫像（1939年，36歲。蔣兆和作，張孫煜收藏）按，蔣兆和爲著名水墨畫家，本作於北平藝專辦公室以一小時完成。



▲台灣文藝聯盟成立大會。
（1934.5.6，台中）
1934年5月6日，張深切（後排右一）等人倡導舉行全島性文藝大會，台灣北、中、南作家菁英八十多人與會，發表宣言，成立「台灣文藝聯盟」，並發行《台灣文藝》雜誌。該聯盟由張深切擔任委員長及雜誌負責人，後來發展爲日治時代最大和最有影響力的台灣人文藝團體，並將台灣文學定位在關心台灣社會中被壓迫的民眾，及表現台灣本土的色彩，從而培養了許多優秀作家，使台灣新文學運動進入一個成熟發展期，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此一組織的成立與所推動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是台灣史的文化大事之一。



▶《台灣文藝》雜誌的編輯與作家：張星建（總編輯，立右一）、楊逵（日文編輯，左二）、吳天賞（作家，右）、張碧珚（作家，中）、張深切（左）。1935年攝。







▲▲台灣文藝聯盟發行的機關刊物《台灣文藝》雜誌（封面圖爲陳澄波素描。日本・河原功教授提供。）

▲作家郁達夫（坐中）於1936年12月22日-24日來台，會見台灣文藝聯盟委員長張深切（左一）及林文騰（左二）、張星建（右一）、李獻璋（右二）。

▶台灣文藝聯盟本部」招牌（1934年啓用，1997年發現。27cmx132cm，莊明勛攝影）。



▲張深切（右二）於1938年任北平國立藝術專科學校訓育主任兼教授，與王石之校長（左五）、伊東教授（左二）及同事合影。此外，先後在該校任教的好友還有畫家郭柏川及音樂家江文也。





▶▲張深切與張洪愛月夫婦及家居生活。

張深切全集

「北平藝專．中國文藝時期」

▲在北京從事編輯、寫作、教育的張深切。

▶在廣東發動台灣獨立革命運動的三位領導者：張深切（左）、林文騰（中）、郭德欽（右）三人合攝於北京的白雪上（1939年左右）。

徵稿簡章

一 本刊下列各門均歡迎投稿：

甲 文學 新文學：小說，散文，短篇創作，詩歌，文藝評論，外國文學之研究，介紹，批評，討論與翻譯。

乙 藝術 繪畫，電影，戲劇，音樂，以及一般藝術理論與介紹（作家小傳及論文）漫畫作品與理論（作家小傳及論文）。

丙 雜俎 科學新聞，名人傳記，時代生活之介紹，學術界藝術界一般動態，消息，讀者通訊……等。

二 本刊文字注重精短，來稿以不超過五千字爲佳，但非短篇所能容納者，不在此例。

三 來稿請用行格分明之稿紙精寫清楚，稿末註明姓名與郵確住址，以便通信及匯寄稿費。

四 來稿得由編輯人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於稿端聲明。

五 來稿一經登載，概酬現金，每千字由三元至五元，特佳之作，報酬從豐，每月結算後，即時發出。

六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版權仍歸著者所有，惟將來結集單行本時須優先由本社出版。

七 來稿寄「北京東單大羊宜賓胡同五號中國文藝社」。

中國文藝月刊

第一卷第一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一日出版

每月一日出版 每册定價國幣二角五分

編輯兼發行人 張深切

發行所 中國文藝社

總代售處 人人書店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印刷所 新中國印書館

創刊號特價三角

廣告價目

中國文藝

創刊號

中國文藝社

▲《中國文藝》雜誌封面及版權頁（秦賢次先生提供）

1939年，張深切受邀創辦《中國文藝》，擔任編輯人兼發行人，爲華北文壇中的一股清流雜誌，但後因被密告領導學生反日、抗日而被迫易手，且遭憲兵部逮捕，險遭不測。

里程碑（下）——［又名：黑色的太陽］——［目次］

・注釋：莊永明

Q 釋放前 503

52 捉放

這時期我在獄中，不知道外面激烈的鬥爭情形，他們的鬥爭無意識地影響到我們的案子上，逐漸消除了案情的嚴重性，使司法當局決定把我們的案件以「治安維持法」違反起訴。

有一天，看守叫我收拾自己的東西，並交給我一份豫審判決書，說要釋放我出去。我翻開一看，原來是關於一中公務執行妨害案判決我無罪，但隻字也沒有提及廣州案。看守要帶我出去時，我故意問他：

「要帶我到什麼地方去？」

「放你回去啊。」

我默然跟他走出了第二監舍，心裡依然疑惑不解，為什麼祇釋放我一個人？難道司法當局認定我與廣州案沒甚關係？或者同志們把我的責任都一肩擔盡了？突然的釋放，使我莫名其妙。看守送我到監獄門口說：

「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我走到大門口，回頭望望監獄的大院子，只有二、三個看守站崗守望，寂然無聲。自想

留那些同志們在獄裏受罪，我個人是否從此可以享受自由？正在疑惑之間，從刺斜裏閃出了兩個武裝警察，走來問我：

「你是張深切麼？」

「是。」

他們隨即取出一張拘票叫我看，我還未看完，他們就取索子把我綑縛起來，這瞬間我才明白我的釋放，是捉放的把戲。原來司法當局把我的案件分為兩起，一起是「公務執行妨害」，另一起是「治安維持法違反」，前一起已經判決無罪了，所以釋放，後一起剛要開始，所以重新逮捕。

我被命坐上一輛摩特卡，剛坐下，車便急速的開走了。天色濛濛，正和我被押解到臺北時一樣，下著毛毛雨，使我心緒更加沉悶。他們帶我到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庭受審。

這次碰上的檢察官是個蠻不講理的人，他以粗暴的態度升堂，瞋視我一會說道：

「被告妄想要推翻我天皇萬世一系的統治，圖謀臺灣的獨立，組織臺灣革命青年團，在我帝國管不著的廣東從事革命工作，是不是⁉」

我覺得這不是問案，而是威嚇性的斥責，所以故意裝作嚴肅的態度，反駁他說：

「我們的宣言以及其他的文書，沒有片言隻語涉及皇室，檢察官故意把我們的案件誣栽反抗日本皇室，這是不是有損皇室的尊嚴，事屬不敬……」

他忍不住大聲喝道：

「渾蛋，馬鹿野郎！御前對皇室有啥觀念？要是有的話，不至於犯這麼大逆不道的叛國罪！」

檢察官暴跳如雷，破口大罵，我覺得這一回合可能操勝券，維持鎮靜的態度，微笑說：

「我有沒有犯罪是一個問題，不敬又是另一個問題，我還未定罪，檢察官不該叫我『御前』，罵我『馬鹿野郎』！」

他抓起了案桌上的墨水壺，站起來，擬著要擲擊我的姿勢，罵道：

「貴樣是個壞蛋，打死你！」

我把雙手交叉於胸前，表示願受他擲擊，他卻又縮回手，苦笑說：

「嗯，好個鬥士，膽子好大！」

他坐回原位，翻翻案卷，看了看，變更口氣說：

「你是好一個首領啊，好，我問你，嘍，郭德金、張月澄、林萬振、林仲節、林如金、吳文身、溫幸義、顏全福、簡錦銘、盧炳欽……等都認識吧。」

「有的認識，有的不認識……」

「你和認識的人有什麼關係？」

「祇是朋友。」

「你和他們怎麼認識？他們什麼時候參加革命青年團？有什麼活動？你說。」

「因為都是旅廣同鄉，自然常見面，不過有的雖然面熟，卻不知他的姓名，有的姓名記

得，卻忘記了面孔。所謂革命青年團，根本沒有這個團體。」

「胡說！宣言及其他文件都使用革命青年團的名義，你們的同志也都供認加入了青年團，只有你一個人不承認，狡猾！」

「發宣言不用個團體名稱是不像話的，所以我揑造了這一名堂，事實上並沒有這個組織，供認的人讓他供認好了，最後還是要拿事實證明一切……」

「廢話！你怎麼狡辯也沒用，要是你不招，我有方法叫你招！」

我不回答，他稍下氣說：

「照實說吧。」

「照實講的。」

「你一點兒也不老實，到底革命青年團的負責人是誰？」

「就是我。」

「你和誰組織的？」

「沒有組織，祇有我一個人！」

「馬鹿！豈有沒有團員的團體？」

「確實沒有團體組織，所以這樣說。」

「宣言是誰寫的？」

「是我。」

「你和郭德金、張月澄、林文騰四個人共同擬稿決定的！是不？」

「不是，是我個人寫的。」

「住嘴！你想哄騙誰？反正你們的同志都承認了，證據十足，不容你分辯，假使是你個人幹的，罪加一等，你是受不了的，知道麼？」

「那有什麼辦法。」

檢察官要錄取我的口供，把案子引入治安維持法違反第一條，適用團體組織條例，我偏不入他的圈套。他不耐煩地說：

「你這個傢伙，滑頭至極，得送你回警察署受刑求！」

「檢察官所要的如果是偽供詞，那末你們要什麼，我說什麼好了，不過得附註這是虛偽的供詞……」

「混帳，不准你開玩笑！」

「檢察官要送我到警察署去刑訊逼供，如果我真的被逼胡說，那末到了法庭審訊，我是不是還得翻供，不是麼？」

「好，你這麼頑皮，就叫你去嘗嘗拷刑的滋味！」

他命令看守「拉走！」站起來，退堂而去。

他們要用什麼酷刑刑我呢，這確實使我緊張和不安。警察拉出我，把我載上機器三輪車駛出法院，一直跑，跑了好久，沒有多大的臺北市差不多快跑遍了。到底要帶我到哪裏去？

搗的什麼鬼？怎樣行刑？怎樣應付他們？

我在車上胡思亂想，感覺意識有點模糊，也許因為恐怖和緊張，打起瞌睡，及至張開眼睛一看，車已停在監獄門口了。又來舉行一番入獄「儀式」，再被押進第二監舍。這次是第四十六號房，和德金同列，離得很遠的地方。我不知道誰住在我鄰近監房，經過了一個多星期，才曉得鄰居有幾個兇殺案的疑犯，對面近處有盧炳欽和吳文身同志，斜對面第五、六房都空著沒人住。

第五房是專供參觀用的模範監房，我盼望張月澄來住於第六號房以便連絡，天天祈禱，天天望眼欲穿的注視那間房子。

我自進入臺北監獄以來，查不出月澄的下落，如果和月澄連絡不著，我們的案情，仍然難能好轉，同時也救不著其他的同志。他和德金與我三個人是案中的首腦，當然免不了刑罰，這早已了然，決不逃避責任，但其他同志總得設法營救，為此需要和月澄連絡。

神秘！不久月澄真的搬進第六號房來了！我隨時教他通信法，他說一向被拘禁在第一號監舍，那裏完全沒有同志，都是雜居房，因為他一個人佔了六、七個人住的房間，這次囚滿，才被命搬到這裏來。我責他供認團體組織未免太輕率，他辯明是受了「誘導審問」上了當的。我告訴他我和德金決定的方針，要求他合作，並通知全體同志取同一步調應付檢察局，他都答應了。

我們自獲悉所犯條例是「治安維持法」，大家都放心了。這一刑罰最高不過十年，算不了

什麼。我們組織團體對日本宣戰，要打倒他們，如果我們贏了，就毀滅他們，他們贏了，要我們的命，彼此都無需講價的。

我們雖然未做到給他們致命的打擊，卻已剝下了他們的假面具，暴露了他們的猙獰面目和罪惡，使他們的榮譽蒙上了莫大的損失，十年的罪刑是不算貴的。然而我們還想和他們講價到底。作戰意外成功，迫使檢察局陷於混亂的狀態，終於無法獲得統一性的結論。

53 夜戰

是年冬天，氣候格外寒冷，有個夜半，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忽兒被看守叫醒：叫我穿上衣服出來，我不知道其來頭，隨便穿一領夾裏的小褂就要跟他走，他說我穿的太薄，得穿厚一點兒，我不理他，答道夠了，他搖搖頭說不行，得穿著和上法院一樣的服裝。我覺得這時候叫人，凶多吉少，必定有什麼重大的事情，故意執拗不聽話，答道：

「夠了夠了，走吧！」

他嘆了一口氣，帶我走出監門，經過了八卦廊，看見掛鐘已指十一點，寂靜的監獄，聽不見什麼聲音，只有看守和我穿的草屨拖著殺殺的響聲，劃破了陰森森的空間。廊下的微弱燈光照著那廣闊的八卦廊，特別顯出黯淡的景象。我不讓看守的影兒壓上我的身，邊躲邊走。到了一個處所，看守站住了，抬頭一看，上面掛著一個「調所」的小牌子，我全身的神經頓時緊張起來，感覺到這裏必定是刑訊的地方。

看守拿出鑰匙打開門，室裏一片漆黑，看不見什麼，他把開關一捺，電燈亮了，屋裏竟是個客廳的佈置，中間有一張長方桌子，兩邊擱著幾個辦公用小籐椅，看守叫我坐下，便獨

自走出去。

我心裏依然不安，想不出他們搗的什麼鬼，短短十分鐘等得十分焦急，終於聽見有腳步聲漸近漸快，在我對面的門聲響處，出現了一個穿和服著裙子的人，仔細一看，原來就是主辦我們案子的檢察官，他搓搓雙手，裝做笑容連聲說：

「噢，很冷很冷！」

他回頭命看守關門，獨個兒和我對談，點點頭行禮說：

「叫你久等了，坐下來吧。」

他從袖袋裏摸出一聽黑標二號「惹斯敏」香煙放於桌子上，問我：

「你穿太少了，冷吧！」

「謝謝，不冷。」

「……張君，我為你們的案子傷透了腦筋，想要趕快結束，讓你們能夠早日恢復自由，所以不辭勞苦，在這深夜也得來這裏問案，這次不分身分，我們隨便談談，請你照實給我說好不好，請吸煙吧，來來，不要客氣。」

「謝謝，我好久不吸了，現在不敢吸……」

我看穿了他的鬼胎，心裏開始警戒，他說：

「那末……我問你，你是不是計劃要使臺灣獨立？」

「未必是這樣。」

「請不要隱諱，要是我站在你們的立場，或許還要比你們更激烈些，事實臺灣被壓迫得很厲害，怪不得你們要反抗日本……」

「是的，但是我們是知識分子，絕不隨便輕舉妄動，在要發動一個計劃時，自會先考慮是否有可能性……」

「那末你以為臺灣沒有獨立的可能麼？」

「當然沒有可能，第一獨立所需要的條件完全沒有具備，況且也沒有陸海空軍的軍備，怎能獨立？」

「但是你們不是主張要獨立麼？要聯合世界上的被壓迫階級和弱小民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我確實這樣主張過，但我們要打倒的不是日本帝國，而是日本帝國主義。」

「結果不是一樣麼？」

「不一樣，日本國家與日本帝國主義完全兩樣。」

「那末你們的意思是說日本如果不採取帝國主義政策就好了，是不？」

「是的。」

「你們組織臺灣革命青年團的目的在哪裏？」

「沒有這個組織。」

「為什麼用這個名稱？」

「我們在廣州留學，不像朝鮮人受免費的優待，因為朝鮮人對中國革命有貢獻，我們絲毫沒有成績，所以不能享受同等的待遇，我們為要爭取免費的關係，我單獨替臺灣人做些實績，所以才使用了這個名稱。」

「你無論如何總是否認這個團體組織，但你們的同志都供認了，叫我怎麼辦呢？」

「那是受了你們的刑訊誘導所造成的記錄，反正最後事實會解決一切，我個人否認也沒有用，我的口供由我負責，他們的由他們負責，最後物證和我們的綜合口供，便是判決我們犯罪的根據，是不是該這樣辦呢？」

「那末宣言是怎麼發出的，譬如誰寫稿子？誰付錢？誰印刷？誰拿去散發的？」

「我寫稿子，自己拿去黃埔軍官學校印刷，印刷免費，等到孫中山逝世二週年紀念日我交給學生們拿去分發的，交給誰，已經記不清了。」

「交給了郭德金、張月澄等人沒有？」

「也許有也許沒有，因為人多，交給誰忘了，還是請直接問他們好，假使我說錯了，倒不好意思。」

「你有沒有參加過四國代表歡迎會，當了張月澄的翻譯？」

「參加了，但擔任臺灣代表講演的是我，不是張月澄，我不會講廣州話，自然不能翻譯。當翻譯的也許是張月澄，這我已經記不清，請問他本人自能明白的。」

我們的同志過去供認了什麼，我還沒有弄清楚，既不能一概否認，也不能貿然承認，所

以我含糊答辯，讓他們自己供，自己負責，只要能脫治安維持法違反第一條就算成功，全部否認也沒有效果。檢察官看透了我的心事，笑說：

「你碰著重點就躲開，真有本事，可是報紙上登的代表是張月澄，不是你啊，你看。」

他指一張廣州《民國日報》的記事讓我看。

「那是登錯了吧，我不想逃避我的責任，講演後見新聞記者的是張月澄，可能因此弄錯了吧，我不會講廣州話，自然不能翻譯，也不會接見記者。」

「你講演的內容是什麼？」

「和登在報紙上的一樣。」

他拿起報紙看看後說：

「不是這麼簡單吧，詳細再說一遍。」

「忘了，要點都在報紙上。」

「以外你做了什麼？」

「凡檢察官對我所舉的犯罪事實我都承認了，以外還有什麼？」

「不，你還做了不少事情吧，例如你回臺一定銜有什麼使命……」

「沒有，因為我父親不給我寄學費，所以回來的。」

「為什麼不給你寄學費？」

「因為他不喜歡我在廣州唸書。」

檢察官表現不滿顏色說：

「你誠然有國士之風，但是為了你一個人不坦白，害了你們全體的同志，這案件可能拖得很久，我這樣誠心誠意三更夜半到這裏問案，你既然不顧他人受累，我也沒法子幫你們的忙，實在很可惜！」

他抱怨似的發了牢騷，想要促我說話，但我垂下頭不答，他似乎覺得多問也沒有下文，沒有做記錄，用指頭把鉛筆撚撚，站起來說：

「太晚了，休息吧。」

他表現很沮喪的神情走了。我和他相反的跟著在門外等候的看守，走回自己的監房，來回的心緒，好像出入陰陽的境地一明一暗。

這回訊問，算是檢察局最後一次，以後就被起訴，把案子送交豫審庭繼續偵查。豫審的偵查，意外地拖延，在這期間，他們根據林同志的日記派人到廣州去實地調查，案中人林文騰和洪紹潭又在這時相繼被捕，供詞上發生了矛盾，使司法當局決不了獄。

因為革命青年團確實存在，被告全部都是團員，按法須適用治安維持法第一條，檢察官的起訴理由是對的，但我們一致推翻了以前的口供，否認有青年團的組織，所以豫審庭認為援引第一條為不當，主張引用第三條。犯第一條的團體組織是刑期十年以下，第三條的宣傳幫助行為是七年以下，同志們不明量刑輕重，在警察署和檢察局隨便答辯，遂被拉入了第一條的陷阱。

日本當局逮捕了林文騰、洪紹潭，以為能夠澄清案情的內容，不料反呈混雜，因為他們認為這兩人都是要犯，我們的同志又誤算文騰、紹潭都不會回來，隨便把卸不開的責任都推諉到他們身上，致使案情更趨十分微妙複雜。

幸而紹潭事實上沒有參加青年團，他對被誣極口否認，文騰初回臺灣，不知案情底細，含糊答辯，結果他們的供詞和事實不符，我們利用這矛盾，改造案件，致使辦案人員無法判斷。

為了文騰和紹潭的新供詞，我們不得不改變口供，重新應付司法當局，沒有幾天，我們所決定的方針連絡成功，供詞漸趨一致，尤其紹潭病歿，文騰把無可卸的責任一肩挑盡，於是案情的矛盾自形解消，容易讓豫審判官判決了。

豫審庭獲得了結論，判決我們應以觸犯維持法第三條起訴，檢察局不服，提出控訴，官司竟打入覆審部去，覆審部慎重偵查的結果，仍認為以第三條起訴為妥，把案子發交臺北地方法院公判。這期間前後費了兩年有餘，算是臺灣豫審時間長期的一次記錄。

54 插曲

牢獄生涯，悲歡歲月，在我們和法院鬥法期間，我同志們有不少「傑作」。

前面說過，我們接到陳辰同在漳州陣亡的消息，證實無訛之後，我們把所有的罪責，都卸在他一人身上，使這位烈士錦上添花，連宣言的印刷，《臺灣先鋒》的編輯……盡掛在他的月桂冠，把這位英雄掛滿了勳章。日本當局對這死無對證的事，不加深究，不了了之，落得賣些人情。

A 佯狂

我們的同志，有一個人生病，整日大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初時，看守罵他胡鬧，後來知道他不大正常，就讓他隨便叫嚷，嚷得大家都不能安靜，我每聽見他叫嚷，連書也看不下去，所謂內疚神明，我責備自己害了他，也怪他未免過於軟弱，經不起輕微的考驗，便這樣垮下來，如果他的親人知道了，不知將如何傷感，每想及此，如萬箭穿心！

他初發時，是間歇性的呼喊，後來變本加厲，連續不休，而且帶有音樂旋律的抑揚，把

「打」放高拉長，「倒」音放低，然後一氣唱「日本帝國主義」，日以繼夜，既不疲乏，又不嘶啞。

看守無法處理，只得報告法院，經過了一番簡單的試驗，也就讓他保外治療了。後來，我出獄會見他的時候，他對我說那時候的病，是他扮演的一場把戲。

B　罵天皇

和裝瘋的同志相反，而令我們欣慰的，是盧炳欽和簡錦銘兩小位同志。他們都是十六、七歲的少年，在廣州中學唸書的時候，平常袋子裏放著兩個小石頭寫「革命」兩個字以示堅決的意志。這次被捕，我們很擔心他們是否經得起考驗，打聽結果，出乎意料的泰然自若，他們毫不悲愁怨嘆。

有一次，炳欽因為在監獄報紙上的日本天皇照片，用鉛筆畫兩撇很難看的馬占山型鬍鬚，寫上「馬鹿野郎！」四個字。這在日人看來，是天大的不敬，看守一發現，即報告看守長，看守長報告典獄，典獄誠惶誠恐，想不出辦法，要是報告法院，當然成立「不敬罪」，但監獄當局也卸不了責任；不報告呢，又怕事洩受上峯譴責，左右為難，鬧了半天，才決定不報告，但須加以處罰，就把他用皮帶綑成一個球形，叫他吃了兩三個鐘頭的苦頭才放開。可是他怡然受之，絕無後悔。這件事好像給予我們一服興奮劑，鼓起了我們的勇氣。

C 報復

我們被監禁的第二監舍全是單身房，一個房只關一個人。關在這裏的不是重刑犯便是政治思想犯，監視較為嚴密，待遇卻比別的監舍好一點，對我們政治犯特別分配一張朱漆小桌子，一領滾邊蓆子，表示優待。可是一犯獄規，他們可以隨時收回，並禁止通信和閱讀監獄圖書，由所犯規的輕重而定日期的長短。

受過這種處罰的有盧炳欽、林文騰和我三個人。炳欽和文騰被處罰一個月，我是兩個鐘頭。炳欽被罰的原因，是為了犯前述的不敬罪，文騰是在法院拘留所牆壁上寫了「若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沒有出路」，我是為了和同志秘密通訊被發現，且和看守抬槓而惹出岔子的。

我們的秘密通訊因為過於頻繁，看守也漸起懷疑，開始注意我們的行動。有一次我們的一位同志，正在發信號的時候被撞見，挨了一頓打，我恨不得替他報復，不時在窺覷機會。

一兩天後，我的發信也被他發現了。我把發信的指頭忽然改變為拂拭塵埃的手勢，故意不縮回，看守來了，他不知道我的詭計，咆哮地詰問我：

「你幹什麼？」

「這裏有土……」

「我問你，你寫什麼？」

「沒有啊，我正在清除這些髒東西。」

「胡說，你寫什麼了？你說！」

我裝做發脾氣，反問他：

「寫了什麼字？你說！」

「你寫什麼，我哪知道，但你寫什麼，向對方發信號的！」

「笑話，向誰？」

他答不出誰，暴跳起來，罵道：

「御前狡猾胡鬧！」

狠狠地打開門再叫喊：

「說！御前不說，乃公不答應你！」

我採取反攻的姿勢，更兇的喝道：

「馬鹿野郎，貴樣放什麼屁！」

「唉呀，你膽子好大，罵本官貴樣馬鹿野郎！」

「當然啊，你罵我御前，我就罵你貴樣，有什麼不對！」

「放屁！我犯了什麼規？你說！我不答應你，來，跟我到看守長那邊去講理！」

他站住不動，不肯跟我走，改變口氣說：

「你真的不承認你的錯誤？」

「不，不承認！到底你看我寫了什麼字，你得說明，說吧，寫了什麼字？」

「你寫得那麼快，我哪能看得出來？」

「看不出來還說啥！你誣賴我，故意找我麻煩，來來，我們一同找看守長去！」

他下不了台，怒氣塡胸，又想不出辦法，指著我的桌子和監獄新聞說：

「都拿出來，不借給你了，同時禁止你對外通信！」

「誰要你這些臭東西，拿走！」

我把小桌子和報紙都還給他，他把門使勁的關起來，狠狠地走開。我雖然打了勝仗，但受良心譴責，很難過，他換了班又再値班時，到我的鐵窗前窺探，我不理他，他打開門說：

「四三六號，你沒有桌子不方便吧，哪，拿回去吧。」

我知道他要求和，本是故意和他無理取鬧，所以我答：「謝謝」，就把放在廊下的小桌子挪上房裏了。他又說：

「你要寫信對我說吧……這裏還有小報紙拿去吧。」

他暗示前此的禁令取消了，我本無意和這小獄吏做對頭，就此和解。

我自曉得我的罪名是「治安維持法違反」以後，便除掉了以前溫馴服從的假面具，而改變態度，以國士自居，不讓他們輕視，有時候還要蠻橫地和他們鬥爭。

D 弄險

有一次，我們從法院回來，通過監獄小門口時，德金跟在我後面，伸出手撞了我一下，

我知道他有了苗頭，因為我們帶著手銬，交接不便，他等我雙手垂下去，立即把密信交給我，這動作竟被在監獄大門口的守衛瞧見了。他馬上報告看守部長，說親眼看見我們有什麼東西授受。

我們剛到獄裏八卦廊，部長便命看守搜查我們的身體。我一看情形不對，很快地把放在袋子裏的密書塞進貼身內褲裏去，他們在我們的口袋找不到什麼，部長疑惑不釋，命看守把我們的手銬打開，叫我們蹲在看守台前受盤查，我們都否認有何授受，部長說：

「你們如果不承認，得脫下衣服，再檢查。」

我作賊心虛，假裝憤慨，抗議：

「好的，要是找不著什麼的時候，怎麼辦呢？」

部長發脾氣說：

「要怎麼樣？查不著就算了，還要怎麼辦！」

我心裡恐慌，覺得非和他力爭不可，因為恐怕密書和案子有關，被發現了，不僅前功盡廢，且將累及其他同志，我以威壓的態度責他：

「不行！你們否認我們是政治犯？不能那麼隨便，剛才你們已經搜查過一次了，證明什麼都沒有，憑什麼又要裸體檢查，侮辱我們！」

「你說要怎麼辦？」

「我說裸體檢查是可以的，但查不出什麼的時候，我們要求處罰胡報的看守！」

部長回頭以目試探跑來報告的守衛，守衛慌忙答道：

「奇怪，我明明望見他們有什麼東西相接手的樣子……」

守衛表現失去了自信的神情，我笑一聲，把握在手裏的《老子》小冊子讓他看，問他：

「你看的是不是這個？」

守衛低頭覷視部長的顏色，部長會意說：

「好了，也許是誤會……都回去吧。」

回到監房，我因氣憤緊張，又怕隨後還有麻煩，不看那張密書，立刻撕破丟進廁所裏去了。

E 狗戲

我們在豫審庭受訊中，聽見一件有趣的插話，說是我們的《臺灣先鋒》後頁，刊登著兩位日本御用紳士辜顯榮（註四九）和林熊徵（註五〇）為本刊的贊助人，這噱頭是張月澄導演的。日本當局當然不信這兩位頭號紳士會公然做這種事，但形式上也得傳訊錄供銷案。不意一訊問，兩紳士口供竟不一致，林熊徵率直承認接到了《臺灣先鋒》，但否認和我們有關係。辜顯榮卻一口咬定，說他連《臺灣先鋒》的名字也沒有聽過，更不會當什麼贊助人，他強調他是清白忠君愛國。想不到他放在寢室的《臺灣先鋒》竟被法警搜出來，和供詞發生了矛盾。

豫審判官大傷腦筋，責他沒有說實話，致使案情趨於複雜，不好辦，他辯明因為不諳世

故，以為一聲不知，百般無事，供述他如何厭惡青年們的活動，藐視孫中山，所以在《臺灣先鋒》封面裏的孫中山照片的嘴上塗上一件東西，請庭上一見明瞭。豫審判官翻開看看，果然如此……便把涉嫌付諸一笑，結了案。

註四九：辜顯榮（一八八六年～一九三七年），字耀星，鹿港人。一八九五年因引日軍進台北城有功受日人賞識，而開始其顯赫生涯，曾有「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民」之言；一八九九年任台北保甲局局長，一九二一年任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一九三四年更被勅選貴族院議員。

註五〇：林熊徵：板橋林家子弟，為林本源家族代言人。

55 暴動

我們的拘押進入了第二年，臺灣社會運動的發展，可謂達至登峰造極；文協左右分裂後，左派為爭取大眾的支持，漸趨激烈，吸收了東京「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和留學中國的學生，組織巡迴講演團，努力擴大思想宣傳。民國十六、七年間，每年的講演達四百餘次，使日本當局天天為「監臨」疲於奔命。

他們一方面出版《大眾時報》以言論攻擊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主張解放弱小民族及無產階級，宣揚協會的主義宗旨；一方面參加各種抗日運動，以行動支持學生罷課或勞動糾紛及小作爭議，掀起了無數的鬥爭事件，就中規模最大的是「新竹騷擾事件」和「臺南廢墓地事件」，兩次都犧牲了不少民眾。

所謂新竹騷擾事件，是因為文協新竹支部委員陳繼章、楊國成兩人為支部主辦「反對土地政策與產業政策」演講大會，日本當局以其宣傳文字過激，涉嫌觸犯「出版法」，各處以二十日拘押。

期滿釋放後，他們又在新竹街西門媽姐廟開「糾彈警察政談講演大會」，攻擊警察野蠻欺

壓民眾，講演者都以激烈言詞攻擊日本政府和警察，造成會場起了爆炸性的緊張，臨監官見形勢不穩，對演講者連續加以「中止」，因此更使會場陷於混亂，於是警察檢舉了陳繼章等二人，同時命令解散演講大會。

鄭明錄、林碧梧、張信義、林冬桂等文協幹部認為警察的處理不當，連袂往「郡役所」要對警察課抗議，興奮激昂的群眾約三百餘人跟著他們的後面，高喊口號遊行。

警察再三命令解散，民眾不聽，就和警察起了衝突，郡役所的玻璃窗被群眾的亂石打得碎片紛飛，無一倖免。警察當局小題大作，認為這是民眾暴動，動員了全州管轄的警察前來鎮壓，當場檢舉了六十三人，才歸平靜。

為了這起事件，文協幹部自不待說，連民眾被檢舉的總數達一百零九人，全部被解押臺北監獄候審。

這時我們的鐵窗飯店為這一批不速之客，頓告爆滿。顧客一多，熱鬧的氣氛給予我們很大的刺激。鄭明錄、林碧梧等人都和我很熟，不意竟又在這裏結成難友。我們獲悉抗日運動如火如荼的在擴大蔓延中，認為所播的種子沒有浪費，臺灣民心既然不死，自有光明遠景，至感欣慰。

以前，我在二十七號房和德金住對面的時候，只有薛玉龍、薛玉虎、王詩琅、小澤一等六、七人的案外熟客，這次不但有許多熟識的同志，並且有許多政治運動朋友，監獄變成了我們的臨時大會場。

新竹事件很快的就結束，除了七十一人有罪外，文協幹部全部被宣判無罪釋放。我們對日人這次的處置，覺得還差強人意。這要是在沒有法治的國家，文協幹部級的罪刑，是不能倖免的。日本當局依法只能處罰證據充分的犯罪者，雖則反日分子也無例外。

新竹案件的領導者裏頭，有個傢伙被關在離我下面的第二間房，因為房子同列同向，通信不大方便，我設法和他通信過幾次都不理我。聽說他是最激烈的分子，曾跟著蔡培火的講演後面，走去跪在講臺上大呼：「天乎！如果蔡培火的話是出於天良，我願被天雷殛死！」轟動一時，料不到他一進了監獄，竟怕得肝膽俱破，哭訴他確實無罪，為表示謹慎恭順，絕對不敢和我們通消息，昔日的英雄如今竟是一隻紙老虎！

56 胖　福

新竹事件被告中，有一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張某，他以肥胖名聞全島，大概有兩百多磅，和日本力士不相上下。他每次被捕，每次增加體重，我形容他像河馬，雖然大胖卻很結實，和獄裏難友一起賽跑，絕不落人之後。

全監獄除我們同案人外，運動時間一般囚犯都被放出運動場集團體操，只是我們被分離在一個走廊上，單獨運動，和外人完全隔絕。我利用這單獨運動的機會，有了一個很好的收穫。

本來我走路搖搖擺擺，姿勢很難看，既不像日本武士的擺威風，也不像小丑的扭屁股，朋友們常笑我有這毛病，我也很想把這毛病矯正過來，在走廊兩邊的小水溝紅磚直線岸上，仿德國軍人的步伐，便走來走去，差不多走了六個月，就把這老毛病糾正了。可見人在任何惡劣環境，只要能善處，便能使其於我有利。

有一天，我被帶去洗澡，聽見一個看守正在怒斥張某：

「不行啊，你一個人用去了半池水，叫別人家哪有得洗！」

胖子不答。若以春秋筆法論之，錯在看守，看守明知他是個大塊頭，就不該叫他先洗，他一下水，就溢出和他同體積的水量，這是定理，怪不得他的。看守自言自語似地說：

「下次不讓你先洗了，以後應該排在最末班次。」

胖子受了體格之累，被宣佈洗澡永遠殿後。不過他的體胖也有點好處，第一耐得久坐，屁股不結疤，第二人家夜裏睡不著，他白天睡不夠，人家坐牢三日，他所意識的時間還不到一天，照這樣子計算，他的受刑只抵人家的三分之一。

57 解禁書

我在「未決監」期間，整天讀書，上半天讀日文，下半天讀中文。讀的書相當複雜，有社會科學、宗教、諸子百家種種，新的、舊的參差不一；只雜誌一類，每月有《中央公論》、《改造》、《文藝春秋》、《紅旗》、《納布》等等；社會科學有各種經濟學，左右兩派的著作都有，監獄當局看我所要的書五花八門，覺得很奇怪。有一天，典獄找我說話，問我：

「你要那麼多的左傾刊物有什麼意思？」

「要檢討研究，但右傾書刊也不少啊。」

「什麼目的？」

「就是要檢討各派思想的利弊得失。」

「過去你不是都讀過了麼？」

「是的，過去讀的只是讀，不加咀嚼，沒有加以研究檢討，以前的思想是別人家的、盲從的，這次我想要有我自己的思想……。」

「好的，你所需要的書我都儘量許可給你……。」

果然以後監獄當局不限制我所要的書，因此我確實逐漸建立了我自己的思想體系。

58 公判

檢察官幾次的控訴無效，拖延了兩年多，豫審庭依然把我們的案件以「治安維持法」違反第三條送交法院公判。公判前，看守時常試探我們對公判會採取的態度，給我們暗示我們如果肯對法官認錯，可能獲得減刑。

在公判時，我們不但不認錯，而且主張我們的反抗是出於被迫的防衛，舉例暴露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無理的壓迫。

我說：「如果政府認定我們是日本國民，就不應該對我們差別待遇，剝奪我們應有的國民權利，政府既然不准我們享受日本憲法的保障，便等於不承認我們為國民，國家既不以國民待我們，我們自不能以國民身分為國家服務，這是必然之理，到底日本肯不肯承認我們是國民，這倒是我們要反問當局的。」裁判長聽了我的辯論，突如質問我：

「那末被告認為臺灣的政治應該如何改革呢？」

這意外的質問，使我一時無言可答，萬想不到裁判長會發出這案外的試題，既不敢說要獨立，又不願意屈膝投降，猶豫片刻才答道：

「應……實施自治制度，最低限度應使我們能夠獲得享受同一個憲法的保障……。」

「嗯，被告還有什麼話說麼？」

裁判長面無表情地問了這一句話，就把案卷合起來，表示不再問了。這時我心裡慚愧至極，自責缺乏勇氣鬥爭到底，竟承認願為日本國民，聲言要求自治。傷心懊悔，怕和人家見面。

退庭之後，我們走過了一個長廊，有許多同志和親戚朋友集在那裏等我們過路。我不敢抬頭，一直走過去，有一位同志的父親走近我的身邊指責：

「唉呀！你敢信口胡說！唉呀，你不該說那麼激烈的話，太過激了！」

我知道他愛子心切，認為我說的話，會傷裁判長的感情，對我們的案子不利，隨而會累及他的兒子。反之，另有一批青年跑到我的面前，舉手說：

「勇敢，講得好，答得對！」

他們用表情和言語鼓舞我，我越感覺不安，受之有愧，慌忙穿過了他們的包圍，奔往拘留所去。

他們怎麼能夠聽見我們的答辯？我們的公判是禁止旁聽的，只在開庭前，讓一般旁聽人進入法庭參觀，問明了身分，在要正式開始問案時，就命旁聽人退席了，旁聽怎能聽見我們的供詞？

第一審公判的結果，林文騰四年，郭德金和我三年，張月澄以下有的二年，最低一年，

全部有罪，但張月澄等人都准予緩刑。何以林文騰的罪多上了一年呢？詳細的原因雖然不知，按法理與事實說，他的刑期不應該比張月澄重，因為他比德金和月澄早離開廣州從軍北伐，所謂廣州事件的犯案不能比我們多，全案本身也不是以他為中心，所以對他的判刑我認為確有偏差。

不過我想：當局也許看文騰年紀大，思想已經成熟，絕不能視同附和之眾；再則有幾位同志未預料到他會被日警抓回來，把卸不開的責任，都算了他的賬，為此對他量刑較重。

59 控訴

刑期判決後，是否要上訴？對此我煩悶了一個多星期，猶豫不決。如果上訴，等於承認日本的法律，也即是承認日本為自己的國家，違背初衷，對不起革命；不上訴呢，林文騰判四年，郭德金判三年，似乎受了我的牽累，我對他們不無有些責任；假使我能減刑，他們也自有連帶減刑的希望。

聽說檢察官和裁判官存心要重懲我，所以他們的量刑也因我而苛了。前面說過，本案的犯罪行為，我比德金等早離開四個月，這期間所發生的連續犯罪行為，都掛在他們身上，如果我不能減刑，他們也沒有理由減輕。

雖然文騰、德金對一、二年刑期的增減，不在乎其事，但我還不敢輕輕放棄上訴。正在焦心考慮的時候，忽然接到德金七十多歲的老母，因為德金被判徒刑，憂愁害病，日夜傷心流淚。這個消息，使我決意提起上訴，但面子上礙難啟齒，恰巧看守又來慫恿我們上訴，我乘這機會辦了手續，並立刻通知了德金和文騰。

上訴提審前，看守再度來勸我們向法院認錯道歉，這時我曾聽見黑色聯盟的負責人小澤

等人雖認了錯道歉。結果，仍未獲得減刑，小澤悔不當初，痛斥法院食言；有這前車可鑑，所以我不肯貿然答應，提出了三個條件，試探法院的反應如何，再作道理，條件是：

1.禁止旁聽應徹底，須關上窗門，密閉窗幔，防止供詞聲音外洩。

2.供詞內容不得刊登於新聞雜誌。

3.確實減刑。

看守答應將我的條件轉達法院，我們就靜待審判。開庭日，果然窗門都密閉，窗帳也放下來了。文騰、德金和我排成一列，裁判長和兩位判官外，檢察官照例出庭準備論告，這回的檢察官又是勁敵石橋首席，他怎麼會到臺北高等法院來出庭，我心裏有點慌張。在臺中曾和他交鋒過幾回合，這次得對他低頭認錯，不免很難為情，有損整個臺灣人的面子，著實心有不甘。裁判長先叫我訊問，照例問明身分，沉默了一會兒，探頭問我：

「你怎麼上訴了？」

我不回話，垂下頭，咬緊牙關，等他再問，他也許知道我的意思，又問：

「你認為刑期太重是不？」

我點頭道是，他微笑說：

「三年不算重啊，你有什麼要申辯麼？」

我搖頭表示沒有，他似乎不想追究，裝出嚴肅的態度問道：

「你想你們過去所做的行為對麼？」

「不對……對不起……。」

回答後，我行個禮表示歉疚。

「還有什麼話要說麼？」

「沒有。」

「好了……。」

裁判長轉問郭德金：

「郭德金……你呢？」

「我也沒有……」

「林文騰你呢？」

「有！」

這意外的回合，不僅法官緊張起來，連我和德金都吃了一驚，石橋檢察官挺胸坐著不動，目不轉睛的注視文騰。文騰不管他，口若懸河，發表了一篇大議論，說他是信奉克魯泡特金的人道主義，贊成巴枯寧的互助論，要求日本統治臺灣，應以人道主義為主，以合作互助為旨，必須愛護臺灣人，施行善政，才能使臺灣人心服。

我暗暗叫苦，想伸手去制止他，中間卻隔著德金，鞭長莫及。

他大概沒想到克魯泡特金和巴枯寧是無政府主義者，當時日本政府最警戒的是無政府主義，不是共產主義，因為這時期的共產主義者還沒有做出過激的行動，一切的直接行動暴力

行為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幹的，所以我為他揑了一把汗。

到底他的用意何在？是故意要「避輕就重」證明他比我們更「革命」呢？抑或要犧牲自己減輕我們的罪刑呢？確實猜不出他的心情。

石橋聽完了我們的答辯，站起來論告：

「被告張深切如果以物證為據，或許難能繩之以法……」

他好像看過了我提交法院的辯訴書，故對物證方面避而不論，主張治安維持法是懲治觀念情態思想犯的法律，繼說：

「由此審查張深切的言論及他在第一審所答的供詞，或其他所表現的言動，可以判斷他無疑是反對我帝國的統治，企圖推翻現政府，實現臺灣的獨立……」

他舉出革命青年團的各種宣言和《臺灣先鋒》的言論為證，說本案如適用新施行的治安維持法，罪至極刑，故第一審判決三年刑期尚無不當，要求維持原判。但他的口氣不甚激烈，似乎留有通融的餘地。

最後宣判，林文騰減不了刑，仍判決四年，我和德金各減一年，定讞二年，這樣我們的案子就算結束了。

對第二審的判刑，文騰決定不上訴，我和德金自無再控訴之理，就此準備服役，渡正式的犯人生活。其他同志在第一審判決後，早已全部被釋放，現在只剩文騰、德金和我三個人，不無寂寞之感，幸喜其他同志都已經回家享受天倫之樂，卻也心安得多了。

60 閱牆

我們被檢舉的那一年，可以說是臺灣社會運動的一大轉變期，文協開始分裂，連雲卿、王敏川、林碧梧、鄭明祿、張信義等人支持急進派，蔣渭水、彭華英、王鍾麟、蔡式穀、謝春木等人堅持中立，林獻堂、蔡培火、洪元煌等被迫走入右翼陣營，形成了三分鼎立，群雄割據的局面。

文協急進派在文協未改組以前，早已左傾，改組後，失去了資產階級的支持，更左轉激烈，拿昨日之友作今日之敵，加以無情的抨擊。

保守派被急進派打垮，一時站不住腳，退入右方休息，由此而產生了中間派和左派爭天下，這一派的主要人物是蔣渭水、彭華英、謝春木、黃旺成等人，及右派中的一部份進步分子，勃勃欲試，計劃組織政黨來與文協分庭抗禮。

林獻堂、蔡培火等人自然不甘寂寞，亟蕲東山再起，派代表去試探蔣渭水一派的計劃，由這楔機而助產了一個「臺灣民黨」出來，可是這一組織因為過於急就的野合，而且沒有依例和日本當局疏通好，行動又較為露骨，不到數月就被當局扼殺而亡了。

臺灣民黨一被解散，更刺激了蔣、林兩派，促進其大團結，兩派協議的結果，決定於民國十六年七月十日，在臺中聚英樓舉行「民眾黨」成立大會，這在臺灣政治運動史上，算是創立了一個新紀元。當時的主要幹部除蔣、林外，有蔡培火、彭華英、謝春木、郭德金、黃旺成、黃周、洪元煌、王鍾麟、陳炘、陳逢源、莊垂勝、葉榮鐘等人，都是兩派的精銳。

但這兩派的野合，本是吳越同舟，同床異夢，是不自然的配合，所以不久就鬧「仳離」，況且臺灣民眾對妥協主義已不感興趣，掀不起有力的運動，於是黨為適應客觀情勢，不得不把黨策稍向左轉，打從無產階層去爭取大眾的支持。

民眾黨因為比新文協遲一步走入無產階層，而且被右派牽制著，左顧右盼，不能如意伸展，所以他們只能爭取勞工和小市民階級的一部分群眾做地盤。

新文協自拋開了資產階級，就以擁護無產階級權益的姿態，深入廣大的民眾基層，不僅和農民組合聯盟，且和極左團體提攜，掀起了臺灣空前未有的階級鬥爭，但他們多是未經訓練的新兵，好戰易敗，患了嚴重的「小兒病」，自毀了新文協的領導力。

民眾黨趁文協挫折的機會，爭取小市民階級的支持，進入農工無產階層，組織了許多勞工團體和青年會，及其他各種俱樂部，大有席捲農民組合之勢，於是就和文協農組開始尖銳的鬥爭。

日本當局看他們骨肉相殘，自然拍掌稱快，暗地裏火上潑油，促其引火自焚，兩敗俱傷；所以當局對他們的爭取地盤，非獨袖手旁觀，不加干涉，倒有意無意地助長其尖銳化的發展，

致使兩派明目張膽，愈趨激烈。

這時新「治安維持法」已經重行公佈，凡觸犯第一條（陰謀變革國體否認私有財產之團體組織者）可處以極刑，民眾黨右派聞風色變，林獻堂即急流勇退，只當顧問，不願負實際的責任；韓石泉等人雖為黨的主要幹部，及看見黨一直左傾，無法挽回，也就溜之大吉了。

其實民眾黨本旨並沒有左傾，黨首蔣渭水是文協的創立人，他崇拜孫總理，信奉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只因受了北伐時期國共合作的影響，採取和國民黨同一政策，計劃把這政策實施於殖民地的臺灣，所以發生了自相矛盾的後果。

蔡培火一派本來是屬於溫和的民族主義者，主張以合法行動申請臺灣自治，反對以非法行動脫離日本的統治，而蔣渭水一派竟奉行三民主義，欲達成其民族自決的目的，而且不擇手段，和農工商學及無產階級組織聯合戰線，爭取臺灣的解放，這由林獻堂、蔡培火一派看來，當認為是要不得的危險，所以他們不得不脫黨向日本當局表白他們的立場。

61 蔣渭水

蔣渭水的思想行為，無論是否正確，總之他為臺灣親手建立了兩個歷史性的組織，犧牲了他的一生（他本心要為臺灣謀幸福，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腳踏實地，組織了臺灣文化協會，啟發臺灣民眾，進而組織臺灣民眾黨，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鞠躬盡瘁）。這種偉大的精神，在臺灣社會運動史上，實堪大書特書的。

我們看他的獄中記《快入來辭》、《入獄感想》、《再遊北署》、《三遊北署》，及其他文獻或遺囑，就能夠認識他的性格。

我是個特殊的「孤立主義」者，不參加任何黨派，但我相信無論奉什麼主義思想，祇要他真實為大眾，真實為國家民族人類謀幸福，而有所貢獻的都可以合作，只是是否真實？是否誠意？吾人常常覺得很難找出可靠的標準。

從各角度觀察蔣渭水（註五〇）的為人，我毫不遲疑地承認他是比較純潔的革命志士。他有人溺己溺的精神，視監獄若自己的家，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在彌留時猶留下遺囑云：

臺灣的社會運動，已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的勝利在即，希望我青年同志仍須奮鬥努力，請老同志加強團結，積極援助青年同志，期早日實現解放同胞。　此囑

立會人　羅萬俥　李友三
杜聰明　蔣竹南
賴金圳　蔣渭川

（譯自《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卷日文）

他的大半生，可謂把全部精神貢獻於臺灣社會，自就讀臺北醫專，計劃暗殺袁世凱起，已是一位許身國家民族的志士。他本來可以靠醫術致富成為大亨，但他認為與其治少數人的病，不如治臺胞全體的病；與其治他人能治的病，不如治人不肯治而又難治之症。他表面上雖然承認日本的統治權，實際上卻是徹底反日的民族自決主義者，他所擬的民眾黨「綱領解釋案」，流露著他思想的一端。

民衆黨黨綱大要：

一、確立民本政治

要旨：實現立憲政治

說明：

1. 要求制定臺灣憲法
2. 反對把持三權於一手的總督專制政治
3. 根據臺灣憲法完全分立司法、立法、行政三權，並要求賦予臺灣人有立法部的協讚權

二、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

要旨：確立生存權，擁護農工階級，提高其生活水準，平均貧富之差

說明：

1. 基於耕者有其田的原理，獎勵自作農，防止大地主的產生
2. 廢除特權階級，撲滅大資本家
3. 採用社會主義原則，各種大事業應歸公營，防止資本主義的跋扈

三、革除社會制度的缺陷

要旨：確立社會生活的自由　實行男女平等　改革社會的陋習

說明：

1. 反對人身買賣，廢止聘金制度
2. 提倡婚姻自由，勵行一夫一婦制
3. 普及女子教育，獎勵婦女職業
4. 普及科學智識，撲滅迷信惡習

5. 節省冠婚喪祭費，嚴禁吸食鴉片
6. 獎勵體育

看他的遺囑和這篇政治綱領，我覺得他是一位實事求是的革命家。遺囑表現他的真實思想，政治綱領表示他的革命方策，他的最終目標是在無產階級的解放，但他不走共產主義路線，而選擇三民主義的穩健方略，以合法運動爭取臺灣憲法的實施，以憲法的實施，爭取民族自決，再由民族自決，爭取無產階級的福利。

他在臨終的時候，率爾認定臺灣的社會運動已進入第三期——無產階級的勝利在即，企望在短期內實現社會主義，這也許他看錯了當時的社會情勢，或因出於希求無產階級的勝利過於殷切，為鼓勵同志，才留下了這樣的遺囑。我相信他的實際目標還是在於民族解放，而以解放無產階級為其戰略，這要是詳細分析他的主義思想，便可以斷言。

他所了解、所奉行的三民主義，或許和現在國民黨的見解不太相同，然而當時他無疑是臺灣唯一最忠實的三民主義信徒，絕不像其他許多職業性的社會運動家或黨棍，長袖善舞，時楚時秦。

他所領導的文協和民眾黨，對臺灣的貢獻甚大，在過渡期的運動程序上和策略上而言，不能說是犯了錯誤；雖然他曾被左派攻擊得體無完膚，但平心而論，這是屬於派別的鬥爭，不是公正的批判，不過當時他們都盡了時代使命，誰是誰非，只是門戶之見，誰也無權判決

的。

我和蔣渭水見面的機會不多，幾次我要往日本或祖國，在臺北寄足時，順便去訪問過他，但沒有深交。他不反對任何主義思想，只要有志打倒日本解放臺灣者，便認為是同志。他素性倜儻不羈，外貌彷彿像白面書生，胸中卻藏有無限的愛國熱情。平時喜歡穿中國衣服，說話溫諄可親，凡接觸過他的青年，無不受其熱情所感召。

由他所領導的團體，自民眾黨起，至臺灣工友總聯盟、臺灣農民協會、青年會、學生會、小商民協會等，鼎盛時期總數達四十八個單位，由此可想見他有多大的領導力。

民眾黨和文協正在展開猛烈鬥爭時期，我們還在縲絏之中，既沒有加入漩渦，更不能預防日本當局的分化作用，等到出獄的時候，他們已鬧至不可收拾了。

註五〇：蔣渭水（一八九〇年～一九三一年），字雪谷，宜蘭人，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是「台灣文化協會」、「臺灣民衆黨」、「臺灣工友總聯盟」的主腦人物；有「一代熱血男兒」之稱，被肯定為「台胞非武裝抗日運動最具影響力的人，也是最能發揮民族運動影響力者。」

62 服役

反正我們的刑期已經決定，不論外界情況如何，插翅難飛，什麼事都管不著了。

看守帶我和德欽到了服役牢獄前的一個「調所」，等候驗明案由身分。這個場所很像檢察局的審問庭，臺上坐著一個不知道什麼官，講的臺灣話，滿口是日本官腔，到底是臺灣人抑或日本人，我也分不清，面孔舉動都是臺灣人，聽他的說話，口音卻又像日本人。他高倨臺上，對我們五、六個服役囚，逐個加以檢點，問答相當有趣。此官先叫一個小偷問道：

「你犯了什麼罪か？」

「沒有，我沒有犯什麼罪。」

「沒有犯罪，怎麼會到這裏來ガ？」

「是的，不知道怎樣……」

「胡說，沒有犯罪，誰會捉你到這裏來？到底犯了什麼罪，快說！」

堂上官好像習以為常的，把一卷大簿子翻翻看看之後，罵道：

「幹您娘，你啊小偷兒ぢやないか！」

那位瘦皮猴紅鼻子的小偷兒扭一下屁股說：
「我我……沒沒有偷什麼東西啊……」
「你沒有偷東西？……」
堂上官邊看簿冊，叱道：
「滑頭！到這裏來了，還不說老實話……嗯，你啊，喂，你偷了人家的鐵馬（單車）ぢゃないか，怎麼說沒有か！」
「大人冤枉，那不是偷的，是借的。」
「喲，不是偷的是借的！向誰借的？」
「鐵馬放在亭仔腳……」
「嗯，放在亭仔腳，で？」
「我騎上了它……」
「你騎上了它，で？」
兩個人一似要相聲，小偷仰首望望堂上，繼說：
「是這樣的……」
「怎樣的？騎到什麼地方去了？」
「騎到和尙州（註五一）。」
「到和尙州，以後呢？」

「又騎到新竹。」

「到新竹去囉，以後呢？」

「到嘉義。」

「有趣，到嘉義了，以後呢？」

「以後被警察抓著了。」

「警察抓著你了，他怎麼說呢？」

「他說我小偷兒。」

「你怎麼說？」

「我說我不是。」

「他怎麼說？」

「他不答應，把我押起來了。」

「馬鹿野郎，你還不承認你偷了人家的東西麼？人家的東西，你拿走，做自己的用，這不是小偷是什麼？別說了，判你多久？……幹您老母，你啊前科三犯ぢやないか，一年兩個月か，太便宜了，這次要好好地服役，要不然大人打破你的屁股！」

「咳。」

堂上官兒似乎故意要這場把戲叫我們開心。再來一個，他叫個矮個的問道：

「你幹什麼了？」

「沒有啊。」

「怎麼沒有?誰叫你到這裏來的?」

「大人。」

「大人為什麼叫你來?」

「不知道。」

「嗯，又來一個不知道的!」

他又翻翻大簿冊，檢閱後說：

「你信什麼教か?」

「耶穌教。」

「耶穌叫你做小偷兒麼?」

「沒有。」

「沒有，怎麼當起小偷來?」

「我沒有偷人家的東西。」

「喝，你沒有偷人家的東西?我看看……你偷人家的金手錶，怎麼說沒有?」

「不，大人，那是冤枉的。」

堂上官心裏有數，笑說：

「你啊，前科四犯，老偷人家東西，誰信你?」

「大人，這次確實是冤枉的。」

「誰冤枉你？」

「大人，事情是這樣的……」

「怎樣的？」

「我在一個賭場，看人家賭錢，他們正賭得起勁，有一個人把金錶子放在桌子上，我我……把它收進袋子裏保管，他們就誣賴我偷的。……」

「混蛋，這不算偷，是什麼，不用多說，你是一年六個月，知道了麼？」

「是的。」

這個近似開玩笑的問答完了，堂上官兒的視線向臺下掃一掃，看中了一個日本人，驗明他的身分詰問道：

「你是內地人啊，是哪一縣人？」

日囚很有禮貌的行個禮，答稱是某縣人，堂上官收起剛才開玩笑的嘴臉，帶著怒氣說：

「你是內地人，怎麼到臺灣來丟日本人的臉面！你已經犯了四次竊盜罪，你害不害臊？」

日囚表示惶恐的態度，點點頭，默默然不答。堂上官怒氣未息，罵道：

「你在臺灣老掃日本人的面子，下次再犯，趕你回老家！知道了麼？」

這位三十來歲身體衰弱的仁兄，上公堂老經驗，毫無表情地答道：

「知道的。」

「不要臉的東西！一點兒日本精神都沒有！」

慣竊仁兄沒有回他的話，表現「肚子餓了，叫我如何打起日本精神？」一付之馬耳東風。在這裏我看出日本人和臺灣人不同的民族性。日本人是率直的、沈鬱的、觀念的。臺灣人是諷刺的、樂天的、現實的。日本人以為罪無可逃，便俯首認罪，徐圖再起；臺灣人明知罪無可免，偏故意刁頑，厚顏無恥，只顧現在，不顧將來。在眼前擺著這現實的對照，我心裏十分慚愧，愈感覺我國社會風氣如果不加以徹底改革，將來恐怕會變成全世界最卑鄙齷齪的民族。

我相信民族性是由政治、教育、文化和民族、生活、環境所養成的。大國民的生活，會養成大國民的性格，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會養成奴隸性格，墮落的民族，腐敗的政治，絕對搞不出健全的社會道德。

臺灣一向做人家的殖民地，除了鄭成功二十年間，成立過一個所謂鄭政權外，臺灣人未嘗做過國家的主人，我們不能承認清朝是我們的政府，同時也不能承認鄭成功是純粹的漢人。數百年來經過幾個朝代，我們一直做人家的奴隸，被塑成妒忌、卑劣、利己、狡猾和現實主義的性格，這是我們最的大的悲哀。

A　美男子

我進入了服役監獄，又被配在最末端的一間牢房，我的對面第一號房是一個日本新聞記

者，第二號房是黑色青年同盟的小澤一，第三號房是竹東大兇殺案的男主角，這幾個人的性格都不一樣。記者先生犯了什麼罪，起初我不曉得，也沒有興趣去問他。他在「未決監」的時候，曾惹過我的注目，因為他和我們同案的張月澄穿著一樣上等的籐面屨子，天天有許多人來訪問他，每次出門，都換新的好衣服，樣子長得很棒，不遜電影明星，但未決監照例須戴覆面幕，看不出他的真面目。

當時我以為像他這樣儒雅的姿態，可能是屬於政治思想犯，到後來才聽說是犯了詐欺恐嚇和其他什麼「破廉恥」罪。這次和我門當戶對，我很想教他通訊法，問個底細。可是這隻笨狗，多麼盡情教他也學不來，只好不再理他，他也不理我，彼此自然斷絕交際。服役監可以不戴面幕，在這裏，我才看見了他的廬山全貌，原來他是一個滿臉麻子的陋男子。那麼英俊的身材，那麼瀟洒的風度，怎麼栽上那麼醜惡的頭顱！真是天道惡盈。

B 日本鬥士

第二號房是日人小澤一，他和我很要好，雖然學會了通訊法，卻駑鈍不靈，學識稍差，既不解文學，又不解幽默，談起來，嚼臘無味，不能喚起我的興趣。我本來很同情他，知道他也是政治思想犯，所以努力要安慰他，和他通款曲，但奇怪，越來越倒胃口，終於盡量迴避和他通訊。

這個原因，我想是受了幾點疑問所影響的。第一是他言論過於極端，而沒有理論根據，

只是漫罵日本政府，千篇一律，沒有什麼變化，有時候竟令我懷疑他是不是間諜。第二他不做工，他要和我通訊，又沒有新花樣；我生成指頭不靈活，糊信封（服役之一）的技巧差勁，德欽每天能做三千張，我只能做七百，看守雖然不責罵，卻沒有好顏色，所以我很想多做一點兒，他偏要叫我通訊，使我不勝其煩。

他的性格粗暴，動不動要和看守吵架，由我看來，大有超過了必要的範圍，簡直是無理取鬧。有時候他又和看守唧唧咕咕，不知道談些什麼，時常使我懷疑，其實我對他的嫌疑都是冤枉的。

有一天，說是「伊勢神宮的遷宮式」，看守預先告訴我們在某時間一聽見鐘聲，得端正跪坐，靜向東方默禱。時間到了，果然鐘響，我也靜坐，默禱我們能夠早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摧毀日本皇室，完成臺灣的解放；正祈禱入神的時候，忽然聽見看守和小澤嚷罵起來：

「你幹什麼？」

「拉屎。」

「混蛋，怎麼偏在這時候拉!?」

「因為急得要命。」

「你是故意搗亂的！」

「我拉我的屎，你管得著麼？」

這一吵架破壞了祈禱的肅穆，大家撇開祈禱，從鐵門孔兒爭著看吵鬧。看守等到祈禱告

畢，就叫他出去，大概是要教訓他一番，但他回來說沒有受到什麼刑罰。

為了這起事，我對他改變觀念，同時關於他和看守密談的原因也明白了。據說小澤的父親病得很沈重，監獄當局利用這機會，叫他認錯，改變思想，要給他方便，讓他回鄉親視含殮，他們唧咕的內容就是這個問題。

但他不理會看守，幾次慇懃苦勸，仍然沒有效果。他在獄中二、三年，未曾獲准出去工廠，比我們更吃苦。刑滿被釋放後，他竟在輪船上暴斃，一般傳說是被日本當局下毒謀殺的，如今回想他，我懊悔對他冷淡薄情。

C　朝鮮志士

由小澤我聯想到朝鮮志士趙明和，他被監禁在「未決監」第三舍，和我們沒有見面的機會。第三舍的監房不多，走廊也不長，中間還夾著一兩間醫務室，我們常常裝病來這裏和同志們見面，我平時心儀其人，但見不著他。

有一天我要上澡堂的時候，在澡堂廊下見著一位青年，正低著頭理髮，我不知道是誰，漠然走過去，一個伙伴對我說，剛才理髮的人就是趙明和，我回頭一看，看守已緊跟在後頭，不便退回去看他。

他的犯案是在臺中，懷著利刃對準日本親王久邇宮作搏浪之一擊，不幸被站崗的臺灣人巡查追到架住，經過了一番格鬥，被逮捕了。對共同敵人，朝鮮壯士要行刺，臺灣走狗要保

駕，臺灣走狗使朝鮮志士在臺灣上了「絞臺」，這段醜史永遠留於人世，無法磨滅。

浴罷，我以滿懷羞慚的心情，走去注意趙明和，他依然低首，讓理髮囚剃他的頭。我看不清他的正面，只約略辨出他是個相貌英俊的青年，我以敬虔的態度，輕步走過他的旁邊，內心替臺灣人向他道歉，求他赦免我們的不肖，希望他能夠感應我的至誠，在無言中和他告別。

臺灣和朝鮮同是日本的殖民地，但彼此的民族性差別很大，他們重實行，我們重理論；他們重意氣，我們重理智；他們駑鈍，我們輕浮；他們動手，我們動嘴；他們屬於北方之強，我們屬於南方之強。我不敢說二者之間有什麼顯著的優劣。

日本的小澤一和朝鮮的趙明和，他們已經為了自己的理想而死，一個在船中，一個上了絞臺，而我至今還腆靦偷生於人世！回頭過去，不勝惆悵。

D 山猴殺家

小澤隔壁的三號房主人，胸前代字也掛著三號牌子，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只聽人家叫他「山猴」。他是在竹東演「滅門」兇殺案的男主角。形狀的確有點像山猴，腳長手長、駝背，看來不甚活潑，其實卻靈敏異常，武藝高強，一口氣殺了七、八個人。

我前在未決監廿七號房的時候，就已經由後窗見過他幾次，想像他絕不是尋常的囚犯，因為他在運動場夾雜群囚之間，特別引我注目，覺得他好像一隻奇怪的動物，渾身有幽靈纏

繞著他行走似的，我把這種神秘的感覺，告訴在對面牢房的郭德欽，他也表示和我同感。

我搬過去四十六號房，恰巧和山猴住斜對面，可惜他不識字，不懂日語，無法通訊，然而不知道什麼緣故，他的一舉一動，老是叫我關心。有個冬天晚上，他放聲大哭，聽見看守安慰他說：

「好了，不要哭了，你母親要送給你穿，你就穿上吧，她怕你冷……」

「大人，不，我不穿，我要託你替我寄回去，讓我母親穿，唉呀，我不孝啊！我的娘啊！」

又是大哭一陣，看守說：

「外面可以送東西進來，這裏不能送出去，沒有辦法，你留著穿吧。」

「唉喲，大人！我家裏只有這件破裘，叫我母親穿什麼呢？她會凍死啊！大人你好心爺，把這件綿裘替我寄回去吧。」

「那我辦不到，你放心吧，你母親一定還有，他會做新的……」

「唉，大人你不知道，我家裏窮得連飯也燒不起，哪裏來錢做衣服，唉呀，我的娘，我不孝啊！」

這不是造作的叫喊，而是山猴真情的流露，故令人非常感動。

我對他的興趣越來越濃厚，決意要查明他的來歷。在日本監獄裏，要知道他人的事情，是不容易的，囚人間的私人談話固屬犯禁，尤其是我們政治思想犯的談話，更受嚴格的取締，山猴的案情，是到了我被判罪服役後才明白的。

據說：他是竹東山地鄉下人，平時事母至孝，鄰居都稱他孝子。他的案情和南投名間陳江一樣是情殺案，這兩案可謂破了日據時代情殺案的最大紀錄。不過山猴是孝子，還有些叫人同情的地方，至若陳江的惡辣無賴，卻令人髮指。山猴的妻生成甚麼樣兒，我沒有聽說，陳江的妻聽說是賽金蓮的尤物。

山猴真是名符其實貌寢不揚，家有老母七十多歲，太太紅杏出牆的風聲時有所聞。有一天，太太回了娘家看鄉下戲。他探知妻和她娘家人跟姦夫一起混帳，無名火起了三千丈，磨了一把蕃刀埋伏在暗路上準備襲擊。戲散了場，姦夫淫婦及其家眷都一路談笑就了歸途，行至山猴埋伏的地方，冷不防地山猴躍出來，表演了一場阿修羅慘劇，頃刻之間，路上死屍枕籍，七、八個人橫臥於血泊中，悄悄地歸於靜默。

山猴隨即逃入深山，匿居蕃界，好幾年日本警察無奈他何，最後利用了他的孝心，散布謠言，說他母親病重，命繫旦夕，想以此引誘他回家。

果然他為探母偷偷地回了家，便被埋伏的刑警逮捕了。兩個武裝警察解押他往新竹，他們坐著「輕便車」駛到山路下坡急彎處，山猴乘勢把兩個警察都撞落車下去，又跑入深山隱匿了他的蹤跡。經過了好久，司法當局仍抓不到他，只得依樣畫葫蘆，又以他母親為囮，騙他下山，這次再也無法逃脫了。

司法當局同情這個名聞遐邇的孝子，不加嚴格的管束，詎料他進入了監獄，在一次運動時間，竟不顧前後，蠻勁兒離場開溜，致使看守忙了半天，大鬧一場，才加以制服；這回監

獄當局不再寬待他了，給他掛上腳鐐手銬，並禁止他運動，直到判決服役後，才解除了他的刑具。

他雖然一再逃獄，司法當局卻沒有處他極刑，聽說在第一審被判處無期徒刑，後來不知怎樣，在我服役的時候，他的刑期已被減為十五年有期徒刑了。

他喜歡清潔，每天費大半時間擦他住房的地板，擦得發亮，我還未看過他的牢房時，以為我的房間可能是全牢獄最清潔的一間，及看見了三號房，就不敢專美了。他每次碰見我，常露出微笑，點點頭，莫逆於心，但未曾交談過一句話。

E　陪死鬼

山猴的大血案，發生於大正時代，陳江的是在昭和年代，山猴屬於衝動性的突發行兇，陳江屬於有計劃的謀殺，前者自作自受，後者卻多帶了一個陪死鬼。陳江的桃色血案頗有戲劇性的內容，可惜我不善寫小說，這裏只敍述其梗概如下——

陳江家住南投名間，我在法院旁聽他被審判的時候，看他約莫三十來歲，身長五尺六七寸，面目端正，有點像武鬚生，在名間鄉下，算是有名的木匠，收留了四、五個徒弟，生活還過得去。

他的太太豐姿艷麗，生成楊花水性，鄰近的色鬼莫不聞香垂涎，樓臺近水的學徒，自然先賞其月了。陳江發覺了他的徒弟張某也是慝妻之一，而且家裏有錢，隨著便勒索了他一筆

巨款。張某花了錢，心有不甘，反臉告他一狀，司法當局以陳江捉姦無證，恐嚇勒索有據，判了他幾個月刑期。陳江憤恨，聲言出獄必殺張某，張某深知老師性情，趁他還未出獄，便奔往廈門去避難了。

陳江出獄，找不著張某，決意謀殺張某一家洩恨。一日，他在眾徒弟面前透露：他想屠殺張某全家，但恐怕自己死後，太太沒有人照料，如果有人肯做他幫手，他願以太太相寄託，自己一人受罪，絕不牽涉他人，眾徒弟默然沒人答應，他的計劃也就告吹了。

世事無巧不成書，陳江的徒弟，有個叫做磁土的，竊慕陳妻美色，時常偷偷摸摸地到後院找陳妻七纏八綿，陳江躺在店口的安樂椅上，利用他暗地裏裝設的幾個鏡子反照，看出了後院的情景，心知孺子可以羅致。

往後就故意在磁土面前長吁短嘆，磁土心裏有數，藉機試探老師的心意，陳江立誓說他只要能夠復仇，死無所求，既然願死，絕不累及他人。磁土信以為真，便和他研究謀殺張家的方法，研究後，陳江卻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磁土急於欲得陳妻，頻頻催促，陳江左右其詞，時而說沒有武器，時而說時機尙早。磁土急不容緩，親自往南投定做兩把長刀，又常到張家窺探情形，以備行兇，時常把所得消息一一報告陳江，促他早速下手。

磁土是個發育不良的矮個子，鼻子扁得難看，目小眉短，一點兒也討不了女人喜歡，何以陳妻也要送他秋波？是否陳江授意的計策？我在法庭上看磁土的神情，覺得他好像被魔鬼抓著沒法子逃脫的小猴子，只是悲鳴掙扎，也可恨，也可憐。

陳江擇定一個黃昏時候，帶磁土到張家附近埋伏，看張家一家人正在吃飯，陳江便叫磁土先往牛舍把牛放出來，自己去躲在灶腳（廚房）門邊候殺。張家人聽見了牛步聲，果然跑出來探視，剛步出門口就被陳江一刀刀斬掉了，磁土也跳過來幫兇，不一刻，把張家七、八口都殺得精光，只活了一個人重傷沒有死。

沒有幾天，兩個兇手都被捕法辦，陳江一反前言，把一切罪責都推諉於磁土身上，結果兩個人都被處了極刑。

F　政治犯

臺灣過去少有政治思想刑案，在羅福星、余清芳以前的政治犯，日本當局一概適用「治匪法」，不認為政治案件。羅福星以後，經過了十年，民國十四年，發生了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非法組織，日本才把這一案列入政治刑案，判決的結果最重的不過「禁錮」四個月，蔣渭水二月二十日「收押」，五月十日釋放；蔡培火二月二十一日收押，也在五月十日釋放，前後只八十天，名雖囚犯，事實上日本當局對他們以國士待遇，反助長了他們的聲勢。

他們在出入獄時，臺灣到處舉行盛大的歡送會，沿途大放爆竹，比迎聖母媽祖還要熱鬧，當局並不加干涉，怪不得蔣渭水的《獄中記——入獄當日的感想》說：

「去月二十二日移入本獄，一到獄裏，看見臺中的林幼春先生和資彬兄、篤勳兄，已經先到了，握手寒暄，分別各自入房內去了，五尺長八尺闊（筆者註：無此監房，恐怕是記錯），有窗子，空氣日光都十分充足，且很靜肅，要埋頭攻書的，正是妙處，受刑務所的好意，待遇很好，特別給予茶瓶、茶碗、茶盤，及鼠毛氈五條，普通紅毡三條，初到之時，不知獄內的狀況，人情上未免有些不安的，及受所長這樣好意優待，始為安心，感覺如入所長的家庭一般哩，眾很滿意，對所長個人至少是感謝的」。（原文）

從這篇短文，我們能夠想像他們所受待遇的大約情形。我們入獄的時候，不僅沒有鼠毛氈，連紅線毡也只給一條，冬天兩條，至於什麼茶瓶、茶盤根本沒有見過，他們還可以「握手寒暄」，我們連一句話也不准說。

我們的入獄，可以說是日本據臺以後，屬於第四批的政治客，第一批是議會期成同盟會，第二批是黑色青年同盟，第三批是中臺同志會，我們所受的待遇，完全和一般囚犯一樣，沒有什麼特別優待。

聽說只有兩件事，為了我們入「本獄」，才加以全面改革的：第一件是福食，以前蔬菜都沒有切根除梗葉，到我們服役那一天，就改為斬根切細，把壞的和葉梗棄掉，揀好一點的，並增加一些植物油佐餐。為了我們三個人的服役，把福食加以全面的改善，這於他們的國家立場上說，算是了不起的施惠了。還有一件，是我要入第五工廠前一天，他們把掛在看守臺

的籐鞭收起來，表示獄裏不用刑具。這兩件事，也算是我們於無形中給獄裏的難友，有了一點兒的貢獻。

G 毒殺？

我們服役頭幾個月，都被關在監房裏糊信封和織瓶苞，對這種勞役我很不高興，心裏正想要抗議。有一次我裝病去看醫生，意外的領到幾包藥粉，本來就是假病，所以把藥量棄掉三分之二，然後當補藥吃。不知何故，服了以後，一直流鼻血不止，我懷疑是毒藥，不敢再吃，老是坐著不動，連工也不做。

看守把我的情形報告上峰，戒護主任便走來看我，我不理他，他問我為了什麼不做活，我答以流鼻血不止。他又問我為什麼流血，我說是吃藥所致的。他辯解不是藥的關係，可能是受了氣候乾燥的影響，勸我不要多疑。我率爾問他：

「喂，到底你們給我們判決的是什麼刑？」

他受我這意外的質問，一時答不出話，反問我：

「你問的是什麼意思？判什麼刑，你們自己知道的不是麼？」

「我不知道，到底我們，罪刑是禁錮呢，抑或懲役呢？」

他微笑答道：

「哪，是懲役……」

「懲役？好的，既然是懲役，為什麼不讓我們到工廠去做工，把我們禁錮在這裏？按照現在給我們課的刑罰，可以說是兩重的——禁錮兼勞役，因為如果說是勞役，又把我們關在這房子裏，等於禁錮；如果說是禁錮，卻叫我們做工，等於懲役。到底我們應服什麼刑，你們得弄清楚，不然，我們要向司法當局提出抗議，你們待遇我們，簡直比一般「破廉恥」罪或強盜殺人犯還要殘酷，這成什麼話！」

他慌忙答道：

「派你們出去工廠做活的事情，我們正在考慮中，不久就要決定了，請再忍耐一些時間……好不好？」

我默然不答，輕點了一下頭表示答應。

H 第五廠

不久他們送我到第五工廠服役，我們的工作範圍是洗衣、晒衣，選別囚衣等級，從初步做起，逐漸升進，減少了粗重的工作；但我不願意放棄抬大竹簍分配囚衣這門勞動。大竹簍裝衣服的重量，約二百餘臺斤，這於我的體力是過份的負擔，看守幾次勸我讓別人做，我卻以鍛鍊身體為理由，不接受他們的勸告。

其實，我要承擔這一工作，暗中試練過幾個月，摔了幾次，負過傷，才學來的，竹簍長約五尺，高約三尺，寬約三尺半，一簍可裝數百套的囚衣，從鄰接工廠配起，以次巡迴各廠，

這是會同志，為同志服務的唯一機會，我哪能輕輕放棄？

囚衣大體分為甲乙丙，和賞表幾個等級，未決監的衣服公私不受限制，被告沒有衣服的才穿監獄的藍布衣，所以未決獄亦稱「烏衫監」。

判決服罪後，一定要穿囚衣，大多數是紅衣，所以服役監亦稱「紅衫監」。紅衫又分為四個等級，初犯的穿乙級，乙級成績優良的升甲級，累犯的丙級，成績特別壞的罰他穿丁級的。乙級的最多，其次丙級，甲級和丁級的少。甲級的升上去，改為穿藍布衣服，腕上縫一塊小方型白布做賞一表，兩塊的稱二表，最高的三表，得到三表的可以酌量減刑，待遇福食都有優待。

一　模範囚

獄裏獲得三表的只有一個人，這個人在第四工廠做皮靴匠，看來三十歲左右，面目清秀，不像一個囚人，他本是個窮兇極惡的弑父逆子，籍貫記得是宜蘭。

他十七、八歲的時候，和他母親共謀絞死了父親，按法殺死一等親罪加一等，無論有何理由，應處極刑。只因為他的祖母哭公堂，哀求法官留個「香爐耳」(後嗣)，感動了法官，乃改判為無期徒刑。由於他做事認真，品行優良，所以又由無期減為有期，聽說經過了幾次大赦，刑期一減再減，只剩一、二年就可能獲釋了。

他和母親謀殺父親的動機，是他母親的姦夫有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姿色可人，他愛

上了她，母親知道了他的隱意，就勸他謀殺父親，除掉障礙，可作長久之計，他聽從母親的話等候一個風雨雷霆的黑夜，看父親熟睡了，便和母親用腰帶拴上父親的頸子，兩人使勁緊拉，勒死了以後，裝像急症暴斃，企圖瞞騙當局。

詎料這件事立刻破案，母子都被判處死刑，在萬分危急之時，他的祖母哭庭求饒，訴說兒子已死，回不了魂，只此一點骨肉，千萬不能埋沒。他是未滿二十歲的青年，本有同情餘地，檢察官為要警戒世人，故意誇張了他的罪責，強調處極刑以儆效尤。結果，裁判長以「不孝無後為大」，判決他無期徒刑。

J 好缺

我們的第五工廠，可以說是服役獄的總務處，工場寬大，分為三部，右邊為洋洗部，洗看守的衣服，並承辦外面的洋洗。左邊為囚衣部，設備有點像日本「吳服屋」(布店)在這裏把洗好的囚衣選別等級，存起來，以便分配。囚衣部前面鄰接外廊的地方是庶務部，獄裏所需要的一針一線，筒帚、畚箕，以及絞台用具等等，都得到這裏來要。

我在這個工廠住了一年有餘，和同伴相處還好，沒有多久，我們的工廠就成為模範工廠了。清潔、整齊、融洽都是我們工廠的特徵。我為要學習勞動，盡量做活，連人家不肯做或懶做的事，都接過來做，在這裏，我不分臺灣人或日本人，只要我能夠幫忙的，無所不幫。

初時，我因為沒有勞動的經驗，做不了工，費力的工作更沒有辦法，下工以後，累得筋

疲力竭，睡不了覺，叫苦呻吟，驚動了看守，以為我病了。

沒有幾天，我很快的學會了洗衣的要領，還會教新囚簡便的洗法，接著執管脫水器，把洗好的衣服，放進機器，搖一搖使它轉動，等到濕衣脫水乾了些，就拿起來裝入大竹簍，挑到廣場去晒。

廣場滿掛著繩子，我們把洗好的衣服，拉開繩子，夾住它吊著晒曝。這些工作很適合衛生，所以我覺得很好，有運動、水洗、晒太陽，沒有比這更好的勞役，因此我的身體才能維持到出獄，未曾生過病。

我抬東西的練習，從四、五十斤起，逐漸增加，經過了一、二個月，肩膀漸能耐勞，不到三個月，我便能抬起二百餘斤的重量了。能夠抬上兩百斤，便有資格抬大竹簍去分配囚衣，這是我練習挑東西的唯一目的。

選衣工作，我把丁級的衣服撕破做廢物，納做髒布，丙級的一部分打下去做丁級，乙級的盡量貶為丙級，甲級的迅速改為乙級，挑選甲級做乙級衣送到同志們的工廠去，好讓同志穿，這在夏天雖然沒感覺到好處，在冬天卻能增加一點兒的溫暖。

冬天，我們被限定上衣兩件，紅線毡兩條。臺北的氣候比臺中冷，我們文弱書生實在受不了，所以我歪著心腸，選比較好的衣毡送給我們的同志。

K 獄吏譜

牢獄也是個小社會，牢犯也是人，也許這裏的社會比較典型，單看這裏，便能夠認識大的世界。

典獄可以說是這個國家的元首，教誨主任和戒護主任等就是閣員，看守至看守長無異於保衛國家的軍警，其他獄吏便是各部官員，我們眾牢囚是老百姓。他們和我們的利害關係，完全相反，他們要我們守法、服從、勤勞、節約、增產，我們要自由、民主、快樂、享受，這種對立在牢獄存在期間，永遠存在。

我們的典獄說是很仁慈的，大家都尊敬他，身材雖不過五尺一二，卻長得結實，掛上一副金框眼鏡，慢步搖擺，威儀生風，還相當派頭，他常帶戒護主任或幾個看守長護駕巡視，囚人們一看見他來，爭先羅拜，如能博得他微微一笑，或垂詢幾句話，就算是光榮，他們的問答，大概千篇一律，如典獄問：

「怎麼樣，好麼？」

囚人一定要答：

「謝謝，很好。」

他若再問：

「這裏對你們待遇好麼？」

四人得表示恐縮的態度行禮答道：

「太好了，我們的擔當先生對我們都很好。」

「你們有什麼意見，或什麼要求，可以不客氣直接對我講。」

「沒有沒有，太好了，我們都很滿意的！」

主管看守立正不動，看守長緊跟典獄身邊，靜聽問答，拿出手冊，把問答記錄起來，這就是他躬探民隱的方式。我為避免說真話得罪看守，仿效深山遁隱的古風，不見元首，所以他除在監房以外，見不著我。他每次到我們的工廠，我便預先迴避他。

我在獄三年半的期間，他只和我談過兩三次話，一次是在未決獄，一次是在服役獄，在未決獄時，他常來視察我的監房，但我不理他，有一次，他忍不住了，叫看守開我的房門，露出傲岸的笑容說：

「嗯，你很用功啊。」

我不得不回頭看他，低聲答道：

「哪裏……」

「你的書籍很多，好像一個小圖書館，哈哈哈！你拿這裏當圖書館了啊。」

我沒有話回答，只好點個頭，表示沒有敵意，他看看我房裏的周圍，說：

「你佈置得很清潔整齊，好。」

說著退一步，讓看守關門，我對這位帶著數珠的「貓公」，實在沒有多大惡感，不論他有

何奸滑的權謀術數，只不限制我需要的書刊，單這一點也就該感謝的。

有個新曆元旦，本獄舉行了一個唱片音樂欣賞會，在年底他們就大事宣傳，囚人們也好像小孩子，天天屈指計算，等著趕快過年，以為過年有什麼了不起的樂趣。可是一到過年，放假三天，那些不識字，對讀書沒有興趣的人，被關在房裏，無所事事，比在工廠勞動還要難受。名曰慶祝，其實等於吊喪，而且惹起旅魂鄉夢，愁上加愁。

囚犯們回想在家時「圍爐」飲酒，一家團圓，享受天倫之樂。元旦穿新衣，探親拜年，看熱鬧、請客，春回大地，喜氣洋溢，萬象更新，何等愉快，如今身繫囹圄，親離友疏，舉目無親，前途極為渺茫。

恭賀新年的大音樂會，自元旦一清早就開始了。頭一個唱片是日本國歌，其次是年始歌，因為留聲機不好，唱片又舊，唱來雜音喳喳，逆耳難聽。接著播些俗不可耐的下流歌曲，我無法掩耳不聽，不得已坐禪靜氣，默讀佛教聖經。忽然聽見澀滯的聲音擾亂了我的安靜，典獄從鐵窗探視我，叫道：

「二九二號，你不喜歡聽這音樂麼？這些唱片當然不合你們的胃口，不過大家都聽得很高興，要是打擾你的用功，請你原諒吧。」

「謝謝。」

典獄去後，我想起在大陸失去了好幾位同志，於今又過一年，在這裏百無聊奈，悲憤塡胸，信口吟了一首。當時的心境是：

挫折雄心憂怨裏　牢房又過一年春
憫憐同志多橫死　恨殺仇人仇未盡

我們的內政部長兼教育部長的教誨主任，是位沈默寡言的老狐狸，他很少和囚人們講話，我記得好像沒有和他交談過。

囚人們最討厭的大概是教誨師，每星期日或大節日都有一個鐘頭的說教，教誨師多是和尚，我不知道他們是專任的，抑或由外面臨時聘請的，有三、四個人不時輪流來演講。他們要我們端坐靜聽，他們自己也得示範保持莊嚴，這一個鐘頭是伙伴們最難過，同時也是看守們最難受的時間，所以主管看守常要藉故叫同僚代替，溜到別處去休息。每次教誨時間，我必定聽伙伴們嘆道：

「又來了！」

有的說：

「教誨師不是要說教，簡直是要虐待我們。」

教誨師們不管受囚人如何奚落，他們依然像盲人自美，自鳴得意，雖則夏天，揮汗如雨，袈裟盡濕，也要講得舌敝唇焦，滔滔不竭。他們力言因果報應，攻擊惡人做壞事，儼然在恐嚇囚人，侮辱犯人。他們的知識低級，不明說話的效果，所以連犯人也瞧不起這些幼稚愚劣

的教育家。

在教誨堂裏，我感覺到日本人和臺灣人的聽講態度很不相同，無論講的話如何乏味，日本人多正襟跪坐靜聽。臺灣人卻坐不安席，欠伸呵息，不一而足。這兩民族的氣質，在這裏可以一目瞭然，日本人比較駑鈍、愚直、認真；臺灣人比較刁皮、狡猾、輕佻；他們性直，我們性曲，他們容易受愚，卻能團結一致；我們自作聰明，多要各行其是。

獄中的總司令牟田戒護主任，是我們王國裏最魁梧的人物，身長六尺有餘，體重二百餘斤，在日人中可以算是巨人。他不愧為監獄三軍總司令，很有威嚴，看守長及獄卒沒有一個不怕他。

他對我們政治思想犯採取密切注意和關心的態度，時常對我表示「有求必應」的寬容，但我偏不買他的賬。反正我們是他們的俘虜，死活都握在他們的手裏，只要能夠應付過去就算了。

有一次，他根據看守的報告，要給德欽和我升進甲級，叫我們到他的辦公室去談話，結果受不了我冷氣呵他熱面，一氣而遷怒於看守，這時真是使看守怕得發抖了。

自此，他明白無法改變我的意志，我也不屑模倣所謂偉大的前人，孫臏之瘋，蔡鍔之狂，大石良雄之放，事實上對日本當局也用不著這麼「高蹈」術策，按照正道，我行吾素，便行得通了。

在德欽和我要出獄的那一天，監獄當局為預防外面迎接我們有舉動，天未亮就叫我們起

床準備，戒護主任率有關獄吏提前上班，辦理各項手續，並整理要發還我們的東西。戒護主任一看我們走到辦公處，便笑容可掬地走前幾步說：

「恭喜，你們從此恢復自由了，請到這裏來磅一磅體重吧……。」

我脫下衣服，踏上磅台，他手裏帶著記錄表，對照看看，笑說：

「真棒，你看，比你初進來的時候，還增加了六、七斤哪！」

我也笑答：

「謝謝你們的關照，能保持這麼好的健康，我該感謝你們。」

他很高興似的神氣說：

「這次出去，請你們多多為國家効勞，不要重踏錯路，好，那末預祝你們成功！」

我和這位司令雖然沒有握手，但他在這場面的表演，確實不會令人討厭。

擔任軍警的獄卒，雖是直接管理我們、虐待我們，但他們也和我們一樣，屬於準俘囚，整天和我們在一起，我們在牢房的時候，他們得整天整夜在走廊上巡邏，我們在工廠的時候，他們得站崗監視。和我們不同的，只是報酬多，穿好吃好，下班後還可以回家團聚幾小時。

我同情他們的境遇，所以盡量不愛和他們吵架。他們所患的「虐待狂」，我能夠了解是由於職務上所養成的，由習慣而埋沒了良知，麻痺了神經，所以他們對囚人的虐待，自己不會感覺到殘酷。對這些失去了人性的「人非人」，我不但不憎惡，反而覺得可憐，以為除用人性溫情去緩和他們外，別無良法，但這不是容易做得到的。

我服役後，離開了法律的保障，就得服從「俘虜營」的規矩，我決意不違法、不反抗，聽從獄卒的指揮，平渡所定的刑期，雖然我一度恨不得把這俘虜營夷為平地，解放這裏頭可憐的同胞，但這的確是感情作用，絕不是理智的想法。

我利用服役中只許看監獄圖書的期間，專心研究各種宗教，連回教的可蘭經也勉強讀下去，但奇怪，獨可蘭和我格格不入，得不到絲毫的收穫。

由研究宗教，我得到了很多的教訓和修養。我發現現代的宗教，都違背了原始教義，假使釋迦、老子、孔子、耶穌能復活於現世，他們一定會宣佈解散現在的教會寺院，並反對現行的傳道。

自發覺了這道理之後，我的人生觀急激的轉變了。超越國家、民族、階級、宗教的思想油然而生，本來已傾向於自由主義的我，更被塑造成有意識、有根據、有理論體系的思想，我好像悟了道，得了真理，看見了新的宇宙，解脫了一切複雜的思惟，而成為自然的信徒。

這一思想的轉變，使我連生活態度也改變了。我希望在世上沒有一個敵人，所以對獄卒的仇視也解消了，他們雖然認定我是牢犯，但我願意他們做我的朋友，只要他們不拒我的話。

管我們牢房的看守裏，有一個約莫六十來歲的老人，他為了無聊，時常找我閒談，逐漸了解我並非如他們所想像那麼可怕的囚犯。初時他跟我學習了幾句臺灣話，後來他認識了學問之為何物，便不敢再矜持其統治階級的優越地位，有什麼不懂的問題，都拿來請教我，要我給他解釋。

我們的工廠有三個獄卒輪流代替，他們的真姓名我都不知道，只曉得主管叫「海醫」，助手叫「吊燈的」，還有一個叫「水雞」。海醫說是看守中最厲害的一個，目光炯炯，身長五尺六七寸，臉黑聲宏，一叱喝，犯人莫不為之戰慄。

吊燈的雖然是矮個子，卻是全獄第一劍士，劍道四段，兼任看守擊劍導師。生成沒人緣，容貌不揚，眼皮有疤，所以我們都叫他「吊燈的」。

水雞是個不上五尺高的小人物，身材瘦削，年過五十，有點駝背，常戴著突出的金框眼鏡，看來一似田雞頭，臺語水蛙叫做「水雞」，他以此而膺了尊號。

海醫在我們的廠裏是個楚霸王，威風凜凜，執法如山，毫不苟且。我們的夥伴恨他入骨，有的故意破壞秩序，有的怠工，工廠不時充滿著沈悶的空氣。

自我入廠以後，空氣逐漸改變，和氣藹藹，比以前明朗得多。海醫以為這是他領導有方，自居其功，聲言他不怕任何兇犯，一到他的工廠，他便能使其棄惡遷善，成為好人。監獄當局信以為真，就把全獄最壞的殺人犯——十三號分配到我們的工廠來，其他脾氣古怪的，愛吵架的也多送到我們這裏來「受訓」。

其實，海醫哪裏有啥本事，徒增加了工廠的麻煩之外無所作為。有一個五十來歲的強盜，和一位二十三、四歲的詐欺犯，常愛和人家拌嘴打架，不巧這兩個人又是同房，吵架的機會更多，兩相不服，擾攘不休。

海醫為排解他們的抬槓，每有事，都叫我當翻譯，但全然不發生效力，越鬧越兇，他終

於拿不出辦法，就讓我充魯仲連排解他們的爭執；奇怪我一講，他們立即和解，聽從了我的勸告，和好相處。自此海齧不嚴禁我講話，凡我們的工廠有什麼糾紛，都叫我替他調停。

按照獄規，牢囚不許自由講話，我們的工廠，只有我和十三號不受嚴格的限制。另有一個特殊犯是六十三號，他膺有前科四犯的「實績」，雖然所犯的都是狗盜鼠竊的小案件，可是累犯一多，刑期也就加重了。他以監獄為家，以獄吏為家長，住得很習慣，有說有笑，俏皮爽朗，善相機和人家開玩笑，人家怕挨罵，他偏要叫你受窘，一次，有個夥伴問他：

「喂，我們一開口，就要挨罵，為什麼他們不罵你？」

他得意的答道：

「因為他們知道我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罵也沒有用，所以就不罵了，哈哈哈！」

這位年輕慣竊，竟能引用論語妙句解嘲，叫我不禁為之燦然。

吊燈的一見很橫暴，平時不說話，如果聽見我們太吵鬧了，才喝句「喂，不要說話！」把兩手托著下巴腮，仰首閉目不看人，裝若在打瞌睡的樣子。

我因為膀胱衰弱，冬天小便更急，所以往往要提前上廁所。在規定時間外的上廁，得要另作口頭申請，海齧抓住我這弱點，每次賣弄人情，找我麻煩；吊燈的卻完全不賣賬，叫我很難受。

後來，夥伴們教我在吊燈的值班時間，用不著申請，要去就去，他絕不干涉。我依照他

們所傳授的方法偷偷的試過幾次，果然安穩無事，以後我便搖搖擺擺去，他也熟視無睹，不加阻擋；可見這個人只死守法規，在人情方面，卻還有點通融的餘地。

我們廠裏的「大人」和囚犯中，有兩個典型的弱者，一個是看守「水雞」，一個是和我同日服役的慣竊，我們叫他「大懶」。水雞的身材瘦小，穿著制服，好像小孩子穿大人的衣服，沒一點兒威嚴。他大概從小就被人欺侮慣了，對任何人都不爭氣。犯人瞧不起他，他也不在乎，只為混碗飯吃，執行任務，捨此一無作為。

但是他在我們之前，卻好吹牛、扯謊，大言不慚，說他在本獄有悠久的輝煌歷史，典獄和戒護主任都是他的後輩，拿他們的同僚品三評四，講得天花亂墜，絮絮不休，只要我們願意聽他的話，他就讓我們自由方便，不過一見主管來了，馬上扳起臉孔，大聲喝道：

「喂，哥啦，不要講話，打死你們！」

主管走了，水雞就掩嘴而笑，表示他並沒有罵人的意思。

他知道我父親是中部拓殖公司的董事長，以為這家公司一定擁有很大的資本，要我出獄後關照他，我含糊答應，所以他對我極盡拍馬屁的能事，凡我有所要求，他都唯唯諾諾無所不答應。他的主管事務，是帶我們分配囚衣，或到倉庫去整理毯子及其他公物，有時候還帶我們上女獄取新做的衣服。

ㄴ 女監

女獄是難友們最喜歡去的地方，這兒是「禁男」之地，全獄的囚人能夠到女獄去的，除我們第五工廠幾個人以外，誰也到不了這世外桃源。

只有同性的世界，真似蠻荒乾燥沙漠。儘管男性是何等的橫暴粗野，沒有了他，就好像白天沒有了太陽；儘管女人是何等的陰毒潑辣，沒有了她，便一如夜裏沒有了星星和月亮。

我本來對女性還沒有發生什麼興趣，在獄中過了幾年孤獨的生活，才感覺沒有異性的存在，一切都是空虛的。我們一聽見水雞要帶我們去女監，大家都眉飛色舞，心花怒放。只是一瞥機會，尚且瘋狂如此，假使再放寬了些尺度，那不更缺德？

男人禁地的女監，只和男監隔一重高牆，就形同河漢，地邇人遐。初時我們要通過女監鐵門的時候，覺得好像要進入阿里巴巴四十八大盜的洞門那麼神秘。電鈴好似咒語，小鐵門豁然而開，跨過門檻，便是沙漠的綠洲，我們忽然呼吸急促，心臟的跳動變劇，十幾個準黛玉的女囚，正在庭園中掃落葉。她們一看見男人，嘰嘻的一聲，丟下竹帚，像蜘蛛兒四散奔走而去。女看守制止不住，連聲喝：

「哥咧，不要跑！」

女囚們急於化整為零，全不聽話，邊嘰邊跑，瞬息間一個影兒也沒有了。到底她們仍逃不出我們的火眼金睛，有的隱在柱子後，有的躲在牆角邊，窗下門後都是她們的埋伏陣地，

一對對的秋波，頻向我們這邊射過來，直使我呆然不知所措。當時我還是個童貞，只覺得異性的吸引力是何等的神秘，卻不懂得箇中的滋味。

女看守形式上喝了幾聲算了事，走來和水雞寒暄，兩人有說有笑，我無意逗留這瘋狂的場面，促夥伴們趕快到倉庫去工作。他們到了倉庫，又走去靠近窗邊，向對面的監房狂吹著尖厲的哨子，和女囚們大吊其膀子，我怕惹出事端，打斷了下次來女監的機會，制止他們勿再胡鬧。這時對面女監的每個窗戶倩影掩映，一個個的雲鬟霧鬢，齊向我們這邊幌動。

M　老強盜

我們的廠裏有個老強盜，和我很要好，因為他做工的位置和我有些距離，難能交談。他常藉故找海鰡訴苦，或叫海鰡給他拔眼裏倒睫毛。訴苦時，定要叫我替他們翻譯。我也深感不勝其煩，勸他與看守打交道，不如與難友們和好，後來果然他不再找海鰡訴苦了。

所謂強盜者，一般人想像中，以為是孔武有力的硬漢，但我所碰著的這位強盜，卻完全相反，是個老弱的傻人，好像脫毛的小雞。他每找海鰡拔倒睫毛的時候，痀痀地趨走，在半路上就用指頭掀開他的眼皮，邊走邊喊：「快點快點，大人，把這根毛給我拔起來！」海鰡看他還未到，就先拿著小夾子等他，一到，馬上把那根毛拔起來問道：

「還痛不痛？」

「不痛了，謝謝！」

「幹您娘，好了，走走，快走！」

N 十三號

十三號囚是全獄最兇惡的囚人，他曾被配在第十工廠做木工，因為看守說了他幾句話，他就拿起利鑿追逐那個看守，鬧得全監獄的獄卒總動員，包圍他一個人，這是好幾年來未曾有的事，為此，他又被監禁獨身房很久。

監獄當局為了十三號傷透腦筋，及聽見海翻揚言他不怕任何兇惡的犯人，都有辦法，於是就把十三號移交過來，配置於我的身邊，意若要讓我感訓，不禁止他和我談話。

十三號和我相處還好，他每天都要講一、二段三國演義的故事，他的記性很強，連三國演義書中的文章詩句都記得起，曾講了一段孔明致書曹真（子丹）說：「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致書於大司馬曹子丹之前，竊謂夫為將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剛，能進能退，能弱能強，不動如山獄，難知而陰陽……」講後自己哈哈大笑，環視周圍有沒有人喝采。

他給我訴說殺妻的動機是這樣的：他本來是個牙科密醫，被警察檢舉之後，就失了業，天天到處去找事情，因為他是個不文不武的人，所以老是找不著工作。有一天下午，他饑渴交加，回到家時，他的妻正在門口織草帽。

他進了門，問她飯吃，她答道三頓飯還吃不著，想吃什麼點心。他因為找不到工作，又挨餓，悶得心慌氣急，聽見妻揶揄他，禁不住地臭罵了她一頓，她不肯示弱，反嘴咬過來。

他喝道再不住嘴就要把她殺死，詎料她竟扔掉手裏的帽子，迫近他身邊嚷著叫他殺，他不覺拿起櫃上的鑿子，揪住她的頭髮，抵住她咽喉，叫她不要動，她偏罵不絕口。以後怎樣，他記不清；等到他清醒時，妻已死在血泊中，看見自己滿身是血，才知道闖了大禍，一時不知所措，取了她的金首飾，把室內佈置得好像強盜謀財害命的跡象，即時逃走，但沒過幾天，就被抓著了。

他談到這裏，嘆了口氣說：他的太太平時對他還不錯，只為了鬧窮，七鬧八鬧竟鬧出了人命，這是萬想不到的，他以為如果不故意掩飾場面，企圖脫罪，坦然去自首的話，刑期當不致於那麼重，如今一判十五年，等到出獄時已是五十多歲老人，前途茫茫，活著也沒意思，口出怨言，自暴自棄，表示要反抗到底。

十三號和我一起過了幾個月，安然無事。到了冬季某一天，吊燈的忽兒看不見十三號，大吃一驚，找來找去，發見他躲在洋洗部烤著電氣熨斗取暖，才放了心，喊道：

「十三號！你在那裏幹什麼？」

「烤火哪。」

十三號毫無畏懼的回答他，吊燈的用一半臺語罵他：

「幹您娘，不行ぢやないか。」

「我才幹您娘、駛您娘！」

吊燈的為保持官威喝道：

「什麼，你罵大人！」

吊燈的下了看守臺，要去抓十三號，不料十三號先發制人，出其無意，揮拳亂打過來，吊燈的招架不住，連官帽也被打落地，慌忙要撿起帽子，又被十三號乘隙多揍了幾下，退到看守臺，才得到了立足點，於是便開始反攻了。

十三號哪能抵敵這四段的劍士，不堪一擊就仰天倒地，爬不起來。我們本來只是隔岸觀火，袖手旁觀，及至看見十三號一敗塗地，不由的跑去排解，夥伴們也圍做一起，七推八拉，正在鬧成一團的時候，恰巧換班的鐘響了。

海翳隨著前來替班，看見廠裏一片混亂，正要問個因由，吊燈的只簡單說了幾句交代，便氣憤憤地走出去了。海翳為了這件事，頗感左右為難，詢問我們起事原因，我們雖然歪曲事實，袒護十三號，結果仍然無效，過不了一刻鐘，便有幾個不認識的看守，到我們工廠來帶走十三號，從此一去，我們誰也沒再看見過十三號了。

O日四

三國演義的十三號去後，我們的工廠就安靜得多了，我也落得輕鬆一點。承接十三號來跟我做伙伴的是一個日本老人。他年近花甲，為了事業失敗，怕子弟的教育費無著，居心把保火災險的住宅放火燒掉，到頭吃了官司，法院以其有計劃的犯罪，判處六年的勞役，已經在我們的工廠做過了二、三年的苦工。他能夠和我搭伴很高興，不但說話能通，而且做不了

的事，靠我的幫忙，所以他比從前快活多了。

也許看守們有意要表示大公無私，我們廠裏的日人不僅受不到優待，反要比我們吃苦。這個老人和另外一個日籍慣竊，幾乎沒有一天不挨罵。

老人姓三輪，因為上了年紀，手足鈍笨，重的抬不起，快的趕不上，獄卒偏要叫他做，藉以奚落他，我給他幫忙的時候，獄卒常常故意喊道：

「二九二號，不理他好了，讓他做！喂，你不要磨蹭著，飯桶！」

三輪氣力不加，瞪著眼睛乞憐，但看守毫不賣賬，罵道：

「哥啦，不聽話麼，快點！沒出息的東西！」

我幫忙日囚做活，不一定出自人道主義，其實我也有意要讓日人看我對他們沒有歧視。三輪有點文學素養，喜歡做「和歌」，也懂得「俳句」，每得一首便拿給我看，我有時候也跟他和一兩首做消遣。他痛恨看守對他絲毫沒有留情，我卻認為他是被監獄當局拿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犧牲，如果他不在我們工廠的話，絕不致於受到那麼壞的待遇。

日人「大懶」顧名思義，是個懶骨頭，他自和我同日判刑服役以後，不曉得被派在哪一個工廠，直到我入了第五廠，他又被派來我們這邊。

大懶平時懶洋洋的不想做活，差不多看守罵一句才動一下，好像傀儡沒有神經。他老跟在我身邊，拿我當擋箭牌。我實在討厭他，因為他身上有一股令人作嘔的臭味，我極想迴避他，他偏緊隨著不捨。

初時我不知道臭味的來源，以為是狐臭或身體骯髒，看守也常罵他不乾淨，叫他要有衛生；他連話也懶得說，對看守常以無言代替反抗，有時候挨罵得難堪，也只是向看守偷瞪一眼算了。後來，他的臭源終於被看守發現了，說是他的肛門有毛病，不時滲出屎汁，無法治療，事實證明他並非連屎也懶得上廁所去屙的。看守以其有傷日人大雅，就把他移到別的工廠去了。

由大懶我得到了一個答案——凡性格上有毛病的人，其生理組織也有毛病。

P 小白臉

有一天，我們的工廠又來了一個新囚，長得像女人，他第一步學習洗衣服，這該是他的拿手，卻學不來；我教他學習操作手勢，教了一個多禮拜，還是沒有學好。

我看這文質彬彬的美少年，以為是犯了色情案或什麼輕微的罪行，想不到他竟是個殺人的兇手。他是個臺籍的福州人，被害人和他根本不認識，自無恩怨，只是他受了朋友的拜託，就去做人家的劊子手的。

這位福州生的職業是理髮匠，有一夜被朋友招飲，酒後，朋友告訴他被某人欺侮，請他代為出息，他一口氣答應，再喝了一瓶金雞酒，便帶了一把剃刀去找那個所謂仇人，醉顛顛地伸手去搭上「仇人」的肩膀，出其無意割斷了他的頸動脈，使他當場斃命。

他被抓著的時候，還酒氣熏噴，醉得像泥人，不知天地。司法當局以其和被害人沒有冤

仇，認為是醉中誤殺致死，判決他三年的刑期，他的朋友卻逍遙法外達成其殺人目的，使死者含冤於九泉地下；我聽了這小白臉的案由，以後就不再理他了。

Q 釋放前

全獄的罪案，要是把它統計分析起來，能夠看到這社會的民情風俗習慣及民族氣質。我因為工作上，每個工廠都得去，所以自第一廠至二十四廠的每個要犯，都有機會見得著。舉凡刑法上所有的案子都有，就是最稀奇的「不敬罪」案也不缺。我欣幸被派在第五廠，在這裏只消多獃一個時期，全獄的情形便能夠明如睹火了。

囹圄心境，歲月催遷，有時候一日如三秋，有時候覺得似短暫，年華逝水般的流過去；想起入獄曾幾何時，瞬息刑期快要屆滿了。在刑期快滿當兒，我開始更猛烈的勞動，以為假使力疾過勞，也不致於瘦死獄中，所以盡一切的能耐，試試自己的體力。

釋放前放假一天，這是說要給囚人靜坐反省的機會。當天，海翳以賣弄人情的口吻告訴我：

「二九二號，你的刑期屆滿了，今天下午特准你休息，為了職務限制，我過去未能對你優待，這是很遺憾的，不過我希望你改變思想，為國家服務，將來必定能夠成功的。」

「謝謝。」

難友們知道我快要被送回監房了，大家都很難過，有的眼淚奪眶而出，相對無語。我和

他們話別，心裡著實辛酸，一時想不出適當的話可以安慰他們，只鄭重地請他們自愛，保重身體，出了獄後會有期；從早晨說到過午，不過也是反覆這些話。

過午，有個看守來叫我出去，這時大家都不覺站起來，流露著由衷而出的神情注視我，我滿腔無限的感慨，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向他們深深地行了一個鞠躬禮，懷著沈重淒切的心緒，步出了工廠的大門。

回頭再望一望難友們，不禁揮手告別，他們也都舉手相送，彼此黯然神傷盡在無言之中。按獄規說，我們的舉動都是違法，但冷酷無比的海蟹在這時也不加干涉，立正著，微笑說：

「再見！」

進入了監房之後，我依照他們的規定，閉目靜坐，朦朧裏，看見難友們一對對的眼睛在注視我，好像黑夜的朗朗明星，綺麗閃爍。眼睛代表人的意志和情感與思想，它能表現誠實、傳真、神秘。眼神的流露，勝於千千萬萬的言語文字，言語文字會歪曲、扯謊、掩飾，唯有眼睛是真實。那些難友們的眼睛留給我的紀念是永恆的，到現在我還時常會幻想那些真誠的眼睛。

監獄於我是很好的學校，我在這裏得到了許多教育，體會了許多事理。我本來不會寫中文，在這裏學會了讀四書五經及諸子百家。我本來只是讀書，沒有研究過學問，在這裏學會了邏輯與批判。我本來以為真理是絕對的，在這裏才發現是相對的。我本來是否認宗教的，在這裏始了解宗教也是有其必要的（但反對現在的所謂宗教）。

我本來相信我的思想是正確的，在這裏才明白犯了很大的錯誤。我本來以為人能創造原理法則，在這裏才認識了原理法則只可發現，不可以創造的。我本來只看得見社會的表面，在這裏才瞧見了它的裏面。我本來相信好的就是好，壞的就是壞，在這裏才領悟了好的也有壞處，壞的也有好處。這三年半的牢獄生涯，雖然光陰不太長，也不算短，總是沒有白費。

釋放前一天，我整天清潔監房，擦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染。看守奇怪的問我：

「你的房間平時已經夠乾淨了，為什麼還得這樣擦？」

「我怕有些塵埃留下。」

「你的用意雖然好，但你一走，馬上就會弄髒的，枉費你的心情。」

「那是以後的事，現在只要我於心過得去就好了。」

「這是很好的日本精神。」

我聽見他說出「日本精神」覺得有些不愉快，難道我們中國人就沒有這種精神？不過日本有句俗諺：「起飛的鷺鶯不留濁水痕迹」，看守的話也該由他說的。

無時不移、無動不變的時空，推著我走近出獄的邊際，使我發生了許多矛盾的心緒。一邊想趕快出獄到社會去試試在監獄所修養的功夫夠不夠，可是一邊又覺得新改變的思想還未成熟，一旦步入了娑婆，是否應用得來？

還有，如何見可怕的父親？他自我入獄以後，未曾見過面、通過信、寄過一件東西，或到過法院聽公判。只我母親東奔西跑，探監、鼓勵、雇律師、送東西、聽公判，負擔我一切

的費用，她把私蓄的錢都為我花光了。

家父平素最崇拜孫總理、蔣總司令，信奉三民主義，卻極端反對我參加革命。他要我做醫生或律師，主張等到學業完成，思想成熟了再說，指我們青年參加革命是瞎鬧。

他在我出獄前一個月，卻忽兒給我寄來一張信，大意是責我輕舉妄動，自毀前途，舉趙奢趙括父子之例，警告我不可妄自尊大，自作聰明，不但誤人誤己，且會惹出殺身之禍，要我在獄中倍加修養，反省悔悟。監獄當局檢閱了這張信，叫我須奉為圭臬，反覆誦讀，一字也不可忽略。

自接到了父親的信，我稍微放心，以前我想父親大概不要我了，因為我不聽他的話，恣意往上海下廣州，參加革命，氣得聲言要和我斷絕父子關係；這次又犯了案，給了他許多麻煩，我自怨自艾，不敢和他見面，想不到他終於給我來信息，顯示他還有父子之情，不拒絕我回家。

註五一：和尚州，今台北縣蘆洲鄉，舊稱「河上洲」，因屬淡水河沙洲地，清乾隆年間，有僧人申請此地作為關渡媽祖廟之產業，以收租谷充作油香費，清政府核准，故又稱「和尚洲」。又因鷺群棲息，也稱鷺洲，戰後後改稱蘆洲。

63 出獄

出獄那天大清早，我從睡朦朧裏被看守叫醒，聽了他的說明才想起真的快要出獄了。應辦的手續辦理完畢，德欽幫忙我搬運書籍，搬到了監獄的大門口，正在苦沒車的時候，忽然出現了兩輛人力車，跑過來兜客。天還未亮，附近一帶罩著濛霧，萬家燈火一片寂靜，哪裏來的這兩輛車？不管他，我和德欽各坐一輛，叫車夫拉往「濱町」方面去。

我們的車跑離監獄約莫二百公尺的地方，迤邐裏跑出來五、六個青年大喊停車，但車夫不停，我也不叫停，他們跑過車前攔住去路說：

「深切君、德欽君都下來吧，太對不起了，我們歡迎的人太少！……」

他們為熱情所激動，氣喘吁吁，說話的聲音也顫動了。我答道：

「謝謝謝謝，你們如果要見我，只派一個人到濱町吳丹桂宅來吧，再見。」

說罷，叫車夫快走。那些歡迎我們的同志好像被我澆了滿頭冷水，懊喪地站著呆望我們說不出話，等到我稍微冷靜了，才回頭望一望他們，遠遠的揮手向他們道別。

這時，我百感交集，失去了理智，不知所措。同志們要調查我們的出獄日子，已經夠不

容易，何況這麼大清早就到那裏埋伏著，等候歡迎，更是難能可貴，為什麼我如此冷淡他們？我在車上心神恍惚，解不開自己的心情。

議會期成同盟會的會員，違反治安警察法，被判處三、四個月的禁錮，衝動了全島民心，他們的出入獄，全島舉行了盛大無比的歡送會，沿途爆竹喧天，歡呼雷動，群眾成千成萬擁護著，鼓勵他們、同情他們，比迎神賽會還要熱烈，難道我們是希求為這樣的隆遇才去參加革命的麼？

到了吳宅，我打算在這裏稍事休息，探詢家中狀況，然後決定去留，吳丹桂和我家是世交，他是總督府專賣局的官吏，由日人看來，思想純正，信望素孚，不致為我的投趾而受累，所以我才敢坦然去找他。

剛踏上樓梯，吳家人就發覺了我，嘩然出來迎接，告訴我母親昨日已來住在這裏，等著時間到監獄去迎接，想不到在辦公時間外，這麼早就放出來，他們先帶我到母親房間，她正在梳理，不慌不忙的轉過來看我，我見她那慈祥的面容，不覺跪下去哭出聲來，她隨手扶起我，流淚說：

「孩子，起來吧，對自己的母親何必這樣……。」

我感慨無量，說不出話。家母平素很少流淚，我也以不為私情流淚為英雄，現在我們母子都不禁嚶嚶啜泣。我心誓此生絕不再使母親流淚，自己也絕不再流淚。

我詢問列車時刻表，準備隨時趕回臺中，母親不同意，她說須先到臺北各廟宇去拜拜還

願；我暗暗叫苦，本想趕快陪德欽返中，好讓他回草屯見他母親，但母命不敢違，只得問德欽意見如何，他答道願陪我們去行香。這是我幾十年來頭一次的拜拜。

回到臺中，我們的家已經搬在現時第二信用合作社的對面。我的哥哥在我離家後，已結了婚，做了二個孩子的爸爸。屈指一算，我二十四歲入獄，二十七歲出獄，短短的四年之間，我家已有相當的變化，我很擔心和父親見面這一著，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一見，並沒有我所想像的那麼可怕，我見他，行個禮說：「阿爹，我回來了……」，他毫無表情的說道：

「嗯，年輕人經驗一次監獄生活也是好的。」

他不願意多說話，說著就走開了。

64 民衆黨

這時，臺灣的社會運動，已形成鼎足而三的局面，民眾黨以各地的勞動團體，聯合青年團、農民協會、俱樂部、讀書會、臺灣新民報社等，代表小市民階級獨霸一方：文化協會則與農民組合、左翼工會及其他左翼文化團體提攜，代表無產階級，也佔據一個相當大的地盤；新興的自治聯盟，糾合過去文化運動界的老將於旄下，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形成一大勢力。

這三派系的形成，在一般民主國家是自然而然會產生的組織，日本政府對這三派的民眾運動，給予相當巧妙的控制，如果看民眾黨、自治聯盟強盛時，就縱文協農組與之鬥爭，要是認為文協農組或左翼團體過於猖獗時，便藉辭檢舉，加以彈壓。

日本帝國主義者當然不歡迎反政府的民眾組織，但他們對言論、結社絕不加以非法的取締，無論任何團體組織，或新聞雜誌的發行，以及言論的發表，只要經過合法手續，便可以自由活動，所以當時演講之盛，出版之多，可謂達到頂點。

日本近代史中最暴戾著名的田中內閣，為對中國積極侵略，和強力推行帝國主義政策，雖然採取了嚴厲的鎮壓政治，但仍沒法子鎮壓臺灣的民心。因為臺灣的民心由於被壓迫，而

愈發生強烈的反抗，造成了臺灣和日本無法妥協的後果。

民國十七年，中國國民革命運動進入高潮，革命軍進駐北平，完成統一的局面，田中內閣深恐中國的統一，會迫使日本改變對華侵略政策，一方面對國民政府提出蠻橫無理的干涉，製造緊張的空氣，一方面為消除國民輿論的反對與妨礙，須佈新「治安維持法」，對日本左翼團體加以強力的鎮壓，粉碎了左翼運動，為日本軍閥鋪築一條侵略的大路。

臺灣民眾黨看穿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決定暴露田中的陰謀，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召集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由政治部主任王鍾麟（註五二）提出緊急動議，攻擊田中內閣對華侵略政策，斷定田中政策係阻礙中國的統一，侵略中國的計劃。推舉蔣渭水等人為起草委員，擬就聲明準備發表，但委員中有人發言：

「反對政府的對外政策，必須特別慎重，一字一句也不可隨便，因為民眾黨是臺灣人民的政黨，不能以中國政黨的姿態反對日本，須認清現實，切不可意氣用事，自毀黨的前途和使命。」

可是亦有人主張：

「左翼團體已經崩潰，失去力量反抗，我黨若不揭發日本的侵略陰謀，阻止其行動，將來必會引起滔天大禍，故必須堅強反對！」

兩個主張引起激烈的辯論，討論的結果，最後採取折衷案，修改了一部分的字句，由王鍾麟擬電，八月二日向內閣總理大臣、外務大臣、日本勞農黨、日本農民黨、社會民眾黨、

政友會、民政黨、東京朝日、東京日日、東京新民會、無產大眾黨等發出通電，電文是：

我黨認定現內閣對中國國民政府東三省問題之解決方案與所持不平等條約之態度為破壞中華民國之統一及東洋和平。

臺灣民眾黨

日本政府接電不勝激憤，以為非左翼團體無敢反對帝國政策者，而臺灣民眾黨竟「大逆不道」發出如此「非國民」的聲明，把民眾黨亦列入為左翼團體，加以嚴密監視。

其實，民眾黨本來為反對文協左傾而組織的右翼政黨，後來因為與地主階級分裂，地主階級另組織了自治聯盟，所以由自聯說，它是屬於左傾的；質言之：中立派的立場，由左翼看在右，由右翼看在左，亦左亦右，吃力而不討好，甚且不斷受兩翼的夾攻，而招致滅亡。

中資產階級的處境，先天的就是大資產階級的勁敵，同時也是無產階級的死敵，大資產階級首先要消滅的是中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首衝其鋒的是中資產階級，因為中資產階級既沒有政權也沒有強力的背景，所以處在容易被擊敗的地位。世界各國的外交政治趨向也是一樣，採取中間路線的大抵都要受大資本主義國家和共產主義國家的夾攻而毀滅，德意如是，日本亦是。

民眾黨為要爭取文協的地盤，和文協左翼聯合軍發生了慘烈的激戰，在這短兵接戰的期

間，雙方都忘記了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他們以為須先消滅內在障礙，鞏固自己的地盤，然後才能對付敵人，詎料這正中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術策，造成了引火自焚的後果。

民眾黨本來只有政治主張，而沒有標榜主義思想，所以一般民眾無所適從，蔣渭水不得不把他所奉的三民主義標明為黨的最高領導思想，而以祖國作其奧援的背景。

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國民黨員王大貞來臺視察，民眾黨由他獲得了「國民黨綱領」與勞動運動有關的文獻；蔣渭水即密派蔣文來往祖國觀摩研究，又密令謝春木(註五三)、王鍾麟和國民黨打交道，積極採取親國民黨的政策。

十八年六月一日，國民政府在南京舉行「國父移靈祭」時，蔣渭水電請在上海的謝春木和王鍾麟任民眾黨代表，參加奉安大典，因為外事體制上的關係，謝、王均未獲准參加，這個消息一傳，臺灣各報便揑造為「謝春木、王鍾麟自任民眾黨代表企圖參加移靈祭，被國民政府所拒，未逞」的新聞。民眾黨員以此為莫大恥辱，議論沸騰，要求徹查責任；林獻堂認為事關重大，怪蔣渭水事前未與首腦部協議，擅行其事，表示不滿，聲言要辭去顧問。

蔣渭水接到林獻堂表示脫黨辭職的消息，大吃一驚，緊急南下往霧峰訪問林獻堂，說明事出有因的苦衷和動機，道歉挽留，方纔息事。六月二十六日謝春木返臺報告：「奠敬花環事實上沒有被國民政府所拒，只因沒有黨的信任狀，所以未克參加典禮……」，這事件看來似乎無足輕重，其實這正是引致民眾黨分裂的基本原因。

日本政府認為這一事，不能單純看作崇拜偉人的舉動，因為在奉安大典當日，全島各地

都同時舉行了「孫中山先生追悼會」，由此可以斷定民眾黨係藉機鼓舞民族主義，所以決定對民眾黨加以嚴厲的取締。右派分子聞訊不寒而慄，迅即採取脫黨的姿勢，以便對日本政府有所表示。

十九年，民眾黨為「霧社事件」(註五四)，對東京中央政府提出嚴重抗議，電文內容：

霧社事件發生的原因，本黨認為由於對山地之經濟榨取與生活壓迫及駐在警官之貪污殘忍行為所引起者，應著即撤職查辦臺灣總督、警務局長、臺中州知事及有關官公吏以明國法，同時須保障原住民生活之安全與自由，並撤廢阻礙其民族發展之政策，我黨要求徹底改革為保持官威放任警察擅權之警察萬能制度。

臺灣民眾黨

拓務大臣
貴族院議長　勛鑒
內閣總理大臣

民眾黨對日本政府的此一抗議和要求，直使黨內右派龜縮，右派黨員為明哲保身，相繼脫黨。二十年一月十八日，林獻堂在臺灣新民報股東會議席上，發表脫黨聲明謂：

「余與蔣渭水君關於民眾黨新綱領交換意見，結果，確認新綱領以無產階級為本位，極端過激，絕非吾人所能容忍者，余無法再以黨顧問地位與黨維持關係，決定斷然辭退顧問職。過去吾人屢受民眾黨幹部之攻擊，蔡培火、蔡式穀諸君早已被黨開除黨籍，余之去就雖再三加以考慮，因黨之旗幟過於鮮明，自無理由留任，故此辭退。」

林獻堂的脫黨，無疑地給予民眾黨巨大打擊，黨本身既不能右轉，又不能左傾，且又無法維持現狀，陷於進退維谷的境地。

註五二：王鍾麟（一八九三年～一九六二年），嘉義縣人，係清武將王得祿後人；京都帝國大學畢業，參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議會期成運動」，也是台灣民衆黨中央常務委員，後往上海執律師業，並兼任上海政治大學教授，戰後返台。

註五三：謝春木（一九〇二～），筆名追風，彰化北斗郡沙山人。日本東京高等師範畢業。二十歲參加「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衆黨」成立時膺任中央常務委員，並擔任政務部主任，他也是台灣新文學運動史第一位發表新詩與小說的人；一九三一年往大陸發展。

註五四：霧社事件：發生於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是泰雅族族民因不滿日本人的欺凌壓榨，在馬赫波社頭目莫那魯道領導下，有組織、有計劃的反日抗暴事件。此後持續了五十幾天，日軍曾以毒瓦斯對付先住民，殘酷的血腥暴行，令人不恥。

65 自治聯盟

民國十九年我們出獄的時候，民眾黨和文協農組已鬧至不可開交的地步，這時自治聯盟已經成立，展開其毫無阻滯的運動。

我靜觀臺灣的主客觀情勢，認識已和從前大不相同，而且我一向堅持不參加任何黨派，更不願意介入任何組織，決定採取旁觀態度，居於超然的地位。

洪元煌找我數次，勸我加入自治聯盟，我均以不願意參加黨派為由拒絕了。他是由文協而轉民眾黨，又由民眾黨轉入自治聯盟的老將，頭大體胖，形容有點像吳稚老，但比稚老矯健結實，眉疏、眼圓、額高、滿頭銀絲，白得漂亮，以「白頭殼仔」的綽號著名。他自二十餘歲就白透華顛了。元煌雖然沒有可誇譽的學歷，因其辯舌無礙，善於應變，所以在社會運動界一帆風順，常居於顯要地位。尤其他那壯大的體魄，由丹田發出來的洪亮聲音，配之以閃爍發亮的白髮，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他因為過於善變，左右逢源，有時候被疑為日本的奸細，有時候被認為難能可貴的幹才，到底他是個什麼人物？我至今還未能了曉。

我和他誼屬同鄉，常在一起談論世局時事，也合作過幾次，但我終沒法子了解他。也許我不好變，他善變，因此思想性格都合不來。不過他卻很少反對我的意見，只是我難能贊成他的主張。他很能攝取人家的意見，配合自己的機智，在全島遊說，暢行無阻，林獻堂、蔣渭水、楊肇嘉都很器重他，但也不無有點疑忌，無他不可，有他不安，這就是洪元煌所賦的特殊性格。我覺得他是一位最具備職業性的社會運動家。

他說自治聯盟和我也有點關係，因為創設聯盟的首倡人是蔡式穀，式穀著想發起自治運動的動機，是受了我的影響，說他擔任我們「廣東事件」的辯護律師時，在法庭上聽見我答辯：「最少限度我們要求臺灣自治」的議論，使他構想了一個自治運動的藍圖。

其實，自聯的組織，是民眾黨右派被排擠後，徬徨無著相隨而結合的；他們鑑於「設置臺灣議會請願」運動，已喚不起臺灣民眾的興趣，東京政界對請願運動也表示冷淡，顯然沒有成功的希望，林獻堂一派不得不改變方針，另找出路，否則他們盡心血所培植的文協，已被左派佔據，民眾黨又被蔣渭水派所把持，成為無處安身的狀態。

蔡式穀把他的構想，先在臺北試探過林履信、林柏壽、周盤石等「有力者」的意見，經過他們的同意，乃更進一步，將這消息通知駐在東京的蔡培火、楊肇嘉等人，徵求他們的意見，他們把這問題拿去請教中央要人及著名學者和評論家們，受到了意外的鼓勵，所以他們才決定作成具體案，訂期召集會議，決定進行組織。

民國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自治聯盟在臺中醉月樓舉行成立大會，臺日籍會員出席者約

二百餘人，選舉的結果——

顧　　問：林獻堂、土屋達太郎

常務理事：楊肇嘉、蔡式穀、李良弼、劉明哲、李瑞雲。

理　　事：李延旭、蔡先於、方玉山、葉清耀、黃朝清、林根生、洪元煌、林木根、王開運、李明家

評 議 員：陳逢源外八十五人

這些人物如非地方豪紳，便是有名的知識分子，資金豐富，人才鼎盛，創立未幾，就形成了一大勢力。自聯把本部設於臺中，各地相繼成立支部，本部以洪元煌為主幹，以楊肇嘉為常務理事兼負責人，葉榮鐘為書記長兼編輯長，莊垂勝、張聘三為主要「幕僚」，張景源、黃再添、何集壁等人為第一線先鋒，各地方配置有聲望的人士為幹部，蔡式穀任臺北事務局主任，陣容之盛，一時無兩。日本當局認為此一運動穩健合法，不加干涉，故大有氣吞牛斗，一舉而取天下之勢。

自聯每次的講演會，楊肇嘉多親自出馬，形若猛獅，聲若巨雷，獨能和左派旗鼓相當。這時，民眾黨因為痛恨他們叛黨，故一次斬掉了蔡培火、陳逢源、洪元煌等十六員大將，做清黨運動的祭旗，但還不敢公開對自聯宣戰。

文協農組自被田中大將鎩了羽之後，只能打游擊、叫罵、搗亂，無法給予自聯致命的打

擊。

跨黨自聯幹部的民眾黨員，在要組織自聯之前，曾請求黨原諒云：

「自治聯盟為實現本黨一部分政策，欲致全力於自治，在求達成目的，絕無叛黨之意，如達成了地方自治的目的，自當解散聯盟歸隊，絕對不使本黨分裂……」

但自聯何時能達成目的？誰也無法預料。我對這一團體根本沒有興趣，所以拒絕了元煌的招請。

66 試戀

我出獄後，在家無所事事，權任聽差，幫忙家中雜務，自灑掃庭除起，至整理房屋，閒來讀書止，每日過著平凡的生活。

家母對我的婚姻問題開始關心，天天都有媒人到我們家裏談親事。過去我對結婚漠不關心，以為女人是禍水，是成功的破壞者，如果要出人頭地，必須離開女性，唯有離開了女性，才能成大事，建大功。所以不論什麼名媛淑女，由我看來，等於骷髏枯骨，無意欣賞。

但自入獄以後，我的人生觀和思想逐漸改變，英雄主義也被新思想淘汰了，對以前所崇拜的聖哲英雄，都有了新的估量。我痛感需要「與人化」，化為人，才能盡心性，知天命。

為了人生觀的改變，我對女人的觀念也改變了，同時對美的觀感也改變了。在監獄既能和窮兇極惡的囚犯為友，在社會上自無可厭惡的女人。所以只要她們真心愛我，能夠理解我，便是我的愛人。

真的美，在德而不在色，色衰愛弛，惟德不孤，這話說來，雖然奇矯，但是事實。只是我未曾認真地去追求過女人，也沒有女人認真地追求過我，所以未能證實。或許有人要問我：

「假使有個又醜又老的女人愛上了你的話，你也願意接受麼？」

我頭一句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我又要反問：

「何以知道她真心愛我？」

所謂真心，並不是為生活、為虛榮，或有其他不純真的動機夾在其間；需要對我有真實的了解，由了解而發生的愛情，才可以說是真心的情愛，否則充其量不過只是情慾，算不了真心。

我們的鄰居有一個小姐，和我常有機會見面，我一見對她發生好感，有一天，有個朋友找我，談起她的事情，朋友說：

「近水樓台之月，何不撈之？」

這話顯然帶有開玩笑的意味，叫我去找她，但我卻認真的答道：

「苦無線索。」

朋友說：

「何不寫一張信試探她的反應呢。」

我擬了一篇所謂情書讓他看，他笑說：

「太硬，不夠痴情，但不妨試試看。」

情書的內容大意說：「我的心最近被你播下了一顆煩悶的種籽，逐漸萌芽，快要生長了。我怕它長大盤根，拔不起來，這顆種籽到底是你有意播的，抑或無意中丟下的，請你給我一

個回示，如果是你存意下的種籽，那末希望你跟我來照料它，使它長成一棵美麗的大樹，讓我們來乘涼，否則，請你趁早把它收回去，不要讓它留為禍根。」

這張信投遞後，好像被北風吹到烏何有之鄉，毫無反響，我也不再去想她了。後來聽見她說：她不願意嫁像我這樣的窮光蛋，她想嫁的男人，他的家裏必須要有鋼琴，並且要有資力能帶她出洋觀光，才夠資格，這是她所要求的最低條件。我聞訊竊喜我的資格不夠，反而覺得輕鬆愉快。朋友怪我說：

「你是偽君子，天下哪裏有失戀者不承認失戀的煩悶，而說輕鬆愉快！」

我說：

「不，所謂失戀者，有戀然後有失，無戀何來得失？」

他不服，駁道：

「你已經寫情書給人家了，怎麼說無戀？」

我搖頭笑說：

「你錯了，試戀和真戀要有分別，我的試戀，不能說是真戀，只想試試看，試探的結果，不行就算了，還有什麼留戀？況且戀愛是不能強制的，因為戀愛是結婚的前奏曲，前奏曲苟奏不好，主題曲更沒法子奏，何必勉強奏下去？」

「你說人人都像你那麼冷澈，不為失戀所煩麼？」

「可能，人之異於禽獸者，只因為他有特殊的理性，人如不運用理性，則等於禽獸，理

性之可貴，在於能判斷是非曲直，可不可，對不對，既知不可，而欲強之者，非痴必愚也。」

「哪，你知難而退，不幹也夠了，何喜之有？」

「我初時不知道她的性格、慾望、思想，所以會胡思亂想而迷惑，現在已經得到了答案，回首迷津，多麼輕鬆愉快！」

「這是你理性強，才會自己解脫的……」

「不，我相信失戀的痛苦，是出於自卑感和執迷不悟，要是能揚棄其自卑感和迷惑，自能豁然貫通，了悟天造男女，並不是有固定配偶，失一而無其他，更好的配偶多的是，不必為失一而悲觀落膽。」

「那，你就是吃不著葡萄，嫌葡萄酸的老狐狸了。」

經過了一段時間，我才明白了她常要瞅一瞅我的原因，是出於好奇心，因為她對我的身分覺得很奇怪，如果說是聽差，卻有點少爺氣派；是少爺呢，一向又未曾聽見過張家有這麼一個人，剃光頭，專作下賤的工作。等到她明白這個聽差是什麼人的時候，我對她的關心已冷如冰霜了。

67 演劇

日本當局對我的監視，漸漸放鬆，我為了百無聊賴，亟想找個差事，先在臺灣新民報參加了「臺灣鄉土文學」的論戰，沒有幾回合，民報以我的文章煞尾，把設了幾個月的論壇關閉了。隨後，我寫了一篇〈鐵窗感想錄〉，表白我思想的轉變，連續刊了好幾天，期待它能引起臺灣社會的注意。

記得這一年，總督府聘請江亢虎來臺巡迴演講，我寫一篇文章，叫他滾出去，意外迎合了當時臺灣青年的思想，氣壞了歡迎江亢虎的林獻堂一派人士。因此我和林獻堂越生隔膜，終至斷絕來往。自從他耽誤了我的行程，招致我坐獄一事，我雖然對他有點不愜意，但我們之間還保持著戰友的情誼，不即不離，及至江亢虎的問題發生，我和他的感情就完全破裂了。

我利用生活上虛脫的期間，組織了一個「臺灣演劇研究會」的話劇團，這一劇團的組織，是根據我過去常在報紙上主張「文藝大眾化，須從演劇做起」的理論拿來實踐的；因為只在文字上論文藝大眾化，舉不出多大效果，需要透過演劇，從舞臺上喚醒民眾和文盲，才能通俗普遍化。

當時臺灣還沒有所謂真正的話劇，只有亂彈、四平、九角仔（高腳戲）、採茶等的舊劇和改良戲及所謂「文化劇」。臺北方面雖然也有話劇組織，卻還未達到「本格化」的水準。我為要從新劇方面打開新線路，糾合了四五十位青年男女，掀起了一個嶄新的演劇運動。日本當局為歡迎我離開政治鬥爭，對我的監視放寬了一些尺度，對劇團組織和劇本的檢查，表示願意給予方便。

這時，我們的研究會缺少女演員，雖然有五、六位小姐參加，但實際上肯表演的只有一、二位，而且演技不大理想，使我大傷腦筋。

在這個時代，要找一個會看劇本的適當女演員，真是像鳳毛麟角很不易得。幸而後來找到了三位從東京回來的小姑娘，寄予很大的希望，可是磋商的結果，只有一位願意參加，其餘不肯；想不到這次的勸募工作中，竟引出了一段不可解的姻緣。

經過了幾個月的訓練，演員們把劇本都背得滾瓜爛熟，況且他們多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理解力更強，演技也有相當的進步，大家都鬧著要公演，一部分會員說我過於獨裁專制，跟著一位某法學士退會，去另組織了一個劇團。他們排斥我只講理論，不敢公演，沮喪了全體的士氣，但大多數的會員，都贊成我的主張，熱心繼續練習，願意等到找著了適當的女演員，才舉行正式公演。

分裂後，由某學士組織的一派，以佛寺為後援，採取宣傳攻勢，說他們不日就要公演，會員們都受優待，課餘還有點心吃，這一宣傳目的在要爭取我方的演員。我方基金遠不及他

們，會員們的服裝、化粧品，都得自己負擔，連佈景費也得向外募捐，吃了許多苦頭。

我們聽見離會組織的劇團與和尙發生齟齬，已陷於解體的狀態；我被周圍所迫，不得不發表日期，決定在臺中市樂舞臺售票公演，有許多脫會的會員跑回來幫忙，增加了我們不少聲勢。

開幕前，便擠滿了觀眾，警察署加派警察和「臨監官」各帶劇本嚴陣以待，警告我們不得超出劇本臺詞，否則即時中止。我們演出的有〈暗地〉、〈接木花〉其他數齣節目，兩天的公演算是在盛況裏結束了。

這次的成功，絕不是我們的表演或內容叫得觀眾的歡迎，實在是民眾不管好歹熱誠擁護的。演完後第二天，警察署傳我到高等課說話，問我編〈暗地〉和〈接木花〉用意何在？我答道：「劇本是你們檢查通過的，我們沒有妄穿劇情，也沒有多說一句臺詞，何必再問？」他們坦白說，單看劇本，實在沒感覺到那麼激烈，及看見了演出，加上表情動作，才知道這兩部劇本內容都有問題，以後禁止公演。

我抗議他們干涉藝術運動，迫我們走投無路。辯論結果，他們提出了一個折衷辦法，說：四部劇「暗地」秋部應刪除，多部須看了劇本另議，至若〈接木花〉即絕對禁止。

他們看穿〈接木花〉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諷刺臺灣的命運，不能作純藝術作品看。〈暗地〉雖然比〈接木花〉激烈，卻只描寫社會的黑暗面，似乎比較可以容允。

警察局的干涉，使我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打擊，演劇如果也得受這麼嚴厲的限制，前途的

發展，渺茫沒有希望，雖則能發展，也沒有意義。我因為不能編「為藝術而藝術」的劇本，更不會編導討好日人的戲劇，所以無法編劇。

在高等課受訊的情形，我不敢讓會員們知道，痛感臺灣不是久居之地，一方面準備再逃亡大陸，一方面加強訓練演員，故意提出〈暗地〉?·冬部讓他們檢閱，果然收到需要刪改的通知。

接到了通知，我就準備在豐中大倉庫（現時的豐中戲院）舉行大規模的試演。燈光佈景都和公開表演完全一樣，叫演員們請親戚朋友多來參觀，我也特意請家母去看。家母本來不喜歡我「做戲」，但她在樂舞臺已經看過一次，知道和過去的戲劇不同，所以她也出席了。

名為試演，其實等於公演，因為沒有收門票，更擠得水洩不通。警察當局探悉試演消息，既不能取締，又無法制止，急派幹員到豐中附近的派出所坐鎮，傳我說話。我預料有這麼一套，預先和會員們佈置局勢應付他們。

我們正在熱烈表演的時候，特務來了，說要找我。接待員辭以導演中無暇抽身。特務說有緊急事情，務必撥冗見面。招待員答應可以通報一下，特務便要跟他後面闖進後臺。招待員說後臺重地，不准任何人進去，叫他在觀覽席稍等，假意找椅子要讓他坐。他急得要命，一直催招待員去叫我，會員們偏忙著要找椅子給他。

這時觀眾連站也沒有餘地，哪裏來的椅子，特務明知中了我們的緩兵之計，但也無可奈何，只得忍著等待。我命招待員好好的請他先回去，我隨後就到，他卻說必定要等我同行，

我答道如果不信我的話，我就要等到演完了才去。招待員這麼來往的傳話，須經過人簇裏慢慢地擠，又故意拖延時間，實在很不耐煩，特務知道我的脾氣，終於先走了。

這個時間表我早已安排好的，所以特務一走，我也就隨後到派出所去。他們以我不相欺，表示滿意。我和他們寒暄一會兒，才談上主題，高等課派來的警官穿制服，準備有必要時，即下令解散。

我察知他們的用意，很客氣的和他們談論演劇的種種困難。他們無心和我談這些，責備我試演的規模弄得太大，等於公開表演。我說明這次是要慰勞演員們的家眷，排出一套理論，和警察人員討論試演和公演的分別及法律的取締範圍，他們堅持我們的試演是變相的公演，要我立即命令散會。我故意問他們是不是「命令？」他們答道「是。」，我便慨然答應「好的，回去就命令解散。」

我回到會場的時候，戲已經演完，觀眾也散清了。只有家母還在那裏懷著不安的神情，看會員們忙著收拾道具。我裝做笑容問她：

「好看不好看？」

「好。你不是被警察署叫去了麼，有什麼事？」

「沒有，不是警察署，是派出所，他們有點誤會，所以要問個明白，現在他們已經弄明瞭了，沒有什麼事。」

「你去得那麼久！」

「我和他們聊天，所以耽擱了時間，沒有什麼，請你放心。」

我心裡很沮喪，但不讓家母知道。會員們很高興地邊整理會場，邊談未來公演的展望，他們都不知道這是最末的一場戲。

第二天，我自動去找高等警察課長，抗議他們干涉我們的演劇運動，是否存意要迫我再走入政治路線？將來由此而發生的後果，他們要負責任。課長慌忙回答他們絕對沒有這種意思，叫我不要誤會；說我們的劇本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和政治色彩，缺乏純粹藝術，所以不得不加以干涉。我說我本來是研究政治的，在臺灣沒有用處，只得寄身於文藝，如今連文藝路線也走不通，叫我怎麼辦？

警察課長說他們希望我繼續從事純文藝運動，他們願意從旁幫忙。我說我對文藝是外行，需要重新研究，要求他們讓我去上海走一趟。他要求我去東京，我說去東京沒有意思，因為日文書籍在臺灣都買得著，日本的事情我們也夠熟悉了，沒有去的必要。臺灣的演劇要演給臺灣人看，所以得要到上海去觀摩，參觀現代劇的演出法，和臺詞的發聲法，並買些參考書和劇本回來，因為這些讀物在臺灣是買不著的。他強調研究中國戲劇，恐怕會更趨於民族主義。我答道這是我本身的思想問題，絕對不受任何影響。大談一套後，他似乎了解我的話，答應幫忙發給護照。

68 活劇

演劇研究會繼續熱心上課，這時忽然失蹤了兩位重要的演員，一個是女演員素鳳（註五五），一個是她的愛人林瑞福。我們本來已缺乏女演員，況且她是頗有希望的角色，少了這位女生，研究會當然受了不少影響。林瑞福是反派的小生，他那天生的濃眉大眼，和太保型態，雖不化裝，也夠表現和壞人一模一樣。

瑞福有一套常人莫及的絕技，就是打橡皮彈弓，這是用橡膠管或橡皮帶子縛於丫形的柄子叉頭，中間做個小皮帶，用小石頭或小鐵丸可以做彈子從這皮帶發射，經他引弓一打，百發百中。他有兩個綽號，一個是「烏狗」，一個是「打鳥兒的」，提起「打鳥兒的」誰都知道就是指林瑞福。他在二次大戰從軍去南洋叢林中打仗的時候，也帶著彈弓未嘗離過身，演出了許多滑稽的故事。

他愛上了素鳳，平時形影不離。有時人家請他打彈，他便叫素鳳用指頭夾銅元，離數十步打，每打必中，不傷手指；有時候還叫她把洋火盒子放置頭上讓他打。西洋有個威廉鐵爾的神箭手，用箭射擱在兒子頭上的蘋果；我國有養由基百步穿楊；臺灣則可以說有林瑞福神

彈手能夠和他們媲美。這兩位男女演員的失蹤，使研究會很焦急，但我仍照常熱心上課，而且鼓勵演員們學跳舞，絕對不透露解散的消息。

研究跳舞的場所，恰巧設在拒絕參加研究會的兩位小姑娘二樓宿舍隔壁。我為看演員們的練習，也常到隔壁去探望她們。這兩位小姑娘和會中另一位女演員共租一棟二樓。她們都去過東京留學，準備做職業婦人。我和Ｓ小姐特別親近，看她每日手不釋卷，孜孜用功，暗暗稱奇，為要鼓勵她讀書，我時常拿各種新聞雜誌去送給她。

有些朋友推想我對她有什麼意思，其實我所喜歡的不是她，而是住在末端房間的一個小姑娘。她平時不大和我們說話，只默默埋頭打毛線。我喜歡到她房間去找在那裏等我的老友張芳洲。芳洲在當時算是唯一研究電影的專家。他常常勸我不要和Ｓ過於接近，怕會惹生意外的麻煩。

果然，有一天她到我家裏來看我，並送我幾件東西，說是要答謝我平素對她的指導，使我異常尷尬；我費盡詞令退回了她的禮物，只留下一件象徵性的小禮物——素面的領帶，想不到這條領帶，竟是象徵套在我頸上的繩索。

演劇和跳舞的研究熱烈並進，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我利用這期間提出護照的申請，揚言去上海一個月就回來。警察當局查不出我的詭計，經過了縝密的調查，終於答應給我批准護照。

註五五：素鳳：本名龔素鳳；藝名林月子，原為台南國風劇團女演員，十八歲與林瑞福結婚；他參與張深切演劇研究會後，加入台中「蝴蝶劇社」，享年僅三十一歲，據說臨終之前，還喃喃地唸着台詞。

69 奇案

好事多磨，突然發生了一個小枝節，使我的立場非常困難。那失蹤的林瑞福，意外飄然來找我，說素鳳被她的祖父拉回去了，要我寫張信叫她回到他的懷抱來，啼啼哭哭的糾纏不已。我不好意思拒絕，勉強寫張信替他拉紅線，不料為了這張信，竟惹出了一個大麻煩。

員林警察署寄來了一張傳票，傳我某日某時去受訊，我似乎丈二和尚摸不著頭顱，一向我沒有去過員林，怎麼會在員林發生疑案？如果不是員林發生的案子，怎麼由員林警察署發出傳票？左思右想百思莫解。我忽兒聽見林瑞福匿居員林，想起我的案可能和他有什麼關係，不如先找他探問情形，然後應訊較為穩妥。

可是我不知道瑞福的住址，漠然到員林瞎撞，人地生疏，不辨東西南北，只好信步而行。偶爾看見一家油漆店，聯想瑞福會畫廣告招牌，在員林說不定又幹起這一行業，試入油漆店一問，果然得來全不費功夫，知道他住在這附近的一家樓上。

虧他在家，我就問起他和素鳳的關係，有沒有受到警察署的召訊。他說素鳳沒有接到我的信就逃走了，現在避居在某一個地方，他自己已被員林警察署傳訊過一兩次，但他始終不

吐實，所以警方還不知道她的下落。聽了他的話，我猜想可能就是為了這起案，坦然去警察署報到。

司法主任是個有趣的人物，他一見我說道：

「你是張深切麼？我有許多案件要問你……。」

我吃了一驚，想不出從哪裏來的許多案子？到底是什麼名堂？他微微一笑，拿一張信交給我看，問道：

「來，你看這個……這是不是你寫的？」

我接過手一看，原來是我寫給素鳳的信，不得不點頭道是。怎麼這張信會入警察當局的手裏？我愕然半晌，想出了一個應戰的術策。他把信收回去放在案桌上，再詳細看看之後說：

「你知道單憑這張信你就犯了幾條罪麼？」

「不知道。」

「我告訴你，你犯了……不敬罪、治安維持法、官吏侮辱、誘騙等等……」

要是依照他所舉的罪名，我竟觸犯了六、七條法律，有的我現在已記不清了。他好像老貓玩弄耗子的態度說：

「你日文寫得不錯啊。」

我搔首笑答：

「豈敢。」

「嗯，從哪一條罪問起？你的罪真是擢髮難數，……好吧，就先審問誘騙一案……你寫這張信的目的在哪裡？是不是想誘騙素鳳離開家庭？」

「是的，但並不是為我自已寫的，怎麼可以說是誘騙？況且這張信可能沒有落到她手裏，一定是你們從郵局偷出來的，那末她當然沒有看到我的信，所謂誘騙從何說起？」

他不覺笑出來，慌忙說：

「你胡說八道，怎麼說這是我們從郵局偷出來的！這張信是素鳳的祖父為要告你，才把它交給我們的，你別胡說！」

我已經知道素鳳的事情，故意和他開玩笑：

「哦，是麼，素鳳的祖父為什麼不告林瑞福而要告我，難道我是她的情人，她是一位從事正業的小姐？」

「她是未滿二十歲的少女，你不應該寫信去煽動她，煽動行為，便可以解作誘騙的。」

「好的，她是酒家女，她的祖父是烏龜（王八），煽動酒家女也可以算誘騙麼？再退一步說，她本人有沒有接到我的信？這大概就是法律上的爭論點吧。」

一言道破案情的重點，司法主任也明知罪案難能成立，舉手制止我說：

「好了，就算誘騙不成立吧。……你怎麼把一個酒家女比擬成宮女，這是不是有意侮辱皇室？」

「不敬的罪嫌，最好你不要提，一提反為不雅，我不願意你們拿日本皇室來誣栽我，所

謂宮女，世界宮廷多得很，何必拿日本皇室做問題呢？」

「好吧，這件事可不問了，你怎麼指總督府是阿呆塔，罵總督府官員都是傻瓜，在衙門裏彈算盤，搾取民膏，這不是侮辱官吏麼？」

「我單說阿呆塔，並沒有寫阿呆塔就是總督府，請不要牽強附會，至於說傻瓜彈算盤榨人民的膏血，這要弄清我侮辱哪一個官員，誰要告我？」

「你的辯論還有意思，你學過法律麼？」

「我是研究政治的。」

「看你這張信含有反政府的思想，可以適用治安維持法違反論罪，你承認不承認？」

「不承認，我不相信我這張信可以引用治安維持法那一條懲治我，同時我也不相信我們不是法治國家。」

「什麼你都不承認啊，好的，最少限度可以適用違警例，你說行不行？」

「哪，只有請你開恩開恩、赦免赦免！」

「你投降不投降？」

「投降投降。」

他得意地哈哈笑了幾聲說：

「你願意道歉麼？」

我連連點頭答道：

「願意願意，我道歉好了。」

「好，放你回去，下次不要這樣狂妄自大，如果再犯，不能輕恕，知道了麼？」

「知道了！知道了。」

他賣弄了一個大人情放我回家。我懊悔自己過於愚蠢，為了人家的桃色事件，發了過份的牢騷，自找麻煩，真是活該。好在這個司法主任還肯賣賬，不然，豈不是自取其咎！

員林的案子沒有發生多大影響，申請赴滬的護照，發下來了。家母以我出獄未幾，又要離家遠遊，心甚不安，不肯答應。她不知道我的苦衷，我也不敢說明理由，雖然得到了護照，反而擱淺在家裏。

有一天，臺中州高等警察課又派特務來叫我去問話，恰巧我不在家，母親以為又發生了什麼事情，很焦急，叫人到處去找我。我一回家，先到我的寢室——這是隔離我本宅一個店舖的空房子，發現一位朋友藏在我的屋裏。我問他出了什麼事情，他說有一個日本皇族叫什麼宮的要到臺灣來，在他旅行期間，所謂危險分子都得看管檢肅，所以到這裏來躲一下子。我說：躲在我家裏也是很危險的，因為我現在也被監視中，不如先找個比較安穩的地方，搬過去，等我無事回來再說。他勸我切不可「出頭」，一出頭一定回不了家。我靠有護照可以做護身符，預料不致於受扣押，叫他暫時不要離開我家，須等到我事情辦好了，才可以離去，要不然，恐怕脫不開特務的警戒網。

我想了好幾個地方，結果，我到臺中公園附近去找陳逢源問他借房子，這時他已由臺南

搬來臺中。他毫無遲疑地隨口答應了，我就回家報告那位朋友，叫他等我準備停妥，等警察課去後半個鐘頭，才可以去逢源宅。因為怕佈置在我家附近的警戒網未解除，還有危險。說罷，我回本宅取護照和身邊要用的零星東西，並多穿一兩件內衣短褲，預防被拘押時，無衣可換。

準備好了，我和母親告辭，說明這次是全島性的檢肅，並不是犯了什麼案，況且我有護照可以做護身符，請她放心，即令被扣押，也不過是一個星期就能夠回家，絕對沒有問題。母親含淚說：

「想不到日本鬼子這麼橫暴，如果這次無事回來，還是趕快到上海去好。」

轉禍為福，母親瞬時心境一變，竟答應我去上海了！我踴躍地跑到我的寢室找那位朋友，他卻已經走了。我以為他等不到我回來，先去了逢源宅，獨自往臺中州高等警察課候審。這時已是黃昏，警察課開了燈火，我剛要跨進辦公廳時，猛聽見室內怒罵聲咆哮如雷，看見一個特務正揮拳向我的朋友打過去，我的朋友一躲，沒有打著，特務用力過猛，顛撲於寫字臺上，我故意拉長聲音喊叫：

「康——尼幾哇！」（借光，即「日安」或「你好」的意思）

小笠原課長因尷尬的場面被我撞見，盛怒喝道：

「是誰？來幹什麼的？」

「是我，張深切！」

「誰叫你來的？」

小笠原怒氣未息，拿我洩恨。

我笑說：

「唔！沒有叫我麼？那好極了！我就回去。」

他急忙忙的隨後追出來喊道：

「等著！張先生，我有話跟你講。」

我已經走出門外幾步了，回頭問他：

「不是沒有找我麼？叫我幹什麼？」

他因為叱喝我，有點不好意思，連聲說：

「有有，我忘了，請等一下。」

他帶我到一間小應接室，坐下說：

「老實不客氣說，是要請你委屈一段時間，不過幾天……」

「為什麼呢，要幾天？」

「是受上峯的命令，不過是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那太長，糟糕！」

「怎麼說？」

「後天我就要動身去上海，一星期哪還行呢？」

「什麼？你要去上海！你有護照麼？」

「沒有護照，哪能去得？」

他顯現意外神情，伸出顫抖抖的手說：

「護照帶著麼？拿給我看。」

我從口袋裏拿出來給他看，他不自覺地問道：

「誰給你的？」

這一問，使我莫名其妙，我們的護照必須經過州高等警察課批准才能下來的，難道市警察署沒有通過州警察課便越級批准了？我揶揄他說：

「這本護照是假的麼？你怎麼不知道，你沒有批過麼？」

他惶惑地說：

「不，好，也許……是我忘了，你，慢幾天去行不行？」

「不行，船票已經買好了，後天得要動身，我現在正忙著準備行裝哩。」

他改容點點頭說：

「對不起你了，你回去準備好了，不過希望你這幾天行動謹愼一點，不然會影響你旅行。」

我站起來和他握握手就要走，他牽住我的手問道：

「你預定在上海滯多少日子？」

「大概一個多月吧。」

「一個多月一定回來麼？」

「……是的。」

「好，祝你健康。」

「謝謝。」

70 亡命

我為履行在高等課說的話，按照日子啟程，母親送我到車站，並做了一領十斤重的舖蓋叫我帶去。這次的旅行我覺得特別感傷，因為我決意此行不再回家了。我輕彈著言外之音，對母親說：

「中國政府無力應付日本，滿洲可能完全失掉，中原也必陷於危險的境地，我們應為國家盡點義務，我此去時間恐怕會長一點兒，請您身體保重，我絕不荒唐，請您放心……。」

她慷慨地激勵我說：

「你父親已經不管你的事了，我私蓄有限，你此去該設法謀求自立，如果碰著什麼困難，即時通知我，一定給你幫忙，切不可自暴自棄，做壞了事。」

我一一謹敬受教，告別了慈親啟程。在車中我自思自嘆，思潮起伏，痛恨帝國主義，同時也傷感由帝國主義者所造成的民族災難和政治腐敗，想道何不隱居山林，置身物外，而偏要去踏不測險地，自找苦吃。又轉念我還年輕，學識不夠，思想還未成熟，應該多經歷世事，多吃苦修行，為國家民族盡點義務。最後想到上海是自由的庇護所——列強租界，只有上海

租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我是漏網之魚，租界是浩瀚大海。何必躊躇？行矣，這是我應去的地方！

到了上海，我逃脫了日本水上警察的監視，一上陸就潛匿無蹤了。我們出境，抵達目的地的時候，按例須先到日本領事館報到，除有必要外，得寄存護照，到要離去時才領回。我因為決意不回臺灣，所以不去繳照登記。

登陸後，我找到了同鄉張芳洲、何非光等人，便和他們在公共租界租了一所樓房，住在一起。房東是一位中國女子嫁給葡萄牙人的寡婦，住在一塊的除芳洲的二、三個朋友外，還有一個姓陳的青年，他長得很俊俏，真是面如傅粉，唇如抹朱，兼有一對晶瑩的大眼睛，彷彿潘安再世。我和他之間取不即不離的態度相處著。

我們同居的雖然多是窮書生，因為大家純摯坦白，對財物不太重視；可是自姓陳的來了以後，大家常發覺丟掉金錢或零星東西，而查不出原因。

有一天，我們的老媽子不做飯，躲在半樓的小房子裏唏唏啼哭，說是丟了七十多來塊錢，這於她算是生命錢。這時幣值還高，她每月的薪金只三、四塊錢，七十多塊錢等於她兩年的全部收入，哪能叫她不傷心。

她已是六十多來歲的老媽，伶仃孤苦，舉目無親，只有一個義子年過三十，遊手好閒不事正業，每月總有一、二次來找這位乾媽要錢。我們很同情她，視若一家人，連吃飯也叫她一塊兒吃，這按中國習慣說，是破格的優待。因為這樣，所以她丟了錢，自然不敢嫌疑我們，

倒是嫌疑她的乾兒子。我認為這是件嚴重的事，如果找不出真賊，豈不會破壞她們母子的感情？我決意要破這起案，因為我心裏已有了一點兒線索。

在這件事發生前幾天，我已感覺到老陳的行動可疑，我們每要出門招呼他，他都不肯同行，我們在家裏的時候，他偏要出門。有一次大家出去，我故意留在家裏和老陳聊天。聊了一會，我問他要不要出去，他先說不出去，我佯說我有事到法租界找朋友，中午不回家吃飯，請他代為看家。

其實我出了門，就去躲在胡同裏的隱處監視他。他不知道我的鬼計，不一刻果然隨我之後出來，匆匆往大街走去。我等他去遠了，急回房裏檢查我的上衣；真的，我存心留下的十塊錢不翼而飛了，卻變成了一張五元的紅鈔票。這事我保密不透露，正想找機會要忠告老陳，不意他竟不擇手段，連女佣的血汗錢也偷了。

為慎重起見，我先詢問房東這幾天有沒有看見陌生人或老媽子的乾兒子來過？房東說沒有。於是我召集臨時會議叩詢同居人的意見，大家都認定老陳的嫌疑最大，我問假使確是老陳的話，應該怎麼辦？非光主張大家分擔代賠，有的主張先叫老陳賠，老陳賠不起的數目，才由大家分擔。我自告奮勇說：那末一任我試辦好了，請大家讓我個人留在家裏對付他，大家表示贊成出去，由我佈置了一個空城計伺候老陳。

老陳在晚飯前獨個兒回來，看見室裏只有我一個人，寂然無聲，似乎感覺到奇異，現出了不自在的神情；我笑著迎接他，和他談了一會，又請他到我的小房密談。他做賊心虛，問

我：

「老媽子呢？怎麼沒有看見？」

「她在廚房做飯，今天我叫她多做幾樣菜……。」

他放下心，問我有什麼話講，我低聲說有個解不開的疑問要請教他，他說這是笑話，好像問道於盲，叫我有什麼話快說。我再放低聲音，溫柔地說：

「五天前，上午九點，你從我的袋子裏取出了十塊錢換下五塊錢……」

他慌忙要否認，我急制止他說：

「你不要說，我都詳細看見了，當時你以為我出了門，其實我沒有出去，你在我下樓不出五分鐘，就取了我的錢，隨我後面走出胡同口，雇了一輛黃包車往右邊去了是不？」

他無法抵賴，垂下頭默認，我安慰他說：

「我不怪你，只是想不開你既然要錢，為什麼不把錢全數拿走，還留給我五塊錢呢？」

他似乎竭盡思慮想要造什麼理由辯解，卻揑不出來，只動動嘴唇又吞下去，我促膝靠近他說：

「你有困難，對我說好了，何必做這沒出息行徑，假使我存心害你，當場就捉住你了，哪能等到這時才說，現在沒有人在家裏，你說沒有關係，到底你有什麼困難呢？」

「我怕你沒有錢，因為我尊敬你，要是別人……」

他還沒說完忽而自覺滑了嘴，緘口不說了。這無意中滑出來的話，使我得到了確實的證

詞，那末其餘便可迎刃而解了。我先感謝他的誠懇，進而詢問他偷老媽子的錢的經過，費盡唇舌，諄諄誘導，使他不得不把事實和盤托出。最後我問他還剩下多少錢，他把袋子裏的錢都拿出來給我看，只有二十七、八塊錢。我教他留下十塊錢，剩下的十幾塊得還給老媽子，不夠的數目由我們分擔賠償，問他這個辦法行不行，他掉下眼淚說就是全部沒收，再打他幾下也是應該的。我問他只有十塊錢，對以後的生活如何維持？他卻反問我能不能容允他再住下去。我笑答：就是讓你住下去，也沒有意思了，不如趁大家還沒回來，盡速離開這裏好；他不得不點頭答應。我即刻幫忙他整頓行李，讓他搬家。臨別時我問他上哪兒去，他笑答要去找他的日本情人。

是夜，大家回來，我把經過給他們報告一下，並徵求他們的意見，他們不贊成我的辦法，有的還罵我假慈悲，慷他人之慨，應該把老陳的錢全部沒收，扣押他的行李賠償才對，不抓他坐牢已夠開恩了，還給錢放他走！我沒法子答辯，只好和何非光兩個人賠了不夠的錢算了事。老媽子領回了錢，跪著對我們叩頭道謝。

71 影　星

我和非光本來沒多少錢，這次為了賠給老媽子，窮上加窮，覺得和他們住在一起沒啥意思，二人決定搬家。老媽子不知道我們窮，哭著要跟我們走。

非光和我兩個人偷偷搬去住在北四川路橫濱橋附近的一家理髮館後樓亭子間。我們的錢快花完了，好不著急。羅朋、張芳洲都常來看我們，大家一碰面，就是唱「無錢歌」自慰。在這窮困中，非光和羅朋常要吵嘴，吵得叫我左右為難。

非光本名何德旺，是我摯友何少丰的七弟，他和羅朋從事電影工作有年，羅朋一帆風順，當過幾部武俠片的主角。德旺落拓無奈，只當當配角過癮，他自以為學識能力都不在羅朋之下，而趕不上他，引為遺憾。有時候他拜最紅明星金燄做老師，有時候自命不凡，不服金燄，又跳出來獨立奮鬥。羅朋看他朝秦暮楚，常要規勸他，反使他意興闌珊，時而竟聲言要和羅朋絕交。

羅朋的脾氣比較溫和，也確是個好小生，可惜他是臺灣籍，沒有背景，雖然也當過幾個片子的主角，都是公司找不到適當的角色，才落到他身上的。他是屬於硬派的小生，眉目清

秀，儀表不凡，武術精通，他在「關東大俠」、「火燒紅蓮寺」等幾部長篇續集片當過主角，頗博好評，如果有好的導演提拔他，必能演出更好的戲。

他父親是南投廳籍的廣州人，在松柏坑開過武館，以「阿乾師」名聞全島。羅朋本名羅克朋，常和鄔麗珠配搭，正要爬上紅星寶座的前夕，為了「八一三——第二次上海事變」發生，日寇占領了上海，他和非光一樣不屈服，不上鏡頭，去當了一家大旅社的西崽（專為洋人服務的旅館服務生），後來患了透腸痔瘡，死於貧病交加之下，明星隕落，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提起這位愛國藝人的名字了。

當時影壇最著名的男明星是聯華影片公司的金燄和明星公司的鄭小秋、龔稼農，又有反派的角色王獻齋。女明星比較多，有胡蝶、楊耐梅、阮玲玉、鄔麗珠、陳燕燕、袁美雲等人。

小生角色很缺乏，金燄雖然是朝鮮人，人才演技都確實不錯。鄭小秋只靠他父親鄭正秋一手提拔，事實他還比不上現在的嚴俊、羅維，要不是他父親當導演兼編劇人，他的呆頭呆腦無論如何捧場，也配不上叫做明星，怪不得何非光目無餘子，何止不服鄭小秋！

非光的藝名是我給他起的，他常怨嘆命運偃蹇，把這原因歸咎於他的名字，說「何德（得）旺？」所以永遠不旺，要我給他改名，我不假思索說「非光」，他不問理由一口贊成，就決定以後改用這個名字了。我告訴他當演員和別的職業不同，絕不是以學識智力就能決定自己的地位，需要根據本質和素材相配合去努力，才能成功。我們學藝的人，最要緊的是鍛鍊演技，把劇本中的人物個性，維妙維肖的表演出來，和美術家的表現方法一樣的描寫扮演角色，才

能成為明星；對這一套理論，非光似乎有所領悟的樣子。

我們手頭本來已經吃緊，搬了家更陷於無法維持的窘況。非光認識了幾位臺灣籍的福州人，他們因為在臺灣偽造金器，犯了詐欺案，逃亡來上海，在這裏繼續製造假金飾，住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這些福州兄很喜歡打牌，聽說打的並不高明。非光要和我共謀去抬他們的橋子，贏些錢維持生活。我說我是初學，恐怕會弄巧成拙，況且孔子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我們何必為窮而濫為？

他說他們有的是錢，以賭博贏他們的不義之財，有何不可。我問他計將安出，他講我們以自己人為由，分坐相對面，你牽制下腳，我也牽制下腳，你有中發白，我打給你碰，我有的時候，你打給我碰，這樣以「番」計算，就可以贏他們了。我問如何知道你有中發白呢？他說我們用最簡單的方法就可以知道的，譬如指頭指在最末第一張牌就是中，其次發，再次白，上海打牌多不用花牌，我們若掌握大牌，就是讓他們儘符也符不了大注，我們贏了他們就差多了。我仍礙難答應，忍窮拖下去。

時日過得很快，轉瞬又過了一個月，飯錢房租催討甚急，拖也無法再拖了。我迫不得已終於答應了非光的提案，就去找那些福州仁兄打牌；雙方都是新手，除了非光，我們都常打錯牌，我哪能記得什麼暗號，亂吃亂碰，打得哄堂大笑，大家非常高興，因為他們也處在亡命境遇，打小牌消遣，極為快樂，盡情招呼，唯恐我們不去，他們輸了錢，還要請我們吃點心。非光的戰術果然奏效，我們贏多輸少，雖然為數不足道，卻挨過了緊迫的難關。

72 一二八

好景不常，一二八前的局勢漸呈緊張，十九路軍開進上海來了。為了幾個日蓮和尚，被可疑的中國人擊傷，臺灣流氓乘機打劫擾亂治安，造成風聲鶴唳，掀起了騷然的險象，老靶子路通至虹虯公園及閘北一帶的住民，惶惶然坐臥不安，開始搬家了。我們打牌的對手，福州仁兄住在閘北地界，特別危險，所以著先搬走了。越界築路全線車水馬龍，扶老攜幼，擠滿了難民。

非光問我中日會不會打，我說一定會打，因為日本已在東北發動戰爭，勢在必取東北，為使中國政府屈服，非在南京的咽喉上海操刀不可；只看中國政府屈不屈服而已。非光又問中國政府會不會屈服？我說不一定，因為讓步是有限度的，超過了限度，不僅國民不答應，列強也不能袖手旁觀的。

這時日本特務命臺灣間諜收買中國流氓，陰謀在越界築路一帶製造糾紛，我們的住址恰在馬路口，處境異常危險，應該如何對付，非光很著急。我說：我們現在沒有錢，搬不了家，最好去看看十九路軍的裝備和備戰情形，看後再行定奪。

我和非光到北站及閘北一帶去視察了一番，我們所得的印象是十九路軍參差不齊，武器不過是些三八式步槍，瞧不見什麼自動火器，這怎能抵敵精銳無比的日軍？非光大失所望；但我們卻在閘北的街頭巷弄，看見了許多英俊的青年軍官在那裏踏查地勢，覺得差強人意，這些錦馬超玉呂布的青年軍官，為民族國家，擔負劣等裝備要對付強敵，一轉眼得身當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砲灰，馬革裹屍，看了這情景，我的眼眶都濕紅了。

我們走了幾個鐘頭，回到寓所，已是黃昏。我們認為十九路軍不堪一擊，一旦戰事開始，不過是幾個鐘頭或一、二天，戰區便會轉移到別地方去，所以不必搬家。

飯館的夥計送飯來了。我問他這個時候還敢送飯來，夥計答道：做生意沒有辦法。他剛出去，忽然闖進來一位陌生青年，帶一大包的東西問我：

「你是不是張先生？」

我疑訝的注視他一下答道：

「是，你貴姓？」

「我姓劉。我告訴你，今天晚上一定會打起來的，這是國家存亡的一戰，我們青年要為國家犧牲到底，素仰張先生大名，特來拜訪。」

「豈敢，我是無名小卒，你是在哪裏認識我的？」

「我們怎麼不認識你，不認識你，哪裏會到這裏來找你。」

我覺得莫名其妙。因為飯菜排在桌子上，我隨口請他吃飯，他也毫不客氣的盛了飯便吃。

他吃完了飯，說聲謝謝，就溜也似地跑出去了。這突如其來、忽然而去的怪客，真是使我想不出其來頭。我們把剩餘的飯吃後，俄然發現了那個青年帶來的紙包沒有帶走。我直覺這一定是危險的東西，那個青年故意留下來的。我提議打開看看，非光不贊成，說如果那姓劉的回來，恐怕會發生誤會。我說他絕對不會回來，不先打開看，太危險，裏頭可能是宣傳單，所以我堅持非檢查不可。果然是激烈的抗日傳單，非光喊出了聲：

「啊，真的！怎麼辦？」

我說：

「趕緊藏起來，這是要命的東西！」

我們把那傳單包裹，藏進床下去，商量應變辦法。那姓劉的說晚上一定會打，這斷不是空穴來風，大概總有什麼根據，放這些傳單在這裏絲毫沒有用處，附近一帶的中國人都搬走了，在這真空地帶，傳單要發給誰看？時間一刻刻過去，空氣一刻刻緊張起來，把我們困在敵軍勢力下的亭子間不能動彈。

老靶子路以北，雖然漫著恐怖的空氣，過了蘇州河的公共租界，卻吸收了戰區的難民，比以前更繁榮熱鬧。我們住的橫濱橋周圍，已經變成死沉沉的世界，越界築路兩邊店門全部打烊，沒有露出一縷的燈光。我們為了窮困無可奈何，得死守這個斗室，賭天運，祈勿打仗為幸。我勸非光早睡，不要駭怕，其實我自己卻愁悶得燒心。想像萬一打起仗來，手無寸鐵，白死於盲目的砲彈下，未免太冤枉，太對不起父母國家，越想越急，輾轉反側不能成寐。

差不多十一、二點左右吧，突然響徹了幾發槍聲，迫我和非光不約而同地坐起來，傾耳靜聽，非光問：

「是槍聲麼？」

我低聲說：

「沒有聽清楚……」

我又躺下去，靜默一會兒，沒有聽見什麼，嘆一聲說道：

「不管他，反正打與不打都沒有辦法，我們睡吧。」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槍聲又起了，這次時密時疏，好像放聯珠炮似的；打了，真的打起來了！時近時遠，大概是一進一退，因為戰爭我是頭一次的經驗，沒法子想像戰場的情況。心裏還獃想著最好這不是戰爭，而是獲得了和談成立的消息，市民欣喜燃放的鞭砲。這幻想即時被前樓玻璃打破的聲音打破了。

大禍臨頭了！這屋裏所有危險的東西應如何處理？傳單、書刊、信件等等，這些被日寇搜著了百無一生的希望。身邊沒有一刀一槍，如果無抵抗的死在倭奴刀下，那才冤枉！

我開電燈處理屋裏的東西，幸而全樓已經沒有人了，我到前樓去找埋藏危險物的地方，流彈又時時穿入窗戶來。我終於在通三樓的梯邊找到了一個直徑約三寸的小空洞，不曉得是通什麼地方，除此以外沒有更好的藏物處，我先把傳單撕破，塞進洞裏，其次信件，接著是書刊，都得一一撕破才塞進去。我用盡平生的氣力，不知撕了幾千次，非光雖然也盡力幫我

的忙，因為書籍太多，費的時間也長。平生所愛讀的書，都埋葬於那個洞裏了，這是和生命交換的代價。如果說「天下第一快樂事，雪夜閉門讀禁書」，那末我這時正是「天下第一恐慌事，戰夜閉門藏禁書」！

葬完了文書，稍微放心，在這時間中，一起一臥，電燈一開一關，沒有想到外面有沒有人監視。最後我想起了壁上掛著孫總理的石膏浮雕，馬上爬起床來，取下石膏像，找不到隱藏的地方，打也打不破，這時才曉得石膏是很硬的東西，結果只得隨便藏於前樓的一個地方。

做完了這些工作，天色已經微白，剛要休息的時候，忽然聽見外面有人叫門，我們不知道是叫哪一家，不去理他。聲音越叫越兇，隨著敲起門來了，先是手敲，繼而用什麼東西撞擊的樣子，我們不敢開窗探視，只是靜聽，聽了一會兒，聽出正是撞擊我們這一家！糟糕，大概是日本兵望見我們屋裏的燈一明一熄，疑為是發信號，要來搜查我們的房屋的！

突然聽見了一發槍聲，就有幾個人叫喊起來，好像怒罵，又好像激勵，參雜著女人哭泣的聲音，使我們陷於極度的恐怖、迷惑不解。我從後窗窺見對面的日本老媼靠在窗緣探視下面啼泣，以為是她的兒子出了岔子。

聽說那家兒子平素不事正業，夕出朝回，行動詭秘，做事可疑。有一個早晨，羅朋來找我的時候，聽見下邊一片喧嚷聲，我們都走去窗邊探望，看見那個日本人正舉起車上的墊子打一個車伕，車伕手裏拿着一張十塊錢的鈔票臭罵那個日本人，日本人以破碎的上海話嚷道十塊已經太多了，再要錢打死他。車伕指手畫脚大跳大叫，日人又揮墊子打他幾下，車伕大

聲叫喊：「打人啊，東洋鬼子打人啊！」羅朋和非光認為中國人受了欺侮，抑不住氣，便要走下樓去打不平。我挽住他們，勸他們不要為瑣小的事，付出沒有代價的犧牲，兩人才坐下來，還是氣憤地大罵日本人蠻野。

青年血氣方剛，痛恨日本人，凡日本人的一舉一動，不管三七二十一，總認為只有百非而無一是，尤其在這抗日聖戰，國軍進入敵人陣前的當兒，一股敵愾同仇的熱血，隨時都會噴洒而出的。

幾年前，非光的六兄少丰，有一次和我在臺中現在的中山路蹓躂時，碰到一個跛脚的日人，一瘸一點地迎面而來，少丰突然向他大喝：

「你走路怎麼排這臭架子！」

那個日人如白天見鬼，愕然不知所答，少丰以此為樂。又有一次，少丰獨坐在臺中公園池邊長板椅，呆望池中噴水，恰巧有個日本兵迷途，走來請教他「臺中神社」的地址，他不答覆，表現不耐煩的神情，以手指與神社相反的方向，致令那個兵空跑一趟，流汗滿面地又走回來問他，他跳起來喝道：

「渾蛋！身為日本軍人，連一個神社也找不着，還當什麼兵！」

這個軍人大概是新兵初到臺中來的，還不熟識地理，被他一喝，反而立正行禮道「是！」

非光受了乃兄的影響，也常要和日本人搞無賴。在上海，有一天非光找了一家當舖當衣服，碰着一個日人也到這裏來當東西，老闆對非光的白嗶嘰褲子估價太高，日人不滿，說同

樣的料子，怎麼估價一高一低，未免太不公平，老闆辯說日式的褲脚窄，又短，上海人不穿，所以價值低，非光的是上海樣式，容易標賣，所以價值高。雙方因為言語不通，搞不清，非光代為翻譯，且以教訓的口氣指責日人，兩人終於吵起架來。門口時，二人說出一旦打仗，即在戰場上相見，可不客氣。彼此臨別還大喊：「記着吧！」

如今戰事爆發，非光和我都變成無膽英雄，他更驚得心寒膽戰，龜縮入被窩裏。問我下面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取個躲避的姿勢，靠窗探望下面，看見一個日本陸戰隊的水兵中了子彈，被二、三個水兵扶着看護，那老媪大概是灑同情淚在哭泣。這件事，可能是撞門時槍械走火誤中的，假使這是事實，那末，他們找上門來送命，對於我們的安全和前途，就增加了很大的危險。

我把這事情告訴非光，非光嚇得面如土色，戰慄不已。我叫他如果日本兵上來，不要慌張，不要說話，因為他講的日語口音稍差，怕會被看出不是日本人。

日兵打破了門，上梯的聲音一步步迫近來了，脚步忽然停止，接著是敲門，好像用槍刺刀撞擊的樣子，聽見：

「開門！」

這一聲，使非光顫抖得快要跳起來，搖手叫我不要開門，我不理他，用日語發問：

「誰啊？」

「開門、開門！」

殺氣騰騰的聲音連續呼喊，我把門刹地拉開，卻瞧不見人，只看見白閃閃的刺刀縮回去，又伸出來，日兵把槍刺指向我踏上一步，瞋目喝道：

「出來！」

我不舉手笑說：

「原來是戰士先生！」

「閉嘴，出來！」

我出了門，轉彎剛要下樓的時候，日兵使勁的推我一下，叫我險些兒顛跌下去，我抓住梯子的扶手，嚷道：

「何必動手，我自己下去。」

非光也隨我後面，下了樓梯，有個長官正要上樓，我向他問安，他也回答「早安」，我排開打壞的後門步出胡同，那裏已有十來個中國人和三、四個日本平民站在胡同路上。我和非光都沒有穿上大衣，冷得打顫，十幾個陸戰隊的士兵，在胡同裏走來走去，又押了幾個中國人到我們這裏。所謂中國人，除我和非光外，好像都是看家的底下人。上我們樓上的官長又下來，向士兵喊問：

「都到齊了麼？還有人沒有？」

一個伍長跑來答道：

「都來齊了。」

官長命我們排隊，排後，住在我們對面的日本老頭子，表著閱兵似的神氣，檢閱我們一番，看來很像在檢舉抗日分子。最後，老頭子向官長說：

「沒有，走了，沒有在這裏頭。」

官長叫我們休息。我曾聽說老頭子很痛恨我們三樓的一個中國廚師，這個廚師極端厭惡日人，時常拿劈柴投擲日人的住宅，有時候還用髒水潑過去，無端加以辱罵，日人恨他入骨，要在這時藉機報復，幸而這位廚師前一天已經搬走了。我曉得日本海軍沒有陸軍那麼兇，所以比較放心，我對那官長說：

「我們沒有穿大衣，冷得要命，想要上樓取大衣行不行？」

他以為我們都是日本人，隨口說：

「好的，快去吧，冷吧。」

我和非光上了自己的房間一看，室內零亂異常，顯示他們剛才在這裏搜查過了，我心裏大起恐慌，叫非光穿上大衣趕緊下樓，不敢多取一物。我們下樓走到胡同口的鐵門，碰見一個穿工部局制服的日本警察在那裏把守。我和他寒暄搭說：

「你們辛苦了，整夜沒有睡吧。」

「沒有，你們受驚了吧。」

「是的，情形怎樣？我們贏了是吧。」

他搖搖頭說：

「不見得，抵抗意外頑強，現在雖然先打退了一陣，大概還會反攻過來的。」

「是麼？那末這裏還有危險吧。」

「是的，因為我們的援軍還沒有到，他們兵數多……」

「那末……我想要到老靶路去看看親戚，這條路可以走麼？」

「不行，很危險，北四川路這條街都走不得，常常有流彈穿過來。」

「那末你說怎麼辦呢？」

「你們這樣子走吧，靠右邊往上面走幾十步有一條轉右方馬路，你們從那條馬路往東南走去比較安全，不過得要注意閘北方面的通路才行。」

他舉手給我們指示線路，巡邏兵雖然看我們站在鐵門外談話，大概認為我們都是日本人，不加盤問。我和非光向警察道謝，慢步朝向他指示的方向走去。

脫離了虎口，我們像漏網之魚，逃之夭夭。走到一條小路，非光忽地止步「啊」的叫了一聲，原來他以前在當舖結怨的仇人，現在正當便衣隊員，把守這條路的關隘。到了這裏，進退維谷，那仇人相見格外眼紅，搖搖擺擺走過來，非光著急要跑，我挽住他說：

「不要怕，讓我來對付他，你只是道歉好了，不要說話。」

那個日人攔住我們去路，橫刀喝道：

「走哪裏去？怎麼，在戰場上碰著了啊！」

我看他面無殺氣，放心笑問：

「什麼，你們都有認識麼？」

日本人向我說：

「這個野郎，以前在一家當舖侮辱我，聲言在戰場見面決個雌雄，現在算是在戰場碰著了，怎麼樣？要幹不幹？」

非光搔首行個禮，表示歉意，我笑一笑說：

「哦，原來你們有這樣的奇緣啊！好像一篇傳奇小說，多麼富有戲劇性，好啊，幹吧！」

日人也笑了出來，問我：

「他是你的什麼？」

「我的好朋友。」

「你是日本人麼？」

「還得問哪，你看我像啥地方人？」

他打量我一下子，問：

「你這位朋友是什麼東西，是不是反日分子？」

我又笑一笑說：

「要是反日分子，哪能和我做朋友？他是一個電影明星哪，哈哈哈！」

日人破顏一笑說：

「唔，是電影明星麼？」他轉向非光說：「那末你對我無禮的一個鏡頭，也算是表演麼？」

非光的緊張緩和了許多，幽默的說：

「就是那麼樣子，太失禮了。」

日人放下刀說：

「那末我們不打了是吧？」

「不打了，不打了。」

非光伸出手要和他握手，他露出微笑和非光握手問：

「你們到哪裏去？」

「到老靶子路去，再見。」

他揮手和我們道別，我們脫出了這第二關，就一路平安地抵達了老靶子路。但身上毫無分文，到哪裏去呢？我勸非光去找羅朋，他賭氣不去。我說平時鬧意見，一旦有事，患難相助，才是真朋友，這時是考驗友情的最好機會。我強拉他去找羅朋。羅朋果然不念舊惡，很輕鬆的招待他，於是他就寄居羅宅，我單獨去徐家匯找洪水星。

水星和我是小同鄉，為人溫柔忠厚。他畢業自臺中一中和上海東南亞同文書院，然後留學京都帝國大學，這時他剛被聘任聖約翰大學經濟學教授，還未赴任上課，住在徐家匯的一家小亭子間，我去寄他籬下。他也沒有錢，兩人的生活苦不可言，他把可以當的東西都當光了。我怕增加他的困難，常到八仙橋一家同鄉開的旅社，去找友人告貸，連續去了幾次，都開不了口；因為來回都是徒步，走路得花幾個鐘頭，更加痛餓，當時我們一天只能吃一、二

小塊麵包，喝開水過日子。

有一天，我又到那旅社去，大家正在吃飯，都給我打招呼，叫我一塊兒吃，我照例答已經吃過了飯，走入一間客房，獨自躺在床上思索。要怎麼開口？向誰拜託？這實在早已想透了，連要說的話也背熟了。可是一到這裏就說不出來，聽見他們談論戰爭不結束，快沒飯吃的話，更難啟齒，只有空腹而來，枵腹回去。

店主蘇老頭和我很熟，幾年前曾送我上船去廣州，應該無話不可以說；但他每見著我，未嘗不長吁短嘆訴苦，說沒有錢維持不了生活，意思是要向房客催討膳宿費。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當然說不出借錢的話，但看他們每頓飯豐餐盛饌，使我不無懷疑他們是否確實匱乏。人家的錢，當然我無權也不該去問它，不過我想，何不試問一次看看，即使不為自己，也該替朋友說幾句話。正在納悶，恰巧有一面之雅的黃樹奎醫師走進來，他以飯後愉快的神情，咬著牙籤問我：

「叫你吃飯，你怎麼不吃，你太客氣了。噫，你的顏色不好，怎麼了，有病麼？」

他三句話不離本行，看人家氣色不好，就疑為有病，我藉這機會，想說的話脫口而出，答道：

「老實說，幾天沒有飯吃了，為的是餓，不是病。」他表示驚異，嘆道：

「哎呀，為什麼不早說？你太客氣了！」

他隨手拉出掛在背心上的金錶，摘下金鏈子交給我說：

「啦，你把這金鏈子拿去當，我現在沒有現錢，不然的話，就拿錢借給你。」

我不敢接受，推來推去，他說：

「沒有關係，我在這旅社可以記賬，用不著錢，你拿去當，當了把當票交給我好了。」

受了他誠懇的勸說，才接過來，我隨即跑到當舖去當了八十塊錢，把當票交給他，他驚問我：

「怎麼，這麼不值錢？」

我答道：

「不，當舖的人說還可以多當些錢，但我不敢要，錢數是我說的。」

他會意，笑著點點頭，收起了那張當票。我很感激這位見義勇為的大夫，由此我們的生活便暫能夠維持了。

這時春雨連綿，蟄居無所事事，我開始學寫電影劇本做消遣。

戰事意外拖延，時而激戰，時而寂然停止。盛傳關公顯聖，在廟行鎮一帶殺敵無數，追逐敵軍，掃數打落吳淞海裏去，我軍大捷，民心振奮。民間傳說神話，由民族自卑感而起，也無足為怪。

十九路軍和支援他的國軍並肩作戰，阻止了日寇的軍事進展，並給予慘重的打擊，確係事實。十九路軍以極粗劣的裝備，抵抗世界列強之一的日寇猛烈砲火，堅守閘北一帶，任攻不退，一時呈為拉鋸戰，這種火力懸殊的戰爭，可謂史無前例。

日寇把閘北商務印書館附近用飛機大砲炸為平地，我軍這場慘烈苦戰，不像斯達林城或硫磺島那樣沒有退路的困獸之鬥，而是以血肉之身，去和機械拼命至死而不退的肉搏衝鋒。日寇所誇譽的「肉彈三勇士」在我們這邊俯拾皆是；我們應該把這功勞歸於國軍無數的活關公，而不是死關公。

狂妄不可一世的日軍，受了這次的考驗，更痛感中國復興的可怕，他們以為幸已佔據了「滿洲」，隨時可以揮戈南下，和華中華南登陸的陸海空軍夾攻國軍，一舉而制中國的死命。但這時日軍在華中挑起的軍事行動，只在威脅國民政府，恫嚇列強，欲使其承認東北的「既成事實」而已，至於真正囊括整個中國，則尚非其時。他們當時以為單靠駐在上海的陸戰隊便足以掃蕩十九路軍，詎料竟遭遇意外的堅強抵抗，失去了國際聲譽。所謂上海事變和滿洲事變，在本質上是相關聯且相影響的。

到二月中旬，戰事還沒結束，我們的錢又快花完了。我想去南市找朋友告貸，在租界路上碰見了幾個可怕場面，都是同胞圍打日本人的鏡頭，聽說也有幾個像日人的台胞挨了打，我心裏有點不安，因為我的態度、服裝、口音都有點像日人的地方。況且南市是中國地界，空氣特別緊張，路上行人稀少，處處關隘都有便衣隊員把守，他們的眼睛都帶著兇狠的殺氣。

我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冒險進去。初入南市，沒有受到什麼檢查，及要退出時，路經一條馬路設有檢查站的地方，心裡忽然慌張，暗想自己北京話上海話都講不好，萬一被嫌疑為日本人的時候怎麼辦？不想則已，一想就駭怕起來。

雖然是春寒料峭時節，卻汗流浹背，我偶爾脫下帽子擦汗，發現了帽子裏內緣塞著日文報紙，大吃一驚，這是要不得的東西，假如被查著了，哪能活得了！雖然辯得開不是日人，也辯不開不是間諜。這時當日本間諜的中國人也不少，有的帶兩個銅板作暗號，有的帶什麼小件東西代表秘密身分，謠言四起，草木皆兵。我一直想把這報紙棄掉，但在馬路上找不到適當的機會，如果失敗了，弄巧成拙，自惹麻煩，只好硬著頭皮，走來檢查站受檢查。五、六個便衣隊員包圍我，搜查身體，連什麼小紙條也拿去詳細檢閱，有一個檢查員問我：

「儂啥地方人？」

「阿啦福建人。」

我的話還未說完，就走出一個福州人來用福州話問我：

「你福建人，奴啊同你講福州話。」

我一時答不出來，結巴巴地用閩侯口腔講閩南話說：

「福建人不一定都是福州人，福建人不一定會講福州話。」

他聽了我的話，現出莫名其妙的表情，疑訝地想一想，然後說：

「好哪，去哪。」

我捏了一把冷汗，通過關，以後再也不敢去了。人生處世，常常為了芝麻小事，惹出意外的大禍。我因為帽子過大，信手拿一張日文報紙塞上帽子內緣調整，沒有包含什麼意思，但在戰爭非常時期，情形就不同了，有一點可疑的東西，常常被認為重大的證據，因為所謂

間諜破案的原因，大抵多由無關緊要的小事，露出破綻的。

找不著朋友，借不到錢，反而碰著一場虛驚，我把這經過告訴水星，說我已經計窮力盡了；他情急智生，想起了幾年前，在東亞同文書院讀書的時候，曾結交一家飯館子，如果店舖沒有換主的話，還有一線希望，叫我跟他到那家店舖去試辦交涉。

我們走到那家飯館門口，水星忽而裏足不前，兩個人移步到別地方繞了一大圈兒，又回到那家飯館門口，聞著烹煎的香味，肚子更起枵響，「餓雞不惜箠，餓人不惜面皮」，水星率然推門進去，恰巧老闆坐在店裏，抽著廣東大煙管，好像在吹洞簫，一見水星便笑迎著打招呼，問我們要不要吃什麼，水星說好久沒有見面，特意來拜訪，老闆問水星為什麼這許久沒有看見他?水星答道往日本留學，瞬息之間已經三、四年，說些閒話做久別序言，並介紹我到過廣州中山大學唸書。老闆是廣州人，和我談起家鄉話，格外親熱。

談來談去，談起戰事，他抱怨政府不派大軍驅逐日寇，只讓十九路軍孤軍奮鬥，講得咬牙切齒，頓足大罵。他和一般市民同樣怪政府不增援部隊，否則必能使日寇片甲不留，他說東北失守，也是政府的膽怯無能所致，言詞激烈，愛國熱忱溢於言表。

我說：所謂「事變」和「戰爭」本來不同，事變是於屬地方性的衝突，不是國家與國家的戰爭，既然沒有正式宣戰，自不便動員所有國家軍隊參戰，要是政府正式派大軍增援，就成為真正的戰爭，規模就不是這樣了，牽涉的問題便不那麼簡單。政府一定有苦衷，表面上雖然是十九路軍單獨和日軍的衝突，實際上政府暗地裏的接濟增援，是未便公開宣佈的。他

還不了解，反問我：

「那末，日本鬼子為什麼不以現地的駐軍為限，還要派陸海空軍來助戰轟炸？」

問得很有道理，我窮於回答，只好勉強說：

「這是弱國的悲哀，他們藉保護僑民為名，揚言不佔領我們的領土，只要擊退攻擊他們的軍隊，退到沒有威脅性的界限為止，所以轟炸和攻擊的地區有限，否則他們對我們的任何國土都可以攻擊轟炸的……」

他氣得拍案嚷道：

「這太豈有此理，欺負我們太甚，日本鬼子真可惡！」

我安慰他說：

「我們的革命剛成功，國力還未充實，實在抵不過他們，等到我們軍隊國家化統一化，軍備充實的時候，才可以和他們相周旋；不然，我們不但打不過他們，還得喪權辱國，失去更大的領土，甚則有被列強瓜分的可能。」

他聽到這裏嘆息搖頭轉問：

「如果我們要復興，得費多少工夫？」

我說頂快也得二十年，他驚問：

「為什麼得要那麼久？」

我雖然覺得有點不耐煩，卻喜歡他這樣關心國事，為要使一位同胞多了解國家的建設，

需要經過什麼艱辛歷程，我不憚詞費的為他敘述下去。

我講了一大套管見，老闆這下子好像聽懂了，稱讚我們讀書人的見地畢竟要得。其實老闆錯了，讀書人徒尚空談，連最現實的吃飯問題都一籌莫展，還懂得啥子？畢竟還是老闆要得。老闆問我們現在做什麼事，生活可好？水星乘這機會，抓緊問題，說明我們現在所處的苦境。老闆哈哈大笑，拍着胸膛說：

「這有什麼問題，小事小事，你們就從這時起，在這裏吃飯好了。我給你們飯票，你們要多少給多少，等到戰事結束了，才來算賬，這樣子好不好？請不要客氣。」

老闆一言，解決了我們的吃飯問題，我和水星過於感動，半晌說不出話，連連點頭道謝，接受了老闆的盛意。

自此平安過日，只是等候戰爭結束才找事情。在間歇性的停停打打期間，我對放在橫濱橋住房的書籍和行李還不能忘懷。曾去過北四川路老靶子路附近試探過幾次，都被流彈嚇阻，到最後一次才達到目的地。房子裏的東西被搶劫一空，只剩下兩架不留一物的鐵床，和一些散亂在地板上的圖書以外，什麼都沒有了。鄰近一帶寂然無聲，只有對面的日人打開窗戶好像在窺探我的行動，我感覺當前環境還不大安全，戰戰兢兢地跑出了這一危險地帶，回到住處還有餘悸。

73 停戰後

停戰後，交通恢復，洪水星準備到聖約翰大學去上課，同時也得搬家，我也不得不找個職業維持生活。水星和幾位朋友勸我入江南正報社，說這家報館是國父的摯友山田純三郎主辦的，比較有正氣。我因為不願意在日人之下做事，所以全然不加考慮，一言之下拒絕了。

本來我很想入商務印書館，或找一家出版社當編譯員，在事變前就央三託四請人介紹，自己也親自到過商務印書館幾趟，終於沒有成功。最後我聲明只求工作，不論報酬，只要有飯吃便可以賣身，但在中國出版界方面，依然找不到事情。

這時我完成了兩部劇本，一部是文藝作品「女人」送交聯華影片公司，一部是武俠片「冷血英雄」，寄給明星影片公司，後來聽說聯華公司劇務部已經審查通過了，卻沒有下文，原稿也沒有退回。明星公司卻託張芳洲來和我接洽，要求我改編，大場面得刪削或修改，改後隨時可以開拍。當時我血氣方剛，認為修改就是侮辱，不肯答應，結果，兩部劇本都賣不出去。

生活迫我無法忍受，雖然家母又給我寄來了一筆款，但一部分花去取回當舖金錶鏈子還給黃樹奎醫師，一部分清還了飯錢，剩下無幾；我不敢再向母親要錢了，為了找不到職業，

無法維持生活，只得降志去找山田純三郎；和他見過一、二次面，覺得尙能投契，他聽我講的日本話不錯，怕我中文未必寫得來，叫我擬一、二篇時評給他看，他看後，就叫我入社擔任時評兼主編副刊。

山田善於用人，他在報館設晚餐，除有特別應酬外，儘量參加，利用這晚餐做座談會，檢討社務工作。有時候他返日回來，順便帶些禮物分給社員，還招待我們幾個重要幹部到他家裏小酌，談論時事。我雖然不買他的人情，卻佩服他御下有方，無怪乎他能跟隨孫總理參加中國的革命。這時他大概五十多來歲，高個子、面形長、眼窩深，眉上有幾根長毛形成了他的特徵。他的哥哥早他侍從孫總理，說是在惠州或什麼地方戰死了，因此孫總理也很器重他。

當時他反對南京的中央政府，自以為是正統的三民主義信徒，主張中國應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宜作速立憲，實現三民主義，復興中國，和日本提攜，解放東南亞弱小民族；這一主張未嘗不堂皇冠冕，然而我仍以為他是日人，對他的思想、誠意，不無存有疑問。

自國民軍北伐以來，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我國的妨礙干涉，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濟南事件、滿州事件、上海一二八事件，一連串侵略性的軍事行動相繼而起，而日人高唱「親善」、「提攜」做幌子，猶之目今的共產集團高唱「和平」，令人惶惑不解。山田和日本軍閥有沒有什麼關係？對此我時常用懷疑的眼光看他。

水星看我的生活已有了保障，便搬到學校附近去，我也在徐家匯靠近中國地界租到了一

個亭子間，搬過去，不意在這裏發生了一段奇緣，迫我不得不離開可愛的樂園。

有一天，我在報館接到了非光的電話，這一電話把我嚇壞了。

74 春潮

我接到非光的電話，考慮了一會兒，終於決定回寓所探視實在情形，小口主筆對我的臨時請假表示疑惑，口頭上雖然答應說：「好吧……但你有什麼要緊的事情麼？」末句好像含有保留的意思，也許因為我接到了電話，態度頓呈焦急不安，面色也變得不大尋常，同事們都把視線集中到我身上來，我答道：

「是的，有要緊的事，得馬上回去。」

他還不放心，眨一眨眼，吞吞吐吐的問：

「跟跟哪一起事，沒……沒有關係吧？」

我猜中了他的話意，發出苦笑說：

「沒有沒有，那個事情我不怕，政府我還不怕，哪裏還怕小小的回教徒！」

他拿出手帕擦擦禿頭說：

「不是怕不怕的問題，只是擔心你買了人家的怨。」

「不會不會，我為正義人道，什麼也不怕，假使報館萬一受了牽累，我願意以生命抵償。」

他聽了我這麼刺激的話，表現很不高興說：

「唉呀，你不了解我的誠意，好吧，那末趕快回去好了。」

他顯示不願意多說話，搖搖頭，俯視他的稿件，我回了自己的座位，把那天的報稿略加整理交給一位姓李的編輯員，叫他替我編排，他接過手，帶著濃厚的閩侯口音問我：

「怎麼了，你的臉色不好，有什麼事麼？」

這時，我心緒混亂，默然不答，離座說：

「希望明天再見。」

「希望」這句話本來含有深沉的意思，但我不管反應如何，倉皇走出報館，雇了一輛黃包車沿東武昌路，過蘇州河，橫穿公共租界，直向法租界平時坐電車的地方去。這時我覺得滿街的燈光和平常不大一樣，特別凄涼黯淡。

我想起前天晚上，在報館發生那一件糾紛，於我生涯中可以算是最鹵莽的一次。那天小口主筆提早一個多鐘頭到報館來，我照例六點上班，他一看見我，大聲喊道：

「張先生，來來！」

我還未到他面前，他就急忙忙地問道：

「喂，那篇回教徒搗毀書局的消息是你發的吧！」

我點頭道是，他責問我：

「你、你真胡鬧，你明明知道回教徒多兇，偏要去惹他，他們襲擊曾仲鳴的書局，燒燬了他們的書刊，還要求政府革職曾仲鳴謝罪，你為什麼故意寫那麼刺激的文字攻擊他們？」

我撰寫回教徒搗毀曾仲鳴書局一則新聞，就預料會觸怒主筆，卻故意用特號字，把標題排成四段登出去的，所以心裏有數，答道：

「是，我厭惡在這文明社會，幹那麼野蠻的勾當，我痛恨政府無能，不能繩之以法，反而畏首畏尾不敢懲罰他們，所以要加以筆誅！」

「哼，筆誅！」

他對我的話嗤之以鼻，說：

「沒有價值的筆誅！」

他擲下筆，拍拍桌子，氣得滿腮的鬍鬚好像都翹起來，我受不了這一侮辱，拉開他寫字臺前的椅子坐下去，毫不客氣地嚷道：

「哦，沒有價值的筆誅！那末我們一向反對反動勢力也是沒有價值的了！」

「不，那是政治問題，這是社會問題，你這兩個問題沒有弄清！」

原來曾仲鳴主編的雜誌惹起問題的那篇文章，是寫了一段回教主默罕德是豬八戒的化身，所以回教徒不吃豬肉，主筆認為這是屬於社會問題，我辯駁他說：

「他們不採取法律途徑控告發行人，而竟用暴力去搗毀書局，這不是目無國法麼？」

「誹謗一個教主為豬八戒的化身，這是重大的侮辱！」

「是啊，這是不應該的，但不依法解決，而以暴力報復是更不應該的！此風一長，中國永遠不能成為法治的國家。」

「你知道我們的報館所負的使命吧。」

「知道，承繼孫總理的精神，擁護中國國民革命。」

他看我絲毫不讓步，悻悻然說：

「好吧，我不是反對你的意見，只怕惹起無謂的犧牲……。」

「我擔保絕不會的！」

我貿然保證不會發生事故，其實心裏有點不安，過了一、二天果然沒有事，方才放心。這次主筆看我緊張不安的神情，也許懷疑我為了新聞記事，招致回教徒的恐嚇，所以對我的舉動表示關心。

恍惚一轉眼，黃包車已經抵達大鐘樓，我為節省時間，從這裏下車，換上了電車直駛徐家匯，離家愈近，心情愈亂。

非光的電話大意說：這幾天絕對不可回家，有很危險的事情將要發生，我問他到底出了什麼岔子，他說有個女人來信說「有人帶槍要殺死你」，在電話中不能細說，不過暫時千萬不要回家，我正要問個明細，他已經把電話切斷了。

我心裡明白自己隱藏著一樁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我的猜測沒有錯，要殺我的兇手可能是第五區的警察隊長，是個山東大漢，他用不著手槍，只消一拳便可以打死我的。

電車到徐家匯末站，忽然嗶嗶剝剝地下起雨來，我趕步跑入G里衖衖，轉了二、三個彎抵達寓所。上樓進入屋裏一看，並沒有什麼變化，寫字臺上看不見新的來信或紙條。掛在壁

上的衣服、床、地板，凡可能擱信的地方都找了，還是找不到什麼信件；幾次拉開抽屜，把裏頭所有的東西都搬出來重新檢點，依然枉費工夫。忽想起門沒有關，回轉身去鎖門，順便探望前樓和樓下的情形，都沒有什麼動靜，坐在迴轉椅上胡思亂想，信手寫了一張遺書，大意說：

「朋友們，請你們笑我為無妄之禍被殺了，我死得絲毫沒有價值，我慚愧、懺悔，死不能瞑目，我不願為殉情而死，我本想把這小生命貢獻於國家民族，結果我為了自己的懦弱，拒絕不了女人的誘惑，終於失去了童貞，而且自惹殺身之禍，但我無意報復，請勿追究暗殺我的兇手為誰。我死後請付火化，把骨灰隨便撒於原野，做野草的肥料。最後我要表白我絲毫沒有愛她——所以絕對不可讓她觸及我的屍體，以免多加污穢。誌此遺囑。」

寫完了遺書，繼續整理舊信件。她寫給我的信紙一共五十餘張，按日子計算，每天可有二、三張，我打算把這些信燒掉，消滅這醜惡的痕跡。這段醜惡的回憶是：

有一天，我照例從報館回寓所的時候，鐘已經打過子夜十二點了。長時間的執筆，和長途的坐車，使我心身俱累，一步步的跨上樓，恨不得就跳到床上躺下來休息。

可怪，拿出鑰匙要開門的當兒，發現鑰孔上塞著一只紙捲兒，取掉了它，開門進去，不知道起了什麼感觸，覺得剛才扔掉的那塊紙捲兒捲得太規矩，轉身把它撿起來，展開一看，紙上用鉛筆寫了幾行潦草的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家正需要有為的青年，你若是有為的青年，不該遲起晚回，過著那浪漫的生活」，我看後不覺失笑，以為湊巧對我下了一個鍼

砭，不介意地把它扔出窗外去。

第二天晚上同一時刻，又從鑰孔取出一樣紙捲兒，這次寫：「休矣，不能起中國之衰歟，休矣，不能提醒青年之迷歟，錦繡河山今欲破，不堪回首是青年」。我翻來覆去看了好幾回，覺得有些討厭，又使勁地把它扔掉了。

第三天，事情越發奇怪，這次竟以信封用按釘釘在我的房門上，內容是：「送給你兩次的信大概都接到了吧，你作何感想呢？我並不是對你開玩笑，因為我崇拜你，所以才冒昧寫那些信給你的，請你原諒吧。」這封信無疑是要給我的，連前兩張紙條的來源也表明了。但發信人是誰？有什麼目的寫這些無聊的遊戲文字？

第四天晚上，花樣又變了，這次是以紅格子信箋寫：「一束生蒭願傚張良，十年寒窗不讓深切」，把我的名字別號都箝入聯上，墨瀋未乾，顯然是剛寫的。我知道這一家人都是目不識丁的土夫，假使是我的朋友，斷沒有這麼淘氣的人，誰在作此詼孽？

隔一天上班的時候，我也在門上留下一張信，用按釘釘住，到我回寓時，居然覆信已經來了。這次字跡寫得更潦草，內容是：「你的信已經詳細拜讀過了，你叫我表明姓名，但是怎好意思表明呢？因為我是一個深閨弱女子，你問我何故相戲弄，我絕無戲弄你的意思，我尊敬你，相信你會解人困厄，如果你肯同情我的話，我願意把我的苦衷告訴你，現時我處在千鈞一髮的險地，惴惴待救，書不盡言，請你給我一個好音。七月十六日　無名女上。」

信還未看完，我的心房已磅動磅動的跳起來了。

一個深閨弱女子！

處在千鈞一髮的險地！

惴惴待救！

多麼富有戲劇性的遭遇，我陷入五里霧中了。

次日，我再寫一張回信釘在門上，照常上班，但提早一點回來，覆信已經貼在門上：拆開一看，寫：「今夜門請別鎖，自當拜訪面敍一切」。

上海七月的天氣，異常悶熱，我不敢脫下上衣，肅裝候駕，衖衕裏只聽見有零食擔子的叫賣聲，周圍的窗戶一個個都熄滅了燈光。我一直想像這將出現的怪女人是什麼模樣的人兒？

忽然，聽見房門推開的微音，回頭一看，門內站著一位穿素白的便裝女人，差不多三十來歲年華，站著肅然不動。解謎的人來了，就是她！多麼神秘的裝束，活像唱戲的苦旦，愁眉深鎖，雞卵形的白臉兒，映照白衣，現出一種神秘的妖氣，沒有燙過的頭髮垂到肩上，中等身材，腳上穿著尖小的平底鞋，顯示她是裹過腳的，我挪個椅子要讓她坐，她躊躇了幾回才坐下去，她一本正經的只點點頭不說話，我只好先發言：

「貴姓？」

他的臉上泛起了一陣紅暈，羞答答地說：

「我叫……××」

她反問我：

「張先生北平話聽得懂麼？」

「聽懂一點兒，你有什麼事要說麼？」

她垂下頭，把兩手齊放於膝上，呆然說不出話似的，我轉個彎說：

「你寫的信我都看過了，現在你有什麼困難是麼？」

「是的，我想請教你……」

「豈敢，我什麼都不懂得，請你說吧。」

她大概怕我聲音太高，故意把自己的聲音放低，要誘導我低聲說話。她忸怩的說了幾句，但我聽不清楚，我不耐煩地催促他說：

「你有什麼事，請說吧。」

被我這一催，她隨著凄然地掉下眼淚，從大襟邊抽出一條純白手帕，揩拭眼眶，掩不住心裡藏著一種恐怖的神情。桌上的鐘指著十二點，周圍的空氣越發寂靜，偶爾近處咳嗽的聲音，發起衚衕的反響，打破了屋裏的沉默。她如泣如訴地說出她的來歷——她是天津人，她的祖母是位名揚華北的烈婦，節孝坊字題耑是黎元洪寫的。她的哥哥在牛莊當一家銀行長，現任國民政府某大員是她的母舅。講到這裏，她怕我聽不懂，問我聽懂了沒有，我點點頭回答她，她繼續說：

「三、四年前，我哥哥帶我到上海來，他有一個日本朋友在一家紗廠做事，就介紹我到

那紗廠當刺繡的教師，直到一二八事變前平安無事。只是廠裏有一個叫黑木的日本人很討厭，常要纏著我開玩笑，我每次以正氣斥責他，他恨極了，及至一二八事變發生，聽說由法國大使館送來的一件公事丟了，那黑木就誣告我偷的，因為事變中，廠裏除我以外沒有別的中國人，他們拿我當間諜，抓我到一個地方拘押。當時和我關在一起的有五洲大藥房的經理，和幾位衣冠楚楚的中國人。我們看每天有些人被押出去沒有回來，便知道事情不好了，大家都駭怕起來。有一天，五洲藥房的經理對我說他有個朋友在警察局當隊長，要保他出去，我就託這位經理釋放後營救我，他答應了。過一天經理果然被保釋出去了。再經過了一、二天，經理說的那位隊長到監所來看我，問我的身世之後，他附個條件說，如果我答應和他結婚，他才肯幫忙。起初我不肯，後來我想不明不白死在這裏，不如佯允他，等到脫了險再說。」

她談到這裏，停頓一下子，似乎要窺探我是否懂得她的話。我裝得很熱心的聽著。其實，我覺得她的話，殊難置信，她接著說：

「我把所有的錢都交給他去活動，沒有幾天我也被釋放了，當時我們先住在大世界的後面，因為那邊出入人多，逃走不便，所以要求他搬家，才搬到這裏來住在前樓，我看這裏的環境好，沒有幾天，他猜著我的心事，便嚴密地監視我的行動，所以到現在還沒有機會……」

我點頭表示肯定她的話，然後問道：

「那個隊長常到這裏來麼？」

「不，一個星期只來一次。」

「那末你為什麼不利用他沒有來的時候跑呢？」

「是……跑不了，因為我現在身邊一點兒東西都沒有，他把我的衣服都帶走了，一步也不讓我出門，恐嚇我一動便要打死，絕不放我活著，你看，我現在只有像這樣的衣服兩套可以換換，哪能走得了。」

「他在公安局當什麼？」

「說是第五區隊長。」

「那末你為什麼不寫信給你舅舅呢？」

「唉呀，怎麼敢寫？我現在有什麼面子和他通信！昨天我想寫張信給我哥哥，被他發現了，挨了一頓打，今天他又忽然來搜我的東西，連紙筆硯臺都拿走了。」

「那麼你希望我幫你什麼忙呢？如果需要錢的話。」

「不不，錢我有的是，我的事情並不是錢可以解決的。」

她看看桌上的鐘，慌忙站起來說：

「時候不早了，明天見吧。」

她邊說邊走，躡足輕步走回去，幾天來的謎兒算是這樣的解開了。

下一晚，我回到寓所，她就來了，這次她帶來了幾本家譜給我看，證明她所說的家世並非子虛。家譜果然有黎元洪、徐世昌等人的題耑。她忽兒又轉往前樓拿來了一大堆相片，裏頭也有裝鏡框的，也有貼在相簿上的，她一一給我說明哪一張是她的什麼人。指一張穿西裝

的人，說是她哥哥，這個人穿舊式西裝，坐在古式的沙發椅上，豐采不揚。她又指一張裝在黃木鏡框裏的，說這就是政府大員，她的母舅。我隨手拿到電燈下去看，一點兒也不像，這個人穿長衫馬褂，戴瓜皮帽，差不多三十來歲光景，腮幫子瘦削，下顎很尖。

「就是他麼？不像。」

她從容答道：

「是麼，我也好久沒見面了，也許和現在不像，他年輕時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除在報紙或畫報以外，還沒有見過這個人，這時我打個欠伸暗示疲乏的意思，她會意說：

「時候不早了，請休息吧。」

她起身收拾相片，我幫她疊成一堆，她趁著我俯下身子的時候，在我耳邊低聲說：

「請你以後不要鎖門，你不在時我會替你管顧的。」

她不等我回話，抱起那一大堆相片就走了。

過兩晚，她給我來一張信說：

「我請你不要鎖門，你偏要鎖，難道你不相信我麼，你怕我偷東西呢，抑或是怕小偷呢……本來我以為你是大器宇的人物，究竟是我看錯了……你不相信我，我也不敢再打擾你了，祝你快樂。」

接到這張抗議書，我很不高興，她怎麼管到我的門戶來？這時候我正為臺灣革命從事特

殊工作，有些文件和資料藏在寓所。她不知道我的用意，譴責我怕她。以後我就只管鎖抽屜而不鎖房門了。

自從不鎖門以後，我的屋裏煥然一新，不但寫字臺擦得乾淨，臺上的東西也擺得很整齊，連床舖地板都清潔異常，衣服被單洗的洗，燙的燙，有時候桌子上還放些水果和點心，她這樣公然的行動，使我很不安。我決意搬家，迴避可能發生的後患，一方面婉言勸阻她不要這樣做。

我在外面開始找房子，找到了一所，約好一星期後搬進去。我回家關門，爬上床，正要入睡的時候，忽而聽見門聲輕啟，有人進來的氣息，我被嚇醒，把枕邊的開關扭開一看，原來就是她，我驚訝的問她：

「有什麼事麼？」

「因為這幾天沒有上你這兒來，所以來看你哪，好麼？」

她現出不自然的笑容，走近我的床邊，我很慌張，大概臉色都變了。她問我：

「你怎麼了，氣色不好哩！」

「是是，我病了。」

「嗳喲！你病了那還行？我叫大夫去吧。」

她藉著這機會更靠近我這邊來，伸手要摸我的額頭，我慌忙搖手說：

「不不，我不過累一點兒，休息休息就好了，我很想休息。」

她這時候才溫柔的說：

「是麼，那麼你就休息吧。」

從此，我臨睡前，便把門閂起來，她對我提出激烈的抗議說：她既不是娼婦，也不是妖精，拒她入門是等於侮辱，我推不開她的抗議，以後只好把門又開放了。這一疏忽便是我吃了智慧之果，失去了樂園的因。我十餘年出入於生死線上兀自未嘗屈服，這次竟屈服於柔情淚影之下，破壞了潔白之身！

預定要搬去的房子，被現住人拖延了幾天，今日接到非光的電話，使我急上加急，趕回來查探究竟，結果我得到了一個結論，推斷是非光到我家裏來，看見了她給我的一封信，發生了誤會，才著急地給我打電話警告的，原來我的桌上放著一張她的舊信，信文是：

「最後的日子快到了，他今天帶手槍來，說你為什麼不聽我的話，你如果不知道我的厲害，我便要下手給你看。我現在駭怕得很，但我愛你，雖死無恨。」

我想非光大概把這張信的「你」看做指我，起了誤會的。無論如何我決定明天搬家，不使任何人知道我的新地址。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了，我聯想起韋應物「滁州西澗」一首詩，低吟：

獨憐幽草澗邊生　上有黃鸝深樹鳴

春潮帶雨晚來急　野渡無人舟自橫

75 奔 喪

出乎房東和她的意料，我突然搬家，湮沒了行蹤，住在離她很遠的地方，但我依然深感不安。不料，忽然接到家兄來電報，說母親病篤，要我立刻回家，這消息比晴天霹靂還要使我震驚。

我決意回臺，就是會發生任何嚴重後果，也在所不計。養母親情深似海，不回去不但對不起母親，也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南投的生父去世時，我正被羈押在臺北監獄，無可如何，這次養母的場合，絕非生父母之可比，絕對不能隨便。我拿電報去找小口主筆，表白我的身分是臺灣人冒充中國人。他倒表示欣慰說：既然是日本籍民更好。立即應我的要求，帶我到日本領事館去辦理歸臺手續。

我們剛踏進外事課時，便有個警察大聲喊道：

「喂，張深切先生到這裡來！你跑到什麼地方去？為什麼來滬沒有報到!?」

小口為要替我辯護，搶先走去見那個叫我的警察，拿出名片和他談了幾句話，就帶我去找一位課長，誇獎我是日本國家有為的人才，現在他們的報館服務，要他們多多關照。課長

不但沒有責備我，反而稱許我肯在日人經營的報館工作很好。

他即時叫主管替我辦理應辦的手續，並命他們給我方便。我心裡驚疑小口何來這麼大的勢力，怪不得他在一二八前，曾喝醉了酒去鬧日本海軍陸戰隊，鬧得連隊長也溜走，不願意和他作對。

我的護照簽證手續，不一刻辦好了。我到輪船公司去買船票，只等船期動身。開船前一天，電報又來了。我遲疑好久，不敢拆開，預料這一定不是好消息，及啟封一看，果然是「母死，希即歸。」我眼前頓時失去了光明，墜入黝冥的深淵！鬼神何狠？奪去了我慈愛的母親！我為何忤逆父母，離家冒大不韙，挺而走險！如今一事無成不能移孝作忠，亦不能晨昏定省，心痛奚似！

我離開她的時候，她雖然還是那麼瘦弱，但不算患了什麼大病，豈知還不到一年，就有這麼大的變化！

隔日，我攜帶一些隨身行李，啟程歸臺。剛抵基隆，水上警察就來找我，帶我去水上警察署，責我一到上海，晦沒行蹤，沒有辦理簽證手續，一定有可疑的行動，應該扣押，依法受審。我拿出領事館的證明和護照讓他們看，並隨便說明沒有報到的原因，警察人員大感意外，即時准我回家。

回到家時，母親已大殮數日，見不著最後一面，二十餘年養育之恩，於今無法報答了。我詢問母親病況，家人說：她初患糖尿病，平時只吃漢藥，毫無起色，及病症嚴重了，才延

西醫診察，醫生說病症是尿毒素發作，陷入彌留狀態。父親和哥哥商量要通知我，但她極力反對，說她就是死了也絕對不許讓我知道，怕我一回臺便有麻煩。

治喪出殯一切依舊俗舉行，我雖然提出了改革意見，希望廢除陋習，但經不起母舅家的反對，沒法子實現。父親意外開明，支持我的意見，也希望有些革新，然而亦有礙難作主的苦衷，終於採取不新不舊的方式完成了大事。

由於此次的經驗，我痛感欲改革風俗習慣，單靠少數人的力量是不夠的。因為傳統惡例，已成為民眾的最高指導原則，而神棍鄉愿已成為廣大群眾的精神領導者，所以要改革陋習，第一需要社會運動家的率先倡導，其次，更要政治力量的積極干預，方能奏效。

光復前，臺灣的社會運動家，鑑於封建思想如果不改革，無法改造臺灣社會，所以盡力提倡革新，日本政府也為要實現其「皇民化」政策，不加干涉，所以當時臺灣社會風氣大有面目一新的趨勢。及光復後，神棍地痞利用愚民心理，死灰復燃，把從前好不容易改革過來的一些風尚，像大水洪流般沖散掉，強烈地推行起復古運動；假如說放任邪教猖獗，迷信成風，社會敗壞，一依愚民習尚是民主自由，那末我要反對民主自由！

治喪後，家父在柳川岸邊買了一所房子，我們就搬到這裡住了。我很喜歡這個地方，柳川兩岸垂柳蔭隄，中間還點綴著修剪得像大饅頭的藤花叢，造成幽靜的環境，是個著名的風景區，房子雖是半磚木的洋樓，屋頂尖塔卻模倣法國式的建築，很適合我的意趣。

在守制期間，我常去訪問演劇研究會的同志，勉勵他們再忍耐一個時期，等我在上海的

研究有些成就，再回來重整旗鼓。我為要矇騙警察當局，同時不得不連同志也一併瞞騙下去。

這時的臺灣社會運動，可以說是自治聯盟的獨角戲，左派共產黨都潛入地下，只有農組在表面上孤軍奮鬥，但也和民眾黨一樣，已成強弩之末，不能有所作為。我的計畫因為注重在上海，所以不參加哪一個陣線。警察當局深恐我死灰復燃，時常派特務訪問我，並勸我趕快結婚。自從在上海發生了令人悔恨的醜劇之後，我也不無結婚之意，想起了以前常見面的三位女郎是否可以做問題，偶爾也加以考慮過。有一天，我去訪問她們，聽說她們都去打高爾夫，我信口對看家的老媽子說：

「喝，多麼時髦！」

在無意中發出來的這句話，後來竟成為她們的流行語：「喝，多麼時髦」。她們可能對我的過訪有深刻的印象，其中S小姐特別樂意和我接近，我也樂意和她們周旋，想藉此多瞭解她們。

有個傍晚，我獨個兒坐在宅前柳樹下乘涼時，演劇研究會的同志黃再添來找我聊天，他是研究會裡最多才多藝的主要幹部。他問我為何不結婚，我答以沒有對象。他提起了S小姐，我說做朋友可以，談不上更進一步；他絮絮不休，勸我應及時物色，以免耽誤青春。我不耐煩地笑說：過幾天又要返回上海，就是有意思找女朋友也來不及了，現在可以做問題的只有一個，但我不知道她的近況如何，他拍膝笑道：

「就是愛月小姐吧，你說的……」

「你真聰明。」

「你的心理我怎麼看不透！真的麼？」

「這話怎麼可以隨便講的！」

「好，這個媒你讓給我做吧。」

他很高興地去後，隔了一天又來問我什麼時候動身，我答道不出一個星期，他說：

「我已經見著她，只要你自己直接和她談一談，事無不諧的。」

我笑著點頭答應，但沒有去。過兩天，他來詰問我為什麼爽約，我答道未免太難為情，他笑我膽怯，認真地鼓舞我一定要去。我一方面考慮終身大事，機會稍縱即逝，另一方面又想像未來遠景，怕因結婚破壞了自己的前途，耽誤應負的使命。我開始煩悶，無法解決內心的矛盾，平素我也信「煩悶是無知的病態」，這時我確已患著無知之病了。

組織研究會當時，我一見愛月，不無鍾情之感，然而我以身為研究會的負責人，不能抱有任何邪念，所以雖則鍾情，也不敢涉及戀愛的範圍。

記得研究會在樂舞臺公演那一天晚上，開幕前我先在觀眾席等著看燈光效果，忽然看見左方幕邊有一位小姑娘，身穿旗袍，胸前插一朵紫色鮮花，帶著淘氣的笑容，在窺探臺下，這一倩影於我覺得十分天真無邪，使我頓起「吾妻芳姿應該若此！」的幻想。這個幻想時常在我的心裡若隱若現，就是往上海以後也發生過幾次，所以這回再添提及她的事，我便為之心旌搖動。

此去上海，關山萬里，何時再能回臺，難為預料，況且自己已有白璧之玷，由於自卑感作祟，論婚不敢抬高身價，煩悶之餘，想起「疑則卜」，我以「尙杯」向母親靈前問吉凶，居然卜吉，於是我就決定去找愛月了。

她事前已由再添聽見了我傾慕之意，自然心照不宣，沒有經過什麼談情說愛，一言為定了。我把母親留給我的一個刻有K字的金戒指套上了她的無名指，就算彼此盟約終身了。這輕薄的訂婚，到如今我尙未起過後悔的念頭。

也許我和她沒有談過戀愛，沒有起過邪念，在純潔的觀念下，她信我，我信她，從結婚起才開始戀愛，所以這一愛情不受結婚的影響而衰頹也未可定。總之，我們的訂婚極端保守秘密，不但我們的家族不知道，就連做媒的黃再添也不曉得我們進行的程度。為什麼得要這樣嚴守秘密呢？因為我怕日本當局知道了，對她發給護照時會發生許多麻煩，所以秘而不宣，不過對申請護照的手續，以及買船票、上下船的次序等等，我都很詳細地告訴她了。

我們的訂婚，互守秘密，都沒有人知道。我約她到水源地去商量渡滬準備，並教她申請護照的手續和辦法，及她到上海一路應有的常識。話別的時候，我牽她的手握了一下，默然和她分袂。

76 桃花劫

離開臺中當日，有許多朋友到車站相送，S小姐也夾在人簇裡，和大家談笑，看不出她有什麼用意。愛月獨個兒站在離車站約二百公尺的鐵路旁邊黯然神傷地目送我，我揮手和月臺上的朋友告別，取出手帕揮幌。車向北徐徐前進，離站漸遠了，我依樣揮手不停，其實我的眼睛只注視在鐵路旁邊的愛月，而不是月臺上的朋友。

我已數度遠行，這回離情最苦。慈親永訣，新歡乍別，一路上縈繫著伊人。

到了上海，我為準備結婚，搬去住在北四川路北的永安里，這兒是一家廣東菜館的二樓，有兩個房間，前面臨大街，後面通長衖出永安里口。在這裡生活，還稱舒適。

有一天，我接到了S小姐的電報，發信地是日本門司，電文：「明×丸抵滬，請相接」。我想不出她為什麼要來上海，但電文既要我迎接，只得按時到碼頭去等她。我想——或許未婚妻和她一同來，藉用了她的名字也不一定。

可是一到碼頭，看見從船橋下來的只有S而沒有愛月，怎麼了？她為何來此？有了什麼意外？我看不見愛月很著急問她：

「只你一個人麼？」

「是。」

這句「是」好像巫女誘惑的笛聲，我愕然問道：

「你來這裡是……」

她笑嘻嘻地答道：

「來玩啊，你不喜歡我來麼？」

我答不出話，搖搖頭笑著說「不」，過一會兒，我情不自禁地再問她：

「你要來的時候，愛月小姐知道麼？」

「不知道。」

「你要來的時候，沒有對她說過麼？」

「沒有，我說要上東京，沒有說要來上海。」

「哦……，你怎麼不說呢？」

「……因為……我動身當時還沒有決定要來上海哪。」

她故意把話題扯開，直使我心慌意亂，我找個機會問她：

「你打算住幾天？」

「沒有一定，要是好玩，多滯幾天，不然，打算只一個禮拜，就要轉往東京呢……。」

我看她的態度，預感到此來，於我凶多吉少，心裡決定不招待她到我寓所，帶她去住在

北四川路的一家公寓，請了非光、芳洲等幾位朋友陪她玩。她要求看我的房子，我沒有理由拒絕，只得帶她去看，她看後說：

「你一個人住兩間房子不太寂寞麼？有沒有佣人？」

「沒有，只我一個人。」

「那末我來住你這裡好了，也可以給你燒飯洗衣服……。」

我漲紅臉，有點發燒，忙說：

「謝謝，我獨個兒住慣了，夜裡在報館吃飯，早飯中飯都是樓下的飯館子包辦的，用不著燒飯，衣服是讓洗衣舖洗的，倒也很方便，你的盛意多謝多謝。」

我裝傻，竭力支吾，預防她更進一步的深入。以後，她每天來看我，使我深感不安，我急於知道愛月的消息，她吞吞吐吐不肯說個明白。我感覺情勢越來越壞，所佈的陣線，陣陣陷落，漸漸迫近我的核心來。為使她退卻，我不得不坦率地告訴她我已和愛月訂婚了，期望她不要對我有所期待。但這不僅沒有叫她退卻，反而使她更激烈地採取攻勢，強調愛月根本沒有來滬的意思，暗示我上了她的當，說得使我心裡搖惑莫釋。

為愼重起見，我請芳洲、非光、羅朋幾個親友來談論她們的事情，沒有得到什麼結論。芳洲雖然主張愛月絕不會背我，但誰也無法保證，他們只是一致反對我和S親近。

愛月自和我告別後，一次也沒有給我來過信，S能夠從門司轉道搶先到上海來，愛月怎麼反不如她？我問S是否看見愛月有準備旅行的跡象，她答道完全不知道。這使我更疑惑不

定了。我又問她是否聽見愛月有甚麼麻煩，她一問三不知，表示她和愛月好像沒有來往。

有一天晚上，下了大雨，雷電隆隆閃閃，S駭怕，強留我陪她。這雷雨之夜，叫我浸漬於天池之中，成為一隻可憐的落湯雞。……她誓約愛月來的時候，絕對不破壞她的幸福，她願意好好地往東京去讀書，絕不給我任何為難。

我日日過著不安的生活，自那風雨之夜，經過了兩個星期，愛月終於來了電報，說她搭什麼船，何日抵滬。我喜不自勝，把這消息告訴她，並問她怎麼辦？她毫無躊躇地答道：「我們就是照常做朋友行宜好了，哪裡有什麼問題？」，我雖然稍微放心，精神上卻苦悶得很難受。

愛月快要抵滬那一天，我求她不要去碼頭迎接，她偏要去，說好朋友來，不去反要引起嫌疑。我不得已，帶她到了外灘上隄，囑她不要站在我的前面，以免衝壞愛月的初印象。

懸掛著大阪輪船會社旗幟的小輪船離開了母船，從黃浦江心駛過來了，我興奮得心臟忐忑不止，真心所愛的人站在小輪船的舷邊，已經瞧得見了，我熱烈地揮手，要使她早點知道我已經來這裡等她，好讓她放心。但她只揮一下手，忽然放下去，不再揮了；我疑訝回頭一看，S已不在背後，而站在我的前面，顧自使勁地揮幌她的手帕。

小輪船靠了碼頭，我伸手去接愛月，覺得她的手是冰冷的，S拍手表示歡迎說：

「愛月小姐你來了，真好啊！」

「謝謝你，你什麼時候到這裡來的，我一點兒也不知道，你好啊？」

我沒看出她們有什麼猜忌，稍微放心，隨時叫兩輛車，一輛送S回公寓，我和愛月同坐

一車回家。我覷見她氣色不好，以為是暈船所致，其實她很敏感地已懷疑我和S的關係了。

對此，我越想要掩飾，S卻故意越要露出她的狐尾。這使愛月太難堪了。她每天低吟日本歌謠納悶，所唱的歌詞都使我很難過，尤其那首「不壞的白珠」裡頭有句「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我的愛願讓給你喲！」這明明表示了她所隱藏的意向。S所提議的條件，她一概拒絕，結果，S表明她願以一死了卻此生。愛月說要回臺灣，犧牲自己，不願給我麻煩。我失去了主意，心亂如麻，一籌莫展。

愛月說她在小輪船上看見S在上海，一見之下，便頭暈眼花，差點兒就要顛落到海裡去；頭一個印象，已經使她受夠了。接著，S一一違約，不肯離開上海，這樣一來，愛月哪裡有心逗留下去！

芳洲、非光都為了我們的三角糾紛傷透了腦筋，他們主張趕走S，作速和愛月正式結婚。我怕鬧出人命，游移不決。芳洲斷言S絕對不致於走絕路，叫我放心；非光說他有把握迫S安全離開上海，勸我不可躊躇，須先正名，有事他願意承擔一切。他們看我猶豫不決，逕自發出了請帖，訂日在北四川路的新雅請客。

請客那一天，S也恬然參加，朋友們爭先對我新夫婦致祝詞，故意撇開了S，使她十分冷落。我內心雖不反對，良心上卻為S難過。引杯狂飲，不覺大醉，我取錢包扔給非光，讓他算賬，頓時昏迷不省人事。

羅朋揹著我，從三樓像演武俠電影般輕快地飛步走下樓，致使我氣息不能相接，呈出慘

白的顏色，妻大驚，急送我到醫院治療，鬧了半天，才清醒過來。

過幾天，非光給我報告他的計劃已經成功了，只要我直接對S說一聲，包管萬事OK，沒問題。我雖然覺得非光的手法未免過於毒辣，但除此以外，沒有更好的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做下去。果然S毫無反抗地收拾了她的行李，悄然而又乖乖地轉往東京去讀書。真的女人有些時候是可憐的弱者，但有些時候却又是勝過鬚眉的強者。

S飄然而來，忽然而去，在我的生涯裏多添了一段浪漫史；我深感對不起妻，也對不起自己，終身引為遺憾。我可以說為了有這內疚，對她時常心存歉疚，所以我們之間有什麼執爭，是她的過失，我仍能原諒她、容忍她。

我怕她寂寞，教她吸煙，養成了習慣；又教她學打牌，在我夜業上班的時候，順便帶她到老靶子路一家同鄉的醫院，留她在這裡打小牌，等到我編完了稿件，十二點下班才帶她回家。

本來我反對吸煙和搓麻將，然而吸煙是我自己犯禁的，搓麻將却是為妻才重新開始的。中國的麻將，我不否認是最有趣的娛樂，然而中國人為麻將所損失的時間太多，如果每個人每天平均花費一個鐘頭，全國便損失五萬萬五千萬鐘頭，如果是兩個鐘頭，就是十一萬萬個鐘頭，按這比率計算，積月累年便是天文數字了。在國計民生事事落伍的時候，在社會風氣國民精神未振作，跟不上世界文化水準的時候，我主張嚴禁國民搓麻將；只因為要安慰妻的寂寞，竟一反過去的主張，這是我的矛盾，我的自私。

妻是一位膽小的人，她白天一個人在家裡也得鎖門，夜裡更不用說，連要上廁，也得叫我陪她，這太不像話了，但她生性如此，不得不如此遷就她。

她們打的牌，一宵頂多輸不了一塊錢，純粹是消遣娛樂。有一天晚上，我跟她回到家的時候，她發覺丟掉兩塊錢，詳細一想，推算是丟在醫院的化妝室，說要去找，我不答應，責她過於寒酸，她不聽話，說自己一個人要去，我很不高興，說為了兩塊錢，跑一段長路，到廁所去找錢，叫人家知道了，未免成為笑話！她說：

「你會賺錢，兩塊錢算不了什麼，我不能幫你忙，倒丟了錢，哪能對得起!?」

我表示輕鬆的笑答說：

「得了得了，不要了，你何必多心，而且天氣這麼冷！」

她的大眼睛潤濕了，默然拉開門走出去，這懦弱的小婦人，那裡來的膽量，在三更夜半獨個兒要去老靶子路，不由地使我愕住了。我急穿回大衣，隨後追她出了街衕，她已走到永安里口了，我叫住她，答應和她同坐黃包車去，她搖頭說：

「有電車坐電車，沒有電車走路，等找到了錢再說。」

她不肯讓我去，說著涼了不好，一定要我回家，她的天真純情，更使我決意當護花使者，非去不可。這時路上幾乎沒有行人，我們差不多走了半個多鐘頭，才到醫院，她搶先跑進廁所，轉回頭便跑出來，指頭上夾著兩塊白閃閃的龍銀，笑嘻嘻地說：

「你看，有了！」

她把兩塊錢放進我的袋子裡，雀躍地跑出門外叫黃包車。我們坐上車回到衖衕口，她又跑進一家夜不關門的雜貨舖，買了一壺天津五加皮和一些燒雞、燒肉、燒餅帶回來。這時她的表情似十一、二歲的小姐，天真無邪。

冬天的上海比北平還要難受，因為這裡的普通家庭多沒有暖氣設備，我家裡也只用火爐取暖。妻身懷六甲，不大喜歡出門。她夜裡常坐在床上織毛衣，等我回家才睡覺。

有個晚上，我照常回家，用小刀子從門縫弄開裡頭小門進去，她放下編織，微笑說：

「我給你做些『善哉』在爐上鍋裡，這裡有碗，你吃吧。」

我掀開床前火爐上的鍋蓋一看，裡頭有紅豆煮年糕的點心。我問她：

「你不吃麼？」

「不，我頭暈不大舒服，你吃吧。」

我看她氣色不好，叫她先睡覺，自己吃了一小碗，也爬上床去。她和平時不一樣，縮進被窩裡，沒有說話就睡覺了。

不一刻，我的手偶然觸著濕漉漉的東西，嚇了一跳，慌忙叫她，她沒回答，我知道事出有異，使勁搖搖她，她昏迷不醒，我手忙腳亂扶她坐起來，因電燈開關安在壁上，手摸不著，要放她躺下去呢，又怕她窒息；我一面抱起她，一面出盡全身的力氣掙扎，才把燈開亮。

她面呈死相，奄奄一息，我抱著她去開門，呼喊住在三樓姓林的同鄉幫忙，他們夫妻跑下樓來，一看就知道是中了煤氣，隨手把窗戶都打開，林太太跑上樓去泡了一碗酸梅湯來給

她灌進去，才救醒了她。

醫生來診察時說：好在救得早，她又耐性強，否則撒尿是窒息前五分鐘的症狀，再遲了五分鐘就救不著了。自此妻很怕煤氣，一生再也不敢使用煤球。

妻提議搬家，說永安里離報館遠，房間又大，不燒爐太冷，要燒呢，又捨不得花錢買木炭。我們搬到靠近老靶子路的大德里住，這裡是個小小的亭子間，排一個寫字臺和二、三張小椅子就擠滿了。住在這兒很適合，來訪的朋友不少。這時羅朋和非光在影壇上已有可觀的成就，時常帶一些明星到我們家裡來玩，談談影圈的消息，給予我許多方便，因為我在報館兼編副刊，很需要有關電影的資料。

當時各報館對電影消息相當重視，影評也相當激烈，為此，中國電影頗有突飛猛進的氣象。我採取中庸的論調，了解電影公司拍不了好片的原因，第一是缺乏資本，第二是市場狹窄，主張政府應大力扶持保護，攻擊政府對電影事業漠不關心，致使中國影片老爬不上國際水準。

別家報紙大致是攻擊電影公司沒出息，製作不像樣的稚劣作品，罵劇本不好，演技壞，影片幼稚可笑。我雖然也痛恨電影公司剽竊作家副本，榨取一般作家膏血，但我也理解影業者不如此做，無法維持。

不過我特別厭惡梅蘭芳，對他的藝術加以一番無情的抨擊，罵他是人妖，說他的藝術是變態，主張男人須扮演男角，不該陰陽顛倒。這一議論曾轟動一時，其實這對藝術不能說是

公正的批判。藝術以表現的技巧和性靈為論據，而我對這問題有錯誤的觀念，但當時卻自認為是不可移易的理論。

報館每天津貼我二、三塊錢聽戲看電影，這數目比普通職員的薪金還要多，電影票價洋片一流館只一塊錢，普通戲院自兩角至四角。我除薪金外，還有這筆外快，所以我們的生活還不錯，夫婦之間異常融洽，同鄉們都稱我們是模範夫妻。

好景不常，我們的報館為了青黃不接，宣告暫時停刊。我離職後，在中國方面依然找不到職業；這次有了家眷，不能像以前過流浪的生活，所以我決意帶妻返臺，和這革命的搖籃告別。這時我痛感沒有資源的革命黨，無法維持，同時也發揮不了多大的力量，也許是有了妻子的牽累，我覺得在大陸已無所作為了。

77 冷戰

失業後，我在上海再逗留了幾個月找機會，妻極力反對我走險，終於鎩羽歸鄉。在基隆一上陸，水上警察署人員就到船裏叫我去，說是又有什麼「宮殿下」來臺，要扣押我一個時期。我說妻子同行，一回臺便受檢束，未免太不近人情。他們一聽見我已有了妻子，表示非常意外，答應隨時釋放。

妻在碼頭等了幾個鐘頭，看不見我回去，就跑到警察署找我，特高課長乘機賣弄人情，派兩個特務說是耽誤了我們坐車時間，要幫忙我們拿行李。因為班車不順，自基隆至臺中換了二、三次車，都由他們交代的特務代拿皮箱，送到我家裏。名曰幫忙，實在是跟蹤監視。

臺中警察署似乎早已接到消息，州高等課和警察署高等課各派一人在我家裏守候；我笑他們未免神經過敏，他們說宮殿下在臺期間，不得不如此戒護，絕不是故意找麻煩。

父親對我的回家，表示不歡迎，因為我沒有獲得他的同意，自由結婚，而且又聽人家說我聲言：「我能獨立才要娶太太，絕不靠父母幫忙」，這使他太失望了。他以為父母給兒子娶媳婦是義務，媳婦好壞影響家庭甚大，雖不必「由父母之命」，也得徵求他們的同意，而我一

意孤行，無視父母的存在，成功則在外放蕩，失敗則回家偷閒，父子間已無人情義理可言，所以他不理我。我了解父親的心情，自然不敢抱怨，妻也很能忍耐，跟我一起睡在二樓地板上，好像浪子回家，不但不敢有何怨言，而且對父母還更加孝順，和顏悅色服侍他們。

我在上海期間，父親續絃，哥哥多添了幾個孩子，妹妹已高中畢業，準備往東京考上級學校。我們的樓上分為兩棟，右棟前面有客聽，後面有父母和哥哥的房間，左棟是一個三間大的廣闊房間，妹妹獨個兒住在這裏，沒有另設床位。我們只好舖蓆子在地板上睡覺。

過了一兩個星期，姨母來看我們，代抱不平，向父親交涉，父親也已心平氣靜，尤其看愛月溫良恭儉尚有可取，聽了姨母的話，即時叫木匠造作房間，訂做了一張大床給我們用。自此安居家中，暫享天倫之樂。

繼母年輕，對我父親雖極驕橫，對我們卻還不敢怎樣，父親年漸衰邁，極希兒孫繞膝，然而因為他不喜歡我大嫂，所以也不大喜歡她的兒女，自然傾向於疼愛月，從而對我的感情也逐漸好起來。

民國二十年起，日本對外積極建設我東北，對內強力鎮壓左翼組織，臺灣的社會運動也隨之陷於窒息狀態，就是右派的自治聯盟也難免兔死狐悲、孤掌難鳴。民國二十三年，自聯完全失去了活動力，日本國家主義派乘這機會大肆活動，替軍閥開始舖築獨裁的新路，由明治時代所培養而茁壯的自由資本主義已面臨被淘汰的邊緣。我預感日本將蹈入老子所言「物壯則老」「兵強則不勝」的末路，國內必有重大的變化，決定暫取靜觀形勢，不想作積極的活

動。

自聯受了日人右翼團體的壓迫而失勢，臺中另醞釀了一個新局面，產生了東亞共榮協會，這一團體的創設，可以說是出於偶然的必然：因為臺灣的社會運動，受了客觀形勢的影響，呈現消沉的狀態，日人也覺得有些詫異和不安。臺灣人不活動不說話了，好像奴隸被虐待後的沉默，居心莫測，於是主人總會問：「喂，你怎麼了？」這主人可以用極右著名的宮原武熊博士來代表。「沒有甚麼」，這回答人可以用極聰明無比的陳炘（註五六）當代表。由這兩人的問答造成了東亞共榮協會組織的動機。

宮原是留德的眼科醫學博士，他的醫術在臺灣算是數一數二的權威；為人好勝，驕傲不遜，視臺灣人如希忒拉之視猶太人，最痛恨臺灣的社會運動家。但他在職業上卻沒有臺日人的差別，凡是患家，總是「一視同仁」；有一次，有個村女手術後，因初次開放眼睛，忽觸強烈光線，反而頓失視力，照實說：

「瞧不見，沒有好。」

他拍地摑了她一記耳光，喝道：

「胡說！怎麼瞧不見？」

他的脾氣這樣，大家都知道他是個不好惹的醫生。

陳炘是留美的金融經濟專家，他創辦大東信託株式會社，在日據時代以純粹的民族資本，組織金融信託業的，可以舉他為啊矢。他雖然是哥倫比亞大學出身的碩士，但他沒有染上美

國的恣驕揚氣，而保持著英國紳士的溫和風度。

他自小老成，在東京慶應大學讀書的時候，雖然也參加過臺灣留學生所掀起的各種運動，但不為運動而犧牲他的學業，他的確是名副其實的書生，大概大我十一、二歲，我在中學，他在大學，當時我覺得他在我們留學生中是位翩翩公子，異常溫文爾雅。

他創辦了大東信託以後，我常有機會和他見面。有一次我為了朋友借款滯償的事去找他，請他寬緩，他不答應，和我爭辯起來，我說這位朋友也是我們的抗日同志，讓他慢些日子總能清還，我也願意負責擔保，不必催得那麼積極。他說掌管金融的人，不能賣情抵賬，否則便以私害公破壞事業。我依然不服說：

「事莫大於謀臺灣人的利益，設立這種金融機關而不能愛護臺灣志士，還有什麼意義？」

他窮於回答，紅著眼眶答道：

「你公私分不清，金融機關絕對不許談私情，一談私情便成不了金融業，這是世界金融界的通例，你未曾掌管過金融業，所以不知道這裏頭的微妙。」

他和我的思想大相徑庭，但他運用其金融，確實也做過了一番大事——就是林獻堂被臺灣銀行的金融政策騙入圈套，將被查封拍賣的時候，大東信託撥出一筆鉅款解救了他，否則林獻堂家便有被迫破產的可能。這起事件，不消說是日本當局和臺灣銀行的陰謀策略，為了這一陰謀的失敗，日本當局不得不改變權術對付林獻堂。

陳炘彷彿是個儒雅的書生，但他絕不文弱，而是一位偉大的領袖，深謀遠慮，有統御群

眾的才能，如果宮原可以比作楚項羽，那末他便可以稱劉邦。

宮原的個性很強烈，因為他是個自由職業的學者，無所顧忌，當過州議員，在議會中是個猛張飛，脾氣一發，州知事也得怕他三分，日本人多認為他是最有學識、最了不起的人物。他和他的名字相符，正是一隻武熊。

這隻熊偶爾和陳炘同席，談起當時剛抬頭的大亞細亞主義問題，宮原主張立刻組織亞細亞聯盟，陳炘主張先建設「內臺融和」的基礎，然後才可以作更進一步的組織；所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捨此別無他途，空談無益於事。兩個人的議論不意竟成為臺中上流階級的話題。

本來這是極平凡的議論，為什麼這個論爭，會引起各方的注意呢？因為當時日本佔據了我東北，退出國際聯盟，成為孤立的國家，極想拉攏東南亞弱小民族做他們的與國，所以對大亞細亞主義不得不認真地加以考慮，宮原和陳炘的議論適合其時，便被拿作檢討的中心問題。

日本自退出國聯以後，右翼團體如雨後春筍般產生，什麼國粹主義、民族主義、皇道主義、高千穗主義、八紘一宇主義、大亞細亞主義、神道主義等等五花八門，無不高唱入雲，極一時之盛。其實這些主義，除大亞細亞主義和八紘一宇主義外，都沒有國際性的號召力，雖則野心勃勃的日本軍閥，表面上不反對，實際上也不敢恭維。

他們自詡日本為萬邦無比的神國，說他們的開國神祇是「天照大御神」，天照大御神就是

太陽，太陽普照宇宙萬邦，崇高無匹，比起釋迦、耶穌基督，甚至上帝還要偉大，日本國民便是天之驕子。

他們的文化說已超越世界水準，東洋文化和西洋文化只是他們的支流，他們以本流為體，支流為用，在其大文化之前，一切異端失色無光。他們的天皇是萬邦之主，至尊至聖；他們的皇軍將為萬世開太平，為世界維持秩序。這種狂妄愚蠢的言論，非獨笑殺了外人，就是日本的智識階級也深覺肉痲，認為是無稽之談。

日本一代的文妖小川周明博士，是近代日本右翼理論的精神領導者，日本軍閥和右翼團體都奉他的「大日本主義」為理論根據，以此抑壓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好像希忒拉的納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蒂，支配了日本全國的思想。

當時臺灣也成立了許多右翼團體，有臺北書畫古董商人有動緣治等所組織的「高千穗聯盟」，三流報紙《四國民報》臺灣支社長山下好太郎等組織的「臺灣社會問題研究會」，奉天皇為活神，主張人神歸一的鎌田正成等組織的「維新社」，森政禧等的「愛國會」，臺中市常見秀夫律師等的「改進黨」，臺北某酒家老闆正森興和永山章次郎等的「大日本正義團」，臺北市大流氓謝龍闊等的「大同促進會」，臺北市陳清波、林齊川、李延旭、郭廷俊、大澤貞言、貝山好美等的「大亞細亞協會臺灣支部」，基隆市楊元丁、丁藍南等的「興亞協會」等。凡擁護軍閥、諂媚政府的主義思想，都算正確，可以自由活動。這些團體以「大亞細亞協會」的組織為最大且最有力，網羅了臺北的御用紳士和日人的有力者，但他們只有上層組織而沒有

大眾的支持，所以也和其他團體一樣，只能強姦民意，威脅民眾，自吹自擂，而不能發揮實在的團體力量，就是日本民眾也對他們冷淡，不加理睬。

在這種情勢之下，宮原和陳炘的議論，掀起了意外的浪潮，倔強的宮原對陳炘的論點大感興趣，二十二年十二月十日，約在臺中市民館（現在軍人之友社）舉行座談會，招請陳炘、楊肇嘉、黃朝清、葉榮鐘、渡邊國弘、吉野秀公等交換意見，大家對促進亞細亞民族融和的這一主張都沒有異議，進而討論實施方法論時，更邀請長岡寬參加，開了第二次的座談會，結果，大多數贊成陳炘的意見，認為欲達成大亞細亞主義的目的，須從臺日融和做起，以臺灣為基礎推進到東南亞去。這一實事求是的理論，不僅獲得了當日出席者的響應，同時也博得竹下州知事的熱誠支持，很迅速地把東亞共榮協會組織起來。這一團體的主要幹部是：

理　事　宮原武熊　陳炘
委　員　田原哲太郎　今井昌治　渡邊國弘　日高茂　長岡寬　關根重憲
　　　　黃朝清　楊肇嘉　葉榮鐘　洪元煌　張煥珪　張聘三
相談役（註五七）　入佐藤次郎
顧　問　竹下州知事　中田榮次郎　二瓶原吾　今田卓爾　林獻堂

這一陣容可以說是網羅了臺中一流士紳，和臺灣的著名社會運動家及自治聯盟的主要幹

部。從表面上看，未嘗不堂皇冠冕，實際上卻是吳越同舟，同床異夢，組織體本身異常脆弱；只因為州知事熱心支持，排除一切的困難，積極鼓舞，強推硬拉，才能活動了一個時期，否則剛設立便有解體之虞了。我對這一組織特別加以詳細說明其來龍去脈，是因為這個團體在臺灣社會運動史上形成了一個最特殊的組織，也可以說是臺日兩民族智力鬥爭最精采的一幕。

過去，日人和臺灣的社會運動家，勿論左右派，都一如冰炭不相容，除御用紳士走狗會和日人敷衍外，真正的民間社會運動家沒有一個能夠和日人的組織體合作。這次共榮協會的合作人物，臺方雖然多是自聯的右派幹部，但臺灣的所謂右派和日本的右派，實質上完全不同，基於民族主義立場上說，臺灣人和日本人是站在對蹠兩極端，把仇敵集合於一處，而欲使其同舟共濟，實屬非常事。陳炘能把這非常事推過一個過程，他的智力和政治手腕確實非凡。

東亞共榮協會設立伊始，日本右翼分子就開始反對和搗亂。他們認為日本人和臺灣人處於同等地位是莫大的恥辱，對日方的幹部尤其宮原加以猛烈攻擊，罵他們出賣國家民族，自貶皇國民的優越地位。

因此，日方委員惶惑搖動，引致惱怒了宮原和竹下州知事，更加熱心支持協會，宮原表示不惜一拚，對他們的同胞報以痛切的反擊。他為堅持其立場，在無形中成為日人眾矢之的。相談役入佐郵局長憤然拒絕參加會議，膽怯的委員，有的不敢公開活動，有的準備退會，會

剛成立，便呈現了風滿樓的狀態。

日方步驟混亂，陣容不整之時，正是我方應團結一致，悉力以赴的有利機會；不幸，陳炘與楊肇嘉兩雄不能並立，楊肇嘉不肯合作，陳炘著急之餘，要我居中斡旋，我婉辭拒絕，惟恐被捲入旋渦；後來因經不起被他熱誠所動，終以朋友身分奔走於陳炘、楊肇嘉之間，但仍舉不出絲毫效果，於是這兩個領袖也就分道揚鑣了。

由於這次的遊說，我才深切地認識了陳炘的人格，他確實真心要為臺灣服務，真心要為民族貢獻他的一切；日人雖然常在背後批評他的是非，可是一旦到了他的面前，便目瞪舌呆，不知所云。他的大議論未曾受過任何人的直接反對，我對他的心折，或許有人認為是他勇敢地推薦我入東亞新報社之故，但我自問生平不為威武所屈，不為富貴所移，如果事對於吾民族同胞有利者，雖則敵人，我也願為之効勞；苟對民族同胞不利者，雖則至親，賄我以富貴，餌我以地位，我也視為仇敵，不能與之敷衍。

我進入東亞新報社，的確使敵友都大感意外，我的入社問題，自臺中鬧到總督府，結果，當局以陳炘的保證，未加以積極的干涉。

《東亞新報》（初名《臺中新報》）出版不久，總編輯葉榮鐘調任臺北兼分社長，我不得不在本社兼任編輯職務，我們的報紙便開始逐漸向日方陣營轟擊。

民國二十三年，賴明弘（註五八）和幾位朋友勸我組織一個文藝團體來代替政治活動。我看左翼組織已經被摧毀，自治聯盟也陷於生死浮沉的田地，生怕臺灣民眾意氣消沉，不得不

決意承擔這個帶有政治性的文藝運動。

我們計劃組織文藝團體的消息一傳，全島各地起了熱烈反應，於是著手籌開全島文藝大會，訂於五月六日在臺中小西湖舉行，這是我頭一次參加全島性的社會運動。

南北各地同好者都陸續來中集會，年長的有六十多歲漢學詩人，年輕的有二十開來的新進作家。但在開會前，臺北和彰化兩地的文人都竊抱成見，採取觀望的態度，不願意參加統一性的團體組織。

我認為這是無足為怪的曲折，況且臺灣還沒有所謂職業作家，頂多不過是曾發表過幾篇詩文遣懷寄興的程度。在這文藝啟蒙時期，與其說是一躍要建立文壇，不如說是要建設文藝運動的基礎，來代替政治運動較為恰切。

這次標榜的文藝運動，骨子裏是帶有政治性的，所以我們不願意輕輕放棄這一運動的領導權。我們痛感過去臺灣的社會運動，常因領導者固執主觀，未能建立正確的路線，徒使親痛仇快，實際上未能給予敵人多大的損傷，是以同志間意見分歧，內醜外揚，甚則有的背叛而走入敵人的第五縱隊，形成可怕的對立，自腐、自侮、自辱，給予敵人有可乘的機會。

我們懲前毖後，很想糾正這一毛病，赤手空拳，相濡以沫，召集了這個大會，期望實現我們的理想。詎料彰化的會員故意集體遲到，臺北的出席者竟有人主張沒有組織文藝團體的必要。文人相輕，自古以來如此成為無法可醫的遺傳，幸而臺北彰化以外，各地會員都熱心支持大會，很順利地通過了文藝聯盟的組織，並議決發行《臺灣文藝》雜誌。

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是臺灣文藝運動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這一天誕生了臺灣文藝聯盟，同時懷胎了《臺灣文藝》月刊雜誌，並註定了幾位作家能爬上日本文壇的命運。

大會的會場設在柳川河邊小西湖，大門貼上一對「萬丈光芒喜為斯文吐氣，一堂裙屐欣看大雅扶輪」紅聯，場內本來貼有許多標語，卻受了日本當局的干涉，撕下了一大半，剩下的是「寧作潮流衝鋒隊，莫為時代落伍軍」、「打倒腐敗文學」、「實現文藝大眾化」、「擁護言論自由」、「打倒偶像創造新生」、「為新文學奮鬥到底」、「擁護文藝大會」、「文藝大會萬歲」等，這些標語都是由各地會員自己寫來貼上的。

大會依照程序進行，主席推舉由總督府評議員黃純青擔任。有許多青年反對他，說這次的大會是我們青年作家新文藝運動的發軔，不該讓給封建遺孽的老古董當主席。我在幕後說明我們召開這一大會，已非容易，況且日本當局異常注意，今後需要工作的事業甚多，他不但可以做我們的掩身符，還可以做我們的擋箭牌，求之猶恐不得，豈可隨便摒棄。

是日討論的議案有：(1)文藝團體組織案；(2)機關雜誌發刊案；(3)(記錄遺失)；(4)演劇改革案；(5)與漢詩人合作案；(6)作品獎勵案；(7)文藝大眾化案。此外另有漢字音改讀案等。

文藝團體組織，雖然遭受臺北一會員猛烈反對，結果照原案通過。機關雜誌發刊案，獲全場一致通過，名稱決定《臺灣文藝》，編輯發行處設置於文藝聯盟本部。演劇改革案，審議委員會認為這是凡百需款的組織，聯盟無法負擔，決議保留，不提出大會討論，與漢詩人合作案，審議委員會認為應予否決。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嚴重的問題，如果此案不成立，影響聯

盟的存亡和機關雜誌的發行甚大，所以極力要求通過，把這經審查否決的議案又搬出大會，要求大會重新討論。豐原林越峯主張：

「吾人理當打倒舊文學，打倒吟風弄月、無病呻吟的腐敗詩人，豈可以和他們合作!?」

全場報以熱烈的鼓掌。我說：

「原則上我是贊成大家的意見，不過目下臺灣文藝運動還處在過渡期，客觀情勢不容允我們分派鬥爭，不若和他們疏通意志連絡感情，擴大文藝戰線，以舊文人為緩衝成員，協助我們，才能鞏固我們的陣營……」

我還未講完，有人站起來喊道：

「對敵求和成什麼體統！反對反對！」

他們的理論我當然能夠了解，但青年們多是無產無權的書生階級，實際上除了和那些舊文人合作外，自己無力維持這個大團體，也沒有財源可能發行雜誌，誰也不考慮到現實問題，我卻不敢說穿到底，只強調：

「我們自顧不暇，怎能排除異己，吾人與其多一個敵人，不如少一個敵人好，況且他們還可以做我們的戰友，做我們的後盾……」

講到這裏，會場嘩然騷動，都不贊成我的意見，於是大會把這議案又否決了。我心裏非常苦悶，要求將這議案列入記錄，方才通過。

其他議案除「漢字音改讀案」外，都照原案通過。字音改讀案的提案人是南投吳宗敬，

他主張漢字的讀音須改用臺灣土音讀，例如「一」須讀「質」，不讀「逸」；「二」須讀「懦」，不讀「字」。這一議案雖值得檢討，但審議委員會認為這是屬於教育問題，實行上有許多困難，而且原提案還有研究餘地，故予以否決。

大會閉幕後，經過了一波三折，終於把最難最重的責任推到我身上來，常務委員會誰也不肯承擔主任委員兼雜誌出版負責人。會散了，大家各自回鄉了，所留下的只有一個空招牌，人在哪裏？錢在哪裏？會務如何執行？常務委員一共五人，賴和住彰化，賴慶在北屯，賴明弘在豐原，臺中只有我和何集璧兩個人。召集了幾次會議，出席者都不過半數，既不能議事，更不能執行。

曾幾何時大吹大擂轟轟烈烈舉行的大會，成立的聯盟，在報章雜誌上無不作為醒目新聞，大書特書，到頭來，一似風前殘燭，快要熄滅了。我四顧無人，孤掌難鳴，但事至於今，欲罷不能，只得採取移樽就教的方式，踵門訪問常務委員，請示提案，作成議決，付諸實行。

這時誠心幫助我的，只有陳炘和中央書局的張星建與演劇研究會的舊同志黃再添，及其他二、三和文聯沒有關係的朋友。聯盟只有軀殼沒有靈魂，藉屍回魂的已不是文聯，而是盟外之人了。家嚴對我的行動置之不理，既不贊成，也不干涉；所謂孤軍奮鬥，在這時候我最飽受了辛酸的滋味。幸而妻還了解我的苦衷，拿她的手鐲、金戒指等當錢資助，鼓舞了我的勇氣。

會的活動與不活動，對文聯本身的死活沒甚影響，機關雜誌卻無論如何不能不發行，如

果雜誌不發行，才是等於團體的死亡，所以我不得不四出求乞募捐。我所求乞的對象，居然多是我文藝大會所要打倒的所謂封建遺孽的漢詩人和地方士紳。就中使我最感動的是霧峰林幼春，這位被稱為老學究詩人，他不僅不念舊惡，而且表示十分誠懇地支持我們，約定每月可以有一定的金額資助雜誌的出版。我得到了他的鼓勵，也去找心有芥蒂的林獻堂，他也答應做我們的贊助員，由此文聯便逐漸獲得了各方面的支持。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五日，《臺灣文藝》創刊號誕生了，文聯的靈魂已附得了屍體，立即對大眾開始說話了，一期期的出版，直使文聯由誕生而發育，而日益壯大；不僅盟員奮起振作，就是日本方面的作家也陸續給我們投稿，連祖國的著名作家也有幾位寄稿子來助我們的聲勢，從而朝鮮文學界也對我們開始深切的注意了。

民國二十四年，世界聞名舞蹈家韓籍崔（承喜）小姐應我們聘請來台，動機無非是為要支持我文聯，拒絕了日人的優渥聘請條件，專誠來鼓舞我們，這一精神鼓勵使我們異常興奮。

話說回來，東亞共榮協會在陳炘的正確領導下，開始活潑的進展，宮原毅然脫離了日人的陣營，矢志願為臺灣貢獻他的全力，說：

「日本有臺灣然後可保有東南亞，有了東南亞才能防衛日本，日本如果得不到東亞民族的支持，定必完蛋。」

說著聲淚俱下，我對他的熱誠很關心，決意利用他抵抗日方的壓迫。他的思想行為，不僅獲不到日方的理解，反被認為是叛逆，備受日人的攻擊，就是竹下州知事也成為被攻擊的

目標，處於困難的立場。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中部屯子腳一帶發生了空前的大震災，死傷枕藉，極為悲慘，我計劃發動東亞共榮協會和文藝聯盟從事直接救濟，不巧，這時陳炘和宮原都不在臺中，我未經任何公辦手續，擅行獨斷，剛要著手，便遭某幹部的反對，只得撇開了協會，由文聯單獨擔當了這緊要的工作。

但臺中的文聯成員不多，需要召集全島同志才夠運用，號召的文書一發，各地文聯員立刻馳來應援，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救災運動。他們都自備旅費，日常生活也自己負擔，分隊挨戶募捐，把所集的許多物品和金錢，直接送到災區去，發揮了極其良好的效果。

初時，當局也認為這是很好的非常措施，不但不加干涉，而且視為義舉，到了救災將告一段落的時候，御用走狗們由於爭功嫉妒，製造謠言，誣告我們誹謗政府貪污無能，吞沒救濟物質，所以我們才採取直接救濟行動。警察當局聞訊之下異常震怒，傳我到警局受審，結果，反被我斥責一頓，不了了之。

事實上，我們的活動也有點過火，當局接到災情嚴重的報告，大驚失措，正要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救災工作之時，我們在地震發生後不過幾個鐘頭，就把救濟物品送達災區了。

文聯正因為沒有配合政府經過例常程序，才能舉出那麼驚人的效果，我們一接到消息，立刻決策，先動員本部人員募捐，把所募的物品——醫藥、米油鹽、鍋釜、衣服隨時用卡車運往災區，及發現災情意外慘重，才再動員全島的盟員協助，擴大救濟工作。

東亞共榮協會任我為記者後，日人方面越起疑忌，有許多委員不但不肯支持，甚且竟和會外人陰謀打倒協會。東亞新報的出版，更刺激了日人和警察當局，我每星期總要有一、二次被傳到高等警察課談話，所談的內容無非是新聞記事和社評的修改問題，給予我很大的麻煩。

日人方面的右翼分子，視我們報社為一個不能容忍的存在，律師山下季重、郵局長入佐、臺灣日日分社長渡邊、南瀛新聞分社長勝本、大日本生產黨員兼人類愛新聞分社長賣間等人，為對付我們的報社，絞盡腦汁策動離間，設法圍剿，非達到消滅我們不止。

賣間在右翼陣營中，本來是個小流氓，因為他在臺中一個會場上毆打林獻堂而一躍成名，臺灣官報日日新聞及日人經營的大小報刊，利用這件事小題大作，為賣間撐腰喝采。賣間以國士自居，要求林獻堂辭退臺灣總督府評議員及其他要職，新聞雜誌製造輿論捧場賣間，一直迫至林獻堂「就範」，始歸平靜。

這時賣間還是經營一家彈球店的小老闆，我在《東亞新報》以四段記事標題「林獻堂氏被一仙彈球店小流氓毆辱，暴漢賣間逍遙法外，民眾大起公憤」，這日文記事使日人切齒痛恨，說我以一仙彈球店小流氓為標題侮辱日本國士，殊難容忍；尤其賣間咆哮如雷，聲稱非和我鬥個死活絕不罷休；後事如何，還有下文。

竹下州知事協助創立東亞共榮協會未及半載，就被他調，宮原失去了靠山，孤掌難鳴，只有依靠臺灣人才能維持他的地位。是年州議改選，他的「官選」顯然絕無希望，需從民選

出馬，但一般日人恨他入骨，誰也不肯投他的票，所以他必須爭取臺灣人的支持，才能當選；可是臺灣人的票若被宮原拉過去，自然臺籍議員會減少一席，這在臺日競選拉票上形成了一個激烈的爭奪戰。

選臺籍候選人呢？抑或日人宮原呢？我們為這個問題檢討過好幾次，陳炘、張煥珪、葉榮鐘、莊垂勝等人都贊成支持宮原，因為假使宮原當選，他的政治影響力比臺籍議員還要大；臺灣人能當選的人物，究竟和官選議員在本質上無甚軒輊，對政治不能發生絲毫作用，所謂民選不過只是個幌子，事實沒有用處。既然如此，不如擁護宮原。我們所決定的這個方針，使日人方面大起恐慌，認為我們的戰術比什麼還要毒辣，假使這隻熊讓他當選的話，必定會擾亂日方的陣營，而且還會被臺灣人取笑。至於臺籍候選人方面呢？他們指我們不支持同胞為數典忘祖，大發牢騷，痛罵不已。

競選當時，日本當局暗與右派流氓勾結，計劃到處搗亂，特別要打擊陳炘。政見發表會場，我記得是設在現時的光復國民學校禮堂，聽眾非常擁擠，臨監官表示十分緊張，警察都武裝戒備，預防不測。

輪到陳炘登臺講演的時候，日方政治流氓都弩張劍拔，採取擾亂的姿勢；陳炘一登臺，聽眾送他熱烈的掌聲，接著肅靜下去。他諄諄然講了半個多鐘頭，聽眾報以雷動的掌聲，日方政治流氓都被陳炘的演講迷住，茫然自失，有的竟不自覺也跟著人家鼓掌。

這場講演越使日人忌憚陳炘，認為他是個了不起的可怕人物，宮原只夠當陳炘的傀儡，

絕難望其項背，所以對陳炘越加警戒，有的主張拉回宮原，以免放任陳炘利用。

宮原得到了臺灣人的支持，輕易地當選了州議長，他感激流涕，誓為臺灣人抵死奮鬥到底。其實宮原何愛於臺灣人，臺灣人也何愛於宮原，只是狼狽相依，形成了變態局面，絕不是正常的心理情態。他本來是反漢思想最強烈的右派人物，視臺灣人為清國奴，在臺中旁若無人，以大和民族優越自居，只因受了陳炘的感召，竹下知事的慫恿，誤入了我們的圈套，欲罷不能，被迫而成為親臺的分子，絕不是他的個性本來如此。

東亞共榮協會初創時，日方佔有半數的委員，而且更有相談役入佐郵局長，顧問竹下知事，在鄉軍人會長二瓶源吾、中田榮次郎、今田卓爾等著名人士為後援，主要幹部日人佔有三分之二，據此，他們控制協會尚有餘力，但他們與臺灣人吳越同舟，立場尷尬，步調不一，全無統制，自竹下知事遷任後，日方委員隨之爭先脫會，不理宮原，致使宮原陷於孤立無援，只有《東亞新報》主筆關根重憲是他唯一的搭擋。我方有葉榮鐘、張煥珪、莊垂勝、張聘三、黃朝清、洪元煌等戰將如雲，皆足智多謀，絕非宮原、關根數人所能左右，是以共榮協會不由的一任我方擺布，無形中變成了我們的團體，這個成果，如非是在臺中得到陳炘的正確領導，絕不能獲致如此輝煌的勝利。

文聯和共榮協會的活動，使日本當局傷透了腦筋；文聯跟著《臺灣文藝》的發展，逐漸擴大組織，嘉義、佳里、臺北、東京等處前後成立支部，東京的發展又刺激了上海和廈門，勢若燎原之火，僑生到處舉行座談會響應臺灣，展開了文藝活動的範圍。

共榮協會的運動和文聯相併行，深入到鄉村去，不久協會便擁有超萬的會員，成為龐大的組織。但有形無形的壓迫也隨之而來，日本當局為消滅協會，決定先奪取《東亞新報》，然後扼殺協會，這個陰謀，他們曾經費了相當的時間和勞力才達到了目的。

文聯佳里支部成立之後，召開了一個值得一提的文藝座談會，林茂生專程由臺南趕來參加，這位長青不老的學者提出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問題和我的「為人生而藝術」挑戰，我主張藝術需要對人生有意義才有價值，關於這一口號我不便說我們的藝術應為臺灣的解放而存在。

他強調藝術是藝術家靈感的表現，不必要有功利目的，藝術本身自有藝術價值。論戰一上一下，茂生看大勢不利，坦然而輕鬆地說道：

「這場論戰，算是我吃了敗仗，暫掛免戰牌，等我養精蓄銳，準備好了，另行討戰，因為我還未承認折服。」

他的純藝術論，和世上一般藝術家奉為圭臬的相同，但當時的青年不滿現實，所以多不歡迎他的純粹藝術論。

林茂生是臺灣人首獲文學士頭銜的文學家，同時也是首任的高等文官，他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頗受日人愛護，但他只肯賣學問，不肯賣靈魂，更不肯出賣臺灣。他被日人認為有用的人才，在民國前就被帶往東京留學，那時候他還留著辮子，是個純粹的「支那人」，日人以為對他特殊的優遇，可使他感恩戴德，傾誠日本，詎料他熱愛他的民族，不屑就任行政官，

而進入教育界，擔任了臺南高商的教授。學生們都喜歡聽他講課，他的教學輕鬆而幽默，嘗對學生們說：

「你們為什麼英文學不來?，英文和臺灣話相同，只是意義相反，例如我們說「這兒」(There)，他們說「彼兒」(Here)，他們說「狗」(Cow)，我們說「牛」，我們說「鹿」(Dog)，他們說「狗」(Cow)。所以說「這兒」(There) 就是「彼兒」(Here)，「彼兒」(Here) 就是「這兒」(There)，「狗」(Cow) 就是「牛」，「鹿」(Dog) 就是「狗」。這樣子記起來，毫不費力。」

這些話由閩南話講，的確很有趣。日據時代他只以教書為樂，不求聞達。我一向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有特務跟蹤，所以一般士紳和御用走狗都忌我如蛇蝎，因此，平時我不大喜歡訪問俗友，但一到臺南，不是訂住林茂生宅便是陳逢源宅；而茂生不但不表難色，而且大表歡迎，由此也可以想見他的人格如何，膽量如何。

文聯的活動，可以說在民國二十四年為鼎盛時代，臺灣的作家已有幾位進入東京的中央文壇，有的在《新潮》、《中央公論》、《文藝春秋》等一流的雜誌，刊登了他們的作品，文聯東京支部也相當活躍，二十四年二月五日在新宿愛爾蒂爾咖啡室，舉行了一個富有紀念性的座談會，出席者有小說家、詩人、評論家、劇作家、美術家等，另有祖國幾位文學家參加，更添精采。他們的議論很可以做文聯本部參考，這雖是歷史陳迹，但不妨摘錄是夜的座談會做個掌故——

吳坤煌：「晚上恰巧文聯本部委員賴明弘君也來參加，我藉這機會，希望請他說明文聯近況和《臺文》的一般情形……我有個感想要說的，是一向不重視文化的臺灣，最近對文藝方面也漸加注意，正如劉捷君所言——臺灣的雜誌自《南音》起至《伍人報》、《福爾摩沙》、《先發部隊》、《第一線》以及《臺灣文藝》，蒸蒸日上，我們相信不久當能產生像朝鮮張赫宙那樣出色的作家……。」

賴貴富：「我很欽佩臺文的作家異常認真，精誠團結奮鬥，不過我希望臺文需要更加大眾化，應該編輯像《犯罪公論》那麼有趣的大眾雜誌，才能吸引讀者的興趣……」

賴明弘：「按照現在的情勢看，這是辦不到的，就是要維持一個獨立的純文藝雜誌也夠困難的。」

顏水龍：「臺文的封面我雖然也畫過幾期，但因為臺灣的印刷技術不好，不能表現原畫的神氣，我想最好把這封面在東京印，然後送到臺灣去裝訂。」

賴貴富：「維持雜誌的最好辦法，是多收一些廣告，希望明弘君把我們的意見傳達本部，又希望多刊登一些音樂界的消息或與音樂有關的文章……」

雷　生：「我主張中國的文學需要統一，寫作應該以白話文為標準。」

賴貴富：「我們要急起直追，創造超越日本的作品……」

顏水龍：「我們不要焦急，欲速則不達，我在法國所見聞的著名作家、音樂家、美

術家，多是年過五十才出名的。」

吳天賞：「顏君你看西洋美術和東洋美術孰優？」

顏水龍：「我想東洋畫是比較注重神氣的，把神氣溶化於畫面，是東洋畫的特徵，西畫太細緻而過於科學化，這是和東洋畫不同的地方。日人的缺點，是他們所畫的畫，多是為要展覽而畫的，我們應該多畫一些富有生活內容的作品來表現作家的個性才有意義。這種畫雖然不拿出去展覽，也自能形成一家哩！」

吳坤煌：「像這種輕鬆的座談會，我們計劃每個月開一次，把我們在東京所研究的資料送給本部做參考。……」

文聯獲得了東京支部的大力支持，《臺文》的作品也隨著東京寄來的優秀作品而提高水準，島內作家的作品漸有落伍的形勢，尤其中文的作品和日文作品對照起來，相形見拙，《臺文》的編輯方針，在實力對比之下，不得不自動轉變，由民族性轉向政治性，再由政治性轉向純文藝性，初創的主旨逐漸無法維持下去了。

《臺文》為適應時勢，不得不轉變為純文藝雜誌，從而文稿也由中文中心移轉為中日文並重，再由中日文並重變為日文中心，這是勢所使然，絕不是編輯人有所偏愛的。

《臺文》出版初期，以中文為主，把中文排在前面，中日文各編一半，計劃逐漸減少日文，改變為中文雜誌；但中文作家少，作品質量都比不上日文，由於讀者的要求，和時潮的

影響，中文終於站不住主要地位。我雖然站在總編輯的立場，有權可以左右稿件，但終於愛莫能助，只有任它讓讀者淘汰。

日文優越的原因，第一是臺灣人受日文教育的多，當時的日本現代文學又比中國優越，文章優美流暢，作家易寫，讀者易讀，所以比較受歡迎。第二是日文已有統一性的語言做標準，中文不但還沒有統一性的白話文，臺灣的漢文讀者看不慣白話文，還未達到能夠欣賞白話文學的程度。

《臺文》的編輯偏重日文之後，便有一部分的民族主義作家不滿意張星建的編輯方針，有一個進入日本文壇的日文作家某生，為爭取編輯權，趁這機會，對星建加以猛烈的攻擊，進而標榜主義問題向我和編輯委員會挑戰。我以為事屬思想問題，而《臺文》係以無黨無派無色彩的姿態出版的，如果公開討論主義思想，恐會惹起日本當局的干預，無異於引火自焚，我苦口婆心要求他顧全大局，息事寧人，然而他口是心非，實際上卻大佈筆陣，表示非打到你死我活，不肯罷休。

當時臺灣的左翼陣營，雖然已被日本政府鎮壓潰滅，但青年們同情左翼理論的人還很多，某生利用左翼理論博得青年們的支持，尤其他的作品曾經被日本文壇列入佳作，更增加了他的聲勢。我一方面為顧慮文聯的團結，一方面極想培養這位前途有為的作家，一再讓步要他妥協，然而他蠻勁兒不擇手段，到處遊說，非置張星建於死地不已，至此我也不得不接受了他的挑戰。

張星建和這位作家本來都不是文聯的委員，星建因為眼見文聯瀕於崩潰狀態，不忍坐視，毅然挺身扶助，使文聯危而復安，運用他當中央書局經理的地位，幫忙《臺文》出版銷售，算是使文聯起死回生的恩人。

過去，臺灣有不少雜誌社的組織，大都維持不到半年，剛聽見出版，接著就聽見停刊；星建奠定了《臺文》的基礎，而某作家不顧大局，為固執己見，不恤文聯分裂，儼然替日本當局效忠，打擊文聯，這一過錯實在難能輕恕。

星建是個好好先生，有人稱他為「萬善堂」，設個譬喻說：

「星建兄你的頭給我好不好？」

他未聽清楚便答應？

「好的好的！」

如果你再鄭重地說：

「是頭啊，要你的頭啊，可以麼？」

他才慌忙搖頭答道：

「這個不行。」

他是這樣無所不好的人物，整天整年忙，所忙的多是為人作嫁，犧牲自己，犧牲家庭，義無反顧；全島的文學家，幾乎沒有不受他的照料，所以大家一致稱他是臺灣文化界最佳的「世話役」，意思是說最好的助理人。

星建和我受了某作家一派的排擊，文聯陷於分裂的狀態。這麼蕞爾的臺灣，尤其言論不自由的時代，哪能經得起分裂內鬨？所以激起了一部分作家奮起而擁護文聯，這裏頭最熱烈的有吳天賞、劉捷、張文環、巫永福，這四個人被稱為文聯的四大天王。吳天賞是很優秀的評論家，劉捷的文學評論早已名噪一時，張文環的小說作品曾刊上中央文壇的一流雜誌，巫永福不僅文學評論好，小說也寫得不錯，這四大天王全是日文作家，足以壓制日文反對派的蠢動，所以文聯又安定起來。

這時，舉世聞名的朝鮮舞蹈家崔小姐，為支持文聯，到臺灣來公演，可以說使文聯蓬蓽生輝，聲價十倍，至此反對派不得不暫緘守默，但前一次的內鬨，已成為文聯的致命之癌了。

崔小姐的公演，雖然遭受日方輿論界的惡意「默殺」和日本國粹派的阻撓，但她固有的藝術價值並不因此而被貶值，到處公演，除臺北外，都很成功，受了熱烈的歡迎。

崔小姐的舞蹈，是學於日本最著名的舞蹈家石井漠，而青出於藍，她一枝獨秀，日人也甘拜下風，推她踏上國際舞壇，飲譽環球；她正如臺灣的音樂作曲家江文也，代表日本的樂壇享受國際名譽，結成日本藝術界的兩大奇葩。

藝術本來沒有國界，而是純潔無比的結晶，只有卑鄙的排他主義者，才揚棄而歧視藝術。當時臺灣還少有舞蹈研究所，就是號稱文化城的臺中，也只有日高研究所（蕾會）一處，學生不少。至於芭蕾舞，多數人根本沒有看過，所以須藉報紙雜誌的宣傳介紹，才能引起觀眾的興趣。詎料這時的臺灣報紙，一致採取默殺主義，就是臺灣人所經營的《新民報》也不肯捧

場，致使文聯立場異常困難。

《臺文》和《新民報》同是臺灣人經營的言論機關，需要站在同一戰線，做臺灣民眾的喉舌，但當時《新民報》的一些老幹部嫉視少壯派的發展，不肯以老大哥的風度提拔後進，甚且有的竟說：

「《新民報》不是文聯的宣傳機關。」

為了《文聯》和《新民報》的摩擦，我們和新民報社接洽過幾次，我低首下心地要求他們愛護，請勿使親痛仇快，但結果仍屬徒勞。

崔小姐在臺中戲院公演散場後，我到現在的民眾旅社特別室去訪問她，她問起我的手為何受傷。我說明因為客滿，遠道來的觀眾在戲院口大吵大鬧，我們不得不加發了一兩百張的額外票，成千觀眾爭先搶購，把我的手也抓破了。她笑瞇瞇地稱道臺中不愧為文化城，但疑惑臺北為什麼賣座不好？我告訴她是受環境影響的關係，她感歎地說：

「我們殖民地的人民為適應被支配的生活，不得不把固有的性格也改變了。」

我沒想到她會說出這麼婉轉而激動的話，答道：

「是的，我們的環境會使我們改變性格的。」

「張先生我說個丟臉的話，這種事情臺灣大概不會有的吧，我們朝鮮人如果有個稍出風頭的，便有許多人嫉妒他，要打擊他，打到他站不起來才止。」

「不，也是一樣的。」

「是麼！這也許是殖民地人民的共通性格？」

「是的，殖民地人民多很小氣，小氣的民族，雖有國家也會淪亡的，因為這種性格是奴隸共有的賤骨性。」

「是啊，日本人則不然，他們如果有個像樣的人物，他們就共同擁護他，唯恐他的聲望失墜，好像扶『神輿』，揹著叫喊嘩嘯嘩嘯使他顯靈，捧為偉人，也許他們有這器量，所以能立國，能成為強大的國家，我們的賤性叫我們成為人家的奴隸。」

她對自己的民族表示悲觀，我聽了她的話，覺得比她還要傷心，凄然地答道：

「你有這自覺是很了不起的，但我以為朝鮮一定能夠比臺灣早點復國，我相信朝鮮比臺灣更有希望。」

「怎麼說呢？」

「我想——國家的強弱是視其國民為國家犧牲的分量而決定的，我看朝鮮人過去的犧牲比臺灣大，所以朝鮮的復興應該比臺灣快。」

她正容說：

「我們如果能夠解放，豈不是同一個時期麼？唯有日本倒，才能解放……。」

「按照事實說，你的話是對的，不過我們臺灣人太自私自利，所以無法獨立的。」

我又說了許多近於神秘的話，她掩嘴笑說：

「張先生你說得太客氣了，我們唯有奮鬥到底，總有一天能夠獲得解放的，你說不是麼？」

我嘆了一口氣，告辭而退。由這一席話，我才認識了她絕非只是單純的藝人，而是一個熱烈的愛國志士，她給予我很深的印象。

文聯自主辦了崔小姐的舞蹈會之後，日本政府對我們更加壓迫，某作家故態復萌，策動離間，雙管齊下，使文聯漸趨下坡，東亞共榮協會受不起日方官民的雙重壓迫，呈現了解體的狀態，連協會的靈魂《東亞新報》也被州當局劫收了。州當局以強化報社，擴大協會組織為名，取半強制的壓力奪取了我們的出版權，奪取後就無聲無臭地任其停刊，致使協會失去了存續的意義。

註五六：陳炘（一八九三年～一九四七年），字若泉，台中大甲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進東京慶應義塾大學理財科；一九二三年赴美深造，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商學系，是台灣金融界專才，不幸死難於二二八事件中。

註五七：相談役：擔任協談工作者。

註五八：賴明弘（一九〇九年～一九七一年），原名賴銘煌，台中豐原人。東京日本大學創作科肄業，曾在台灣新民報、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撰寫文學評論及隨筆、小說。戰後任台中縣政府秘書。

78 虎狼關

日本自民國二十一年發生了所謂五、一五事件(即五月十五日)，陸海軍的少壯軍人謀殺了當時的首相犬養毅，政局為之一變，右派勢力壓倒了日本的政黨政治。

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軍閥又發動了所謂二、二六事件，唆使軍隊叛亂，大殺群臣，佔領了東京的一角落，由此日本軍閥便名副其實地控制了政權，一直趨入備戰的體勢，什麼公理、正義、人道、和平都談不上了。

他們曾於民國二十一年在上海製造一二八事件，藉機創立了偽滿洲國，二十五年鏖殺資本主義派的大臣政要，十月便在我平津兩地採取以演習為幌子的軍事行動，露出其帝國主義侵略的猙獰面目，然後把箭頭指向我中原，強迫我方締結城下之盟，承認偽滿政權。

軍人干政，國家非亡必敗，我和陳炘都有同樣的感想。我們明知所謂大亞細亞主義是假戲，但偏要把這假戲真做，利用局勢和宮原的矛盾，做些我們想做的事。然而時局已不容允我們有所作為，所以我們便停止東亞共榮協會的活動，雌伏下去，日本當局當然希望我們繼續為協會效勞，可是我們認定這個團體已無利用價值，就棄之而不顧了。同時我對文聯也採

取消極的態度，停止和反對派鬥爭，漸次準備停刊結束，靜候下一次的冷戰。

局勢迫使日本趨入非戰不可的地步了，他們為侵略東北，而退出國際聯盟，甘冒與世界為敵，成為東南亞的獨角獸；但他們恐怕受不了列強的經濟壓迫，站不住腳，所以東條英機大聲疾呼，警告日本國民「日本會因『日日貧』而亡國。」

日本國民被軍閥的宣傳迷惑，上下嘩然，攻擊政府懦弱無能，右派乘機主張非徹底改造不可，少壯軍人憂時憤世，拔劍而起，擁護軍閥奪取政權。我們單看一代文妖小川周明博士的神國論，便能預卜日本必將跑入神話政治的命運。

當時日本的戰爭理論，大抵可分為三大派別，一對美，二對蘇，三對華：對美是認定美國為資本主義國際警察，動輒干涉日本的外交政策，非把它伸在東南亞的手令其縮回去，不能自由控制太平洋，故只要在太平洋擊破美國海軍，進佔菲律賓和關島及其他二、三島嶼，便能驅逐美國的勢力。

對蘇主戰論謂：蘇聯連接中國大陸，直接威脅東北，牽制日軍在中國的行動，乃係日本有事於東南亞時的心膂之患，尤其欲防止赤化，須先打倒蘇聯，要打倒蘇聯，必須與英美提攜，敗蘇之後，始能實現東南亞的和平。

對中國的「膺懲論」說：中國依靠英美勢力，主張收回東北，不肯和日本妥協，不承認「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又謂國民政府統一了中國，愈形驕傲不遜，復興意外神速，若不及早加以膺懲，將來噬臍莫及。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藉盧溝橋事變，進占華北，大有破竹之勢，連下重要城鎮，我方敗戰消息頻傳，家父大為憤慨，我安慰他說：

「這是日本該亡的前兆，不必憂慮。」

「國軍意外的脆弱，不堪一擊，便退得那麼快，莫非誘敵深入之計。」

「國軍裝備差，哪能抵敵日寇，是真敗，絕不是誘敵之計。」

「我想必定是誘敵之計，或者抵抗的是雜牌軍，不然，蔣委員長的正規軍絕不是這麼脆弱的！」

他最崇拜蔣委員長，以為中央軍一定能戰勝日軍，平時他常對朋友們說：蔣委員長用兵如神，雖韓信猶遠不及他，中國有史以來，未曾有比他更偉大的統帥。他除蔣主席外，還崇拜吳佩孚，痛惜他不扶孫總理而扶曹錕；吳佩孚在漢陽一帶被革命軍擊敗時，他撫掌大笑說：連吳大帥一碰著蔣委員長，就如秋風落葉，其他可想而知，斷定革命一定成功。他這樣的絕對信任委員長，所以華北的敗戰使他非常悲痛。我說：

「現代戰爭是以武器為主，雖則有沖天的士氣，如果沒有武器，也抵不過一挺機關槍。」

他很不高興地詰問我：

「如照你說，那末我們非敗不可了！」

「是的，但我們終能戰勝。…………

日本佔據了東北，列強已經眼紅不能坐視，今又進兵中原，列強怎能熟視無睹，今後列

強必援助中國與日抗戰，戰到中國無法維持的時候，他們就不能袖手旁觀，列強一參戰，日本便會敗亡的。」

「如果列強不援助我們，也不參戰呢？」

「那是不會的，假使日本完全占有了中國，如虎添翼，進而可能征服世界，列強哪能置之度外？」

「列強怎肯為同情中國不恤重大犧牲，賭國運和日本打仗呢？」

「列強何愛於中國，只因為須確保他們的權益，瓜分中國的市場，不得不和日本爭鬥，也因此他們的援助才靠得住，否則單靠道義同情是沒有效果的。」

「你說列強的參戰是絕對的趨勢麼？」

「絕對這句話是不能隨便講的，不過中國還有抵抗力的期間，欲求他們的參戰是很不容易，列強希望消耗日本的國力，等到他們國力消至枯竭的時候，才肯動手。」

「那末我們得受很大的犧牲了！」

「那是免不了的！」

我乘機告訴父親希望去淪陷區北平，父親默然不答應。這幾年來他漸漸理解我、疼愛我，如今我又要遠離他，的確使他很難過。但我坐臥不安，眼見日軍在大陸的佔領區日日擴大，身為漢民族的一員，殊難忍看江山沉淪。

日軍正進攻徐州的時候，朋友何集璧為了諷刺日本先被扣押，接著莊垂勝也無端被捕，

全島各處為中日事變抱不平而被檢肅的時有所聞。我痛感兔死狐悲，家父為我的事，異常著急，在家裏片刻看不見我就要問，如果我出了門，等到吃飯的時間沒有回來，他也不吃，老等著不放心。

自家母去世以後，他雖然續絃，卻和我繼母感情不睦，妹妹又到東京去留學，自然對我寄託著全心的愛撫，在家尚且難離，況且欲往遠處，踏不測之地，老人心境自然非常不安！我一生老是流浪異鄉，萍蹤不定，老人家無時不繫心吊膽，致使他看破世情，幾次要出家而未果。近來稍微安定，剛溫暖了一些日子，我又要憑匹夫之勇，進去戒嚴地區，難怪他生起了無限淒涼的晚景之感。但我決意到淪陷區盡點義務，也就顧不著家了。

自蘆溝橋發生事變，我就開始研究如何領取護照，脫離臺灣，幸得由北平歸來的吳子瑜給我很大的幫忙，終於把護照弄到手，我就準備動身了。為了我的護照，市警察署和州高等課又發生齟齬，因為市警察署沒有和州高等課接洽，擅發護照，所以州方大抱不滿；據說，州方以我像毒菌，應封鎖在臺灣的罐頭裏勿使有活動餘地，署方則認為留我在臺灣更加危險，不如令我出境較為穩當，結果，當局以威信所在，終於決定放行，事實關於我的護照，另有許多文章，這裏不便說明。

家父看我意決，而且怕我在臺灣發生事端，不得不幫助我出國。在動身前，我往訪陳炘和宮原；陳炘和我在抗日戰線上本有特殊關係，此次遠行，彼此心情之苦，自不必說。

陳炘從外表看來，是個文雅的儒生，其實他全身是膽，全身是火，謀如湧泉，靜似處女，

動若脫兔，每為時局、為民族，不惜一切犧牲，悉力以赴，他問我：

「你看時局會擴大到什麼程度？」

「我想這是由國民政府和支持國民政府的國際情勢來決定，日本政府已失去了主動地位，不能自主了。」

「你想國民政府會屈服麼？」

「大概不會吧，因為日本志在迫國民政府承認日本在東北的特殊權益，國民政府雖則答應，國民也絕對不答應，而日本掀起這次事變的最大目的，是在欲強迫我政府承認滿洲國，其次是要確保他們在中國的權益，他們如果達不到目的，絕難放手，一放手，日本軍閥便會失去攫取政權的機會，那末五一五和二二六的犧牲都等於白費，所以這次的軍事行動，我想無法停止。」

「那末就沒法子收局了？」

「這是必然的趨勢，也可以說是不能避免的劫數，這隻貪眠不醒的睡獅，也許得受這麼大刺激才能覺醒也不一定！」

「這個東亞病夫，恐怕受不起太大的打擊，會喪命的！」

他雖然熱愛祖國，但他還沒去過大陸，所以對大陸的情形未甚了曉。我答道：

「那是不會的，中國的國力絕不是那麼脆弱的，我想中國除了城市人以外，多還過著封建生活，家鄉觀念雖強，國家觀念薄弱，如果不再受一番大流血的教訓，中國人恐怕難能認

識國家的寶貴，和異族統治的可怕。」

「異族統治的可怕，我們在清元金遼已經受夠了。」

「不，異族統治的可怕，在戰爭期間更能深切體會到，平時比較容易淡忘，甚且有的反以為異族的統治會比同族的好，這是對現實不滿的咒詛，所以我們有句話『願作太平犬，不作亂世民。』」

「這是漢奸慣用的誑言，人民豈有這種觀念！」

「這種觀念是有的，但不是正常的存在著，所以我說是對現實的咒詛。人民是以現實來做觀念基礎，單以民族主義做號召是不夠的，我們只看漢人之圍剿太平天國，或美國人民對其歐洲祖國的漠然觀念，也可以說明種族觀念的消長所繫。」

「這是變態，絕不是正常，我想還是民族自決才是正常，所以我絕對主張民族主義。」

「我也有同感，只怕日本能施行善政，收攬民心，那就糟了，太平天國的前車可鑑……。」

「是的，所以我不阻擋你到華北去，希望你阻止臺灣人協助日本，需要暴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惡毒，喚起中國民族精神，徹底和日本相周旋，否則，我很希望你在臺灣幫助我反對皇民化運動，假使讓他們皇民運動搞成功，臺灣便會變成第二沖繩，我們非獨滅亡，也會滅種的。」

「我想我們如果救不了祖國，臺灣便會真正的滅亡，我們的希望只繫在祖國的復興，祖國一亡，我們不但阻遏不了皇民化，連我們自己也會被新皇民消滅的！」

我們談了許多關於抗日問題和未來的展望；談後，我又謁訪宮原，他以嚴詞的語氣對我說：

「這次你要去戰地後方，我故意不送你禮物，只以幾句話相送：你這次去北京，最好不要做官，我要你做個生意人，嗯，是半官商的生意人，利用軍為背景做生意賺錢，你千萬不要談仁義說道德，得要做猶太人，等到發了財，要做好事再說，因為你無論做什麼大官，日本領事館的一個小警察，也有權用電話傳你到領事館去訓一頓，假使你發了大財，你隨手抓一些臭錢扔給他們，臺灣總督也會到車站去迎接你，稱你是愛國的富翁，捧捧你，只要你有錢，什麼人格、地位、名譽都買得到的。所以我勸你賺錢，如果做官賺錢，容易惹問題，做生意賺錢，人家便認為是正當的，錢錢錢！我勸你賺錢。」

我點點頭答謝他，他很得意地笑一笑說：

「我絕不騙你們青年人，這是我積數十年的經驗所得的學問，你不信，可以試試看，假如你不信我的話，有一天你會反悔，會落魄的！」

他誠懇從肺腑發出來的這些話，使我深惡痛絕，但我站起來握他的手說：

「老先生的話自當謹記在心。」

我步出他的會客室，黯然神傷，好像聽見了魔鬼對基督說：「你要全世界和萬國的榮華，我都可賜你，只要你俯伏拜我。」

我要動身那一天，家嚴送我出門，老眼淚下，說他血壓高，何時會發生何事難能逆料，

勸我此去不可輕舉冒險，希望不久就能夠見我安全回家；在北京有什麼困難，他會立即給我接濟，切勿因窮變節，丟掉了自己的人格。

我忍住淚，裝若颯爽的氣概，坐上洋車趕往車站去。妻帶四歲的煜兒緊跟在我後面，在車站我吩咐她：「爹爹年老了，這幾年來雙鬢都白了，我實在不忍離開他，妳得替我倍加孝順，如我在北京能夠安定，需要妳去的時候，定會另作通知。」

自結婚以來，幾乎未曾離開過的夫妻，這次不僅要分離，而且後會無期，她已泣不成聲了。時間一到，我們都進入月臺，朋友們不知我像個遠征的士兵，此去未必生還，他們興高采烈地歡送我，期待我成功，衣錦歸鄉，連煜兒也天真的隨著人家歡呼：「爸爸爸爸，快回來！」

只有妻知道我的心境，含淚呆望著我，一言不發。

我搭開往大連的輪船離臺，這次日本當局並不驚動我，倒使我感覺有些不安。船抵大連的時候，忽有水上警察署的工作人員來叫我到一間特別室談話，進去一看，原來是假作船客和我同住一室的日人坐在那裏。我雖然是老經驗的被跟蹤人，卻沒有注意到他是特務，他笑著迎接我說：

「在同室受你照料，多謝。」

「哪裏哪裏，看不出你是警察人員，太失禮了。」

航海四、五天，每晨互相說聲「早安」外，我和他沒有談過話，料不到他就是監視我的

旅伴兒。他說：

「等一會兒有人找你說話，請坐一下。」

我料知大連水上警察人員要來查問，等了半個多鐘頭，船客都下去了，只留我一個人，我心裏雖然生氣，卻無可如何。特務大人姍姍來遲，他唇上蓄著一撮髫髭，是一位矮個子，我不知道他是什麼職位。他問我要去北京的目的，並詢問我何時入獄，犯了什麼罪，何時出獄，出獄後做了什麼事，明知故問，問得我心裏冒火，但都照實答覆他了。他以傲慢的態度取出一張白紙要我寫「轉向聲明」，並要我下令解散臺灣演劇研究會和臺灣文藝聯盟，我氣極了，問他：

「什麼轉向聲明，轉什麼方向？」

他認為我是裝傻，露出不高興的神情說：

「你自己犯過罪，你不知道轉什麼方向？」

我發了脾氣，喝道：

「我不知道！」

他被我當頭捧喝，倒吃了一驚，稍下氣說：

「你不知道，誰知道？」

「是啊，我倒要問你，到底你們認為我是屬左或屬右？你們要我轉哪一方向？」

他呆然不知所答，想一想後說：

「好吧，你隨便寫好了。」

「笑話，左右不分，叫我怎麼寫？」

「你不寫，不准你上陸！」

「你有權阻擋麼？」

「有，怎麼沒有！」

「我領有外務大臣簽證的護照，是誰授權叫你來阻擋的？請拿出憑證讓我看看！」

他啞然無語，過了半晌，點點頭說：

「我認為你有不穩行動，便可以取消你的護照的。」

「好啊，你既然認為我有不穩行動，那末我不去了，我就此坐回頭船吧！」

「你的脾氣真大，我們商量商量好不好，你隨意寫幾個字讓我們能夠交差就行了，比方過去有對不起國家或政府，或什麼……都可以……。」

「不行，那你替我寫好了，我不會寫，你寫給我看，我給你簽字好了。」

他覺得無可如何，改變態度，要我幫他忙，說最低限度也得發出解散演劇研究會和文藝聯盟的聲明。他們打算在大連這關頭對我勒索。我偏分厘不給，我說我無權解散一個團體，我們的團體沒有獨裁制度，團體的解散，必須經過會員大會通過才行，我個人在旅行中，既無權也沒法子解散。如果當局承認日本是個法治國家，不應當強制我做不合法的勾當，准不准我上陸，隨便，我把護照擲給他說：

「好了，我們已經談了三、四個鐘頭，多談也不過這些話，反正我回去好了，還有什麼話講？」

他看我意志堅決，擲下鉛筆笑問：

「謝龍濶先生和謝廉清先生你都認識麼？」

「認識的。」

「那好極了，請你到了北京，替我給他們問好，這是我的名字。」

他拿出一張沒有銜頭的名片給我，表示要讓我過關，接著又說：

「太耽誤你的時間了，下午的火車都已經開了，你得等夜車，現在腳伕都不在，你的行李我可以叫人替你帶到你要去的地方……對不起你了，這是我的職務，請你原諒。」

果然他叫了兩個特務來替我拿皮箱，到我下了船，已是黃昏時候。二月底的大連，氣候還冷，碼頭一帶行人稀少，只有特務給我帶路，默默然向車站方面走去。

我從車站打電報給住在奉天（瀋陽）的張星賢。車到瀋陽站時，星賢已在月臺出入口等我，帶我到一家旅社休息，然後出去遊覽市街。街路上人群雜沓熙熙攘攘，看不出亡國的景象。

星賢請了幾位朋友陪我吃飯，裏頭有一位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楊基振，他和星賢同在滿鐵服務，星賢是《臺灣文藝》發行人星建的弟弟，他是代表日本出席奧林匹克的運動選手，是四百公尺跳高欄和三級跳遠的名將。為人忠厚純真，長得英俊，也是個熱愛祖國的青年。

楊基振是楊肇嘉的叔弟，和星賢是早大同學，在學校的時候，成績就很優秀，日本當局

不敢另眼看待，滿鐵對他們都相當器重。我們聚餐後談些時局問題，大家對祖國的局勢都很傷感。我勸他們造機會到北京來為祖國効勞，後來他們果然都遷居北京，各盡所能，完成了他們的任務。

自瀋陽至山海關，一路極目蕭條，天地一線，萬頃平原不見丘陵人影，除停車處外，幾乎看不到民家，儼然是死寂的大地，田園荒野之間偶然看到稀疏樹木，但經冬後枝頭無葉，枯枝好像脫離了軀體的血脈，簇立在灰色的空間。我平生厭惡灰色的天空，除要探望車站，常閉目不愛向外張望。

車過山海關的時候，天剛亮，我用手套擦擦凍冰的玻璃窗，探視外面，橫在眼前的光景，煥然一新，青翠的大地，巍峨的山嶽，深藍的渤海，這一切都和昨天的景色完全兩樣。「啊，錦繡的河山！」關內關外，一夜之間真是有雲泥之差，無怪乎滿人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的覬覦中原。

山海關，這天下第一關，自滿人入主中原以後，就變成通行無阻的歷史性關隘了。現在由日寇把守。殷汝耕承繼吳三桂，名字不同，漢奸則一，歷史常常會反覆重演的。我們在這裏接受行李檢查，中國人極受嚴格的搜檢，我以日本籍民的身分，不但身體沒受染指，連行李也沒有被打開，檢查員只指問：「這是你的麼？」我答：「是的。」就通過了。沿途好像未受過兵災戰火一樣，但我已聞到了血腥的氣味。

行程越近北京，我的神經越緊張，因為我選擇這裏做戰場，一似要入虎穴。我們的車快

要駛入北京站的一瞬前，我看見城垣邊的一株古梅開透了雪白的花；冰雪之操，國亡節勁，這一印象永遠難忘，就是現在運筆至此，還會引起和當時一樣的傷感。

出了車站，便看見雄峙在眼前的朝陽門，這和我初次步出東京站看見宮城的感想完全兩樣，當時的感想是自卑的，這次是自傲的。以前常在大前門牌香煙盒上看見這座城樓，並沒有感覺其偉大，這次身歷其境，才瞻望到它的實際雄姿，不禁欣嘆良久。朝陽門通三座門，至天安門、午門、紫禁城一帶的佈景，規模壯麗，洋洋大觀。我觸景熱血沸騰，流出激動的眼淚。十年前看了南京外城時，也曾以目睹故國城郭而感懷流涕，但那時候所見的是敗垣斷墉，如今所看的是完整的城池。我們有這麼偉大的文化，能使四夷賓服，異族同化，而現在城郭如故，人面已非，在日寇鐵蹄下，故都人物盡是些城狐社鼠了。

79 刺虎

驅車往新開路找吳子瑜，他恰巧去了東京，但他動身前已吩咐家人招待我，所以我暫時在吳宅下榻。初到北京，人地生疏，我每天去遊覽名勝古跡，和訪問同鄉。這裏的老朋友有彭華英、李金鐘、柯正和、謝廉清等人，新知有洪炎秋、張我軍、黃南鵬等人，由這些朋友我漸漸認識了其他同鄉。

北京的同鄉素質都好，多數受過高等教育，少有流氓「歹狗」，和廈門、福州、上海等地文野懸殊，叫我很欣慰，覺得是個有為的地方。我和炎秋、我軍很快成為莫逆之交。炎秋負有暗中監視偽組織下的北大、師大的使命，所以他不接受任何大學的專任教授，只兼各大專講師，每日僕僕電車上，東奔西跑，極為忙碌。我軍專任北大教授，較為安閒，所以和我接觸的時間比較多，幫了我不少忙。

有一天，我接到老P的電話，說要給我接風洗塵，因為他和我是幾十年的老友，自然不便敬謝。按時去找他，到他公館的時候，但見謝龍濶獨個兒坐在客廳看報。多麼巧，我痛惡的人，偏要在這裏碰頭！

他在東京留學的時候我就認識，自明大畢業後，回臺擔任過警官練習所的臺語兼柔道教官，後來因事流浪到我們家鄉，做了我們鄉友的食客，不久又跑到廈門去，當日本間諜，兼任閩南日報社社長和臺灣自衛團團長。我在廈門時見過他一、二次，認為是留學時代的老友，可不客氣地規勸他不要賣國求榮，自毀人格。他恬然笑說：

「我家境不好，不能像你們有錢人走公路，假使我和你們同樣的走直線路，就永遠追不上你們，所以需要跑橫路，唯有橫路才是捷徑！」

他的這種理論，絕不是下級流氓地痞所肯講出口的，由此我卑視他、厭惡他，不願意和他來往。

我未離臺前幾個月，他曾以滿洲國陸軍少將身分回過臺灣一次，頗受日本當局和各界士紳歡迎，算是衣錦歸鄉，也到過臺中揚眉吐氣，陳炘為要請他，叫我作陪，我執意不參加，陳炘說：

「你好惡過於分明，做不了大事，我們應該能屈能伸，知進退，不讓敵人覺察我們的意志，才能夠出奇制勝，你不能清濁兼容，而孤高自潔，嫉惡如仇，這樣容易惹是非，我希望你放寬器量，學些裝痴作聾，才能建大功成大事。」

「這個道理我也曉得，但我不想做官，也不想做英雄偉人，個性已經塑成定型，很難改變。在某些地方，我雖然不喜歡孟子，卻喜歡他的『盡心論』，同時也喜歡孔子所主張的『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的理論。清濁兼容，涇渭不分，我不屑為也學不來。」

「我不是要你和壞人同流合污，只要你多認識壞人的真面目，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你單做陪賓，聽他談吐，何害於你，並不是你請的，也不是你本意要和他接觸，於你的人格有什麼關係。」

我扭不過他的懇請，終於參加了。龍潤一見我，豪爽地哈哈大笑，和我握握手，談起他落魄時候，在我們的家鄉河邊垂釣，說來不勝今昔之感。而今他成為不可一世的風雲人物，侃侃而談，在座人士只是傾耳靜聽，莫不恭維他的宏論。一轉眼，才經過多少日子，又在北京相會，好似冤家路窄。

我進入客廳，以後進之誼，向他行了一個禮，剛要說聲「久違」，他卻只回我一瞥，默然看他的報紙。我拘謹地坐在離他稍遠的一旁沙發椅上，一直抽著煙等待主人。老P從後房走出來，向我們打招呼，看我和龍潤各取互不相識態度，好像很意外的問我們：

「哎啊，你們兩位不認識麼？來來，我給你們介紹介紹。」

我隨著站起來，本來想要說「認識的」，龍潤卻坐著不動，答道：

「嗯，不認識。」

老P笑說：

「是麼！我以為你們都認識的，來來來，這位是張深切君，這位是謝龍潤兄。」

龍潤鷹揚地站起來，走近一步，比著高傲的手勢，取出名片遞給我說：

「我謝龍潤，現在改名謝龍闊。」

我伸出雙手，恭敬地接過名片答道：

「小名張深切，我沒有帶片子來，對不起。」

老P指著我說：

「他是玉書先生的少爺，你怎麼不認識？」

龍潤說道：

「唔，玉書兄我是認識，他們後輩我少有機會見面。」

我倜促地移步坐回原位。看這個柔道三、四段的壯漢，額廣、眉翹、大眼露出兇光，頗有凌人之勢。他擺的架子咄咄逼人，要不是看在主人情面，我幾乎要拂袖而去。

不一會兒，客人都來齊了，我們上了宴席，才知道今天的主賓是謝道尹。酒過三巡，龍潤說：

「晚上在座的都是熟友，大家都得多痛飲幾杯，誰要和我較量？」

大家都稱他海量，誰也不敢撒野，他得意大笑說：

「別處我可不敢說，在這一席上我也許酒量最高！」

有人捧他說：

「是是，你是上將！」

他傲然指我軍說：

「嗯，……我軍也許可稱中將。」

我軍搖搖手答道：

「不當敢！不敢當！我只配做個中尉。」

龍潤舉著杯子注視我問道：

「你呢？」

我答道：

「我是無名小卒，酒一滴兒也喝不了。」

他撫掌大悅，喊道：

「好，來，我們打通關吧，從我這裏向右邊打過去！」

他提議豁拳，果然有本事，一關關被他順利打過去，輪到我的時候，我說不會豁，願受罰酒三杯，說著斟滿三大杯喝下去。這不由的使他有些惱了。剛才他問我酒量，我說一滴兒也不會喝，要我豁拳，我不豁，他露出不高興的神情瞪我一眼，和別人再打，全部打通了。他又要耍新花樣，說有酒無花俗了人，要大家都叫妓女陪酒，大家贊成，各自拿帖子寫，他也要我叫，我辭以初到北平，一個也不認識，他佛然不悅，向大家叫道：

「喂，你們不要寫了，我叫！」

便取出七、八張名片，寫他想叫的妓女，喚司機去韓家潭，百順胡同，把那些妓女都載過來。

司機去了一會兒，空車回來報告所要叫的姑娘們都不能來，因為有的出局，有的患病……

司機還未說完，龍潤大喝一聲「好了！」把司機手裏的名片搶過來裂為碎片擲於地上，說他還有幾處非去不可的應酬，嚷著氣憤憤地跑出去。大家啞然莫知如何勸說，慌忙跟在他後面送他出門。只我一個人留著啃瓜子，頗覺輕鬆。

80 流寓

記得是牡丹盛開的時候，有個傍晚，我和儲小石教授在中央公園的來今雨軒碰見藝專的校長王石之，談話中，他希望我承擔一門功課並兼任訓育主任，我對講課雖然無甚興趣，對訓育一職卻不無心癢欲試之感，再經過了儲教授的一番慫恿，我終於答應了。

藝專西京畿道的校舍，當時已被日軍佔駐，且又被毀壞了一部份，所以只得在西城另覓一處，籌備復校。校址和東城新開路我住的地方距離很遠，坐黃包車得費一個多鐘頭，我為趕上時間，常雇汽車上班，雖謂作闊，卻未免過於浪費，於是決定叫妻來京幫忙。

六月初旬，妻帶著兒女和七、八件大行李上京。我問她父親近況，她說父親自我離臺以後，多愁寡歡，但很高興我得到了適當的職業，終於答應她申請護照。

她要動身的時候，父親把保存已久的金環首飾拿出來交給她，囑咐她不要讓我知道。這時，日本政府已禁止黃金自由買賣和帶出國外。她本來不敢接受，父親卻慷慨的表示：雖則會被警察查著沒收也算了，強要她攜帶，備防不測之需。

父親探知有個姓李的也要上北京，就拜託他關照愛月母子，她們和姓李的約好日子同時

啟程。父親見媳婦帶著兩個小孩和那麼多的行李，要跋涉萬水千山，一時心酸，他哭了。起程那天，他跟在她們後面走了好遠，才悄悄回去。聽了妻的話，我想像當時父親的情景，不禁心如刀剜。

妻說：那個姓李的不但幫不了她的忙，反而因他惹來了很大的麻煩，差點兒連金子都被沒收了。因為姓李的行李藏著一把日本刀，被警察查著，累及她的行李也被細密檢查，終於金器都被警察發現出來，因此，船抵達日本門司港，她就被水上警察署傳去訊問。她以手環首飾都是她的粧奩，有的係結婚時訂做的紀念品，未嘗離過身為理由力爭。警察表示要扣留金子，叫她返臺時才去領回。她訴說臺灣北京間的航路有大連、釜山直通路線，不一定經由門司，難能為領金器專程到門司取物。問案人認為有理，就賣弄人情，把金子都還給她了。她怕趕不上開船時間，雇小轎車馳往碼頭，一到，果然船已開始解碇離岸，不得不人先跑上船，才把行李從岸上投進去，表演了一個驚險的鏡頭。

小家眷安抵北京，我以為脫出日本的計劃，算成功一半了；但北平還是日本的勢力範圍，如何才能再脫出這圈子進入抗戰區去呢？這是我最主要要研究的問題，我的出境固然比平常人為難，帶家眷走更難。離臺這一段，雖則陰謀敗露了也沒有危險，要突破戰線投入抗戰區，這就非獨生命有問題，連家族也有被害的可能，我不忍使家族犧牲，中止了本來的計劃。

當時我未能預料到郭沫若會背叛中央政府，本以為他是個了不起的愛國英雄，拋妻離子回國抗日。我讀了他的《日本脫出記》，欽仰感激流涕，很想傚他留下妻子，單獨跑入抗戰區

去工作，然而為了自己的懦弱和無能，終於沒有實現，只在古都徬徨躑躅，過著無聊的生活。

我軍知道我的心志，很同情我，他看我每天上班吃力，替我借了西城東和商事電影公司的一棟房子讓給我住。這家公司只有招牌沒有人住，因為日人已拍完了「東亞和平之路」回國去了；留下的只有承租權和一個看家的傭人。不過和公司有關的演員們卻常到這裏來玩，當時最常來的是李香蘭、白光、李明三個女星，她們這時還未闖紅，平時無所事事，老在公司胡混。中午我因為不回家吃飯，她們便代理我享用，玩到我下班快要回來了才走。

李香蘭的菲司鏡頭不錯，身材嬌小，肌膚粗，滿身長著細毛，從體質上看是十足的日本人，卻能表演十足的中國人樣式，誰也沒有預料到她能夠成為一個明星。她平時對化粧很講究，幾乎整天拿著鏡子照臉兒，用小夾子捲曲她的長睫毛，對表情的研究非常用功，她特別疼愛我們四歲的煜兒，除了照鏡子，就是抱著他玩。

白光的性格，像一個嫻靜的小姐，除了哼哼幾句歌曲外，不隨便撒野；這時她還未受教於江文也，嗓子雖然不壞，因為沒有受過正式的發聲訓練，所以還未洗練圓潤，聽來不甚順耳。

李明在東北「滿映」已經拍過幾部片子，善於撒嬌，可惜腳有毛病，走起路來不大自然。我聽見主持滿映的負責人，就是在東京大震災殺死了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的甘粕大尉；日本軍閥為要庇護他，等他一出獄，就讓他改名換姓，潛入這個機構，並任他兼華北區的特務工作，李明是否屬於他的爪牙之一？我對她不無警戒，同時也對她無甚好感。

在東和商事公司住了幾個月，藝專在東城東總布胡同找到了一所比較寬大的校舍，遷過去，我也跟著學校擇鄰於外交部街大羊宜賓胡同的汪宅。

房東姓汪，名其砥，是個掛牌的律師，我未曾見過他承辦過一起案件。說是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曾任過袁世凱的機要秘書，能講幾句淺白的日本話。頭髮半白，大概有六十多來歲光景，身體胖胖，性甚慵懶，平素穿著一套骯髒的長褂子，項鈕不扣，腳上拖著一雙倒跟布鞋，閑時總是到附近的胡同閒蕩，從小攤買些愛吃的東西，拿在手裏邊吃邊走，逛累了就回家抽大煙。

他是個氣小性急的人物，非常吝嗇，斤斤必較，幾乎沒有親戚朋友來往；然而獨對供吸鴉片卻不吝惜，一家人除了女傭楊媽外，都抽大煙，妻子自不用說，連號房、廚子、老媽子都共享其福，他們抽煙的錢從哪裏來的？他似乎不想去稽考它。他也許因為寂寞，常要找我聊天，談些東京留學時代的回憶，或袁世凱時代的秘史，炫耀他當時何等榮華富貴，說的雖然是一遍遍的翻版，我卻都裝像新聞似的聆聽，不表示厭倦，所以他喜歡我，認為我是他唯一的知己，對我特別慷慨。

太太像是蘇州出身的風塵美人，可惜抽了大煙，現在已瘦得像朵枯萎的花。兩夫妻只有一個二十多歲還未出閣的小姐，這位小姐長得不美不醜，平時少出門，老守在閨房抽大煙，整天懶洋洋的，頭不梳，腳不洗，面色蒼白，頸脖子生瘰癧，動過幾次手術，留著幾個疤。我教她得常曬太陽，注意衛生；她還聽話，早晨起來，就去躺在廊下的坐臥椅，臉上蓋張報

紙讓太陽曬。內人也常勸她女人需要梳粧打扮，她有時候也在兩頰上塗抹臙脂，像貼著兩面日本國旗一樣難看，但她毫不介意。

聽說他們以前傭人很多，現在只留兩個老媽子和一個老聽差，兼號房、廚師、跑腿數職。這些傭人都是獃過二十年以上的，按此看來，汪老頭儼然頗有善用人的本領；不過我想：他們大概是被鴉片挽留著，而不是主人；汪老頭不忝為這「煙家」元首，親人、傭人都不得不擁戴他，唯有他在，他們才能生存，因為他有的是鴉片！

他雖然很吝嗇，卻歡迎我抽他的大煙，我一到冬天，支氣管就要發生毛病，咳嗽不止。他勸我抽大煙，必定會好，一試，果然比什麼藥還靈；妻怕我吸久成癮，終於不讓我抽。我的病，可能是因為身體衰弱，事務過勞，過不慣北方冬天的氣候，房子又不大向陽，空氣不流通，日常沒有靜養的時間，所以很難治好。

我們的校長王石之雖然是留日的彫塑家，並娶了日本太太，卻不大喜歡和日人打交道，因此學校的許多事務常讓我決定。教務主任邱石冥為人溫良恭儉而柔弱，諸事也取決於我，我於無意中成為學校的主要人物。這時學校的教授陣容相當優秀，如齊白石、溥心畬、黃賓虹、張大千、陳綿、蔣兆和、衛天霖等人都是第一流的藝術家。

張大千自華北淪陷後，計劃逃出日本佔領區，我們的學校還在西城的時候，他的計劃就漸呈表面化，時常缺課，對我說他要到上海去一趟，馬上就回來；我知道他這一去絕不會再回來，但我贊成他走，因為我知道他是一位愛國畫家，希望他去做些政治活動，較為適當，

至於他的藝術我是看不懂的。我認為還是以其「南千」的大名拿去讓外國人欣賞好，所以他後來在法國開展覽會蜚聲國際的時候，我也替他高興。

藝專本來是一個很糟的學校，學生以浪漫不守校規著稱。我以為淪陷區的教育也是重要的，我們不應該自卑餒志，不應該在敵人的鐵蹄下垂頭喪氣，反而需要培養活潑的民族精神，準備未來的戰鬥。

初時有許多教授和學生反對我，教授們以為我這位訓育主任不是要訓育學生，而是要訓導教授，學生們疑我獨裁專制，事事對我鬧彆扭，無端怠課，在教室胡鬧；如陳綿常和學生買東西在上課時間吃，學生郭某在黃賓虹老教授的上課當中拉胡琴，老師和學生戀愛，學生和學生時而打架，時而爭風吃醋，鬧得一塌糊塗。

王校長不管事，邱教務主任故作充耳不聞，藝專成為北京校風最壞之一。我認為這是墮落，絕不能算是反日抗日的表現，煞費心思，吃了許多苦頭，才扭轉了這混亂的局面。我始終沒有罵過學生，沒有去窺探過學生胡鬧的場面，只有一位助教被我斥責得無地容身，差點兒就吃了我的拳頭。

這位助教是當時農學院長的乾兒子，我聽見他又和陳綿及學生待在教室裏聊天不上課，我故意去視察其實際情形。本來我在學校裏走路，腳步聲特別響，為的是要使學生們知道我快到了，好讓他們恢復秩序，這次卻躡足不作聲，突如進入陳綿的教室一看，果然他們蹲在一角落，吃著花生米談笑，我隨手把門關上，默然退回辦公室。

我派人去請那位助教來問話，他來時，我不讓他坐，把他當做一個犯人審問。陳綿堪稱為愛國學人，我還怕他三分，至若這位院長的兒子，當然不能寬恕，我發了必要以上的脾氣，大聲斥責，唯恐室外聽不見，迫他道歉改過，否則要他辭職，並叫他父親來和我理論。他極力辯明出主意的是陳綿不是他，但我無論如何偏要找他麻煩，說助教要幫助教授，使學生守秩序好好上課，不管誰出的主意，助教都不能卸却責任。他心裡不服，以為我無權干涉教員，抗辯了一個多鐘頭才表示屈服。

這件事使教授們起了很大的衝動，議論紛紜莫衷一是，有的表示贊成，有的反對，有的疑我弄權控制學校，暗地裏使學生攻擊我。

有一天，兩個國畫組的學生打架，一個學生的門牙被打落了一顆，用白紙包著捧到我的辦公室來告狀，要求開除行兇的學生。我極力撫慰他，要帶他到醫院治療，代支醫藥費，答應他處罰那位學生，但歉難開除。他不服，強硬地要求非開除不可，否則他自己要退學和我鬧了二、三個鐘頭，堅持「身體膚髮受之於父母」不得毀傷之說，如果不懲兇絕不干休，連我都罵透了。我說明牙損無礙於前途，無傷於藝術，把一個學藝術的人開除了，便斷送了他的前途，使他前功盡棄，可能毀壞他的一生，所以什麼處罰都可以，只不能剝奪他的藝術生命。

這兩個學生的性格，我都知道，打人的是全校的暴力領袖，為人豪爽，好管閒事，不甚用功，身大力強，動輒出手打人，是屬於講義氣的太保。被打的學生，為人沉默寡言，成績

相當優秀，只因陰險狡猾，缺乏人緣，同學們都不喜歡他。我和這位難以理喻的學生談到天黑了，還無法結束。

有許多學生們關心這件事，下了課還留在校裏打聽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被迫需要放棄一個學生，結果，受傷的學生捧著被打落的門牙，哭喪臉走出去了。我忍痛不理，獨自逗留辦公室，黯然神傷。

受傷的學生自是日起不上課，我雖然吩咐訓育處寫幾張信勸慰他，然而他以這野蠻不講理的學校不敢領教為由，自動退學表示對我憤恨的抗議。

經過了這起事件和以後發生的二、三小糾紛之後，藝專的校風逐漸改變了，以前的壞學生都收斂了無賴的作風，師生相處漸漸和諧，不再發生任何風潮。我深切地體會壞的學生如果變好的時候，比好學生的影響力還要大，所以對壞學生需要設法善導，不得濫加處罰，處罰不能舉出好的效果。學生不良，罪在教師，教師苟不負責，教師就不成為教師了。

這時，先後由日本聘請了兩位教授，一位叫鹿島，一位叫北原。鹿島前任是日本國立東京美術學校的教授，兼日本文展審查委員，是一位「臘染」專家，到我們的學校來擔任圖案科教授。北原是彫塑家，擔任彫塑科教授，我記得這兩位都是王校長和儲小石教授留學時代的老師。

當時大專以上的學校，原則上必須聘請兩個以上的日本教授協助教育，名曰協助，其實日本政府是想利用日籍教授監視學校的動態。幸而我們聘請這兩位教授都是純粹的藝術家，

不喜歡干涉校務，頗得人緣。

後來，北原殉職死於北平，鹿島被興亞院所迫出境回國，換來了二、三個帶有政治性的非專家教授，擾亂了學校的秩序，這是後話。

北京本有一個臺灣同鄉會，旅京同鄉們都不喜歡參加，因為這裏的同鄉，大抵冒稱福建人或廣東人，自食其力，以託庇日本勢力占便宜為恥辱，這在全國可謂絕無僅有的特徵，日本當局認為這是要不得的嚴重問題，想要加強同鄉會，利用同鄉會做他們的御用機構。

這一年動員領事館全體人員勸說臺灣籍民必須出席同鄉會參加重要會議，改選幹部。我被迫不得不去參加，詎料同鄉們竟推舉我為負責人，這使我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日本當局比我更感意外，恨不得把我驅逐出境，另選他們的意中人，但同鄉們不了解我的苦衷，不讓我辭退，多給我加上了一層的痲煩。

日本外務省警察局派了一個叫綿引的特務來跟蹤我，這個特務是早大畢業的知識分子，還懂得人情義理，和我只談了幾次話，就變為朋友了；因為他是個失意的人，說他初來北京的時候，外務省派在北京的警察只有九個人，事變後，人員一直增加，現在已經超過以前的十倍，但他仍然沒有高升，平不了心，尤其湊巧的是，他的太太臨娩難產，住在離我家不遠的一家醫院，我以朋友的立場常去看他們，知道她們陷於無可如何的苦境，我要妻盡量給他們幫忙，使她安全出院。綿引以此感恩戴德，說就是骨肉也沒有這麼厚情，以後不但不拿我當「被疑者」，反而以我為他的知己，給予我許多方便。

81 鬥龍

不久，我由日本著名美術評論家一氏義良的介紹，認識了堂脇中校，堂脇是華北最高指揮部的高級參謀，不但有良好的背景，也有相當的勢力，他計劃出版一種文藝雜誌要我幫忙。他和一氏都不知道我是臺灣人，以為我是個難得的「日本通」，熱心慫恿我主辦，並說他們曾物色了許多人，也有許多人活動著要承辦，大家求之不得，我竟推辭再三，愈喚起他感覺意外。我提出四個條件，詢問堂脇的意見。第一、編輯方針與內容不受任何干涉；第二、雜誌裏絕對不刊登任何宣傳標語；第三、保持純文藝雜誌的形態，不作主義思想的宣傳；第四、不加入其他新聞雜誌社所結成的團體做政治活動。他把我提出的四個條件反覆看了後，笑說：

「好的，就這樣辦吧。」

他開了一瓶法國製的白蘭地斟滿一杯請我說：

「我給你介紹一位指揮部的參謀浦野大尉，這位是我最親信的部下，一切事情你可以和他連絡，我在東京的時間比較多，假使有什麼困難，請你叫浦野大尉幫忙好了。」

過兩天，我和浦野上尉見了面，他答應配給紙張幫忙出版，於是《中國文藝》便開始懷

胎了。這時統轄華北出版界事務的主管是山家少校，他自恃文武全才，大有不可一世的霸氣，文化界的所謂文人墨客趨之若鶩，合其意者興，逆其意者亡，他比土肥原（少校時代）研究中國問題還要積極且厲害。

山家的腦筋很靈敏，不但中國話講得漂亮，而且也會抽鴉片捧戲子，可以算是個最厲害的「支那通」。當時在他手下的新聞雜誌有三六九報、民眾時報、武德報、實報、時言報、時事快報、晨報、新民報、電影報、戲劇報、中國公論月刊、中和月刊、立言畫刊、北京反共戰線、民眾畫報、改造月刊、佛學月刊、青年呼聲週刊、長城週期畫刊、紅卍字月刊、朔風月刊、婦女家庭月刊、農學月刊、僑聲月刊等。《僑聲》的社長是王克敏，這一雜誌和《中國公論》、《改造》一樣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諂日媚日最為肉麻，《中和》是以瞿兌之為主編，屬於學術研究的出版物。

我們要出版《中國文藝》，經過了幾番慎重的檢討，研究如何避免日方的介入干涉，如何利用這刊物有所作為。關於這些問題的檢討，周作人也是參與人之一，他在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發表了一篇〈文壇之分化〉，說明當時的文壇梗概說：

「在北京向來就沒有所謂文壇，事變以後更是寥落，雖然有方紀生編的《朔風》，張深切的《中國文藝》先後出版，但也只有幾個流落在這裏走不動的文人湊寫稿件，聊以消遣，有如魚相濡以沫耳。說是消極，固亦難免，卻亦不是真正十分頹唐，他們不以文

學為職業，或是想於其中求得功業，或是利權，但如或對於國家民族有什麼好處，在文學範圍內盡其國民之力，也是願意的。所以文壇雖是沒有，寫文章的人雖不多，精神意氣都是一致的。……」

日本投降後，被檢舉為「文化漢奸」的這位作家，在這篇文章中所敘述的文壇概況都是事實；可是自他任「教育督辦」，被日本作家林房雄和他的高弟沈揚（啟无）迷惑以後，便和我鬧出意見，鬧得文壇分化，陷於泥淖，才發表了這篇自白，宣言「破門」了沈啟无，對我有所表示，但這時已悔之莫及了；我會被日軍逮捕，他會被拉入漢奸圈裏，這種命運在當時已經註定了。我並不是要為周作人辯護他出於不得已而被拉入漢奸圈裏的可悲遭遇，而是要警戒後人不要為一念之差，自招千古之恨。關於周作人的失足經緯，後面還有下文。

事變一、二年之間，作人確實還能忍其寂寞，拒絕了各方面的誘惑和利用，保持其純潔的士人精神，只因為和林房雄發生接觸，經不起環境的利誘逼迫，又眼見我軍陣陣敗退，日本的所謂「大東亞戰爭」節節勝利，引致他的腦筋不知不覺鬧昏了。

我初到北平的時候，文化界已陷於極端紛亂，滿目盡是淫書、桃色新聞，和頹唐悲觀的論調；所有言論若不是諂媚日本，便是讚揚新民主義的八股文章。漢奸、流氓、地痞藉日本勢力乘機打劫，橫行無忌；下流的政客跳樑跋扈，賣身賣國，忝恬不知恥；陷害忠良，壓迫百姓，習以為常。恐怖空氣籠罩著故都，這是內地後方所不能想像的悲慘情形。

沒有看見淪陷區的人，或許要罵我們沒有出息，甘受敵人的奴役，但目睹淪陷區千千萬萬的同胞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沒有人拯救的狀態，我相信有心人誰也不忍袖手旁觀，無視面臨的事實。我們不能叫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抵抗日寇的堅甲利兵，我們自己不能拿筆桿防禦日寇的侵略，我們唯一的辦法，只有設法使人民減輕痛苦，或鼓舞人民不要灰心。我在《中國文藝》創刊號〈編輯後記〉寫了幾句話：

「吾人不怕國家的變革，只怕民心死，民心苟不死，不愁國家的命脈會至於斷絕，民族會至於滅亡……」

「偉大的民族是在其能復興國家於危急存亡之秋，此時何時！這正是吾人應當奮起努力興邦定國的時候。」

「國可破，黨可滅，人可殺，文化不可亡，我們可以一日無國家，但不可以一日無文化，因為文化是國家的命脈。」

國家興亡有其時，國雖亡猶能復興，文化一亡便難能重建，失去了民族文化，等於失去了民族精神，失去了民族精神，絕沒法子復國。腐敗的文化，會養成腐敗的民族，唯有健全的文化，才能建設健全的國家。

我看見淪陷後的北平，誨淫誨盜的畫刊盛行，由日人和漢奸野合所組生的新民主義，強姦民意，強迫民眾服膺，其禍害有甚於洪水猛獸，正苦沒有一個什麼刊物洩氣，這時給我來了一個機會，當然認為受之有愧却之可惜，但我不能隨便俯首接受。

《中國文藝》出版兩期，反應不壞，聽說天津方面有人因為搶購《中文》引起打架，可見淪陷區民對精神食糧感到何等的饑渴。老實說：《中文》並沒有什麼特別好的作品，只是內容沒有媚日，單這點，便可以吸引讀者的歡迎，可見當時的知識階級已經陷於何等寂寞的狀態。

當時的知識階級，最厭惡的是觸目傷心的標語，一個刊物上如有一句標語，便足以抵消那刊物的全部價值。日人和偽組織花了無數的人力和物力印刷了汗牛充棟的讀物，但這些讀物，恐怕連漢奸本身也少有興趣去看它的。

堂脇第五列以為利用我是成功的，我也以為利用他是有意義的，我們計劃逐漸擴大組織，成立一個思想研究團體，可以和他們做第二步的周旋。這時周作人一批人還堅持不和日本妥協，他們不做官，不做走狗，只從事教育，透過教育來鼓舞一般青年的士氣，所以他尚能博得文化界和青年們的支持。

82 失怙

農曆八月中旬，我忽接到家父病勢危篤的電報，愕然手足無措，一面準備返臺，一面用往復電報拍給臺灣的愛國志士陳新彬博士（註五九）詢問病況，回電是「絕無希望」，我立即束裝，留女兒和二、三朋友看家，請張我軍代編《中國文藝》，便帶著妻兒離京，同時打了一通電報給臺中警察署，要求停柩數日，等我回家再出殯。

這時日本當局以非常時為由，指令人死後，停柩不得超過三十小時；我不忍連父親的棺木也看不到，所以拍電要求特准。

回到家，父親已經大殮五、六天，還停柩在廳。警察署以父子遠離之故，特准不限日期。恰巧，家父的出殯正與林幼春同日，因此我未能參加這位偉大詩人的殯禮。

林幼春的死，可以說是臺灣的一大損失，我以為臺灣的詩壇唯有他始能領導，始能革弊維新。他當過臺灣《新民報》社長好幾年，很能棄舊迎新；自己是舊詩壇的泰斗，卻反對無病呻吟的擊鉢吟。晚年他計劃創作新體詩，可惜未竟其志中途殂落，迄今還沒有人承繼他的遺志。

他曾寫一篇〈愛鄉曲〉，交給我請作曲家代為作譜，歌詞是以閩南語描寫臺灣所隱藏的痛苦，原稿現已遺失，不能把全詞記錄出來，大意是說：這天惠的美麗之島，「日光合水調和」，形成一個詩意河山，「北茶南蔗夾著中間水稻」，物阜人和，大家都稱讚「吾鄉好」，「好便好，煮石炒砂未免替伊煩惱」。這位愛國詩人看臺灣的寶藏一直被日本囊括殆盡，人民只有煮石炒砂充飢，字裏行間悲憤之情溢於言表。

家嚴個性很強，不肯服人，但他尊敬林幼春，受他的影響不少。到了晚年，思想和詩體漸形改變，以前喜歡用典故駢麗，晚年作風傾向於簡易平白，努力創作新體詩，然而也和林幼春一樣，未果而輟。

他在民國十六年五十晉一自述詩云：

光陰流水去悠悠　百歲中分又一秋
笑我不農還不賈　任人呼馬與呼牛
未登五嶽懷平慶　欲隱何山伴點求
名利關頭都看破　莫嗤垂老寡交游
隨遇行藏豈是迂　買船曾泛莫愁湖
未能學易師尼父　安得工詩繼達夫

依俗漸籌衣食足　對人真愧子孫愚
三竿日上猶高臥　疏懶生成孰膽麤
十載棲遲不擇鄰　幾重牽累為移薪
今為風月行吟客　元是滄桑歷劫身
健腳踏翻三島路　素衣染遍兩京塵
此生差免天公妒　看水看山號散人（下略）

這首詩可謂敘述了他垂老之時的心境，這時我沒聽他的話，參加革命工作，在縲紲之中，使他悲觀失望，自號「笏山——散人」，含有避世隱居的意思，不似六年前，還有悲歌慷慨的氣魄。他到日本去觀光，從報紙上看見祖國動亂不停的消息，作〈游海外偶感時局〉云：

偶從海外憶中州　險惡新潮每逆流
略土有人常割據　鬩牆無處不戈矛
爭雄豈獨如劉項　植黨何堪似李牛
戰死沙場三十萬　如山白骨幾家收

對軍閥植黨紛爭，極為痛恨，他從日本遄赴祖國，先往北京看故宮，感懷作詩，錄其兩首如下：

寂寞宮門十載餘　無名草長繞階除
游人欲問文淵閣　今日深藏四庫書

太和殿上動飛埃　紫禁門前長綠苔
胡月不知塵世變　夜深猶照景山來

民國十年，他四十五歲，對祖國的民主革命抱很大的希望，想不到軍閥作祟，三年小反，五年大亂，一直亂到無法統一，雙十節他往探總統府，吟道：

扶笻南海曉開門　親友招游倒玉罇
此日同慶雙十節　也留鴻爪雪泥痕

他喜歡故都的風光，依戀不捨，不覺耽擱了好些日子，時近中秋，起了鄉愁說：

燕京為客暮登樓　回首家山發旅愁
神武門東明月上　天文地北暝煙收
遠游始覺乾坤大　過隙還驚歲序遒
遙憶沙邊舊鷗鷺　漫天風露近中秋

他在京旅邸夜半，忽然聽見有人說閩南話，彷彿回到了故鄉：

孤燈獨對遠遊身　踏遍燕雲已二旬
夜半忽聞作鄉語　始知客是故閩人

離京前，他到北京大學去訪問平素敬仰的胡適之先生，出示他的詩稿，他有詩讚頌胡適，這裏不錄。

接著離京南下，經過曲阜，很想去瞻拜孔廟，卻因旅程另有預定，未能如意，經過南京往蘇州遊覽虎坵，眺望姑蘇有詠史詩云：

姑胥弔古日斜時　野水空波注劍池
存越夫差終自誤　沼吳勾踐太相欺

試行三策誅文種　安用千金鑄子皮
若果西施敗人國　論功端合繡蛾眉

遊罷蘇州轉赴西湖，寫了不少詩，這裏只撰錄二、三首如下：

秋瑾女士墓

拔釵回憶當軍資　裂帛高搴革命旗
身願犧牲興漢室　論功巾幗勝鬚眉
天生女俠獨憂時　為國捐軀此勒碑
今日共和除弊政　九京含笑可前知

謁岳王祠

崔嵬祠宇趙堤東　南宋偏安獨賴公
三字獄興莫須有　千秋垂淚説愚忠

二十七年，我和妻往北平，他頓感寂寞，每日只與詩友做詩寫字下棋消遣，曾寫了一張信給我，用輕鬆的語氣說我書法不好，宜加注意，寫三、四張各種字體，叫我選擇法帖練習，並附一首詩題〈淡如齋遺興偶成〉云：

自把蕭齋署淡如　十年閉戶養迂疏
論交世少同膠漆　趨利人多互毀譽
毛穎試臨新獲帖　牙籤重檢舊藏書
殘篇無故生科斗　老眼猶能辨魯魚

這首詩似乎有意通知我，把他住宅稱「淡如齋」，叫我交友需要謹慎，並說明他的近況，言外之意還激勵我仍須繼續用功。

我奔喪回家的時候，看見他留下兩首未完成的詩稿，使我非常傷感。聽說家嚴於農曆八月十三夜子時發病，起症時正在推敲這首〈秋興〉，忽然感覺頭暈，想入寢室拿毛巾濕涼，就昏蹶於洗臉盆架子下了。急請陳博士新彬看病，診察是腦溢血，症狀極嚴重。他平素很少在十二點鐘前睡覺，常得過夜二時才掩卷擱筆。是夜他受了我繼母一點氣，無聊之餘，拿出新作詩稿推敲，這二首絕筆詩是：

(一)

簷馬錚鏦落葉初　柳川水碧繞精廬
養生早已憎乾肉　適口今仍愛野蔬
萬里燕京兒作客　一朝海嶠雁傳書
少游不作封侯夢　處世惟求下澤車

(二)

良夜無雲轉玉壺　西風涼動拂庭梧
閉門補誦三都賦　排悶重歌一斛珠
麗句儂曾愛元稹　絶才誰不羨敦儒
叢書滿榻閒常讀　差免人間笑武夫

他對第二首似乎未甚滿意，用鉛筆在稿上改了幾次，尤其對第四句和第八句煞費了不少心思的樣子。

他和幼春相繼辭世，臺灣詩壇為追悼他，詩友們紛作誄詩弔唁，且錄數首誌為紀念。

哭張玉書先生

王竹修

文彩風流擬旭仙　騷壇隨處結詩緣
游蹤遠歷三千里　幻夢初醒六四年
入世羞同牛馬走　振家賴有子孫賢
遺篇累牘皆心血　留與後人作秘傳

王了庵

壽星忽報黯漳臺　知是吟壇失巨魁
秋興更成餘興盡　生辰翻逐忌辰來
西南三社題詩哭　東北二京遺族回
從此風騷傷寂莫　淡如齋過不勝哀

陳雪滄

入夜秋聲臥病時　仙家良藥竟難醫
嘔心詞賦同昌谷　生性風流比牧之
地下一朝君去早　天涯萬里子歸遲
高齋從此重吟日　忍聽山陽笛裏吹

家父易簀時，舍妹在東京，我在北京，她搭飛機早我幾天到家，我坐輪船遲回，王了庵故云。

喪事以簡單嚴肅的儀式舉行，墓地不叫地理師看風水，由我兄弟姊妹主決，未及完墳，我又趕回北京了，因為當時我另兼了新民學院的教授，這個偽官養成所的規律比較嚴格，不許長期的請假。

註五九：陳新彬（一八九九年～一九四四年），台中龍井鄉人；東京帝大醫學博士，於台中市開設新彬醫院，每年六月十七日「台灣始政紀念日」，他堅持不懸日旗「慶祝」；戰時被征調南洋當軍醫，冤死他鄉。

83 韜晦

回到北京，我又繼續活動，組織了中國文化振興會，網羅了北京較有正氣的文化人，準備和日本相周旋。領事館警察署高等課長林下對我的行為多加嫌疑，主張將我驅逐出境，以絕後患。這時綿引已逐步高升，由部長再升為警部補，派到漢口去當司法主任，我失去了支持的特務，陷入危險的境地；幸而有一個由臺灣總督府特派的特務姓壇名鐵夫，到北京來監視旅京臺灣人，他不但能說一口流利的臺灣話，也會唱臺灣歌和人家相戲謔，這個特務承繼了綿引的缺，特意監視我，但因為學識較差，我不大喜歡他。有一天他來找我說：

「我昨晚上差點兒就和高等課長決鬥了。」

「為什麼？」

「為你的事情啊。」

我以為他又故意賣弄人情，笑說：

「謝謝你，我害了你了！」

他正色矜持地說：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哦，到底為了什麼事？」

他沉吟一會兒說：

「林下特高課長說你是個危險人物，不該讓你任同鄉會的會長，況且你的行為又異常詭秘，不如驅逐你出境比較好。」

「哦，是麼？」

「我替你說了許多話，並說同鄉會沒有你，誰也主持不了，唯有你才能維持現在這麼好的規模。」

「謝謝，豈敢豈敢。」

「真的！我沒有扯謊，他問我你敢保證麼？我說怎麼不敢？他說好，那末要我斬你的頭，我問他是真的斬首麼？抑或革職？他說要斬首，我說好吧，那末我們到外面去。」

鐵夫說他是在東郊民巷練兵場哈德門附近的一家小酒店碰著特高課長，談到了我的事，雙方都有點酒意，由論爭而起了衝突，約到外面決鬥，他們到了黑暗的練兵場，課長忽然拍他的肩膀說：「要得，你勇敢，我喜歡你有這膽量，我們回去再喝吧，這次我請你！」結果他們沒有打架，就回去那小酒家再喝。

我笑著拍拍他的肩膀說：

「要得，我們也來喝幾杯吧！」

我叫妻備辦小酒席，和這個特務痛飲了幾杯悶酒。

過些日子，我們召開同鄉會，我特意敦請警察署各課首長和情報處主任林○龍，華北憲兵司令黃南鵬等列席。南鵬（臺灣彰化縣人）本來拙於日語演講，簡單只說了幾句話塞責，輪到林○龍的時候，他以大臣的身分，大講其赴日觀感，說他見過近衛首相，開口「近衛君」，閉口也是「近衛君」，致使警察署長氣得滿面通紅，幾乎要罵出聲來，我故意請署長致詞，他賭氣不講了。

會畢，轉入酒席，署長和高等課長都不肯和林○龍同桌，表示瞧不起他；我竊喜有機可乘，偷偷地到別室去吃了解酒藥，回坐於署長的鄰席，慇勤招待他們，署長大悅。席散後，特高課長給我打耳語說：

「張先生你有沒有工夫？署長先生說要請你。」

我佯醉，裝做前俯後仰的動作答道：

「去啊，署長先生見請，怎敢不去，就就是沒沒沒有工夫也得去啊，哈哈哈！」

他們以為我真的醉了，特高課長扶著我去坐署長的小轎車，開往哈德門方面去，署長在車裏還漏出餘憤罵道：

「林○龍這傢伙真可惡，膽敢妄自尊大！」

「是是啊，小人得志，趾高氣揚，這這個傻瓜大概忘記了他是日本國民！就是德國的希忒拉、義大利的墨索尼里……呃，我們盟邦的元首也不敢對我們的總理大臣稱君，林○龍啥

東西，竟看不起我們的首相，視若自己的部下，稱之曰君！嚶，你說不是麼？」

署長越想越氣，嚷道：

「這個野郎奴不識抬舉！」

「不是，不是不識抬舉，他瘋了，他以為當了情報處主任，就等於是德國的情報部長里賓特羅普，部長就是大臣，大臣和總理大臣同資格，所以可稱君，因為我們老百姓都稱『近衛先生』，日本話先生就是兄，那末他當然可以稱君囉，不稱君哪能顯示他的地位！對不對？」

這火上潑油的說法，愈使他生氣，氣得默默無言。我們的車抵達北京最大的日本料理店「扇屋」門口，下了車，我們搖搖擺擺跨進去。老闆娘認得是署長和特高課長，慌忙打招呼，說現在客滿，沒有坐位，帶我們到藝妓寢室，跪著叩頭請罪，要我們在這裏暫時休息，等著給我們找一個好地方搬過去。特高課長高興得腳蹈手舞說：

「不用換了，這裏最好！」

他拿了妓女們的衣裳化妝，把枕頭揹著當孩子，說他要唱國定忠治的「赤城子守唄」——搖籃歌。我們拍手唱和，等到他唱不來的時候，我衝去抱住他，用柔道把他撥倒，加以「絞首」問他：

「怎麼樣，投降麼？」

這個開玩笑的奇襲，使他連連把手拍塌塌米，表示投降，我拉起他抱著哈哈大笑，署長鼓掌稱快。不一刻，妓女端酒菜來了，我乘機假作解手，又暗地裏服下解酒藥，回來和他們

打酒賭，連妓女們也打翻了。

署長已有醉態，不想多喝，特高課長自以為酒豪，想要賽倒我，一杯杯緊緊地催請不停，我都接受了，大有斗酒不辭的氣概。其實他醉，我沒有醉，他喝我沒一定喝，他不知道我的詭計，以為迫我近於醉倒邊緣，我偏不倒，他嘆道：

「我以為你是文弱的書生，卻是英雄豪傑，你不是支那人，而是日本人，不，你是日本人以上啊！」

我舉杯命他乾一杯，說我要講話，他馴服似地答道：「是！我乾，你講！」他打了一個酒呃，點點頭裝著傾耳恭聽，我說：

「什麼叫做日本人？如果沒有日本精神，雖然日本人也不算日本人，如果有日本精神，雖然支那人也應算日本人！是不是？」

他伸手去搖醒署長，拍手大笑說：

「對，很對！名言！」

署長已不勝酒，打瞌睡，強打開眼睛，糊塗唱和：

「對的，很對！」

我信口講了一套日本精神，他們都聽得目瞪舌呆，特高課長鼓掌大喜，喊道：

「張先生偉大，我們今日才認識你的偉大！」

我斜倒於署長的膝股上，呼呼地說道：

「啊，醉了，我醉了，不要聽我胡說八道……」

這場我自編自導自演的把戲，演到過夜兩點多鐘才閉幕。日本當局以非常時期下令酒家不得開過十二點鐘，但我們犯禁却不受任何人的取締。

從此警察當局對我的看法完全改變，凡我之所是皆是，凡我之所非皆非。他們為對我示惠，關於臺灣人的一切事項，都一任我主決。八年之間，在北京的臺灣人沒有犯案，沒有一個人受徵用，除楊正義一個人犯了姦殺案外，幾乎沒有人吃過官司。

我不否認我的作風是虛偽奸詐，但相信這是對敵人應取的戰術。我天天像空中飛人在日本刀刃上橫走，當然無法維持長久，總有一天會失足摔下來的。

84
陰　霾

日本當局認為我還有點號召力，有些利用價值，要我做官，表示無論政府機構或地方長官，任我選擇，只要我肯，便可推薦；他們看我淡泊不肯接受，愈想拉攏利用，但亦漸被另一方面嫉視仇妒，招致了禍患。

憲兵隊有個姓陳的臺籍通譯兼特務，時常以同鄉的身分訪問我，其實他負有調查我的使命，有一天他說：憲兵當局對我和陳綿很注意，叫我和陳綿每個月需要提出一、二次生活報告，否則恐會遭受逮捕。到底是真或只是恐嚇，我也分不清，只將這消息告知了陳綿，叫他小心預防。

陳綿是中國學界一位難能可貴的人才，字伯早，福建閩侯人，畢業於法國巴黎大學，並獲有博士學位，二十七歲就任巴黎大學中國學院及藝術學院講師，這在歐美算是稀有的榮譽。回國後，歷任北京各大學的講師和教授，現任我們藝專的講師兼中法大學文學院講師，譯著有——熙德、昂朵馬格、復活、茶花女、緩期還債、牛大王、祖國等。為人逸蕩不羈，長得一表人才，我說他比胡適或梅蘭芳還要漂亮，講話非常動聽。他喜歡穿油膩膩的長褂子到煙

館去抽大煙，講掌故，有時候被他的法國太太發覺了常要發生勃谿，我因為欽佩他的才華，所以和他有親密的來往。

陳特務的話，我雖然不理他，卻也不無繫心，總有一點不安。後來他給我介紹了一個監視我的憲兵特務叫西村捨三，他的職位只是曹長，但受過高等教育，性格溫厚，平時穿著藍布大褂，乍見起來，體態有點近似女性，我很少見過像這樣的日本軍人。陳特務把他的職務交代西村，說他另有任務，一去就不來了。

我一生雖被特務尾隨慣了，但我很不喜歡臺灣人的特務，因為他們比日本人更難應付，更加厲害。陳特務雖然沒有給我多大的打擊，不過我很討厭他。他後來升為北京市中國警察局的特務股長，做了一番賣國的官員，日本投降後報上以特號大字登載他被槍殺了，但這消息似乎還未能證實。

西村人緣還好，我也不輕視他，自然結為朋友。他說他年輕時候，遭遇不佳，因為他和姊姊是孿生的；日人的習俗，厭忌孿生一男一女，先出的為小，後生的為大，大的認為是人，小的認為是鬼，鬼不可養，所以他被父親抱出去棄掉三次，都被警察救回來，因此父母都不疼他，把他的名字叫做「捨三」。他為了環境所迫，曾幾次想要自殺，終於沒有成功，高中畢業後，不能讀大學，才去考憲兵學校。我同情他的境遇，待他不錯，他為感謝我的溫情，幫了我不少忙。

有一個從上海來的話劇團，由唐槐秋領導，在北平公演時，主要幹部和陳綿都被日憲檢

舉了。我為救陳綿，託西村調查他們被扣押的原因，和羈押地址，並替他們寫了幾份陳情書，得了西村的協助，把他們都救出來。

劇團方面當然不知道誰營救了他們，陳綿雖然知道，卻未曾對我有何表示，我的朋友們嘆道：「真是人情薄如紙！」責備他們忘恩負義，我說：「施恩勿望報」是古訓，況且我救陳綿是義務，是為中國愛惜人才，並不是只為他個人，至於劇團的人，我根本不認識，為救陳綿和唐槐秋，愛屋及烏，絕無恩惠之可言。後來有人對陳綿說明他們何以獲釋的原因，叫他對我道謝，他笑道：「張某哪裏需要人家道謝！」朋友不服，拿他的話來告訴我，我答道：「這就是他對我最大的道謝！」

民國二十九年，我的命運開始惡化了。藝專的日本彫塑教授北原突然死去，換來了二、三位不合資格的教員，藝專便趨入多事之秋了。北原的後任是一個沒有學歷的彫刻家，他和前田、伊東兩教授一樣，都是由興亞院推薦安插的特務。前田是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的青年美術家，伊東曾任臺灣新竹女學校的圖畫教員，他只會說畫，未嘗畫過畫。彫塑先生剃光頭，臉黑貌寢，顎下留有羊鬚，不會講課，卻有些作品。前田看來聰明瀟洒，做圖案還有點把握。伊東身材高個，整年穿著中國衣服，若以中國人自居。我雖然對他的印象不好，卻也未至於厭惡程度，想不到他竟是個可怕的劊子手。

85 低氣壓

北京自設置了興亞院以後，對華北的政治、經濟、教育方面都加以積極的控制，興亞院和軍部的意見時常發生齟齬，大體都藉特務機關居中斡旋協調。興亞院命各大專的日本教授，每校須推舉一個代表和他們連絡。我們的學校當然希望鹿島老教授為代表，極力慫恿他擔任。但他堅持學校是研究學術機構，不是政治機關，教員不是特務，不肯接受。校長和我都懇切地拜託他好幾次，他才屈就。然而他只去了興亞院一、二次就不去了。他是純粹的美術家，不喜歡政治，討厭興亞院的作風。我雖然苦勸他為學校、為學生、為王校長委屈求全，勉強和興亞院敷衍，否則別人擔任了這一職，學校的犧牲更大，但他以性格不合，遂有倦勤之意。

興亞院以藝專的特務工作最壞，表示不滿，嘖有煩言；伊東乘這機會，就和興亞院打交道，計劃驅逐鹿島，獨攬全權。不幸的是有個臺籍教授郭柏川和伊東因為輪流教授法鬧意見。柏川是西畫科最有實力的教授，他的作品曾入選東京畫展數次，自然心裏不服無名小卒的伊東，而脾氣又大，硬要和伊東拼命。我知道伊東已兼興亞院的特務，不好惹，極力勸他忍辱負重，不可造次，但他不聽話，以為他也有強力的背景，為藝術、為民族要爭個徹底，致使

我陷於泥淖的境地。

一方面我在新民學院也發生了一起事件，就是有個日籍教授，在我上課的時間，跑去報告佐藤副院長。說我在教室講解三民主義和反日理論，而且說是他自己在場親耳聽見的。這時橋川教授適在副院長室，小吃一驚，立刻跑到我的教室廊下探視，但看不見什麼；依照事實回報副院長，副院長疑信參半，命令調查學生，結果查不出證據，暫擱不提。

新民學院的院長是由華北行政委員長兼任的，當時的院長還是王克敏，副院長是日籍陸軍中將佐藤三郎。這個學校是訓練偽官的最高學府，編制分設本科、豫科、特科三科，本科又分行政和司法兩科，肄習科目，本科有東亞政治學、行政學、刑法、民法、財政學、日語及中日文化交流史。豫科有東亞倫理學、刑法、民法、國文、日語、倫理學和經濟原論等。特科和本科的課目大體相同，特科三年，本科一年，豫科二年。投考資格是豫科或大學畢業者得考本科，高中畢業的得考特科。

我是擔任本科的日語課程，這一課程有三個教授，一個叫山口喜三郎，一個是日野成美，日野就是密告我的教授。他們的教授法稱「直接教授法」，我的教授法稱「文法教授法」，我主張幼學兒童可以適用直接教授法，成人學生應該採用文法教授法，為此我的意見和他們不合。學生們不但喜歡聽我的講解，同時也歡迎我上課，所以若由我代課的時候，學生們常常拍掌歡呼，這種情形，使日籍教授覺得十分奇異，或因此遂嫌疑我和學生們有什麼政治性的勾結。

中國文藝社這邊，由於發行部數的發展，使山家系統的各雜誌社都大起反感，放出種種謠言，宣傳《中國文藝》是反日刊物，或謂是日本軍部出資的御用雜誌，故意挑撥離間，對準《中文》開砲轟擊。我對任何方面的攻擊都置之不理，獨對山家派系的攻擊卻非常擔心，因為山家派系的中傷，會置《中文》於死地。

在這危急存亡之秋，堂脇好久沒有到北京來，浦野又升為少校，被派任山西太原的特務機關長。我孤掌難鳴，敵不過山家派系的圍剿；山家機關不僅控制了全華北的新聞雜誌，他的魔掌又伸展到戲劇及廣泛的文化界去，他們認定《中國文藝》是異端，是他們的眼中釘，非打倒不可。他們造謠的目的，第一是欲使日本當局彈壓《中文》，第二是欲使讀者對《中文》起反感，我預料我的立場已陷於險惡的地步，除我屈服加入他們的陣營以外，別無挽救的方法。

藝專的鹿島教授受伊東和興亞院的雙重壓迫，站不住腳，已成定局。伊東要求我合作，排除郭柏川派；但我認為伊東過於專橫，不加理睬，他只得去威脅彫塑科的羊鬍教授和前田等人製造一派的勢力。我厭惡他的行為過於卑鄙齷齪，以為假使讓伊東得勢，我留在藝專也沒有意義，所以我不得不支援郭柏川。

伊東根本沒有什麼學問，也算不得畫家，只是因為做特工有功，得寵於興亞院，所以他才能狐假虎威，壓迫校長和高級幹部，排除優秀的教員，擾亂學校的行政，柏川性情過於天真，不懂世故，做事魯莽，貿然和伊東開始積極性的攤牌，伊東正痛恨柏川，計劃要驅逐他，

等到鹿島返日，完全掌握了控制權時，便向柏川反攻，並到興亞院去暴露我和郭柏川的身分，報告我們兩個人都冒充中國籍，不肯為國家効勞，反有通敵嫌疑，要求下令革職。興亞院准奏，即命王校長解聘我和郭柏川，至此，柏川始發覺自己的渺小和無所作為，但悔之莫及矣！

柏川的犧牲雖小，我所受的打擊卻甚大，因為伊東知道我有些勢力，所以拚命搜集資料，控告我煽動學生反日，把持學校行政，離間中日感情，為一惡劣危險的人物，著即予以處分。興亞院對新民學院和山家機關調查結果，證實伊東的控告，並非全是空穴來風，就命令新民學院立即解聘我的教職。學院當局迫不得已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處理我的問題。這時的院長已換了王揖唐，會議席上，大沼喜久男教授主張我曾被人告密有案，不無蛛絲馬跡可尋，要求學校當局決定解聘為妥，橋川和河合兩教授雖然極力為我辯護，但院長王揖唐怕得發抖，一言不發，致使佐藤副院長猶豫不決，遂問我本人的意見如何，我答道：「既然發生了問題，便是我的不德所致，不管有無事實，我決意辭職。」說後即離席回家，隨著向學院和藝專提出了辭呈。

我辭職後，伊東訪問過我幾次，試探我對他有無介懷，我絲毫不露出我知道他的陰謀，或對他有何不滿。領事館當局接獲伊東大鬧藝專的消息，遽爾開始嚴密注意，將要下手檢舉伊東，我倒大吃一驚，極力替他辯護，防止事件的擴大，因為我作賊心虛，怕萬一事情鬧至不可收拾的地步，恐將惹火自焚，所以不得不吞聲忍氣，不了了之。

這時，日本的對華政策已有相當的變化，日本軍部對華用兵的真正目的，不消說，在於

欲迫我政府承認「滿洲國」，解決關稅問題，容允日軍在華北建立緩衝地帶，防止抗日軍的北上，並要求我方取消抗日政策，最少限度勿使東北問題釀成國際問題。日本軍部以為運用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可使我方接受城下之盟，詎料我方堅持抗戰到底，而且接受新四軍的投誠，結束了兩面作戰的危機，全力與之相周旋，所以日本的對華政策，不得不加以重大的調整。

民國二十年四月下旬，日本政府所標榜的對華政策三大原則是：1.親日防共，2.協調日本在華的經濟發展，3.徹底打倒侮日抗日的軍閥政權。

五月初旬，大阪朝日新聞報導張群負有我政府的使命，出現於上海法租界策動和談，侈言我政府的和平條件是：1.承認滿洲國，2.參加防共，3.承認日本在華駐兵，4.賠償戰費，5.蔣主席下野。從這一荒謬的消息，可以想見日本的慾望如何。

由蘆溝橋事變發展到中日戰爭的這一局面，我也相信不是日本政府的預定行動，而是關東軍和日本軍部所策劃的陰謀，因為當時日本政府還未確立戰爭經濟政策，所以開戰未幾，他們的經濟便陷入混亂癱瘓狀態，就是連陸軍方面也不得不臨時加以調整和異動，從這點自可以推想其大概。

這次的事變發生剛過十三個月，日本便發生了一件奇事，使日本全國為之震驚，就是供奉楠木正成的湊川神社大「鳥居」(好像牌坊之類)的鋼筋混凝土橫樑無故突然折斷下來，日人多認為這是不祥預兆。楠木正成是日人最崇拜的偉大忠臣，這一鳥居也可以說是日本最大的建築物之一，建造異常堅固，按照常理說：是絕對折不了的。折斷當時，日人只驚疑在心頭，

不敢云何，一到日本敗戰，日人便公然說這是楠木正成早已給日本表示的警告。

中國的長期抗戰政策，牽著日本的鼻子跟我們走長期戰的態勢。本來只為恫嚇性的軍事行動，一旦改變為實質的全面戰——經濟戰、政治戰，在在使日本負荷沉重的擔子。日本設置興亞院的目的，就是要加強控制佔領區的政治經濟。我看一般社會情勢已經進入了戰爭的第二階段，正想把全付精神寄託於《中國文藝》雜誌，計劃充實內容，擴大組織的時候，新的禍患又來了。山家少佐派人來叫我到西單闢才胡同「中國公論社」談話。我準時去找他，他一見我，開門見山地迎頭問道：

「你《中國文藝》辦得不錯啊，出版多少冊？」

「每個月大概五千至六千份吧！」

「嗯，不少，你還想繼續辦麼？」

這句話問得太唐突，又太無禮，我默然不答，他毫不客氣地說：

「老實告訴你，我們決定接收你的《中國文藝》了，所以問你還辦不辦，如果你要辦，還可以當總編輯，但得到這裏來辦公；不辦的話，我們這裏自己發行，你說。」

這明明是命令，絲毫沒有商量的餘地，事出意外，我愕然半響，想作最後的掙扎，說：

「堂脇大佐現在在東京，是不是應該請示一下？」

「沒有必要，請示也一樣，我只問你辦不辦，回答只有一句話。」

堂脇這時已升上校，常駐東京參謀本部，《中文》的創辦人可以說是他，我以為得先要請

示，然後才可以答覆，但山家不答應，迫我答「是」或「否」，其中必有緣故，我感覺《中文》的命脈已斷，無可復活，答道：

「因為地點關係，我礙難到這裏辦公……」

「好了，那末從下月起，我們這裏自己編輯出版，你還有什麼意見麼？」

「沒有。」

「就算這樣決定，我們不要什麼東西，只要《中國文藝》四個字好了。」

我未嘗受過這麼大的侮辱，咬緊牙根忍著，悵然退出。回想以前《東亞新報》被臺中州當局劫收的時候，他們還表示幾分客氣，至若山家這傢伙，竟視中國人不如殖民地人民，殊堪痛恨。

斷送了《中文》這部雜誌，我比受任何打擊還要難過。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所有的工作都被剝奪清光了。我失望頹唐，閒居家裏，無所事事，房東走來看我，知道我被黜無聊，吟打油詩自慰。他拿我的詩稿看了後，帶回去做了四絕相和，我的原稿早已遺失，只記得頭一首是：

自笑無能祇掛冠　　閒居陋巷暫偷安
明知奮臂何多事　　欲把頭毛試火看

臺灣有句俗語，冒險叫做「頭毛試火」，明知赤手空拳欲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是等於螳臂當車，毫髮試火，但我偏要試。且錄汪律師二絕，可見當時人心。

同院張深切君，出示閒居，雜詠四絕，感慨漓淋，韻和之：

㈠

出遊遍見沐猴冠　闔戶持脩勉自安
得雨蛟龍雲霧駕　頓教萬目向天看

㈣

獨懷卓見出危時　弗恥三行任笑痴
燕雀焉明鴻鵠志　自來養晦愛吟詩

我本來不會做詩，連平仄也分不清，協韻更非所長，只因抑鬱感慨，一口氣作了四首，這於我算是稀有的本事。

86 逃亡

禍不單行，西村曹長獲得憲兵隊決定要找我麻煩的消息後，立刻通知我，初時我以為是恐嚇，向各方查詢結果，果然伊東透過興亞院對憲兵隊策動驅逐我出境，或扣押，以保護他自己的安全。此間，藝專的學生漸發覺我的所謂請假是假的，實在是受了伊東的壓迫已經辭了職，並無歸校的可能，對伊東開始強烈的反抗。伊東大起恐慌，不得不移樽就教於我，我趁機叫他不得策動憲兵隊找我麻煩，我願自動離京返臺，空氣自會緩和下去。他信以為真，終於答應向憲兵隊緩頰。

我本來有意留京觀望形勢，不料伊東竟下毒手，策動憲兵隊逮捕我，好在藝專內部發生問題，迫使伊東不得不龜縮，否則我就要被扣押了。尤其領事館方面沒接到興亞院和憲兵隊的消息，不知我又被列入黑名單，對我還未掛上嫌疑；護照的確保，我對警察當局早已做下了好的掩護工作，不過我的妹妹剛到北京找我，還未及欣賞古都風光，就得跟我逃難，實在怪難為情。

我藉整理財產為理由返臺，瞞過了臺灣警察當局，日子一長，他們便開始懷疑了。這一

消息隨刻傳入了我的耳中，屈指一算，不覺已經過了十個月，紙是無法長久包住火的，我又非再亡命不可了。

日本當局首先唆使毆打林獻堂的日人賣間試探我的意向。賣間想透過陳炘的介紹求見我，陳炘不答應。賣間也許從前受過我的辱罵，心有不安，躊躇不前，託特務間接和我連絡，特務說他要和我約定時間地點會談；我明知他們的詭計，故發脾氣說：「賣間是什麼東西！他早已認識我，何必裝腔作勢，得約時間地點？叫他自己來好了！」過幾天，特務又來說：

「賣間先生說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不曉得你肯不肯？」

「什麼事？」

「要為國家做一點事。……」

「嚇，那很好，叫他來吧。」

「他說先要請問你肯不肯，才要來。」

「到底什麼事？」

「他說要請你到香港去工作。」

「他要我當他部下麼？」

「不，他要做你的部下。」

「他為什麼想到我呢？」

「他說你去過廣東，廣東話、日本話、英文都會講，在香港工作很方便。」

「為什麼選擇香港？」

「他說香港是個國際都市，要調查各國的情報是個比較有利的地方。」

「賢哉，賣間！這是他發明的意見麼？」

「不，他在這非常時期想要為國家服務，和幾個人研究的結果才想出來的。」

「工作費呢？」

「由軍部給。」

「說好了麼？」

「賣間先生已經和軍部接洽過幾次了。」

我覺得好像受了賣間的侮辱，怒火欲發，但笑說：

「賣間這個傢伙真偉大，他也想當間諜啊！他大概是想到香港去賣我的頭，要不然，就是要去花天酒地玩一番痛快！」

「怎麼說呢？」

「不然，他會幹什麼？不識字，不懂外國話，連秘密也不能保守，他能幹什麼乾坤!?」

「你怎麼知道他不會保密？」

「怎麼不知道，他還沒有開始工作，便到處宣揚，滿街已經沒有人不知道他要幹什麼，如果他認真要幹，得秘密來找我，他不如此做，還要幹什麼秘密工作？像賣間這種人我不敢領教，殺頭雖然沒關係，連國家的秘密也會無遺地漏出去，請你告訴賣間，叫他不要老想吃

天鵝肉，還是去另找一個林獻堂打個痛快好，國家的大事他不懂也幹不來的！」

特務啞口無言，匆匆告辭走了。我感覺軍警已注意到我身上來了，住久必危，尤其有個姓簡的臺灣特務向我暗示警察當局命他調查我的歸臺內幕；接到這消息，我就決意再從事逃亡了。

從北平回臺時，我預先由領事館領得沒有限期的「渡航證明」，趁警察署還未向北京領事館照會我的事情以前，非走不可。但此去沒有職業，怎能維持生活呢？當局所定的攜帶金額只限一千元以內，況且這回的境遇又和從前不同，北平的朋友誰敢幫忙，毫無自信。正在苦悶之時，妻拿出了她在北京的銀行存摺交給我說：

「這是我兩年間背著你節省的錢，準備預防萬一的。」

我翻開一看，已存有三千餘元，這叫我太高興了。得了這筆款，我即刻買了船票，揚言回北京復職，像落網之魚，再渡開始流亡的生活。

87 賦閒

離開了十個月的北平，依稀沒甚變化。我們的房子委託藝專的一位事務股長代為看家。我問他藝專近況，他說：自我離校以後，校風日衰，學生不斷地攻擊伊東，伊東站不住腳，請了幾個月長假，不知去向，學校鬧得一塌糊塗，現在王校長處境異常困難云云。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像伊東、山家這種妖孽我們希望越多越好，我不但不怨恨他們，反而歡迎他們更加胡鬧，自掘更深更大的墓坑。

這位誠實的事務股長，為我割愛了十個月的家庭生活，他回去後，六、七間房子只剩我一個人，以前所佈置的家具都沒有變動，我觸景生情，不禁凄然傷感。沒有一件東西會安慰我，天涯落魄，寂寥、沮喪、孤苦悲哀一至於斯！

房東汪律師夫妻聽見我回來，立即走過來探訪，問我為什麼家眷沒有來，我隨便造個理由瞞過去，他們怕我無聊，表示願意儘量幫忙，請我三頓飯到他們家裏吃；這畨吝無比的房東竟如此誠懇慷慨，使我無限感激。

我有潔癖，看滿室塵埃，住不慣，自己洒掃，費了半天功夫，才弄乾淨；晚飯到東安市

場的廣東小菜館東亞樓獨酌，喝了半斤老黃，覺得有點酒意才回家。

過夜，因為早睡，因之也早醒，懶洋洋的躺在床上看書，彷彿聽見熟識的笑聲，猜不出是誰，接著有人敲門，打開一看，原來是汪太太帶著我們的郭媽站在門口談笑：「你看，多麼巧，你們老爺回來了！」

郭媽揩拭眼淚，行個禮說：

「老爺你回來了，這次回家，去那麼久！」

我也喜不自勝地問道：

「你怎麼知道我回來了？」

「不，她不知道你回來的，她啊，三兩天來一趟打聽打聽你們的消息，剛才又是來打聽的哪，你說這個巧不巧！」

汪太太替郭媽說：

「剛說咧哪。」

郭媽慣說這句話。我請汪太太進來坐，她看屋裏格外清潔整齊，嘆道：

「張先生真有本事，剛回來，屋裏就弄得這麼乾淨！」

我問郭媽：

「怎麼，我們回去以後，你沒有找事情做麼？」

「不，找過一、二處，都住不慣，老獃在家裏等你們，因為你們待她太好。」

又是汪太太替她說話，我笑說：

「假如我們不回來呢？」

「會餓死哦！」

汪太太說著嘻嘻地笑了一陣才出去。

郭媽已是六十來歲了，初到我家的時候，妻不大喜歡她，看她臉長、肌黃、眼皮帶有像患過沙眼的紅肉，服裝襤褸。我說那是貧窮所致，慢慢會好的。面龐看來還溫厚老實，我們家裏又少有打牌應酬，一般老媽子恐怕滯不慣；我們本來想試用她三天，這一試，竟默下了兩年，眼睛也治好了，健康也恢復了，和以前完全兩樣。郭媽跟妻學會了一手菜，我愛吃的菜她大抵都做得來了。她一回來，我把家裏的事都交給她管顧，自己就隨意到外面去亂撞。

回京以後，我不敢隨便去找朋友，朋友也很少來見我；我不怪他們，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本來如此；況且伊東在做困獸之鬥的時候，到處宣傳我的壞話，指我若罪無可恕的敵人，宣傳得滿城風雨，煞有介事，大家還有餘悸，誰喜歡冒險自找麻煩？

新民學院的同事橋川時雄教授很同情我的境遇，答應替我找事情，因為興亞院令公教機關不得任用我，所以可以求職的範圍很窄，也很困難。我利用失業的期間，每天去遊覽名勝古蹟，這也許可以算是個好機會。

以前因為事務繁忙，沒有時間也無心為觀光而遊覽，這次悠然飽嘗祖國風光，大慰平生。北京的遺蹟，雖然多是滿清留下的文物，但都是模倣我大明的建設，只有北海的白塔稍具異

象，這對整個北京來說，事實無傷大雅。

春夏登上白塔眺望，滿城一遍綠海，看不見市街人影，唯有鐘樓、鼓樓、大前門、紫禁城等聳構巍峨的大建築物，好像浮在海上的龍宮。

有幾位美術家對我說：他們雖然也去過巴黎，看過世界第一綠都，還遠不及北京，北京可以說是世界最美麗的古城，最有詩意的都邑，處處是詩。

外國人一到北京，便會改變他們對中國的觀念，他們所聽說的支那，是個亂七八糟的國家，人民卑鄙齷齪，民族無法可救；但一見了北京這純粹的中國都市，他們自會看出中國的真面目，認識中國的偉大，省悟他們自己的蠻野。難怪有許多看過北京的外國學者說：世界無論哪個都會都可燬，只有北京不可。

有個日本學者對我說：他想像不到中國有這麼偉大的文物和建設，日本最大的大阪城拿到中國來一比較，還比不上一座普通的城樓，北京城的規模之大，輪奐之美，可謂冠絕世界，而中國古代文化更不遜於歐美，為什麼中國動亂不息，人民自私自利，招人卑視？

我說：這是你們拿近代國家作比較說的；我們翻開世界歷史一看，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維持五十年以上的和平，就是日本也一樣，日本到了明治維新才形成統一，統一以後到現在，也不能說一向泰平無事，例如對內有白虎隊、彰義隊的反抗，西鄉隆盛的西南之役，臺灣的西來庵事變和霧社事件，東京的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都可以說是相當大的內亂。又對外有甲午戰爭和日俄、日德與前此的中日爭戰，都是賭注國運的大戰。中國地大人多，變化

比較複雜，但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中國人是最不屈服的人種，但一服則天下太平，成為世界最強盛的國家。這看漢唐宋明的歷史都可以證明。漢民族是絕對不屈服的民族，屢次被異民族征服，每次都把異民族擊滅或同化，就是現在如此窮、衰、弱、亂，也能夠使滿蒙民族在中原失去其存在，如果復興起來，真的思過半矣。

日寇佔領了北京以後，對市容確實經過了一番整刷，能修理的修理，需要油漆的油漆，殿閣、牌樓、天壇、馬路以及富有歷史性的建築物，在可能湊出經費的範圍，逐步進行修飾。

當時盛傳日本有意遷都北京，以北京為統治亞洲的首都，這一傳說似乎未必全屬子虛，最少限度，日本軍閥必定有人假設過這種理想才傳出來的。沒有到過北京的人，不會想像北京的壯麗雄大，所謂：

山河千里國　城闕九重門
不觀皇居壯　安知天子尊

北京的景物大體看完了，還沒有接到橋川的消息，我忍不住地去訪問他，他笑說：

「我已想到一個去處，但不知道你合意不合意，因為這個地方離市中心太遠。」

「在什麼地方？」

「在阜城門外，是一家印刷廠叫做新民印書館。」

我問他有什麼工作，他說不知道，如果我不嫌太遠，他要給我介紹兩個人，這兩個人過去在日本都是很有名氣的社會運動家，辦過自新「轉向」過來的，一個叫安藤，一個叫和田。我沒有聽完他的話，就答應了，請他替我約日會面，雖則就不了職，也值得一會的。

橋川知道我們都從事過社會運動，預料可能意氣相投，但路程太遠，怕沒法子趕上上班時間，所以還在游移不定，一聽見我有興趣要與和田、安藤認識，他就替我約定會面的時間和地點了。

我和安藤、和田會談結果，彼此印象不壞，他們便帶我去見田中常務董事，他對我表示歡迎，並說願以客卿待遇，不必按時上班，不必遵守服務規程，薪津待遇均與課長地位相等，如有著作，還可以另領「版稅」。這一來，我的職業就算決定了，立即打電報給妻，叫她隨時來京。

在日寇佔領區域裏，得了興亞院的罪，要找一個職業是很不容易的，況且我的才能有限，無法經天緯地，既擬日本為仇敵，欲在其勢力範圍內謀求生活而且要有所作為，實在等於緣木求魚，至為困難。臺灣住不得，淪陷區滯不了，叫我到哪裏去呢？這次走投無路，終於得再藉敵人矮簷下苟延殘喘，說來真好愧殺！覆巢之下無完卵，我這個破卵竟滾入了烏鴉的巢裏，是否能夠保全下去？

88 溥儀

妻到北京，以為我必定寂寞無聊，不料我們的家裏卻異常熱鬧，她看見黃樹奎一家人來和我住在一起，喜出望外，因為她知道黃樹奎在上海一二八事變的時候，幫過我的忙，對這恩情，至今還未報答，常引以為憾。

樹奎在民國二十七年雖來過北京一次，但只逗留了幾天就返新京，未能十分招待，這次久別重逢，格外欣喜。樹奎和黃子正都當過滿洲康德的侍醫，他不喜歡宮中的生活，所以帶眷南下決定卜居北京。初來時，先住在西城一家旅社，我此次回京接著消息，就請他們來住我們家裏湊湊熱鬧。我問他：

「溥儀的生活怎樣？」

「名是皇帝，事實等於囚人。」

「那末如何過日子呢？」

「現在真是悔不當初，因為無聊，他也倣日本的昭和研究生物學，常在研究室摸這個那個，不過就是這樣子而已。」

「你看滿洲國的前途如何？」

「人民都不服日本的統治，溥儀也無所作為，我看將來凶多吉少，所以我覺得不如溜之大吉。」

「你說東北會起革命反抗日本麼？」

「這我可不敢說，不過我想：沒有人民支持的政府，等於沙丘樓閣，不堪一搖就會倒塌的，住在裏頭實在太危險！」

「現在豈不是太平無事，比以前軍閥時代安定得多麼？」

「是的，表面上比以前好得多，實際上比以前壞得很，因為日本軍的壓力使人民都不敢說話了，人民肯說話肯罵政府的時候，還有辦法，人民如果沉默不言不語，這危險性就大了。」

果然不愧為名醫，他把滿洲國的命脈都診察得一清二楚了。他平時事母至孝，怕母親住不慣異鄉，盡力設法安慰她，天天為她講故事，或陪她去聽戲，有時候還學老萊子自己唱戲跳滑稽舞讓她看，只要博她一笑，說聲「傻孩子」樹奎就快樂了。

89 打游擊

時局依然沒有好轉，我方自南京退入漢口，又由漢口再遷入重慶，張群和平運動的消息，被認為日本和平攻勢的宣傳，吳佩孚的出馬發生挫折，汪精衛、陳公博等人在南京組織了偽政府，一切的一切都使淪陷區民眾大失所望，無為聊生。

況且這時英、美、法也有意混水摸魚，近衛計劃和美國羅斯福總統會談，列強雖然給我以輸血性的援助，在另一面卻對日本暗送秋波，時加威脅勒索，假使日本野心不大，勒馬懸崖，以其所得戰果分一部分給列強，那末中國的命運實有不堪設想的後果了。

幸而日本政府自事變當初，對佔領區的統治就沒有一定的方針，政府與軍部意見不合，單欲看國際情勢和國民政府的態度而定奪，舉棋不定，無法實施一貫的政策。日本軍部的意向，是擬把占領區作日本的附庸領域，即時加以開發，確立幣制，使資本能夠如意運用，建設鐵路，開發資源，發展電力，振興工業。他們認為煤與鐵為華北的兩大重工業，其他煤油、金、石棉、鹽、棉花、小麥、花生米、羊毛、玻璃、洋火、皮革等，都列入重要事業的部門。

民國二十八年，英法對德宣戰，無暇顧及東南亞，只有美國以國際警察的身分，單獨監

視日本的侵略行為，難免鞭長莫及，而且為要警備歐洲的戰局，曾在一月二日向日本提出的「不承認東亞新秩序」照會，也不得不放鬆了。

二十九年八月八日，德國空軍大舉轟炸英國倫敦，震驚了整個世界，日本深信德軍必能制壓歐洲，征服英法，嚇阻美國，生恐失去分贓機會，在是月下旬，急不容緩地和德義締結了軍事同盟。這時日本自以為可以乘機囊括東南亞，肆行無忌，率而揚棄了事變當初近衛聲明的「對北支出兵，只為維持東亞的和平，別無企圖」，「日本絕不以中國國民為敵」；悍然露出其獰猙面目，竟視佔領區為領土，開始其積極的統治。這若觀察其興亞院的設置和它的動態也足以佐證的。

日寇雖然擊退了國軍，佔領中原大半的領域，但多止於點、線，無法擴大到面去，包圍點線的面，滿佈著我方的游擊隊，日寇愈剿，我游擊隊愈多，他們愈彈壓，我方的反抗愈強烈，於是日方不得不開始檢討其所由來的原因，時常舉行各種會議，試探中國方面的意見；這正適合我中國文化振興會的發言機會。中國文化振興會是以中國文藝社為中心組織的文化團體，中國文藝社被山家機關劫收後，這是所留下來的唯一組織。

我們獲悉日本受不了美英的經濟壓迫，漸趨貧困，而且美英又對日本實施凍結令，致使日本無法購進重要的軍需物資，尤其鐵和煤油。東條以為這比戰爭還要毒辣，決意給予報復，此即是日本掀起所謂「大東亞戰爭」的一個主要原因。話且按下。

事變後一、二年之間，日本還未痛感到游擊戰有多大的力量。有一天，幫助我去北平的

吳子瑜，請我吃飯，並叫我提早到他家裏談話。我到了新開路吳公館，才知道是要我陪日本黑龍會副首魁佃信夫的宴會。

佃信夫看來已是六十多歲的老頭兒，但是個矍鑠翁，白髮童顏，尚有魄力；我正和他談話的時候，忽兒來了一個荒唐漢子，言動近於小丑，主人向我介紹他就是李盧杞，他略和佃信夫談了幾句話，看見我們的六歲孩子煜兒在另一個客廳跑來跑去，鬧著玩，他去找他喊道：

「這個小孩好玩！」

我聽見了這個第五列首魁的名字，心裡很不愉快，只和他輕握一下手就不理他了，但他的舉動，在在特別引起了我的注意；佃信夫看李盧杞和煜兒玩得像小孩子，不覺哈哈大笑，我想道：一個是見利忘義殺人不眨眼的漢奸，一個是日本黑社會暴力團的魔王，他們竟也另有一面的童心稚氣，可見人非木石，每個惡人都有他一股的人情味。

黑龍會的首領據說是頭山滿，這時因為年老退休，所以讓給佃信夫當大亨，佃並兼冀察政權殷汝耕的最高顧問。這個政權在民國二十五年以殷汝耕為首成立的，名為自治政府，其實只是傀儡，純為日貨走私和準備侵略中原創設的機關。佃率爾問我對游擊隊的看法如何，我答道那是非常厲害的，他怫然說道：

「游擊隊有什麼厲害，只像蚊子叮牛角，何關痛癢！」

我本來不想和他辯論，卻為要進一步了解日本方面的看法，故意誇張其詞說：

「不，不是那麼簡單的吧，皇軍雖強，恐怕一百個皇軍還抵不過五十個游擊隊員。」

「什麼？」

他果然變色，詰問我：

「你說的什麼意思？」

「你沒有聽過『強龍難敵地頭蛇』麼？」

「鼠輩何足道哉！」

「老鼠一多也會咬死貓的。」

「你未免太長他人之威風……。」

「不，我是為日本擔憂而說的。」

李盧杞和煜兒玩倦了，走過來我們這邊，看我和佃正辯得面紅耳赤，他覺得沒有風趣似地說道：「時間還早，我出去一會再來。」說著便走出去了。佃說：

「照你所說：我們對游擊隊就沒有辦法了！」

「得看我們能不能把握民心，民心若不能把握，我們便沒法子消滅游擊隊，因為游擊隊是老百姓組織的。」

「我聽不懂你的話，你說什麼五十個游擊員抵得過一百個日本兵，根本不像話！」

子瑜怕我得罪他，頻頻以目示意，叫我不要多說，我偏不停止，繼續說：

「那是客氣說的，也許還能夠抵敵更多的數目……」

他勃然變色喝道：

「你的話夠了，胡說霸道！」

我保持鎮靜，微微笑道：

「請你不要生氣，我是為國家擔憂才這樣說的，如果你不高興的話，就不用說了。」

他似乎抑下氣，點點頭說：

「好，你說你說！」

「我有一個體驗，以前在監獄的時候……」

他瞪我一眼，把雙手插入和服的袖袋裏側耳聽著。

「監房沒有蚊帳，蚊子很多，起初我脫下上衣打蚊子，把蚊子都撲滅了，正想要睡覺，蚊子又一陣陣飛進來，任打不能消滅，致使我整夜睡不著，我就聯想起尼港事件，皇軍被蘇聯的游擊隊困擾，終於不得不撤兵的故事……。」

「嗯，你說支那的游擊隊也會倣蘇俄的游擊戰麼？」

「當然，不過我想游擊戰是用不著模倣的，是民心不服自然會產生的東西，游擊戰絕不是蘇聯新發明的，過去無論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有，只是近來比較進步顯著而已。」

他稍持鎮靜問道：

「那末游擊隊怎樣才能消滅呢？」

「政善自然消滅，因為政善則民服，民一服，游擊隊自無兵源了，不是麼？」

這位倔強的老頭子，雖然仍表著不高興的顏色，卻不再反駁我的意見了。子瑜替我捏了

一把汗，把話頭轉到其他方面去。這時李盧杞忽然來電話，對子瑜說他現在韓家潭妓院打茶圍，為要打牌，恐怕錢不夠，要他馬上派人送兩千塊錢去。

子瑜說今天是專誠要請佃和他兩個人，有些話要談，請他即時回來。盧杞說牌已經打了，走不了，還是錢要緊，得立刻給他送去。子瑜氣得說不出話，因為他知道李盧杞正在策劃拉攏吳佩孚出馬，組織偽政府，想要和盧杞合作，所以藉佃信夫來的機會，請他們吃飯，順便要談這個問題，詎料他竟置之度外，枉費了他一片心機。

李盧杞在華南的時候，曾與謝龍濶各霸一方。謝在廈門當臺灣自衛團長，縱人打死了黨國元老許卓然，李在福州牛耳臺灣同鄉會，奉日本第五列之命，暗殺了患肺病第三期的日本教員，誣栽係中國抗日分子所為，替日軍製造事端，向我挑釁；後來事發，兩人都避居東北，繼續做日軍的鷹犬，協助偽滿的組織。

七七事變前後，他們兩人又闖入華北，謝在天津，李在北京，各據一方，為了爭權奪利，雙方也拚過一次火；到底軟派的李盧杞術策高明，稍佔上風，以此自命不凡，自況劉邦李世民，把名字改為李漢唐，以日軍為背景，著手製造偽政府；聲言已經拉攏吳佩孚出馬成功，天天都在石頭胡同韓家潭窰窟胡混，說是倣日本明治維新前，伊藤博文等人在花街柳巷謀天下之大事，規避敵方的注意，這種廢話，竟也有人信以為真。

聽說他從窰窟裏以四萬元贖出了一個第九姨太太，派她往汕頭工作，事敗，被國軍抓去槍斃，這也算「為國犧牲」，越有名堂逛窰子，狂嫖濫賭，就是負有國家高度使命。他為人佻

達慷慨，腦筋靈敏，有多少錢花多少錢，不像謝龍潤善積蓄，而成鉅富。他常說：

「吾人不利用這時花日本的錢才是傻瓜，機會一去不再來，所以要盡情花，花空了日本國庫，才算有本事！」

漢奸的辯詞也有其一套，怪不得王揖唐辯說他也是個抗日志士，自稱他的抗日是屬於消極的手法，例如日本發令要「快快的」，他就故意「慢慢的」拖，這樣子做也可以算是抗日。如果按照他們的行動看，他們只要對自己有利，什麼都幹，出賣國家民族，出賣豢養主人日本，甚至妻子。聽說盧杞還陰袒臺灣人，曾說：

「我是個沒有國家的浪人，把全世界的人都殺光了也與我無關，但我絕對不害臺灣人。」

事實我也未曾聽見過他陷害臺灣人，反而聽說他在福州的時候，為營救我們的同志林文騰、蔡惠如，也賣過了一點氣力。我認為他是殖民地臺灣自然產生的一個畸人。

謝龍潤在北京被我侮辱過二、三次，恨我入骨，有一次我的朋友到天津去訪問他時，他正叫理髮師在家理髮，和我的朋友談話中，突然問我的朋友說：「張深切這傢伙你認識麼？」朋友聽見他的口氣不好，著了一急，不敢說是熟友，只說：「認是認識的。」他說：

「喂，我請你告訴他，問他要不要住在華北，如果要的話，叫他眼睛得放開一點兒，你問他要不要看手槍？」

「怎麼了？」

「你就是這樣子問他好了，說是我講的。」

朋友返京，急來找我，叫我小心，我說：

「我沒有和他當面伴過嘴，得罪他啥兒？」

「你不要這樣，他是殺人不眨眼的流氓，吃了他的虧是不值的。」

「日本軍閥我也不怕，還怕這條小喇叭狗！」

「你錯了，軍閥可以不怕，瘋狗是要小心的。」

「我偏不怕，請你告訴他，說我說他的槍彎曲長鏽了，恐怕打不出子彈，預防打著了自己。」

話說回來，宴罷，吳子瑜為了盧杞忌席，整夜懊惱，我勸他不必為這小傢伙發愁，他說：

「你有所不知，他正要拉吳大帥出來組織政府，少英叫我探詢他們進行的狀況，他偏不來！」

我認為這是件大事，同時也是吳佩孚一生的大事，說道：

「何必和他接洽，盧杞幹的勾當，他哪肯讓我們知道？他們已經在祿米倉設立了組閣本部，連少英都不放在眼中，你們要和他合作是不可能的。」

盧杞本來不認識吳佩孚，託林少英替他拉線，接通了之後，盧杞就撇開了林少英，單獨去找老吳。他們在祿米倉設立了一個組織政府籌備處，盧杞自任處長，宣傳吳佩孚已決定出馬。少英接到消息，大為著急，急要知道他們的進行是否事實，所以請子瑜代為周旋。這件事我認為是盧杞的把戲，不足採信。

林少英是臺中人，本名子瑾，時人稱他為詩文並茂的才子。年輕時，因不服日本的統治，僑居北平，把大部分的財產都移過去，曾做過閻錫山的幕賓，又任過吳佩孚幕下的僑務處長。這次吳佩孚的出廬，諱莫如深，連少英也未得其詳，可見李盧杞有一套，吳亦有一套。

子瑜和少英本有姻誼關係，也是個老北京，他的父親吳鑾旂是臺灣中部的豪富之一，通稱吳部爺，和霧峰林家有親，自清末就有很大的勢力。子瑜為人風流倜儻，好作「第一」，他第一著支援國民黨，民初在上海和汪精衛等人頗有來往，光復後，在臺北首創國父紀念館。曾在冬瓜山建設了臺灣第一大的家墓，現在還被列為名勝之一。臺灣的牡丹是他頭一次由北京帶回來種植的。臺中的天外天（現在國際戲院）可以算是臺灣日據時代唯一獨資經營的戲院。他又從上海來臺的平劇班中買出了白蝴蝶和白玉樓兩主角做小星，打破了臺灣娶姨太太的鉅款記錄。他說人是無價寶，這活寶如果用錢可以買，無論多少錢都不算貴。

子瑜和吳子玉大帥也很熟，所以和大帥府的高級幕僚們都有交際，由於他的介紹，我和大帥的「軍師」及幾位處長都有來往。有一次子瑾和子瑜帶我去見子玉，子玉是吳佩孚的雅號，這三個人的姓名巧合，我覺得很奇趣。

進入吳大帥府的第一印象，使我永遠難忘的，是全院滿貼著符籙，大小門、客廳、寢室都有。大帥完全是一個戲臺上的老生腳色，十足文雅，不愧為秀才出身，絲毫沒有叱咤風雲的大軍閥氣派。聽說他的拳頭特別小，而嘴特別大，拳頭可以塞進嘴裏去，可惜我不敢請他試給我看。所談的話平平凡凡，我沒有留什麼印象。

要建設當時所謂的新中國，像這種人物是否擔當得起？日人並沒有考慮這一點，日人只想利用他的聲望，拿他做傀儡，絕不是要他幹什麼政治。此次李盧杞愚弄他一場，他為明哲保身，不敢公然峻拒，這麼一來，謠言隨之而起，損了他的名譽不少；我和子瑜煽動子瑾去破壞吳大帥的出馬，此中別有一段的秘辛。

言歸正傳，我們由吳子瑜宅回到家，妻笑著拿出四張冀察銀行的五元新鈔票對我說：

「下午教煜兒唱歌的那位李先生賞給煜兒的。」

這時拿二十塊錢賞初見面的小孩兒，算是有面子的。但我氣極了，告訴她這個姓李的就是李盧杞，和謝龍潤都是害群之馬，叫她扔掉這不義之錢。妻迷惘了，不知道如何處理，欲留不得，欲棄不忍，啞然失去了主意。我稍下氣說：

「給他包起來，等他們有一天做乞丐的時候，拿還給他。」

我的口氣未嘗不大，然而李盧杞、謝龍潤都在日本投降前起了奇病，未受到任何裁判而死了。我卻窮困之餘，在不知不覺之間把那所謂不義之財的二十塊錢花掉了，命運真是諷刺。

隔日，冀察偽政權主席殷汝耕給我送來了一張請帖，我覺得很奇怪，因為我根本不認識他，何以會受招待？以為這可能是佃信夫出的主意，我把這疑問拿去請教子瑜，他說他也有請帖，於是我便乘他的小轎車去殷宅。客人除了佃夫外，還有林少英和其他二、三個人。佃一見我就哈哈大笑說：

「好好，你也來了！」

「晚安。」

「年輕人很有氣魄啊，我喜歡你，我昨天對你有點不客氣……」

「豈敢豈敢，少年鹵莽，請你原諒。」

「哈哈哈！好的好的，昨天的場面，假使我年輕時候，一定會拔出日本刀把你斬掉了，好在我已經老了，哈哈哈！」

他表示很愉快，笑得同席的客人都莫名其妙，殷看佃的態度，誤認我和他有什麼特殊關係，對我很殷勤。宴會沒有什麼政治色彩，主賓是佃信夫。我對殷汝耕的印象——他長相不俗，風度有點像日本的貴族，彬彬有君子之風，能說一口漂亮的日本話，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惜那副皮囊裏面裝的是一些髒東西。我平時常聽見日人稱讚殷汝耕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想像他的臉譜可能是大花，詎料竟是個儒雅的書生！華北的所謂要人，我大體都看過，其人其相大體相稱，唯有殷汝耕是例外的。

90 大戰前

我們感覺到日本已面臨經濟危機的邊緣，我第二次返臺的時候，臺灣和日本已經實施了「統制經濟」，米、棉花及其他軍需原料有關的生活必需品，都實行配給制度，把統制品盡量輸送大陸，供應日軍和佔領區人民使用，炫耀日本還有充分的經濟餘裕。

其實，日本國民節衣節食犧牲一切，比佔領區中國人還得吃苦，統制經濟的法令多如牛毛，國民不勝其煩，聽說近衛首相有一次召見法制局長詢問新法令的概要，法制局長不能答，說：「太多了，得看法令才能奉告。」近衛赫然震怒喝道：「渾蛋，法制局長不知道，老百姓哪能知道!?」

近衛覺得時勢日非，頗有倦勤之意，但軍部以為時機未熟，偏不讓他下臺。

日方想利用政治來挽救經濟虛脫的窮困，開始訪求我方的民意。我們獲知這個消息，認為這是絕好的發言機會，大家都有個共通的意見反應給他們，宣傳侮日抗日的最大原因，是中國人都瞧不起日本，相信日本萬不及英美，只要日本先打垮英美，中國人才肯心服。

我也參加過幾次的座談會，極力主張對英美開戰，強調必先打勝仗，然後才能取得中國

的信任，日美如果開戰，中國一定願意供出人力物力，協助日本解放東南亞，完成東亞新秩序，驅逐白人勢力，共扶日本為盟主。

幾個月之間，日本各機關不厭其煩地對英美開戰問題，叩詢了中國社會各方面的意見。有一次我和幡野參謀個人對談，談到日美開戰的問題，他問我：

「中國人方面一般的看法怎樣？認為日美如果開戰，日本會贏或會輸？」

「中國人認為日本一定輸。」

「你個人的看法呢？」

「一定贏！」

「怎麼說呢？」

「我對軍事完全是外行的，不過我想——日本和美國打仗一定在海上，日本沒有打到美國本土去的必要，只要在太平洋上把美國的基地菲律賓、關島、威克島摧燬掉，就算日本贏了。」

「日本的海軍能不能戰勝美國？」

對這個問題，我實在不能回答，糊里糊塗地說：

「怎麼不贏！日本海軍比世界第一海軍國的英國還要強，怎麼打不過新興國家的美國？他們還沒經驗過大規模的海戰，日本曾經擊滅了帝俄的波羅艦隊，況且美國人最怕死，他們多是有錢人，色厲內荏，其實不堪一擊，怕他什麼？」

「戰事假若拖延了怎麼辦？」

「頂多不過是以戰果換取和平得了，不是麼？」

「這個恐怕不行。」

「我的意思是說：戰勝之後，隨時換一換內閣，把戰爭責任推諉於前任內閣，即向美國求和，把所得的戰果和利權分一部分給他們，做損失賠償，美國戰敗而有所得，何樂不為？只看日本慷不慷慨耳。」

他拍膝叫道：

「這是很好的意見！」

我口頭上雖然這樣講，其實我們假託民意欲促使日本和英美作戰，令其放鬆扼在中國咽喉的魔掌，推他們陷入大戰的泥淖為目的。我們人微言輕，但希望聚蚊成雷，擾亂日寇的視聽。

91 軟禁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竟悍然偷襲了珍珠港，對英美宣戰。我們接到這個消息，都為國家民族慶幸，認為這一仗我們已經打勝一大半了，預料日本必敗，中國不亡，臺灣也自然能夠解放，多年來寤寐求之的希望，終於實現了。我把要逃往重慶的計劃也取消了，自此可以在淪陷區坐山觀戰，靜待好音。

本來郭德欽和我計劃過幾次要潛入重慶，正在研究線路當中，就被日本當局破壞了。德欽主張從徐州走張蘭峯線路，我却認為經由張垣歸綏進入戰區後方較為安全，因為我帶有家眷，必須採取比較安全的線路。

有一天，領事館派個特務來勸我們的煜兒入日本小學校，我明白這是人質陰謀，婉辭拒絕，說我們戶口上都登記中國籍，因為怕露出日籍身分，不敢使子弟入日本學校，女兒娟珈在臺灣為了上日本學校，讀日本書，不懂中文，所以到現在還無法上中國女子中學，實在不忍再叫煜兒犧牲，而且煜兒日本話一竅不通，沒法子上日文課，我懇求他們讓煜兒上中國學校。領事館不答應，說這是強制命令，因此只得叫煜兒上了日本小學。北京的臺灣人受到這

種命令的只有我們一家。

孫煜當時八歲，因為我冒稱中國人，領有中國戶口，不受日本的配給品，不讓家眷講日本話，自然不教兒女學日文，就是我的妹妹，北京話完全不通，也自動地禁止講日本話，在這種情形下，得送兒子上學校，真是如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煜兒天天得掛一個小紙牌上學，用這紙牌做學校和家庭間的通訊工具。例如老師明天要他帶什麼東西去，在下課時，老師得先在那紙牌寫上需要的東西，讓他帶回家以便替他準備。尤其麻煩的，是他每天上學，須備兩套衣服，上學的時候，穿中國衣服出門，到了學校附近，得換上日本制服；下課回家，半路上又得換中國衣服，所以上學數年，鄰居都不知道他到底上的甚麼學校。

煜兒一到學校就成啞巴，老師的話聽不懂，自然成績好不了，只有數學一科稍能跟得上。他的同學知道他過著這種矛盾的兩棲生活，大家要欺負他，有時候還要在路上攔住他，或故意緊跟著不讓他換衣服。

他時常啼啼哭哭不肯上學，妻也很難為情，跟著他哭。兒童心理天天受這麼無可避免的折磨，連身體也支持不了，所以常害病請假。他一天不上學，老師就到我們家來訪問，有時候還帶糖果來探病，這無疑是對我們間接的監視，預防我逃出北京。

有一次，幾個日本孩子追煜兒在我們門外叫喊不休，妻一看心痛，氣得失去了理智，隨手抓了一根小竹竿去趕走那些淘氣的頑童，演出一場啼笑皆非的趣劇。

日本當局為監視我，在精神方面雖然給予我許多痛苦，在物質方面，卻表示極願意儘量幫忙。他們知道我入中國籍，不能受日本方面的配給，特務們常要拿配給品來送我，並說他們還可以替我供應所需的東西。但我什麼都不要，連我們家庭生活覺得最需要的米和「味之素」，我也沒有要過。

日美開戰前後，堂脇又來過北京一趟，並到我家探問，這時他已升為陸軍少將，兼大東亞省次官。我說明離開中國文藝社的經緯求他諒解，他搖頭嘆說：

「日本的時局現在已經弄得非常糟，連軍部也分成了幾個派系，我又不能常駐華北，管不著這裏的事，請再容忍一下，時局總會轉變的。」

關於中國文藝社和山家少佐的事，他似乎不願意多談，喟然告辭而去。堂脇這個人，到底負有什麼使命？是好人抑或壞人？我不得而知，只聽說皇弟秩父宮很喜歡他，在參謀本部裏頭也有相當的背景。他除幫助我出版《中國文藝》月刊外，一無所求，我也對他一無所要，況且軍部的秘密不得隨便詢問，所以我知道他的事情很少。他以前在北京的時候，有幾次問我要不要做官？要不要做些有利的事業？我只以搖頭笑答，他也不加勉強；這次看我落拓無聊，不勝傷感。他臨別時，忽而回頭問我是否知道浦野少佐現在轉任開封特務機關長？我說不知道，他說我有什麼困難，可以找他幫忙。

浦野是他親信的部下，只士官學校畢業，就任過參謀。日本軍人沒有經過陸軍大學而能任參謀的很少，他可以說是受了異例的優遇。後來我被一四二〇部隊逮捕的時候，他已經升

為中校兼任天津特務機關長了。

堂脇另有一個親信部下叫幡野參謀，他是陸軍大學畢業的年輕上尉，常駐在萬壽山特務機關，也可以算是我的恩人之一，因為他是頭一個接到我被捕的消息，立刻打電話通知天津浦野機關長，由浦野再連絡三谷部隊，替我緩頰，才能受到正常的裁判，不然，這個三谷特務機關握有格殺勿論的大權，我的生命一似風前殘燭，瞬息可滅的。

92 敷衍

華北最高指揮部報導部長突然派人邀請我會談，慫恿我和周作人合作，再出版一部新的文藝雜誌，他們願意儘量配給紙張。我說這件事需要和新民印書館接洽後，才能答應。報導部的這一建議，是堂脇離開了北京不久，提出來的，是否啣有堂脇的意思，軍部沒有表示，我也不便詢問他們。

自受了伊東教授的搗亂和山家少佐的打擊以後，我對出版刊物已經沒有興趣，但義務上我和新民印書館主管協商結果，館方當然沒有異議，而且表示可以儘量幫忙。我帶了公司的議案去請示曹汝霖董事長，同時和他談些問題。他平時待我不錯。有一次他看了我的兒童文庫稿件說：兒童故事應該儘量使文字通俗化，如果能像日本兒童讀物那樣淺白、輕鬆易解更好。我說中國的語彙比日本少，語言文字又比較深，一般文人還未注意到兒童文學，對兒童常用語也沒有詳細研究，所以在現階段恐怕難能寫出理想的兒童讀物。

他又說：兒童的腦筋很單純，應該得寫像安徒生那樣富有詩意的故事，不可把中國固有的童話，如姦淫、殺戮、陰謀詭計、爭權奪利的資料，隨便搬上刊物出版，荼毒兒童。這個

華北大亨對兒童讀物也有他一套的見解，的確可人。

淪陷後的華北老軍閥政客中，我最卑視的是王揖唐，這個人簡直是豬，只能奴顏婢膝脅肩諂笑，除了拍日本人的馬屁以外，幾乎一無所長。王克敏雖然也是老奸之一，卻聰明過人，另有一套權謀術策應付日本征服者，不無令人有所原諒的地方。吳佩孚號稱愛國志士，終日杜門禮佛，與清磬木魚為伍，身為武人，但是個書生本色。江朝宗的日常生活和吳佩孚差不多，但多掛了一個狗牌，很肯和日人數衍；逢人不是講清朝朝儀，便是說些他所見聞的狐仙神怪故事。齊燮元是個相當頑固的人物，他不僅以漢奸立場反對國民黨，而且是有主義思想的反對三民主義，他反對國民黨的五權制，而主張三權獨立，擁護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他為了主公吳大帥小姐的親事，被曹錕的兒子侮辱，氣得要命，連大帥爺也被這位曹少爺一氣而死，成為北京家喻戶曉的故事，曹汝霖和這些老骨董比較起來，還可以算可兒可兒。

為了出版《新文藝》雜誌的事，我不得不再去訪問周作人。和這位隨筆作家的認識，我是在他被愛國志士狙擊前，才見面的。因為他不被乃兄魯迅承認為親骨肉，所以我初時對他沒有好感。及見了他，意外文雅，一對特別小的耳朵，配合那圓滿的臉兒，不但不難看，反而呈現溫柔可愛，因此我的觀念也改了。

他對時局的看法相當清楚，似乎有一肚子的愛國熱情，時常溢於言表，只因站在人家矮簷下，不得不低頭，這種苦衷雖然值得同情，在春秋筆下是不能原諒的。他在二十八年元旦，被他的姪兒（魯迅的兒子？和一位刺客）打了一槍，擊中了毛衣大鈕釦，由於急智假死，倖免於

難。

日方為了這件事，越看重周，極盡誘惑之能事，但他要擔任偽教育督辦之前，卻異常愼重，曾經徵求過多方的意見，然後始行決定。他也問過我的看法，我認為既然要問，便是有意向，既然有意向，反對沒用，所以我答道：

「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怎麼說呢？」

「做，須吃苦；不做，也苦。」

「做，恐怕會受人批評，尤其督辦這個地位……」

「如果吾人有愛國家民族之志，有何地位不可就？就是參加敵人的第五列也沒有問題，所謂出賣國家民族，不在於地位，而在於居心立意如何而定耳。」

一般人以為在重慶做官的便是忠臣，在偽政府做官的便是漢奸；我的看法卻不同，在重慶也會做漢奸，出賣靈魂，出賣國家民族，像汪精衛跑到南京來組織偽政府者是；在敵方政府下也能做忠貞志士，為國家民族貢獻他的所能，如在淪陷區被日軍逮捕處決者是。有的是任偽職以掩護其身分，故忠奸之分不在於環境地位，而在於立志如何而定。

不久，他的教育督辦發表了，我又去見他，在他們的門口，看見那古色蒼然的大門，已經改造，又上了油漆；進了客廳，看見沙發椅也都換新了。「為配合文部大臣地位的改造！」我心裏這樣想，對他同情的觀念頓時改變了，我故意問他：

「周先生，以前的大門很好，為什麼改了？」

他似乎不好意思地答道：

「以前的太老了，開關都很不方便，所以改了。」

聽說他出任偽職的動機，是受了周圍的環境和他的日本太太所影響的。無論誰去影響他，他本質固不是勁草，風來草偃是自然的下場。

往後我很少去見他，這回為了計劃發刊《新文藝》雜誌，再度登堂去叩詢他的意見，得了他的同意，就決定開始籌備了。但這次我沒有像以前創辦《中國文藝》的時候那麼熱心，所以拖延了好些日子沒有進行。

光陰荏苒，民國三十二年，我的厄運又來了，日本林房雄自稱負有「日本文學者報國會」的使命，到北京來活動，邀我在北京飯店相會。這位曾以左翼理論聞名的作家，要求我合作，計劃出版雜誌；我本來和日人合作不感興趣，尤其他說負有文學報國會使命，更叫我懶於應付。

他看我消極，又不恭維他，轉去北京大學文學院找幾個教授做橋樑，和周作人打交道。周因為和我有約在先，勸他們和我接洽，林房雄不得不再找我商量；結果，擬定重新組織一個文藝團體，稱「藝文社」，推周作人為社長，尤炳圻、陳綿、傅惜華、傅芸子、瞿兌之、張我軍、蔣兆和及我為編輯委員。開了幾次會，因為林房雄和沈啟无作梗，愈開愈糾紛，無法成立。我斷定一切的癥結，在林房雄和沈啟无，勸周作人不要聽他們的話，並表示我絕對反

對林房雄為主編，因此我和周作人心上都有了芥蒂。

沈啟旡一派利用新聞攻擊我，我卻束手無策反擊他們，因為我一反擊他們，就等於我公開反日，所以我不得不去找周作人釋明彼此間的誤會。去了幾次都被擋駕，最後周竟以文字表示他對我不滿，拒絕和我見面，於是他和我便正式決裂了。

過去，我對他還有點期待，期待和他合作，有所作為，對陳綿、尤炳圻等人曾經剖白了我的志向；不料沈啟旡一派，眼見日軍以破竹之勢，擊敗了英美聯軍，席捲了東南亞，竟喪心病狂，出賣了我方的文化「自主權」，甘作日人的傀儡。

我和周作人的衝突，立刻掀起了嚴重的風波，新民印書館即時追究責任，迫我和周恢復感情，繼續合作，否則需要自己抉擇去處。我不敢把這回事告訴董事長曹汝霖，怕他無能為力挽留我，反而會惹出更大的麻煩，所以我隨即提出了辭表下臺。

我本來並不是文學家，只為了我個人政治活動的便宜上，隱身於文化圈工作；但智淺力薄，心勞日拙，事與志違，幹不了大事。日人當然重視周而不重視我，若不及時躲開，只有付出重大犧牲，斷送自己的前途。

興亞院獲知我和周不睦辭職，以為我故態復萌，到處擾亂，再度擴大範圍，通令各公教機關，爾後不許錄用張深切。我聽到這個消息，額手稱慶，欣喜他們不以拘留或驅逐出境議處，僅以永不錄用了事，真該感謝！

這時，恰巧有同鄉宋維屏和黃烈火計劃在北京組織公司經商，有意請我當他們公司的顧

問，此時我正失意無聊，自然一拍即合，很快的就決定了。七、八年來勞心苦戰，像在馬戲團當空中飛人，沒有一刻不在空中飄搖動盪，趁這時擲筆從商，也算三生有幸，倒覺得輕鬆愉快。

周作人到頭發覺他錯了，悔不當初，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特意寫一篇〈文壇之分化〉寄給偽都南京的一家報紙刊登，自白其被沈啟旡、林房雄愚弄經緯，宣佈和沈揚（啟旡）斷絕關係，加以「破門」，不再認為周家門徒。這篇文章雖嫌冗長，卻是戰亂中的一段有趣記錄。內容如下：

文壇之分化

周作人

在北京向來就没有所謂文壇，事變以後更是寥落，雖然有方紀生的朔風，張深切編的《中國文藝》先後出版，也只有幾個流落在這裏走不動的文人湊寫稿件，聊以消遣，有如魚相濡以沫耳。說是消極，固亦難免，卻亦並不真是十分頹唐，他們不以文學為職業，或是想於其中求得功業或利權，但如或對於國家民族有什麼好處，在文學範圍內盡其國民之力，也是願意的。所以文壇雖是没有，寫文章的人雖然人數不多，精神意氣卻是一致，如没有什麼意外的風波，大抵這一角落的平安總是可以保持的。

過了三數年之後，組織文化團體，興起文學運動的呼聲，忽而不知從哪裏發出來。在去年春間，來了所謂文化使節的某甲，不幸的很，在北方的往日本留過學或是知道日

本文學情形的中國人，對某甲都不大看得起，因此即使没有明白表示輕視，也總不能予以歡迎，只有某乙竭誠的招待他，這樣一來，恩仇的形勢已經很明瞭的立定了。某乙以某甲的後援，計劃編輯純文學的文學集刊。同時張深切也計劃編一種文學雜誌，由某部印書館出版。經接洽磋商的結果，議定設一藝文社，鄙人掛名為社長，發刊兩種雜誌，一為藝文雜誌月刊，由尤傅陳某乙同編，二為文學集刊，由某乙獨編。但是某乙與張深切意見決裂，表示不幹，於是文學集刊中止，藝文雜誌則改為尤傅陳三人主編，鄙人掛名藝文社長如故。這大概是去年四月初的事。到了五月一日，這個日子我記得很清楚，因為先母逝世，這正是第十天，預定開弔的前一天，當天晚上九點左右，某乙忽然走來，某乙是我的受業弟子，相從有年，那一天的態度卻特別不遜。談到的要點大略如下，最初某乙説，我決定不辦文學集刊，請先生也脱離藝文雜誌的關係，我答説，你自辦刊物，你可以決定不辦，你與人鬧意見，雜誌又是書店所出，我不能隨便主張不辦。某乙又説，因為有我參加，所以有紙可以配給，如我脱離後紙即不能得到。我答説，紙有没有是書店的事，與我無關，如真没有紙則書店會停止刊行。某乙末後説，刊物出後作家協會將加以攻擊，於先生名譽不利。我答説，我也是作家協會的評議員，其幹部人員也多相識，不會無故攻擊，而且我非文士，我的價值不在於編一個雜誌的好壞上邊，即使有人攻擊也於我名譽無關。大意就是這三點，卻是一直糾纏到十一點後，總想強迫我脱離藝文社，我覺得這太無理也無禮，不客氣的嚴詞拒絕了。二日開弔是星期日。至星期二，據印書

館的人告訴我，某乙約定星期一與館方會談，已議定仍舊編刊文學集刊了。這裏便有很大的一個謎。假如預先約定星期一與書店會談，預備妥協的話，那麼星期六夜間不應該來強迫我幫他折臺。既在那時不顧及開弔的前夜喪家的情狀，以不遜的態度來強迫我，則在一天之夜絕不能那樣忽然轉變，去無條件的妥協。雖說是人情反覆無常，總也未免反覆得太奇怪了吧。鄙人感覺遲鈍，所以常上人當，但是遇見這事以後也很覺得疑懼，稍加留意，俗諺云，賊出關門，雖曰已遲，亦差勝於不關焉耳。

這以後有些事情逐漸漸的發生了。夏天的一日，某乙發起在公園水榭召集文學茶話會，會的詳細不必細述，只須說明其時有日方來賓某甲的演說，開始攻擊中國的老作家，這可以算是第一幕。到第二幕揭開時已在秋天，日本文學報國會在東京開東亞文學者大會，在第二分科會中片岡鐵兵提出掃蕩中國反動作家的議案，接著又有某乙攻擊中日合辦出版機關的演說，原文都登載在《文學報國》第三號上，某乙所攻擊的顯然是某印書館，片岡所攻擊的當初有人說是指我，我卻還不大相信，及至把原文一看，雖然似乎有點像誇大狂的樣子，覺得這恐怕是我也說不定，至其來源則片岡得之於某甲，而某甲則得之於某乙，此傳授線路雖出於想像，大致當不錯也。要證明這不錯，有第三幕為憑。今年春二月初，北京發現有《文筆週刊》第一期，第一編題目雜誌新編，作者署名龍陀，即是某乙的化名。這裏邊攻擊中國老作家，與某甲以及片岡的攻擊正是一條戰線，而又特別集中攻擊藝文雜誌的老作家，其目標非常顯著，已無異於指名之罵。在藝文雜誌上

寫文章比較年長者只有錢稻孫先生與鄙人，但這裏的攻擊目標，我知道確實只在我個人，錢先生不在其內。這個可以引用片岡的話來作證明，因恐不能傳其真意，故用直譯法述之如下：

「諸君之文學活動沿著新中國創造之路線。然彼老大家則毫不考慮今日之中國呼吸於如何歷史之中，被置於如何世界情勢之下，唯弄其獨自隨意的魅力豐富的表現，暗嗤諸君，而對於新中國之創造不作如何的努力，彼已為諸君與我輩前進之障礙，積極的妨害者。彼為在全國東亞非破壞不可之妥協之偶像。彼不過為古中國的超越的事大主義與在第一次文學革命所獲得的西洋文學的精神之間的怪奇的混血兒而已。」

這裏所說嘲笑他們、妨害他們的文學活動，都是我的事，即看不起某甲、某乙，不聽從某乙的要求，又西洋文學確曾弄過，雖然我的價值不在這裏，卻在於知道本國的精神，關心中國與東亞之運命。總之這三點都不關錢先生的事，可以知道不曾被攻擊在內。到了現在，須得說明，這某乙是誰？某乙姓沈名揚，現改名為沈啟旡，是鄙人的受業弟子，上邊亦已提及，在我指導之下任事已有多年，就是前一次出席文學者大會，算是一名代表，也是我派他出去的。這一回因為想要領導文學運動，主宰文學刊物，似乎不大成功，以為這由鄙人的障害，便二次三番的勞動外國人演說攻擊，末了自己出來打，在我本來毫無妨害他們沿著新中國創造之線的意思，向來只用作揖主義，不過覺得徒弟要

吃師父，世界各國無此規定，我也未便再行作揖，只好聲明破門完事。自此以後完全斷絕關係，凡有沈揚參與的團體或事業及刊物，鄙人一律敬謝不敏。個人間的關係這樣可以解決了，但是這一年間因這件事而引起的影響也並不少，而且也不小。對這個我深致歉疚之意。其一弟子對於恩師之反噬，這對於中國的智識階級給與一種極大的不安。世間傳說我有四大弟子，此話絕對不確，俞平伯、江紹原、廢名諸君雖然曾經聽過我的講演，至今也仍對我很是客氣，但是在我只認作他們是朋友，說是後輩的朋友亦無不可，卻不是弟子，因為各位的學問自有成就，我別無什麼貢獻，怎能以師自居。唯獨沈揚，他只繼承了我的貧弱的文學意見之一部分，以及若干講義，一直沒有什麼改變，這樣所以非稱為徒弟不可，而且破門也可以應用，至於我的思想還是我自己的，不曾傳給什麼人，平時我最模糊，不喜歡多事，這回卻覺得不能不再計較，雖然這事聽了使人寒心，以教書為業的尤感不安，但也沒有法子，只得請大家原諒。其二，這又暗示文壇之分裂。上文說過，在北方本無什麼文壇，況且鄙人也並非文士，若沈揚似乎更談不上是什麼，即使有這一場事也與文壇前途無干。不過承他們不棄，硬派定我是老作家，又從而掃蕩之，自北京的文學茶話會，到東京的文學者大會，鬧得滿城風雨，彷彿若有那麼一個文壇，反動老作家佔據了這堡壘，阻礙新中國創造的諸君的前途。這個分裂與混亂叫人瞧的了。事實上固然這是老儒的一個徒弟的去就，既不是文學運動也並非文壇派別，總之分化的計畫的成功是無疑的，這裏須得補充說明，上邊說的某甲就是林房雄，最初來時

報上説是文化使節，後來被改稱為分化使節，很是確切。

這裏嘮叨敘述的也就只是這分化的一個簡略梗概。所以他們在這一回的事情裏可以得到一大教訓，用現代的方法做去，中國統一的文壇永不能成立，文人鈎心鬥角相爭，將無寧日，現今覺得非成功不可的中日文學家的提攜聯合也必無希望，若是當初敷衍隨和，以至凶終隙末，那還是算是最好，最難得的結果了。鄙人本是文壇以外人，況又老被見憎，無意學蘇州姑娘嘴臉向人，不妨直率的説出，即使言者有罪，只要聞者足戒亦已滿意矣。

民國甲申清明節

93 不速之客

民國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之間，我灌注全付精神為同鄉會服務，並認真學習做生意，宋維屏和黃烈火都對我很好，併力維持我一家的生活。在北京除此一門，已走投無路，既然無法回臺，不得不暫時寄人籬下。

這時日本當局很想利用在北京的臺灣人，派往前線服務。他們看中北京的臺灣人都會講「官話」，利用做翻譯官或宣撫員最適當。我以同鄉會長身分極力反對，強調他們現在的職位，都比在前線工作更重要，絕不可大材小用，委屈人才，拼命和他們周旋，推翻了他們的徵用計劃。

自所謂「大東亞戰爭」，即太平洋戰爭開始以後，日寇愈痛感人力物力不足，對臺灣已徵用了大批的軍夫和軍屬，實施強制性的志願兵制度，在華中、華南都已經就地徵用了不少的臺灣僑民，只華北尤其北京沒有徵用過一個人，這絕不是偶然如此，更不是無為自然的。

三十三年秋初，我為要了解內地的實際情形，沿津浦路南下至徐州，去視察這著名的戰場，順便訪問摯友劉捷和吳坤煌，劉捷是我們文聯的四大天王之一，為了生活所迫，流落到

這裏來，亂離中相逢，彼此不勝感傷。

中秋前後，我因事經由京漢路到新鄉，就近馳往開封府觀光，聞浦野還在這裏，順便去見他。他以朋友自遠方來，十分慇勤招待；也許由於這次的溫情，更加親善，三十四年我被拘的時候，他才肯出那麼大的力營救我。人生在世，千變萬化，時而化敵為友，時而化友為敵，無時不移，無動不變，真是瞬息不可端倪。

從奧地返京，我感覺中國還富有希望，從而臺灣也已接近黎明，心中非常欣慰。日寇的士氣漸衰，我方的民氣反旺，大地充滿著喜氣洋溢的景象；我獲得了日本必敗、我方必勝的信念，索性叫煜兒不要上學，免得叫他天天受苦，學校當局為了時局激變，也無心再顧慮到他了。

三十四年二月中旬，忽然有個佐佐木中校參謀從東京到北京來找我，說有事要請我往東京見「近衛公」，我辭以事務繁忙，無法抽身，不去。是年四月中旬又來了一位尾關中校參謀，問我是否可以撥空去東京參謀本部一趟，如果我答應，他要陪我搭後天的飛機返京。我照例婉辭拒絕了。這位尾關參謀就是日本投降前任北京最高指揮部的報導部長。

這兩位不速之客，為什麼來邀請我去東京？到現在我還未能明瞭。有幾位朋友罵我不識抬舉，勸我接受東京的邀請。但我總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無道穀恥」、「邦無道富且貴恥」為座右銘，覺得這是無妄之福，必有無妄之禍，不敢領教。

他們叫我見近衛的目的在哪裏？是為臺灣問題呢？中國問題呢？抑或國際問題呢？這都

用不著我，我也不懂得什麼，問我無所益，答他無所用，何苦白跑一趟。朋友們責備我雖然不為自己，也得為朋友著想，去東京看看有沒有好的機會提拔朋友，我答道：

「你們現在恨不得有更好的地位，有一天你們一定會後悔不該爬得那麼高，你們現在恨不得有更多的錢，有一天你們一定會後悔不該擁有那麼多的錢。」

94 生死線上

尾關參謀飛返東京的第二天凌晨，天還未亮，我從睡夢裏被叫醒，聽見有人叫「張先生！張先生！」口音明明是日本人，敲門敲得好兇，並且還用腳踢門的樣子，妻怕得縮做一團；我只好起來開門，門一開，五、六個穿中國便衣的壯漢衝進來，擬著手槍，迎頭問我：「你是張深切吧！」我答：是。站在前頭的矮個子說：

「我們奉命來搜索你的住宅！」

說著指揮同來的人喊聲「來吧！」他們便七手八腳搜查我的屋裏，翻箱倒櫃，凡屬紙張沒有一件不被蒐集做一起。他們找到兩件東西，似乎覺得很意外，一件是五聽綑在一起的三砲臺香煙，外面貼有日本禮紙寫「佐佐木」，另一件是三個大號紙盒縛做一綑的前門煙，也貼著同樣的禮紙寫尾關。矮個子拿來問我：

「這是誰送給你的，佐佐木、尾關是幹什麼的？」

我答道：

「一個是參謀佐佐木中佐，一個是參謀尾關中佐。」

「什麼時候來找你的，為什麼送禮物？」

「佐佐木參謀是兩個月前，尾關參謀是前天。……至於為什麼送禮，我不曉得，大概是當做見面禮吧。」

「他們找你幹什麼？」

「恕不奉答，這是屬於軍事秘密。」

「好的，慢慢再說。」

他們忙於選別文書，我向門外探頭一看，周圍牆上都有人舉著槍監視我們的房屋，我感覺事情非常嚴重，心裏忐忑不安，但我平時已有充分準備，他們所要的東西，當然一無所有，反而儲備著對我有利的文書偽造不少，所以我怕他們搜索不力，而生出了遺漏。矮個子對我說：

「我們是要帶你去的，你準備吧。」

妻問他：「他剛起來，還沒有吃飯，可不可以弄些東西讓他吃？」

「可以。」

她立刻去做了一碗雞蛋湯和一些點心給我吃。衣服都換好了，妻給我準備了一大包衣服，又向矮個子問道：

「牙刷牙膏肥皂這些東西也可以擱進去麼？」

「可以可以。」

「還有……香煙呢?」

「也可以,不過被布氈子不要,我們那邊有。」

他答應可以帶香煙,這使我覺得非常意外,因為監禁所是絕對不許吸煙的。

他們搜查後,整理了一個多鐘頭,就要帶我走了。妻緊跟著矮個子問他:

「你有什麼證件麼?」

「證件?要幹什麼?」

「要看啊,你們要帶我丈夫去,沒有拘票或一件什麼給我看,那還行呢!?」

「我們用不著拘票,我們不是綁匪,是奉命來的,你放心,你先生當過大學教授,很有聲望的人,我們不會隨便的,今天這件事最好不要外揚,外揚對你先生不利,沒有事一、二天便放回來,有事呢,你託任何人都絕對沒有辦法的。」

「不行,你一定要有什麼給我看,就是名片也可以。」

矮個子不能拒絕,只得拿出名片交給她,片上印三谷部隊曹長上村……沒有載明地址。

他們要帶我出門的時候,長女媚珈和煜兒都怕得哭了,我去給他們安撫一下,跟著特務們走出前院,瞥見公司的同事們都躲在屋裏,從窗戶探望我們。兒女的哭聲跟著我的腳步,漸離漸遠了,但我的心好像還留在家裏沒有離開他們。

號房的老王失手開了大門,以為害了我被捕,怕得發抖,站在大門邊哭喪的臉好像在頻望我寬恕他,點點頭行禮。妻送我到門口,不敢流淚,也沒說話,呆望著我們坐上小轎車駛

去。

車開到一個同鄉林權敏的門口停住，這裏另有特工等著，帶林權敏上我們的車一道走。權敏雖然也是我的朋友，卻和我的案子不相關，抵達了監所就分開了。

我到了拘留所，隨即被帶進一間好像小客廳的審問室受訊，主審就是那矮個子上村曹長。從早晨一直問到晚上十一點鐘，除了三頓飯，都沒有休息。他所問的要點，是從我來北京的動機起，至八年間的活動經過，為什麼冒稱中國人？進入教育界的目的在哪裏？煽動了幾個學生去重慶？和堂脇、佐佐木、尾關等有什麼關係？由誰後援組織中國文藝社？我在北京飯店座談會席上大罵松岡外相是什麼意思？我和抗日團體有什麼關係？近衛和參謀本部邀請我去東京的目的何在？問得詳詳細細無微不至，表示他們對我有很多的情報資料。

我說明來北京的動機，只是為求職謀生；冒稱中國人，是不願意藉日本勢力欺壓中國人；主編《中國文藝》、組織中國文化振興會等都是獲得日本當局同意成立的；至於多少學生逃往重慶，我非神仙，無法憑空想像。又與堂脇及參謀本部等的關係，都屬於軍事秘密，須直接去詢問他們，我無權回答；罵松岡外相是出於愛國熱忱，憤慨罵出來的，我說松岡是留美廚子出身的流氓政客，知識淺陋，鑄成大錯，誤國殃民，罪深惡極，這種見解至今不變。我一生對任何主義都絕無興趣，自然不加入任何黨派，所以和國民黨共產黨都沒有關係。」

整天的審問，彼此都累了，上村曹長命一個軍曹（中士）帶我去休息；他帶我上二樓住於靠近梯邊的一間房子，裏頭放置兩個洋床和幾張中國式的烏木學士椅，很像旅社房間的佈

置。軍曹問我：

「你渴了吧？」

「嗯，是的。」

「我拿開水給你喝吧。」

「謝謝。」

他跑下樓去拿開水。我偶見壁上有電話機，偷偷地試撥家裏的電話號碼一聽，奇怪！接電話的居然是我的妻，我說：我現在被拘留在一四二〇部隊，待遇還不錯，請放心；剛講到這裏，聽見有人跑上樓梯的聲音，我慌忙把聽筒掛上，假作咳嗽。軍曹問我剛才說了什麼話？我說沒有，因為渴得厲害，所以咳嗽不止。我接過他的鐵茶壺倒開水，連喝兩杯，抒了一口氣。他指示左邊的床，叫我在那裏睡覺。

我聽見遠離正房後面有凄厲的哀叫聲，問那是什麼？他充耳不聞似地答道：「沒有什麼，快睡覺吧！」他脫下衣服，上了右邊的床睡去。我躺在床上胡思亂想，想像剛才聽見的哀叫聲，是否我們的志士在受著刑求逼供？日本鬼子佔我們的地，抓我們的同胞，拷打我們，殺戮我們，此仇何日洒雪！我越想越惱，今日聽見同胞在哀叫，明日可能輪到自己身上來，不禁毛骨悚然。

不一刻，覺得滿身癢癢，原來是臭蟲排著長蛇陣在床上遊行，有的已經闖入我的身上了，我大驚，全身起了雞皮，急忙跳下床，把衣服脫光，振拂後再檢點一下，才穿回去。這時氣

候還冷，脫光不能耐久，腳亂手忙鬧了一場，卻沒有吵醒他。我不敢再睡，獨坐在椅上思索此後如何對付審問。約莫經過了一小時，軍曹霍地醒來，看見我沒有在床上，嚇了一跳，轉過身問我：

「你怎麼不睡，起來多久了！」

「有一個多鐘頭了吧！臭蟲太多，睡不著！」

「是麼！這裏有臭蟲！這間屋子是前任市長何其鞏住過的，他一向沒有說過有臭蟲。」

「他大概被咬慣了吧，不覺痛癢，我是受不了的，你的身上自己仔細看看吧。」

他往自己身上注意一看，喊道：

「唉呀，不得了！這麼多，哪能捉得了？」

我教他把衣服脫光，打拂一回，再看，他照我說的樣子做了，穿回衣服說：

「我們怎麼辦？」

「不睡好了。」

「哪還行呢，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啊。」

他想了一會兒說：

「張先生假如你不嫌髒的話，到我們的寢室去睡好不好？那邊沒有臭蟲，不過設備沒有這裏好。」

「只要沒有臭蟲就行了。」

他帶我經過一個走廊，轉個彎就到了他們的寢室，這裏可容三十來個人的廣闊房間，全部舖塌塌米，裏頭只有五、六個人睡在那裏，我說：

「這裏很好！」

「請忍耐一下，對不起哪，嘿嘿嘿。」

自此我就住在這裏。

第二天，主審改換佐藤曹長，我又被叫到昨天的審問室受訊。室裏有三個褪色的紅沙發椅，他把昨天上村曹長問過的內容重新再問，問到我為什麼反對共產主義的時候，我答道：

「因為我反對唯物史觀，尤其反對階級鬥爭說，所以自然反對共產主義。」

他以諷刺的口吻說：

「胡說八道，你們一到這裏，誰都會扯謊。」

「你憑什麼說我扯謊？」

「據我們所調查的你的著作，都帶有反日思想。」

「這是你們的錯覺，所謂反日思想是以什麼為標準，用什麼來衡量的？」

「用不著標準，也用不著衡量，用感覺就可以判斷的，反日分子便是共產主義者，因為這次的聖戰，日本是純為剿共而發動的，所以反日便是親共，親日才算反共。」

他的這套話使我生氣了，我正色問他：

「你講理不講理？要事實不要事實？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引我入罪，那末不用

審問了！」

「怎麼不講理？要是不講理，把你抓出去一刀，不就解決了麼？」

「可是你今天所問的，不是挖苦便是開玩笑，哪能說是問案？」

「那末，你講反對階級鬥爭說就是反對共產主義是麼？」

我嚷道：

「世界上哪裏有否定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試問共產主義除掉了階級鬥爭，剩下的是什麼？」

我正大發脾氣的時候，妻忽兒出現於我們的審問室，我和佐藤都愕住了：我以為她也被捕了，佐藤料想不到她會上這裏來，妻看我向審案人大聲叫嚷，大驚失色，佐藤回頭詰問她：

「你來這裏幹什麼的？」

「我來看我們的主人。」

「誰叫你來的？」

「我自己來的。」

「誰讓你進來的。」

「號房帶我進來的。」

佐藤想一想後笑說：

「既然來了，就讓你們談一談吧，也許我在這裏不大方便。……」

他站起來，指自己坐的椅子說：

「太太請這裏坐吧，我出去一會就來。」

妻看他出去，竊問我：

「你這樣嚷嚷哪還行呢？你在這裏要謹愼才好。」

「你不知道，他們故意無理取鬧，所以不和他們理論不可。你怎能夠到這裏來？」

「我是拿上村曹長的名片進來的……你的事情幡野、浦野兩位先生都知道了，他們會給你幫忙的，你放心，你有什麼不自由麼？」

「沒有，我在這裏還好，睡覺吃飯都和他們的士官在一起，沒有被當犯人待遇，不日當能解決，你放心吧。」

我說到這裏，一個下士兵端兩杯茶進來，態度很慇懃，妻看這情形，稍微放心，她帶許多東西要給我，我說這需要先交給他們檢查，才能轉給我的。我們談了半小時，佐藤笑著走進來問道：

「情話談完了麼？」

我告訴他妻帶東西來，請他代辦手續，他滿口答應，即時拿去辦理了。

佐藤是個很有趣的軍人，頭一天和我鬥過口以後，有時候請我去喝啤酒，有時候要請我去住他家裏；後來他老實告訴我，說他為了我的案子大傷腦筋，解不開這個無頭公案，每天要我寫二、三篇論文是出自上村曹長的意見，這是等於開玩笑的，笑我太老實，竟認眞遵辦

無違。

上村曹長是一四二〇部隊裏最厲害的一個，他是早大畢業的知識軍人，年輕的時候曾信奉共產主義，所以他對共產主義有他一套的研究，對三民主義和國民黨的組織也很精通，有案交他辦，都辦得非常徹底。他是官銜准尉的曹長，聽說他在北京手下的特工有三千多人，百分之九十是中國人，由此可以想見他的勢力；就是不說三千，只一千人也可算了不起的龐大組織。

他叫我寫論文，題目都是由他擬的，例如〈對支那發動戰爭的神聖意義〉、〈對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批判〉、〈對大東亞戰爭的觀感〉、〈八紘一宇的宗旨〉等等，六、七日之間，接連作了十幾篇；他們每天拿我的文章去檢討，認為前後矛盾，內容有可疑的，就用紅鉛筆劃記號，拿來究問我，要從我的各種理論中找出思想的根源。

這次的拘押，我推想他們只根據各方面的報告而沒有確鑿證據，所以一味要從我的思想中找出處刑的口實。這次我在身體方面雖然沒有受到什麼虐待，在精神方面卻受了很大的折磨。

監禁第三天，他們說怕我無聊，叫林權敏來陪我做伴兒。每天早晨我們都被放出後面的運動場散步，權敏幾乎每天撿到銅板或女人的裝飾品，或什麼吉祥小東西，我卻始終未曾撿到什麼。聽說這裏以前是「天津會館」，房地相當大，前面是辦公處和士官宿舍，後面是拘留抗日分子的牢獄；我從樓上看過二、三次不堪卒睹的光景——都是黃昏時候，我們的忠貞志

士被押上卡車，眼睛被白布掩住，雙手反綁，滿載出去，空車回來，他們的命運如何，可想而知。

這裏的審案，刑求方法無奇不有，極為慘無人道，審判不是生便是死，沒有判處徒刑的，一旦進入這裏，十之七、八大抵都算失蹤了，北京居民一聽見一四二〇部隊，莫不不寒而慄。

他們逮捕我的動機，至今還是個謎，唯有上村曹長和他們的下手人才知道。一四二〇部隊可能是東條手創的秘密憲兵部隊之一，東條為要強化他的政權，對內施行「憲兵政治」，藉非常時之名，以憲兵監視軍政黨，預防近衛一派和老臣們的反對，壓迫反東條的政黨，解散了「東方會」，迫死其黨首中野正剛，取締反政府的言論，解散了其他政黨，造成日本近代最黑暗、最恐怖、最獨裁的政治。

對外，為抗制前線的將校，鎮壓敵人的反抗，組織了一個特殊編制的部隊，如一四二〇部隊，賦予超越軍法裁判的特權，格殺勿論，不必向任何機關報告。我被捕的時候，幸而日本已處於敗戰前夕，東條倒閣，東京頻受轟炸，時局急激轉變，始能倖免，否則將不知伊於胡底了。

我所以倖免一死的原因，也許還有三點，一是他們查著佐佐木和尾關的禮物，以為我和日本中央方面有什麼關係，不敢隨便制裁。二是我的行蹤即時被發現，浦野機關的連絡意外神速，使三谷部隊無法隱諱。三是妻的活動非常敏捷，我被捕不出十小時，就查出了三谷部隊的地址。他們初接到浦野機關的查詢時，以部隊長不在，含糊其詞，及至被浦野迫緊了，

才答應給我優待，並愼重從事偵查。要之，他們推測我如果是真實的抗日分子，不可能和日本軍部發生那麼許多關係。

最後一天，妻照常到部隊送東西，佐藤接待她，刁皮地說：

「自今天起，禁止你給你先生送東西。」

妻大吃一驚，以為大禍臨頭了，忙問：

「為什麼呢？」

「理由不容問，你的東西帶回去好了。」

她快要哭出來了，嚷道：

「理由不說，怎能回去！」

佐藤答道：

「他快要回去了，還送東西幹麼？」

妻聽不懂他的話意，急問：

「回去，回什麼地方去？」

佐藤不敢再開玩笑了，笑說：

「回你們家裏去啊，還有什麼地方!?張先生今天快要釋放了，你快回去預備洗澡好了。」

妻將信將疑，說不出話，佐藤停一會又說：

「你等一等，也許可以和你一道回去，我進去看一看。」

說著往裏頭去，一會兒跑出來說道：

「太太恭喜，張先生本來預定晚上才要釋放，因為你來了，部隊長說要讓你們一塊回家，等著張先生就來。」

我想不到那麼快就被釋放，走近大門時，妻跑出來迎接，悲喜交集，虎口餘生傷感之情自不必說，佐藤和特工人員送我們出大門口時，還開玩笑說：

「再見，慶祝你們新婚旅行快樂！」

前說：我被押進三谷部隊時，偷打了一個電話給妻，但只告訴她我在一四二〇部隊，何以她會知道我被監禁的地址呢？原來我被捕那天早晨，妻聽見林權敏也同時被捕了，她趕快到林家去探問，恰巧以前認識的一個日本婦人也在林宅。妻拿出三谷部隊上村的名片請教她，她說好像聽過這個部隊的名稱，不過記不清是何種部隊，要帶那名片回去問她丈夫，妻把我被捕經過講給她聽，她立刻回了家，一會兒又跑回來說道：

「哎喲，不得了啊！我先生說三谷部隊就是一四二〇部隊的支隊，他當過這部隊的分隊長，知道凡被抓進去的人凶多吉少，這部隊的地址是很秘密的，但他卻已畫個地圖給我了，你看。」

妻按圖索址，摸半天找不著所謂三谷部隊營房，她看見有一家古式大洋樓，院前兩扇門和房子不相稱，好像車庫又不是。她對這個場所有所疑問，就地隱身附近的牆邊，窺探出入人的行動，瞧見這裏出入的人多是穿不合式的中國衣服，腳穿日本軍用的白襪子，襯衣的袖

子都是用鈕釦，所以她判斷這兒必定是個秘密機關，地址和地圖相符，便佯為熟客的態度，從小門闖進去，門邊的號房有人跑出來制止她，問道：

「你要找誰？」

「找上村曹長。」

「他不在。」

「他交給我一張名片要我來和張深切見面。」

「是麼？……那末我帶你去。」

料不到這張名片等於通行證，號房的便衣兵不知底細，聽她一口流利的日本話，似乎誤認她是負有什麼使命的工作員，便帶她到佐藤曹長審問我的地方。佐藤看她通行無阻走進來，覺得很意外，這時他們已經接到天津浦野特務機關長的電話找我，所以想像她有什麼特殊關係來的，不敢過於究問，便讓她和我見面了。

幫妻忙的那位日本婦人的丈夫，是個喜歡吃人肉的退伍上尉，妻本來和她不太熟悉，只在林宅見過一、二次面，看她冬天沒有襪子穿，心甚不忍，買了兩雙襪子送給她，這次她挺身奔走，說來因緣也是奇巧的。

八、九天的恐怖生活，使我心身俱累，休養了幾天，才帶妻買了些東西去答謝佐藤。其實我還有一個未能釋然的疑問非解不可，如果解不開，我的案子還不能算已了結。

佐藤寫給我的住址，我和妻找了好久找不著，後來我按門牌號碼次序詢問那鄰近的人，

被問人表現恐怖的神情，問我是不是日本人的住宅，我答是。他驚訝地注視了我一會兒，然後用手指一堵長牆小門，低聲說：

「是不是那所房子，你們自己去看看。」

我看他的態度已猜中一半，道個謝，回去瞧那堵牆的小門上的門牌，果然沒有錯。我們在這門前走過幾趟，沒有注意到小門上有門牌。門上裝個小電鈴，我按了一下，裏頭便有人應聲走來開門，一看就知道是穿便衣的軍人。我告訴他找佐藤曹長來的，拿一張名片給他，他接著帶我們進去。沒進門以前，我以為是佐藤私人的小住宅，進了門以後，才知道這裏也是一個大秘密機關，房子大概有五、六十間，我們經過了三個小院子，才到了一個大客廳。我看這廣大的房屋，和前被拘押的地方一樣陰森靜寂無聲，呈現著淒涼的景象，不過前者是洋樓，這裏是古老的中國房子，可能是清朝時代的大官兒府宅。不一刻佐藤出來笑著說：

「啊，張先生、張太太，你們好啊，勞您大駕！」

彼此寒暄了幾句，佐藤對我太太說：

「以前我請張先生來住這裏，他太客氣了，這裏環境好，又比較自由，離你們的家又不遠，要吃什麼東西都方便，而且我們可以隨便聊天，他住在那邊太吃苦了！」

「謝謝，我沒有當過兵，不曉得士兵的辛苦，在那裏體驗軍人生活也是好的，可惜時間太短。」

我胡說一套，說些奉承軍人的話，他說：

「老實說，我們要抓你以前，我就認為你沒有犯什麼罪，跟蹤你一、二個月，沒有發覺你有什麼可疑的舉動。」

「你跟蹤那麼久，我一點兒也不知道。」

他得意地答道：

「我們是吃什麼飯的，還會讓你知道！」

我拿出香煙請他，並詢問：

「到底你們給我掛的是什麼嫌疑？」

他替我點上火，自己也點著吸了一口才說：

「現在一切都成為過去了，可以坦白告訴你，你受了許多人的密告，我們所接的情報都對你很不利的，說你是個惡質的抗日分子，煽動青年學生反日，鼓舞他們去重慶，到處宣傳日本的壞話，攻擊政府，說你的行動詭秘，一定有什麼陰謀，其實沒有什麼確鑿證據。這次搜查你的房子，一無所獲，才明白你蒙冤受屈，並且知道你受許多要人所尊重，我們的鹵莽倒覺得不好意思，反正你現在被證明清白，這於你也是很好的。」

「我不想詢問你們的情報從哪裏來，不過在這個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希望你們愼重，不可濫造冤獄才好。」

「是的……」他停一會兒，又頓一頓，欲言不言地說：「張先生……我有句話想請教你，是否可以對我說？」

我心裏曉得他要問的話，故意裝作嚴正的態度反問：

「什麼事？」

他沉默片刻，說道：

「老實說，我們還有一個解不開的疑問，是關於你和東京參謀本部及近衛公有什麼關係？」

不錯，我要知道的正是這個問題，我裝作不高興的態度說：

「不是說了麼，這個不能隨便發表的，上村曹長說他有權可以查問國家的最高秘密，我倒要問這個大權是誰賦予的，我答應最高指揮官如果有命令，我便可以講，你們領著了命令沒有？」

「是。」

他垂下頭，表示不能說明，我狠下一鞭追問：

「到底命令拿著了麼？」

他默然不答。我今天找他的唯一目的就是在這個問題上，名為答謝，其實我要調查的是他們有沒有曾向最高指揮官請示過命令。我雖然預料他們不敢申請，但心裏總是懷抱不安，萬一有了命令，事情就麻煩了。

所謂軍的秘密，全是我信口揑造的，連近衛和參謀本部是否確實邀請我會見，都還有疑問，只憑佐佐木和尾關兩參謀的話，未能證實，這個真的秘密如果讓一四二〇部隊知道了，那才真的要命！

95 日蝕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下詔宣佈投降，中國、臺灣、朝鮮及其他的日本佔領區和附庸國的旗色都驟時改變了。先是四月二十八日，德國無條件投降時，日本的命運實在也已經決定了，只是多苟延殘喘幾個月，在這以前，日本海軍已被美國盟軍殲滅，運輸補給都沒有辦法，各地派遣軍唯有坐而待斃，正苦於沒有投降的機會，八月六日，美國以原子彈投擲於廣島，九日又再投一枚於長崎，於是日本便藉此舉手投降了。

八月十四日，日本正式向盟軍提出無條件投降，十五日，日皇裕仁下詔對國民宣佈投降這一天，恰巧是農曆七月八日，也是我的四十歲生日。中午剛吃完飯，妻和我正在商量晚上如何準備請客的當兒，忽然聽見收音機有重大消息播送，側耳細聽，原來是日皇正在發表他的投降詔勅，裕仁的聲音澀滯而沉重，我聽了廣播，全身的血都沸騰了，因為過度的興奮，我的神志也茫然自失了。等到稍微鎮定，我立刻驅車往華北最高指揮部去找尾關報導部長。

這位報導部長，就是四月十八日說啣有參謀本部的使命，到北京來邀請我去東京的中校參謀。我提出二、三個條件，要他即時借給我兩架飛機載一批人回臺灣，他答應請示指揮官，

叫我明天去等候消息。我說不行，一刻鐘也等不了，得馬上請示。他頗有難色，但被我力促之下不得不去了。

去了一會兒，回來說道指揮官不敢作主，須請示東京參謀本部。我主張在這非常時期，沒有請示的必要，強要他帶我去見指揮官。他說這時本部異常混亂，指揮官忙不過來，沒有時間見客。我說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事，非見不可，促他再跑一趟。

當時指揮部確實亂得像一窩狂蜂，將校們跑過來跑過去，怒哮、叫囂，亂得不像指揮部了。有的嚷著須支持國軍，有的喊道要援助共產軍，揮拳拍案，一如大廈崩塌時的震撼聲音。我預感這是凶惡的預兆，越痛感非趕回臺灣不可，報導部長頹然回來報道：

「沒有辦法，指揮官說除參謀本部的命令外，一架飛機也不能起飛。」

我以戰勝國國民代表的態度，強硬要求他帶我直接見指揮官，他只搖頭默不作聲。我明白借不到飛機一切都絕望了，今日借不到，明天更困難，這是很明顯的道理。

回到家，已有五、六十個旅京同鄉聚在我們的大院子等我，大家都走來圍著我道喜，為祖國的勝利、為臺灣的光復雀躍歡呼。我悄然進入後院，躲在一個小角落哭起來，妻不解我的意思，走來陪著我哭道：

「今天正是最可喜的日子，又是你的生日，大家都樂得要瘋了，你的希望已經實現，反要悲傷，到底有什麼難過的事情麼？」

我沒有回答她，只是哭，盡情的號哭，哭到聲嘶淚竭始止。祖國勝利了，臺灣光復了，

恨其不倒的敵國都垮下去了，誰不歡喜？誰不高興？但我呢？養育我的父母，生我的兩親都死了，他們臨終時沒有一位見著我，如今我又拿不出什麼可以安慰他們在天之靈，這不孝的大罪如何贖得？怎麼叫我不哭！

（全書完）

解說

張深切全集

里程碑（上）・（下）⊙陳芳明

〔卷1〕・〔卷2〕

亞細亞孤兒的聲音

——張深切與《里程碑》

台灣知識分子心影錄

在台灣抗日運動陣營裏，有兩位歷史人物曾積極從事於政治與文學的結合工作，其成就對日後台灣文化的發展都產生巨大衝擊。他們是楊逵與張深切；前者在島內參加抗日的農民運動，後者則遠赴中國發起台灣獨立革命運動。在政治運動凋零之後，這兩位歷史人物都團結在台灣文藝聯盟的旗幟下，為台灣新文學運動寫下精彩動人的篇章。

如果楊逵是中間偏左的運動者，那麼張深切就是中間偏右的行動家。楊逵的政治理念建立在社會主義之上，終生堅守不渝。張深切則在早期與無政府主義有所接觸，與范本梁一度過從甚密；不過，張深切在後來就放棄任何意識形態。他們會以台灣文藝聯盟做為結合的據點，便是鑑於日本殖民高壓的統治下，所有的政治活動都宣告停頓。為了在精神上尋找出路，他們都決心奉獻最美好的時光給文學運動。然而，他們在思想上的分歧，最後導致台灣文藝

聯盟的分裂。這兩位代表左右文化路線的作家，高度象徵了殖民統治下台灣知識分子的苦悶。他們都努力在追求歷史命運的答案。但最後都困惑於政治問題之中。

楊逵在晚年克服了白色恐怖所帶來的心理障礙，有意撰寫回憶錄。只是天不從人願，當他開始進行口述記錄時，僅及兩章，便溘然去世。他的自傳沒有完成，等於是為現代台灣歷史留下無可彌補的缺口。相形之下，張深切是幸運的，他寫下了他的回憶錄《里程碑》，清楚描繪了日據時代潮流的起伏。倘若張深切沒有完成這部自傳，後人要瞭解殖民地台灣社會的演化，恐怕就更加困難了。歷史的幸與不幸，由此判然分明。

張深切的《里程碑》，是一位台灣知識分子的心影錄。全書涵蓋的時間，前後緜亙四十年，亦即始於一九四五年作者張深切的誕生，止於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戰爭的結束。他寫成這部自傳，是在一九六一年，當時已屆五十七歲。然而，整部回憶錄卻僅集中於中年以前的事跡，可以說是一部「四十自述」。對於戰後的台灣，他隻字不提，其中的微言大義，就只能在淡漠的無聲裏去揣摩推敲了。

所以，《里程碑》以嚴格的傳記來看，其實是截斷成一半的里程碑，因為這本書並沒有觸及後半生的經驗與心境。縱然如此，這部傳記置於台灣史料的行列裏，也是令人不能不注意的。透過張深切的文字，可以看見日本帝國主義在島上的確立鞏固與臻於極盛，並且也可見到殖民統治是如何盛極而衰，以至走向崩潰。在帝國主義統治的升降過程中，一位知識分子如何自處，如何鍛鍊意志，如何思想武裝，都跟隨年齡的成長與環境的改變而有所調整。台

灣作家的日本經驗、中國經驗與台灣經驗，都在張深切的心路歷程上交疊浮現。

張深切的早年，有三大活動標誌著他對台灣前途出路的追求，那就是一九二七年在廣州成立的「台灣革命青年團」，一九三四年在台中成立的「台灣文藝聯盟」，以及一九三九年在北京創辦的《中國文藝》。在這三大活動裏，張深切分別接觸了當時台灣與中國兩地的領袖人物，包括在政治與文化運動方面。《里程碑》的重要性，就在於觸及運動中的事件與人物，並觸及時代潮流裏的周邊與側影。

困頓於母國與祖國之間

《里程碑》，另一書名是《黑色的太陽》，作者的用意極為清楚。太陽，係指日本統治而言，太陽呈黑色，自然是指殖民地台灣的黑暗社會。全書結構，便是以上述三大活動作為主要分期。《里程碑》初版第一冊（編者按，現全集為〔卷1〕1章～42章），專述幼年生活到青年時期思想的形成，時間橫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二五年。這段時期，正是張深切受完基礎教育之後，又遠赴日本與中國去留學。一位台灣知識分子，親身經歷了兩個「內地」社會，在內心起了強烈震撼。日本，是殖民地的「母國」，而中國，則是半封建的「祖國」。在母國與祖國之間，張深切第一次嚐到島嶼歷史的苦澀滋味。

回憶錄初版的第二冊（〔卷1〕43章～〔卷2〕51章），集中於描寫他在廣州參加台灣革

命青年團的始末。有關這次政治經驗，張深切已寫過數次的專論與專書。包括發表於一九三一年《台灣新民報》的「鐵窗感想錄」，以及一九四八年在台中出版的《獄中記》與《在廣東發動的台灣革命運動史略》。不過，有關這個政治事件，敘述最為完整的，當推《里程碑》的第47章～63章。從一九二六至一九三〇，張深切介入了他生平中的第一次政治運動。也在那次運動中，他體會到台灣與中國的命運是不同的。

從來有一種歷史解釋，堅持台灣人的抗日運動是受到中國抗日運動的領導，甚至還解釋成台灣的抗日是中華民族運動的重要一環。然而，張深切的親身經驗，否定了這樣的歷史解釋。倘若台灣的抗日運動是屬於中華民族主義的一部分，為什麼知識分子千里迢迢奔赴「祖國」之後，竟然從事獨立運動，而不直接加入中國的抗日組織？

張深切在書裏說得極為清楚：「台灣和朝鮮的民族革命，必須先藉國際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才有辦法。因此台灣的革命志士多走國際路線，是出於欲達目的所必擇的手段，絕不是真正信奉什麼主義而有所偏袒，讀者預先了解這個事實，才能夠理解台灣革命志士的思想。」這是他總結二十世紀以來台灣革命運動的一個觀點。企圖以中華民族主義來解釋這樣的歷史過程，往往不免產生錯覺與曲解。台灣知識分子到中國從事政治運動，乃是「走國際路線」的一個實踐，而並非是接受中國抗日運動的領導。

張深切更進一步指出，他在廣州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超越了中國內部的黨派之爭。他特別強調：「統治台灣的國家只有一國，蹂躪中國的國家是世界列強，台灣的處境和祖國不同，

自然我們的鬥爭方策也和祖國不同。我不反對同志們加入任何團體，但反對有礙我們自己組織的一切言行。我們需要援助祖國的革命，但不能相信祖國革命的成功，就等於台灣革命的成功，所以我們不需要參加任何派別的鬥爭。」這段話足以說明，台灣與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固然都是以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做為出發點，但是，雙方的反抗運動領導權，是平行的，也是自主的。只有從這個觀點來看，才能清楚解釋台灣知識分子在中國境內發起台灣獨立運動的思想基礎。

掙扎於政治與文學之間

《里程碑》下冊〔卷2〕，筆鋒急轉，描寫張深切從政治監獄走出後，如何又跨入文學運動的道路。現在回顧起來，張深切在文學運動上的成就，可以說遠超過政治運動方面的業績。因為，廣州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活動，實際上基於台灣本島並沒有產生直接的影響，而張深切回到島內所發動的全島作家大團結，對於台灣文學發展的衝擊可謂至深且鉅。

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全島的文學作家齊集台中，正式組織完成台灣文藝聯盟。從這個團體的成員來看，聯盟是由三個作家集團結合起來的。一是以《福爾摩莎》雜誌為中心的台灣藝術研究會成員，這個組織成立於一九三二年的東京，是台灣左翼文學的最早組織。一是以《先發部隊》為主的台灣文藝協會成員，這個組織建立於一九三三年的台北，其精神在於

強調寫實與批判。另一是以台南鹽分地帶為中心的平民作家，他們雖然沒有發行刊物，但是他們作品所突出的社會寫實色彩，為台灣文學開創新的境界。

為什麼台灣作家會團結在文藝聯盟的組織之下？這可以從兩個客觀的條件來觀察：第一，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大恐慌爆發以來，一般知識分子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崩潰，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期待。在殖民統治開始產生動搖之際，台灣作家已普遍認識到精神抵抗的重要性。以文學作為反抗的武器，是當時全世界殖民地社會的共同潮流。第二，台灣的政治運動，在一九三一年後受到高度的鎮壓，激進的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不僅被迫解放，即使是最溫和的，贊成體制內合法改革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也受到日本當局的監視與阻撓。當整個客觀形勢有利於殖民地革命之際，政治運動反而消沉下去，台灣知識分子不能不另尋出路。台灣文藝聯盟宣告結盟，便是以集體力量，藉文學形式探索台灣前途的一項努力。

加入聯盟的三個作家集團，在創作精神上都是以台灣社會為主體，誠如張深切在《台灣文藝》發表的〈對台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所說：「台灣固有台灣的氣候、風土、生產、經濟、政治、民情、風俗、歷史等，我們要把這些事情深切地以科學的方法研究分析出來——察其所生、審其所成、識其所形、知其所能——正確地把握於思想，靈活地表現於文學。」張深切所主張的，也正是《台灣文藝》作家所實踐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成熟結實，無疑是以《台灣文藝》為重要里程碑。

台灣文藝的分裂，則是由於張深切與楊逵在意識形態上的強調有所歧異。張深切側重的

是台灣民族主義，認為台灣社會的不公不義，全然肇源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因此主張全體作家應該站在同一聯合陣線上。楊逵則比較主張台灣社會主義，他看到的是台灣社會內部的結構性矛盾，認為階級壓迫遠超過民族壓迫，所以他支持工農運動，並且以文學作品建立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在一個殖民地社會裏，民族壓迫與階級壓迫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在反抗日本帝國統治的運動上，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社會主義也是無可分割的。然而，張深切與楊逵未能深入剖析台灣社會的性格，終為各自堅持的意識形態所困惑，而造成分裂的局面。雖然張深切仍繼續支持《台灣文藝》，楊逵則創辦《台灣新文學》，雙方都是以文藝聯盟的成員為骨幹，但是力量分散已成定局。

從《台灣文藝》到《中國文藝》

《台灣文藝》創辦兩年後，就宣告停刊，台灣文藝聯盟的活動也隨著消失，在其存在的兩年期間，台灣作家陣容日益雄厚，後人艷稱的作品大多產生於這段時間；楊逵、王詩琅、楊雲萍、吳天賞、劉捷、吳新榮、陳虛谷、楊華等作家，大多在這段時期奠定他們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對張深切個人而言，他在寫回憶錄時，似乎並未能正確評估這份成就。因此，《里程碑》對於台灣文藝聯盟的檢討並沒有佔用太多的篇幅。

在那個苦悶的時代，張深切即使放棄政治活動而從事文藝工作，仍然未能擺脫統治者對

他的監視訪談與干擾。在廣州台灣青年革命團的事件中，他坐過將近三年的政治牢，日本當局對於他的出入活動格外注意。因此，他參加台灣文藝聯盟後，始終受到殖民者鷹犬的騷擾。這也是他決定離開台灣到華北的主要原因。

一九三八年他抵達北京，翌年便創辦了《中國文藝》。當時中國抗日戰爭已經爆發，日本軍閥佔據了大部分的華北地區，北京自然也在日本人手裏。做為一個台灣知識分子，張深切遠赴北京，也沒有解除他的苦悶。當他被慫恿出來主持《中國文藝》時，他個人的主觀願望，便是希望保留一些中國文化的遺產；但是，客觀環境卻不容他對於時局有所議論。他的尷尬立場，具體表現在這份文藝刊物上。

《中國文藝》被當時的中國抗日作家視為「日偽雜誌」，因為出資創辦的，是日本軍事機構。張深切會接受這個刊物的編輯職位，乃是鑑於日據下的文化古都充斥著誨淫頹廢的書刊，而希望利用文藝雜誌使淪陷區的中國「不要灰心」。

對張深切來說，《中國文藝》的編輯，其實是精神的苦悶象徵。從雜誌的內容來看，其中有中國人的立場，也有日本人的立場，卻完全沒有台灣的立場。最清楚的例子，便是他在《中國文藝》發表的一篇〈戰爭與和平〉。在短文裏，他主張中國必須求和，這是日本人的立場；中國在和平的狀態下，才能保持中國文化的傳承，這又是中國人的立場。這種矛盾的現象，無疑是張深切的迷惑。事實上，他也知道戰爭是由日本人發動的，他應該是呼籲日本人止戰，而不是主張中國人求和。

還是他發表了這篇文章，才更完全呈露做為弱小民族知識分子的悲哀。然而，寫出這樣一篇站在日本人立場的文章，也還是擺脫不掉政治的干擾，最後他也被迫離職而去。張深切對於這段經歷，在《里程碑》裏有極其痛苦委婉的描述。那種內心的自我煎熬，恐非外人能夠理解。從現在的觀點來看，以簡單的中華民族主義或臺灣民族主義去責備求全，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正確的。

在戰爭末期，張深切不但放棄政治，而且也放棄文學，終於從商去了。這樣曲折的道路，大約是他僅能抉擇的吧。留在北京的張深切，也並沒有獲得平靜的生活。就在日本投降前夕，他突然又遭牢獄之災，日本軍國以莫須有罪名逮捕了他。

亞細亞孤兒的哀歌

《里程碑》是以日本投降做為回憶錄的結束。然而，書的結束卻是整個臺灣人歷史命運的巨大象徵。當一般人因日本戰敗而喜悅歡呼時，張深切反而陷入哀傷情緒之中，躲在後院的角落悲泣。他的最後一段說：「祖國勝利了，臺灣光復了，恨其不倒的敵國都垮下去了，誰不喜歡，誰不高興；但我呢，養育我的父母，生我的雙親都死了，他們臨終時沒有一位見著我，如今我又拿不出什麼可以安慰他們在天之靈，這不孝的大罪如何贖得？怎麼叫我不哭！」

以慟哭做為結束，是這冊回憶錄最令人震撼之處。張深切寫回憶錄時，已是戰後二十年了。處在一個全新的時代，他並沒有透露絲毫喜樂之情。對他來說，太陽畢竟還是黑色的。

他的心情，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張深切也被通緝而逃亡，這段草木皆兵的日子，必定帶給他無比的幻滅。臺灣社會脫離了殖民地「母國」的控制，過渡到「祖國」的懷抱，卻反而見證更為粗暴殘忍的統治。站在時代交錯的關口，張深切的滿腔控訴，只能代為高度的沉默。《里程碑》終止於悲泣，並對於往後的日子一語不發，恰恰是由於他變得瘖啞無聲，他內心的控訴才益發顯得震耳欲聾。

《里程碑》是一個破碎時代的完整記錄，也是一位知識分子的精神流亡史，張深切回憶自己曾經多次進出監獄，從來沒有表現絲毫挫折；但是，他的堅強反抗卻屢屢失敗，一股看不見的哀傷，沉澱在他精神最深處。在異族的統治下，縱然踏在自己的土地上，精神與思想總是找不到歸宿。他奔走於中國的大地，內心始終停留在自我放逐的狀態。他的境遇，不能不使人聯想到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這部長篇小說，正是刻劃台灣知識分子在島上、在日本、在中國的困頓遭遇。《亞細亞的孤兒》中的胡太明，在索求精神出路而不可得時，終於發瘋了。無論他的發瘋是佯裝，或是事實，都可以反映出台灣知識分子的迷惘與困惑。張深切並沒有像胡太明那樣，被逼成瘋；不過，他的幻滅與落空，毫不遜於胡太明。張深切的自由，等於是唱出一支歷史上最深切的哀歌。

從來沒有一位台灣人，寫成這樣巨幅的回憶錄。張深切的自述，當不只發抒他個人的哀

痛，他同時也道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刻骨情感。在《里程碑》裏，可以看到他與台灣中國兩地讀書人的交往情況。在台灣人中，他寫出對謝雪紅、蔣渭水、范本梁、陳炘、林文騰等無數領袖人物的觀感。他也寫出對中國文人的看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當推魯迅與周作人。尤其是周作人留在淪陷區的北京，從抵抗到投降的經過，《里程碑》都有第一手資料的交代。因此，這不是個人的歷史，而是一個時代的投射。要瞭解日據下的台灣，要研究抗戰時的中國，《里程碑》是一部份量極重的史料。

從這部回憶錄，我們看不見張深切的後半生。他的晚年，沈溺於電影與話劇，幾乎把大部份時間都投注於劇本的撰寫。他在這方面的興趣，卻是根植於他年少時流亡於中國的期間。《里程碑》對於他在藝術方面的關切，提供了脈絡清晰的發展軌跡。事實上，電影與劇本的工作，也是他精神流亡的一個反映。二二八事件以後，張深切已完全從政治與文學的領域退出。他在一九五四年，完成一部《孔子哲學評論》，此書在字裏行間因對時局有所針砭，終於遭到查禁。從此，他也放棄思想的工作。一九六五年他去世之前，更是對世事不聞不問。這是最徹底的自我放逐，是白色恐怖下的最大受害者。

《里程碑》，終究只是一冊沒有寫完的里程碑。然而，他後半生所留下的空白，正好可以證明他的存在，並且可以證明他所處時代的險惡。張深切的孤兒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真正評價他的時代卻還未到來。當台灣社會仍然還未超越受害受傷的階段時，張深切和他的時代，就難以得到正確的看待。從這個意義來看，屬於台灣人的歷史里程碑，還是有待塑造完

成的。解開精神的枷鎖，卸除思想的束縛，是建立莊嚴碑石的第一步。

（原載一九九〇·一·廿一《自立早報》）

〔附錄〕



張深切年譜

張深切著作年表

張深切研究相關目錄一覽表

張深切年譜（1904.8.19~1965.11.8）

張志相 編
黃英哲
莊永明 校訂

西元	年代／年齡	生平事蹟	周邊大事記
1904	明治三十七年 一歲	•八月十九日，生於南投廳南投堡三塊厝庄貳佰拾九番地。取名深切。為張獅、曾鉗夫婦之次男。 張獅，原承父業，為獸肉行商，後轉業為南投街郵局信差。為人豪放不羈，重信義，守然諾。有任俠之氣，時人以「長脚獅」稱之而不名。先生自言，童稚之時甚具野性，且嗜酒，蓋得之父風。 **按**：先生深切之名，其本意未知。恐係源於家業。但連雅堂氏〈台灣語講座〉中云：「恨深曰切，又曰切心。切呼砌。謂恨深入心也。與切齒切骨之意略同。」，是則先生「深切」之名，或有別意。	•二月十日，日俄戰爭。 •二月十八日，郭秋生出生在台北新莊。 •五月十五日，台南製糖會社成立。 •五月二十日，「大租權整理令」公布，收買全台大租權之土地。 •七月一日，改革幣制。 •八月廿六日，准本島人改姓名。
1905	明治三十八年 二歲		•三月五日，楊守愚生於彰化。 •五月一日，張維賢生於台北。 •五月十三日，因日俄戰爭，謠傳波

西元	年號・年齡	事蹟	時事
			羅的海艦隊將襲台灣，宣布全島戒嚴至七月七日。 •八月廿日，孫中山在東京成立同盟會。 •九月五日，日俄和議成立。 •十月一日，實施台灣第一次全島性戶口調查。 •十月十八日，楊逵生於新化。
1906	明治三十九年 三歲		•五月廿三日,佐久間馬太總督上任。 •十月一日,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卸任。
1907	明治四十年 四歲		•三月六日，台北自來水工程興工。 •三月十三日,「台灣浮浪者取締規則公布。」 •十一月十二日，吳新榮生於佳里。 •十一月十五日北埔事件。
1908	明治四十一年 五歲	•九月，祖母喪。家貧，無以為葬。生父將先生過繼於姑表兄弟張玉書。住南投廳北投堡草鞋墩街參拾玖番地。以其所得葬母。 •先生過繼後，易名嘉裕，號楚女。弱冠後自號列良。(先生赴中國後,常冒籍為中國人，為避免日方特務騷擾及遭中國人排斥之故也。所以常用別名、筆名行世。先生	•二月廿六日，王詩琅生於艋舺。 •三月十八日，縱貫鐵路全線通車。 •五月十三日，郭水潭生於佳里。 •七月十三日，畫家李石樵出生。 •七月廿二日，廢止台民赴日渡航證規則。 •十月一日，發佈台灣違警令。 •十月，慈禧太后、光緒帝崩。

		之別名、筆名計有死光、南翔、紅草、之乎、者也等。） •先生養父張玉書，號笏山。一九二〇年加盟櫟社。原為雙冬富戶黃春帆氏掌櫃，因樟腦事務往來霧峰林獻堂家，得林階堂等人賞識，得於草鞋墩開設「腦館」，並以此興家。一九二五年，與友人在南投創立南陔吟社。一九三一年曾在「炎峰青年會」附設之讀書會擔任漢文教習。	•十二月二日，大清宣統帝即位。
1909	明治四十二年 六歲		•吳天賞生於台中。 •吳希聖生於淡水。 •徐玉書生於嘉義。 •張文環生於嘉義梅山。 •十月廿五日，地方官制改正，設台北、宜蘭、桃園、新竹、台中、南投、嘉義、台南、阿緱、台東、花蓮港、澎湖共十二廳。 •十一月五日黃得時生於台北樹林。
1910	明治四十三年 七歲	•入私塾（位於李春盛公館）。啟蒙於洪月樵。讀三字經等書，兼讀中國小學用課本。 •洪月樵，鹿港人，秀才出身。原名攀桂，學名一枝，字月樵。富漢族意識。	•五月廿五日幸德秋水大逆事件。 •西川滿（三歲）隨家人來台，住基隆。 •十月三日，公布「台灣林野調查規則」。

年份	年號・歲	事蹟	相關事件
		乙未割台後，改名繻，字棄生。(一八七二～一九二九)。著有《海外偕亡記》《中東戰記》《寄鶴齋詩矕》《八洲遊記》《寄鶴齋詩古文駢文集》。子炎秋，與先生相友善，戰爭期間兩人往來頗密。	・台灣總督府為台灣留日學生在東京設高砂寮供食宿。
1911	明治四十四年 八歲		・三月廿八日，梁啟超來台。 ・八月廿五日劉榮宗(龍瑛宗)生。 ・十月十日中國爆發辛亥革命。十二月廿九日，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 ・十一月廿三日劉捷生於屏東。
1912	大正元年 九歲	・塾師洪月樵返鹿港，改由施梅樵擔任(施亦鹿港人)。施梅樵名天鶴，著有《捲濤閣詩章》、《鹿江詩集》。	・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成立。 ・三月廿三日，林圮埔事件。 ・六月一日總督府興建。(一九一九年竣工。) ・六月廿七日，土庫事件。 ・七月三十日，明治天皇歿。 ・十二月九日，日本第一次憲政擁護大會。 ・四月一日，廖漢臣生於台北。
1913	大正二年 十歲	・斷髮，入草鞋墩公學校就讀。級任老師李逢霧，亦為本地人。熱心教育，	・三月十一日，巫永福生。 ・羅福星事件。

		先生在其教誨下，始擺脫傳統以記誦為主之讀書方式。先生對讀書感到趣味即始於此。惜李氏得有肺病，一年後即逝去。	・連溫卿、蘇璧輝成立「世界語言協會台灣支部」。 ・十二月十六日，中國革命黨台灣支部事發。
1914	大正三年 十一歲	・祖母逝。神棍藉機斂財，家中不得清靜。先生終身痛恨迷信，其來有自。成年後劇本「落陰」之寫作，或有源由。	・四月一日，林芳年生於佳里。 ・七月廿八日，一次大戰爆發；八月廿三日，日本對德宣戰。 ・八月廿五日，呂赫若生於豐原。 ・八月廿六日父玉書於台灣民報發表〈本社特設五問〉意見希該報「多記載文化經濟」，及「多鼓吹言文一致或白話文」，或「翻譯外國時事」，可見其對社及文學之態度。 ・十一月廿日，板垣退助來台組「台灣同化會」。父玉書曾加入該會，但該會旋為總督府查禁。自此後玉書先生誓不穿和服，亦不涉足政治。
1915	大正四年 十二歲	・升上公學校三年級。參加學校遊藝會之演講，先生因只得事前半小時之時刻準備，故臨場時過度緊張，而不知所云，又不知如何收場。直到校長帶著怒氣喊叫「下來吧！」才得下台。此一失敗之刺激，遂發誓以後之演講，決不重蹈覆轍。	・四月三十日安東貞美任台灣總督。 ・五月一日，公立台中學校開校。 ・八月二日，「西來庵事件」爆發，余清芳抗日。事敗被叛處死刑者達二百八十八人。 ・中國「雲南起義」。反袁稱帝。 ・十一月十日，日皇大正即位。

年	年代	事蹟	大事
			·十二月十五日，鍾理和生於屏東。
1916	大正五年 十三歲		·二月廿五日，王昶雄生於淡水。 ·三月廿二日，袁世凱取銷帝制。 ·七月三日，江定等三十七人被判處死刑。「西來庵事件」告一段落。 ·七月八日，陳夏雨生。
1917	大正六年 十四歲	·升上五年級。因為同學誣告先生在教室中講台灣話，遭受留校勞作處罰。先生以動物為例，向同學陳述為何台灣人不能講台灣話。言談中涉及日本殖民台灣諸事。同學起相附和，集體罷作。日人級任導師以先生為主謀，欲以羅織入罪，刑訊一個多小時。然先生仍持言「無人教導」。事以退學處分結束。霧峰林獻堂得悉，乃向玉書先生建議送先生至日本繼續就學，願代為照顧云云。 ·八月，隨同林獻堂，搭「備後丸」赴日求學，偕林氏子弟進入傳通院礫川小學校五年級。第二學期起寄宿於日人長塩氏宅。與洪清江(先生二年級時之級任)之子耀動為伴。	·四月十六日，靜修女校創立。 ·十一月七日,列寧建立蘇維埃政權。 ·十二月十八日，公佈「台灣新聞紙令」。

1918	大正七年 十五歲	•遷居蔡式穀宅。未久，再遷至日人河本氏宅。 •始習劍道，並與日人同學和睦相處。同級生中有山田氏、佐竹氏與先生交好，三人號稱「礫川三烏鴉」橫行於學校。所謂「民族意識」此時隨環境變化，已消失殆盡。	•一月十八日，威爾遜發表「十四點和平宣言」，台灣人士深受影響。 •三月三十日，蔡式穀、林呈祿諸人成立「啟發會」。推林獻堂為會長。 •六月六日，明石元二郎任總督。 •七月廿二日，林幼春、蔡惠如創立台灣文社。 •八月三日，日本發生搶米騷動。 •九月二日，「原敬內閣」成立。 •十一月十一日，一次大戰結束。
1919	大正八年 十六歲	•升上六年級。第二學期中與教師擊劍，發生衝突，日籍教師以「清國奴」辱之，身分差別之感再生，自此後先生民族意識日趨堅定，終至投身反日工作。 •小學校畢業，就讀豐山中學。暑期一度返台省親。	•一月十八日，巴黎和會。 •三月一日，朝鮮爆發獨立運動抗爭事件。 •三月十八日，林海音出生於頭份。 •五月四日，中國五四運動。 •六月廿八日，凡爾賽和約簽署。 •十一月廿九日，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上任。約略同時林呈祿、蔡惠如等於東京籌組「聲應會」。
1920	大正九年 十七歲	•轉學至東京府立化學工業學校。先生自言「要救民族國家，須先振興科學」，故選擇了自身也不喜歡的學校就讀，孰料此事為父親反對。先生為貫徹自身主張，遷入高砂寮寄宿，用	•一月十一日，東京「新民會」成立。 •七月十六日，《台灣青年》創刊。 •九月一日，地方官制改定。台北設「市」，地名大幅更改，如「打狗」改高雄。

	1921	1922
	大正十年 十八歲	大正十一年 十九歲
以撙節生活費用，以防父親中斷學費。在高砂寮寄宿期間，常與彭華英、范本梁、林呈祿等人暢論政治、時事。由是識見俱進，為日後投身社會運動奠下基礎。 •老家舉家遷往台中市，開設布行。	•因去年轉學，父親仍持反對態度，至於斷絕援助，先生不得已束裝返台。	•先生返台後，與父親懇談，遂得返日，插班考入青山學院中學部三年級。返日之初，又暫居高砂寮。一度與張暮年等人於中華青年會館合演日人尾崎紅葉之《金色夜叉》及《盜瓜賊》。先生並於《盜瓜賊》一劇中扮演小偷一角。後承父命離開高砂寮，遷往日人柴山氏宅。 •斯時「議會請願運動」正如火如荼展開。先生於此則持反對態度，並倡言「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台灣應該爭取獨立自由」。惜未獲多大之回響。
•十一月九日，蔡培火倡議「六三法」撤廢。	•一月三十日，第一次「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四月廿八日，〈台灣通史〉刊印完成。 •十月十七日，「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於靜修女校，並發行會報。	•一月八日，總督府施行治安警察法。 •一月廿八日，北京「台灣青年會」成立。 •二月十六日，第二次「議會請願運動」。 •十月十七日，蔣渭水、石煥長組「新台灣聯盟」。 •十一月，第二次北師事件。

1923	大正十二年 廿歲	・八月下旬，先生因肺炎返台。九月一日關東大地震，青山學院受損嚴重。先生以此為由，力求其父同意轉赴中國求學，年末遂得赴上海，寄居「台灣青年會館」。	・四月十五日，《台灣民報》創刊。 ・日本作家有島武郎於六月九日自殺。後先生於《台灣新聞》發表〈哀悼有島武郎〉一文。先生自此受日本警察注意即始於此文。 ・十月十五日，內田嘉吉總督上任。 ・十月十二日，張我軍成立「上海台灣青年會」。 ・十一月，中國國民黨改組，確定聯俄容共路線。 ・十二月，彭華英、蔡惠如組「上海台灣青年會」。 ・十二月十六日，「治警事件」。 ・十二月，周天啟於彰化組「鼎新社」推展新劇運動。
1924	大正十三年 廿一歲	・入學上海商務印書館附設之國語師範學校。該校以吳稚暉為校長，教師則有鄭振鐸、沈雁冰諸人。 ・留居上海期間，與同鄉郭德欽(公學校同學)洪絹治、洪紹潭等人來往密切。五月「台灣自治協會」在上海成立。六月十七日該會假務本英專舉行反對「始政紀念」集會。會中先生發表演說，攻擊殖民統治。	・二月八日，范本梁、許地山在北京成立「新台灣安社」。 ・七月，「公益會」召開有力者大會。文協則於十三日召開無力者大會反制。 ・七月廿五日至八月一日，「治警事件」一審，全體無罪。 ・七至十一月，「竹林事件」。 ・九月一日，伊澤多喜男總督上任。

・暑期返台。台灣文化協會八月十八、十九、九月廿七日在草屯共樂園先後舉辦兩次演講會，聽眾多達四百餘名。先生兩次皆與會。第一次且主講〈家庭之爭〉，第二次則主持閉幕會

・十月廿八日，先生與洪元煌、李春哮等人籌組「草屯炎峰青年會」，並演出文化劇〈辜狗變相〉〈改良書房〉。

・十一月，先生邀集友人，發起徒步環台旅行運動，行前並得林幼春贈詩。對於林氏不假思索，隨口吟詩之舉，先生頗感震撼，一改往昔對於舊詩人之成見。唯旅行一事至東港而廢。旅途中嘗訪林茂生，受邀參預文化講座並發表演說，但為日警所中止。

・張我軍於《台灣民報》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一文（十一月廿一日出版）引發台灣文壇之重大波瀾。

・十一月二日文化協會另開會員大會於彰化。

1925

大正十四年

廿二歲

・七月，「炎峰青年會演劇團」成立，成員二十八人。是後該團曾至霧峰各地公演，劇本、導演多由先生負責。

・先是日議員田川大吉郎於去年末訪台，途經草屯，草屯人士設歡迎會。會中針對台蕉配銷受神戶「荷受組合」所壟斷情形有所討論。蔡培火主張組織生產組合以為因應之策。先生則力主於日本市場外另闢新市場抗衡。蔡

・三月十二日，孫中山逝世。

・四月十八日，廈門「中國台灣同志會」第一次宣言。

・五月十二日，實施治安維持法。

・六月廿八日，「二林蔗農組合」成立。

・十月，彰化「二林事件」。

・十一月廿七日，王詩琅、王萬得在台北組「台灣黑色青年聯盟」。

年代	年號・年齡	生平	記事
		氏以先生年輕識淺，且為個人意見，不讓先生發言，雙方進而引發衝突。事後，先生暫不加入文協，進而與蔡氏一派對立。 ・十一月一日，處女作小說《總滅》以日文發表於《櫻草》。	・十一月一日，葉石濤生於台南。
1926	昭和元年 廿三歲	・三月二日，「炎峰青年演劇團」至竹山公演。首夜演出《改良書房》《鬼神末路》《愛強於死》等齣。次夜以《舊家庭》《浪子末路》《啞旅行》《小過年》等劇上演。其中脚本泰半出於先生之手。 ・三月廿五日，林階堂出資之「東華名產會社」成立。其上海支店長賴金圳與先生熟識。而先生欲以貫徹打開台蕉新市場之主張，遂透過賴氏，前往上海經商。孰知上海水果市場全為廣東、寧波商人所控制，先生雖向公司建議聯合寧波對抗廣東(以廣東亦生產香蕉之故)。但未為公司採納。公司營業狀況不佳。先生甚急，乃自行於虹口市場設攤，直接販售，却又因攤位牌	・六月，蔣渭水創設「文化書局」。 ・六月，張月澄於廣東《民國日報》發表〈台灣痛史〉。 ・六月六日，大甲農民組合成立。 ・七月十五日，范本梁返台，被捕。 ・七月十六日，上山滿之進總督上任。 ・七月，「中台同志會」成員藍煥呈、李振芳、吳麗水等人被捕。(三月廿一日於廈門成立。) ・十二月廿五日，大正天皇歿。

年代	年號・年齡	生平事蹟	時事
		照問題，為人所誑，落得血本無歸。不得已往奔廣州依同鄉郭德欽、洪紹潭諸人。 ・蟄居廣州期間，先生積極投入社會運動。與郭、洪諸人相議籌組團體，從事反日運動。九月十五日，「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成立。會中並決定由先生、郭德欽、林文騰、張月澄、洪紹潭等五人擔任委員。 ・九月五日，第二篇小說〈兩名殺人犯〉以日文發表於《櫻草》。	
1927	昭和二年 廿四歲	・二月廿四日，以張死光為名，偕張月澄往訪魯迅。三月廿八日再訪魯迅。 ・年初學生聯合會內部受廣東國共暗爭情勢影響，以李友邦為首部分成員，以先生並無學生身分，怎能加入聯合會為由，進行領導權爭奪。先生乃宣布退出該會，但未為大會接受。未幾，先生考入中山大學法科政治系，紛爭即告平息。三月十三日聯合會例會林文騰提議籌組革命團體，先生附和，並言組織革命青年團，以多吸收成員。大會議決，委託先生、林文騰、郭德欽三人起草綱領、會章，會名暫	・一月三日，「台灣文化協會」左右鬥爭，雙方正式分裂。以連溫卿為首之左翼掌控了文協。 ・一月二日，台中「中央書局」設立。 ・二月一日，「台灣黑色青年聯盟」四十四人被檢舉。 ・二月廿一日，大東信託在台中市開業。 ・五月三日，濟南慘案。 ・七月十日，「台灣民眾黨」在台中成立。 ・十二月四日，第一回台全島農民組

定「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會後成員一體參與廣州東較場之示威遊行。
•三月廿七日，聯合會成員廿餘人聚集中山大學，議決成立「台灣革命青年團」。先生被推選為「宣傳部部長」。春季末，革命團成員參加東較場歡迎四國勞動者代表大會。
•四月一日，青年團機關刊物《台灣先鋒》出版。先生以紅草為名，發表〈台灣怎樣要革命〉一文。
•四月十五日，李濟琛受命於蔣介石，進行廣東內部之清黨工作。「朝鮮革命青年團」首遭池魚之殃。「台灣革命青年團」工作一度稍沈寂。月末先生受命返台籌募運動基金，獲張煥珪、林幼春等人捐助。此時正值「高雄大罷工」，先生一度思參預其事，協助工人收局，但為特務跟監，不得脫身，乃罷。
•五月，「台中一中事件」爆發，先生居幕後指導，與學生共同作戰。五月十一日，先生以學生家長身分參預該校父兄會，唯會談並無結果。會後先生擬下八條戰略，指導學生進行罷課活

合大會。

1928

昭和三年
廿五歲

動。迄於十六日，一度有三分之二學生參預其事。唯不久先生即以涉嫌台中一中事件罪名被捕。而台中一中之學生為日警分化離間、各個擊破，至六月初，終以悲劇收場。

- 五月在廣東的革命青團年團再度活動，聲援「濟南慘案」。六月發表文章，針對「台中一中事件」提出抗議，該文登於六月十三日之廣東《民國日報》。六月十七日該團再度於《民國日報》就始政紀念提出批判。但此一期間廣東政府仍持續清黨，革命青年團隨後即遭取締，人員四散，形同解體。
- 八月六日，台灣總督府針對「廣東事件」關係者進行全面檢舉，人數達六十四人。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為止，共三十二人被捕。
- 台中一中事件過後，先生無罪開釋。但隨後再以涉嫌「廣東事件」被捕。
- 二月廿一日，先生以涉嫌違反「治安維持法」被起訴。
- 十二月四日，「廣東事件」判決。林文騰、張深切、郭德欽各懲役三年。張

- 范本梁遭判刑五年。
- 新文協聯合農民組合創刊《大眾時報》。
- 三月十七日，「台北帝國大學組織規

		月澄懲役二年，緩刑五年。林仲節、林萬振、簡錦銘各懲役一年六個月，緩刑四年。林如金、溫幸義、盧炳欽、吳文身各懲役一年，緩刑五年。	程」公布，設校於水源地。 •四月五日，日本共黨台灣民族支部在上海成立。 •六月三日，「台南墓地事件」。 •六月十五日，川村竹治總督上任。 •六月十七日，台灣民眾黨分裂。
1929	昭和四年 廿六歲	•四月五日，「廣東事件」控訴審判決。先生與郭德欽改判懲役二年。餘同一審。 •先生於獄中，開始進行大量的閱讀，內容龐雜，其中尤以中國古書為要。前此先生對於中文書籍之閱讀須以返點倒讀方式進行;自此後先生對於中文已然較有掌握。	•七月三十日，石塚英藏繼任台灣總督。 •十二月楊逵遭台共分子排擠出農民組合。 •新文協於十一月三日召開第三次大會。連溫卿遭排擠。十二月三十一日新文協開除連氏。
1930	昭和五年 廿七歲	•先生刑期滿，出獄。 •八月十日，先生與何集璧等人在台中興業組合樓上舉行「台灣演劇研究會」發會式。成員總計約二、三十人。 •八月，黃石輝掀起「鄉土文學論爭」。先生一度投稿於《台灣新民報》，表達自己的看法。 •十月十八日，《台灣新民報》登載署名「曝狂鐘」的文章，針對「演劇研究會」內部紛爭加以攻詰。質問先生欲	•一月二日，「台灣民眾黨」向國際聯盟控訴日本當局准許吸鴉片，三月一日，國聯派員至台灣調查鴉片。 •八月十七日，「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在台中成立。 •十月廿六日，「台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於台南舉辦十天。 •十月廿七日，「霧社事件」。

年份	年號／年齡	事蹟	時代背景
		將「演劇研究會」帶往何處？長此以往，唯恐研究將成資產階級的辯護者。不久研究會即告分裂。林庚申、林竹林脫會，另組「台中蓬萊演劇團」，但此團為時不長，即告解散。 ・十一月十一日「演劇研究會」舉行公演。在樂舞台演出《論語博士》《暗地》等齣，未料大受好評。是以事後又於豐中倉庫續演《暗地》《接木花》等劇。	
1931	昭和六年 廿八歲	・六月廿日，先生之〈鐵窗感想錄〉開始在《台灣新民報》連載，迄於七月十八日止。惜內容多被日警刪除（食割）、塗黑。 ・「演劇研究會」成立後，日警對先生之刁難有增無減。先生亟思前往上海，期望避開特務跟隨，故藉口研究文藝，申請渡華旅券。獲准後，先生隨即往赴中國。	・一月十六日，太田弘政總督上任。 ・二月十八日，台灣總督命令解散民眾黨。 ・九月十八日，「滿洲事變」，台灣島內形勢緊張。復以日警自昭和二年以來刻意打壓、分化台灣之社運團體，社會運動人士或被捕、或隱匿、沒落、轉向。自昭和六、七年後，社會運動狀況不似以前熱烈。 ・六月三十日，王詩琅、別所孝二等人組「台灣文藝作家協會」。 ・八月，郭秋生掀起「台灣話文論爭」。

年份	年號／年齡	生平	大事
1932	昭和七年 廿九歲	·一月，先生抵上海。與何非光、張芳洲同租屋於公共租界。三月，為生活所迫，進入日人山田純三郎主辦之《江南正報》擔任副刊主編及時評。母歿，回台奔喪。未幾，又返上海。同年在上海與林愛月女士結婚。林女士是先生「演劇研究會」同仁。 ·本年完成兩部電影劇本，分別為《女人》、《冷血英雄》，分別投交聯華及明星兩影片公司。前者審查通過後，卻無下文。後者託張芳洲與先生接洽，要求改編，但為先生所拒。是故，兩劇本皆未印行出售。	·一月一日，《南音》雜誌創刊。 ·一月廿八日，日軍與中國十九路軍在上海激戰。 ·三月二日，南弘總督上任。 ·三月廿日，張文環、蘇維熊、王白淵、巫永福等人在東京成立「台灣藝術研究會」。 ·「五一五事件」，日本首相犬養毅為陸軍軍官刺殺。 ·五月廿七日，中村健藏總督上任。 ·六月廿九日，日警方置特別高等警察（俗稱特高）。
1933	昭和八年 三十歲	·《江南正報》陷於財務問題，宣告暫時停刊。先生在上海徘徊數月，謀職未成，乃決意返台。返台後即受特高跟監。因此決定暫時靜觀形勢，不作積極活動。 ·十一月三日先生在《台灣新聞報》發表〈觀台灣鄉土文學戰後的雜感〉。	·七月十五日，雜誌《福爾摩沙》創刊。 ·十月廿五日，郭秋生、廖漢臣等人在台北成立「台灣文藝協會」。 ·十二月廿九日，陳炘、楊肇嘉與日人宮原武熊等人在台中公會堂成立「東亞共榮協會」。
1934	昭和九年 卅一歲	·先是先生因業務往來需要，而結識大東信託（總經理）陳炘，當「東亞共榮協會」成立之後，台灣人陣營內部	·三月一日，滿洲帝國成立。 ·七月十六日，「台灣文藝協會」（台北）機關刊物《先發部隊》發行。

以楊肇嘉為首之部分成員與陳炘等人彼此間呈顯對立氣氛，陳炘委託先生從中斡旋。先生雖婉辭此事，但陳氏感之以熱誠，先生遂以朋友身分往來於兩者之間。事雖未有成效，但先生與陳炘却成好友。先生對於陳氏「以退為進」的對日鬥爭策略頗為欣賞，因此自身也採取了老子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的想法。決意進入「東亞共榮協會」之機關刊物《台中新報》（後改名《東亞新報》）擔任記者及編輯事務。殊料事為台中州政府及總督府刁難，賴陳炘之具保，事始成。

・「滿洲事變」後，台島內社會運動氣氛漸降。枱面上最後僅存自治聯盟及農民組合。餘則轉入地下。先生與賴明弘等人有感於此，乃協商籌組文藝團體用以替代，由賴氏南北協調聯絡。

・五月六日，假台中市西湖咖啡館舉行台灣文藝聯盟創會式。全島文化工作者共八十二人參與盛事。同日，議決成立「台灣文藝聯盟」，並發行機關刊物《台灣文藝》。會中先生倡議與舊詩人聯合，但遭眾人反對而作罷。會後，

・八月五日，東京台灣同鄉會主辦鄉土訪問演奏會。

・八月廿六日，江亢虎來台，鼓吹東洋文化，台灣文藝協會舉行歡迎會，但不歡而散。

・八月二十六日，文藝聯盟嘉義支部在徐玉書、鄭盤銘、林快青籌劃下成立。

・楊逵〈送報伕〉一文於十月刊載在日本《文學評論》雜誌，且獲二等賞（一等從缺）。

眾人於彰化溫泉聚會，公推賴和為文聯委員長，但賴氏固辭，遂改推先生為委員長，賴和、賴慶、賴明弘、何集璧及先生為常務委員。唯會議雖順利完成，但會議未開始時，彰化區成員即集體故意遲到，會議進行中北部成員又極力反對成立全島性文藝團體。為文聯日後發展埋下陰影。

•文聯大會後，忽忽數月，文聯即陷於財力、人力困窘狀態。絕大多數委員及成員，未盡心力投入工作。日常事依賴先生、何集璧及黃再添(先生「演劇研究會」同仁)等人之力，始得運轉，而資金之挹注，則向中部士紳如林幼春、林獻堂等人募集。職是之故，文聯之財政多賴盟外之人，特別是所謂舊詩人之贊助，始能順利運作。日後文聯之消歇，與此關係甚大。

•八月，先生於《台灣新民報》發表〈驅逐江亢虎出境〉。

•十月廿七日，「大溪革新會」出刊紀念雜誌。其中有先生之文〈談吃錢官與神佛〉，但檢閱時被裁。

•十一月五日，《台灣文藝》發刊。第一

西元	年號/年齡	事蹟	背景
		號由先生主編，且先生於該號中發表小說〈鴨母〉、評論〈評《先發部隊》〉；及〈偉大詩人林幼春先生〉等文。 •十二月十八日，《台灣文藝》二卷一號出刊。先生發表〈文聯報告書〉〈小評文藝大眾化〉及〈第一回台灣全島文藝大會記錄〉。	
1935	昭和十年 卅二歲	•「東亞共榮協會」發展迅速，迄於昭和九年底，會員達到萬餘人，各地紛設支部。《東亞新報》總編輯葉榮鐘遂往調台北，負責北部業務，中部報社事務改由先生負責。 •《台灣文藝》二月一日出刊二卷二號。先生發表〈對台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 •四月一日，發表〈對台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續篇〉於《台灣文藝》二卷四號。 •五月五日，《台灣文藝》刊載先生之〈台灣文藝的使命〉一文。 •發表劇本〈落陰〉於《台灣文藝》二卷七號（七月一日發刊）。 •八月，發表〈歡迎文聯大會〉於《台灣文藝》二卷八、九號合刊。	•一月，「東京台灣藝術研究會」與文聯合流，改稱文聯東京支部。 •二月五日，「台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舉辦「文藝座談會」，於新宿文聯常務委員賴明弘往會。 •三月，文聯埔里支部成立。 •六月，文聯佳里支部成立。 •八月十一日，文聯假台中市民館舉行第二回大會。 •文聯二次大會氣氛怪異，日後編輯方針爭議，於此次大會中已見端倪。 •《台灣文藝》自從得到東京、佳里支部成員支持投稿，日文作品逐漸取得壓倒性優勢，中文作品數量日漸稀少。因此增加日文編輯，由楊逵負責此一業務，而中文仍由張星建負責。

·自先生負責《東亞新報》事務後，對於文聯刊物《台灣文藝》之編輯，實苦於分身乏術，幸得張星建等人之助，《台灣文藝》方能如期刊行。而刊物之主編、發售等事務也漸由張星建主導，先生方有餘暇思索《台灣文藝》發展問題，故而寫下自身對於新文學較具體系性的想法。強調正視台灣社會「現實」、先民族後階級的文學觀點，作為台灣文藝工作文學創作之理論建議。

·六月，文聯機關刊物編輯群因意識型態差異、編輯方針主導權爭議，逐漸衍為張星建、楊逵對立二方，且雙方論爭日益枱面化。張星建在此過程中得到先生及東京支部成員劉捷、吳天賞、張文環、巫永福等人支持，情況遂日益明朗化。十一月，楊逵退出編輯群。十二月，廖漢臣及楊逵另創《台灣新文學》雜誌。唯張、楊雙方論爭仍持續，張星建甚且以藍紅綠的〈紳士の道〉為例攻擊楊逵盜用《台灣文藝》的稿件。此後文聯內部即呈顯對立狀態。又加上《台灣文藝》和《台

·四月廿一日，台中大地震。台中文聯成員發動賑災義舉。殊料此舉反遭台中州政府敵視。以謠傳文聯誹謗政府貪污無能之故。

·文聯東京支部成員張文環作品〈父の顔〉入選《中央公論》小說徵文第四名。

·十一月廿二日，台灣舉行第一屆市街庄議員選舉。

		灣新民報》間，不知何事摩擦，使文聯立場更加困難。終導致《台灣文藝》在無形中停刊，而文聯則漸趨解體，名存實亡。	
1936	昭和十一年 卅三歲	•七月，朝鮮出身的舞蹈家崔承喜來台公演。先生嘗往訪於台中民眾旅社特別室，並就殖民地人民自覺問題交換意見。對於崔氏愛國精神，先生深感敬佩。然而先生此時對於台灣獨立、解放之想法，亦不似早年之樂觀。 •「東亞共榮協會」由於主導權落入台灣人手上，所以台中州政府及日人成員即施壓於協會。甚且州當局以強化、擴大協會為藉口，奪取《東亞新報》出版權，而後任其停刊。先生遂失業，蟄居於家中。	•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再度發生政變，陸軍官兵攻進首相官邸，暗殺了藏相高橋是清等大臣。 •五月廿二日，「台灣文藝聯盟」台北支部成立。 •八月廿八日，《台灣文藝》三卷八、九號合併出刊。此後該雜誌即陷於停刊狀態。 •九月二日，小林躋造總督上任。此後台灣重回武官統治。 •十二月二十二日至廿四日，中國名作家郁達夫應總督府邀請來台訪問，文聯部分成員與相晤，並合影留念。
1937	昭和十二年 卅四歲		•四月一日，總督府下令禁止漢文，雜誌、新聞刊行影響尤大。 •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爆發。 •七月十五日，總督府下令解散地方自治聯盟。 •八月十五日，台灣軍司令宣布進入

年份	年號・年齡	事蹟	時事
			戰時體制。 •九月十日，官方設置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 •十二月九日，在台灣官方策動下，各地掀起「改革陋習」運動。
1938	昭和十三年 卅五歲	•「七七事變」後，先生感於時局及自身在台已無可能有所作為。思前想後，先生決意隻身再往中國。本年二月，先生請得旅券後，即搭往大連的輪船離台。船抵大連後，先生為水上警察及特務刁難，要求簽署「轉向聲明」，並下令解散「台灣演劇研究會」及「台灣文藝聯盟」，否則不准上陸或將取消護照。先生以「寧願坐回頭船」回應，堅持不肯簽署。日警滯留先生數小時後，終於放行。 •三月初，先生抵北平。暫下榻於吳子瑜(台籍)宅。旋即結識洪炎秋、張我軍諸人，且與舊識彭華英、謝廉清等人取得聯繫。 •四月，在北平來今雨軒(中央公園)得儲小石介紹，認識「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校長王石之。王氏邀請先生前往該校	•小林台督發表「關於台民志願兵制實施」，做為日帝驅使台灣青年為其侵略砲灰之先聲。 •三月卅一日，日本公佈「國家總動員法」。 •五月廿八日，日政府積極移民來台，各地次第成立日本移民村。

		擔任訓育主任兼教授。先生當面應允。未幾，先生復在王克敏主持的「新民書院」擔任日語教授。至此生活較為安定。 •六月，先生家眷安抵北平。遂賃屋於外交部街大羊宜賓胡同之汪宅。	
1939	昭和十四年 卅六歲	•經由日本美術評論家一氏義良介紹，識得日人堂ノ脇中佐，受其邀請創辦《中國文藝》。先生以堂ノ脇應允：一、編輯方針、內容不受干涉，二、雜誌不刊宣傳標語，三、不做主義思想宣傳，四、不做政治活動等條件，遂擔任《中國文藝》之主編及發行人。九月一日，《中國文藝》創刊號正式出刊。其中〈創刊詞〉〈編後記〉均出自先生手筆。在編後記中先生強調出保持固有文化、鼓舞民心之重要性。 •十月，父歿，返台奔喪一個月。其間刊物委由張我軍代為編輯。返北平後，因同鄉人之推選，出任「台人旅平同鄉會」會長，並籌組「中國文化振興會」。	•三月十日，日本公布「興亞院聯絡部官制」。 •五月十九日，小林總督在東京宣佈治台重點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 •七月十日，台灣官方公布「國民徵用令」。 •九月一日，德國侵略波蘭。二次大戰開始。 •十月七日，台灣施行「米配給統制規則」。

西元	年號・年齡	生平	大事
1940	昭和十五年 卅七歲	•先生因藝專及新民學院內部門爭波及，遭人密告違反大東亞共榮圈政策，不得已辭去教職。八月，日人山家亨少佐系統控制的「武德報社」接收《中國文藝》，改以張鐵笙為主編，先生被迫辭職。此時先生且受興亞院及日本憲兵特務的注意，為避免困擾，乃藉口整理財產，攜眷返台。 •本年，先生總計先後在《中國文藝》發表〈隨便談談〉（一卷六期、二卷一期）〈廢言廢語〉（二卷二期）〈一個聚會的記錄〉（座談會記錄）〈戰爭與和平〉〈廢言廢語〉（以上二卷三期）〈廢言廢語〉（二卷四、五、六期）〈散言碎語〉（三卷四期）等文。同時也整理養父張玉書之《笏山吟草》詩集，並選擇部分，分別發表於《中國文藝》二卷二、三、四、六各期。	•一月，日人西川滿在台北組「台灣文藝家協會」。 •二月十一日，修訂戶口規則，規定台灣人改換日本姓名。 •十月十二日，日本「大政翼贊會」成立。十一月廿二日，總督府發表「台灣大政翼贊會計劃方案」。 •十二月十六日，長谷川清總督上任。
1941	昭和十六年 卅八歲	•先生返台期間，仍不斷遭受日警騷擾，且日方特務認為先生返台有所意圖。所以先生只得於返台十個月後再往北平。 •抵北平後經由藝專同仁橋川時雄介紹，進入已「轉向」之日本社會運動	•二月十一日，《台灣新民報》改為《興南新聞》。 •四月十九日，「皇民奉公會」成立，六月廿一日，各地「奉公會」分會成立。 •五月，張文環、王井泉等人在台北

		人士安藤氏經營之「新民印書館」擔任編輯。 ·本年，先生所發表的文章計有〈北京感想錄〉(興南新聞二月二十六日)〈あの頃この頃の思ひ出〉(台灣文學創刊號)及著作《兒童新文學》《日本語要領》。(以上由新民印書館初版)，同時也先後二次應北平廣播電台演講，講題分別為〈新文化的理念〉〈振興中國文化的意義〉。	組「啟文社」。六月其機關刊物《台灣文學》創刊。 ·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變」，日本對美宣戰。
1942	昭和十七年 卅九歲	·八月，先生與友人合譯之《現代日本短篇名作集》，由新民印書館初版。其中先生譯有橫光利一的〈秋〉一文。	·四月，第一梯次台灣志願兵入伍。 ·十月，「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東京召開，台籍作家參加者有張文環、龍瑛宗、張我軍等三人。 ·先生之子孫煜為日領事館強迫就讀日人小學校。在北京的台灣人受此命令者，唯先生一家。
1943	昭和十八年 四十歲	·四月，日軍華北指揮部要求先生籌辦刊物。先生徵得新民印書館同意，擬同周作人創辦一藝文雜誌，恰巧自稱負有「日本文學者報國會」使命的日人林房雄亦擬在北平籌辦刊物。雙方即一同組織「藝文社」，推周作人為社	·一月卅一日，賴和逝世。 ·二月十一日，皇民奉公會文學獎頒發，得主分別為西川滿、濱田隼雄、張文環。 ·五月十二日，實施「海軍志願兵條例」。

長，先生與張我軍同為編輯之一。但先生與林房雄、沈啟旡於會議中屢有牴牾，復以先生反對林房雄擔任雜誌主編，因此與周作人間遂有芥蒂，先生隨即退出編輯群。而新民印書館也在興亞院的壓力下讓先生自動請辭，興亞院甚且通令各公教機關不得錄用。因而先生只得失業居家，幸得同鄉黃烈火、宋維屏等人資助，先生乃改行從事商業維生。

•本年先生發表文章總計如下：

一、〈點線面的關係〉（《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十卷六期）

二、〈理性與批判〉（《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十卷十二期）

三、〈民族精神與民族性〉（《華文大阪》每日）

•八月，第二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東京召開，台籍作家參加者有張我軍、楊雲萍、周金波三人。

•九月二日，厚生演劇研究會於台北永樂座演出「閹鷄」。

•十一月十二日～二十六日，開羅會議。

•十一月十三日，「台灣文學奉公會」在台北舉行「台灣決戰文學會議」。

•十一月廿五日，美機轟炸新竹機場。

1944

昭和十九年
四十一歲

•本年，先生投注精神於經商，及為同鄉會服務。

•秋初，先生為理解大陸內地情況，乃沿津浦路南下徐州，順訪昔日文聯盟友劉捷、吳坤煌。

•一月廿日，總督府公布〈皇民煉成所規則〉，全台設五十處，加強皇民化政策推行。

•一月廿四日，簡化手續，鼓勵台人改日本姓名。

	1945
	昭和二十年 民國三十四年 四十二歲
•八月中旬，先生有事經京漢路至新鄉，並馳往開封觀光，順道拜訪前些年支持先生辦理《中國文藝》的日人浦野少佐。	•四月中旬，先生遭人密告為抗日分子，煽動青年學生反日，鼓舞他們前往重慶。因此，為日軍一四二〇部隊三谷支隊逮捕。幸得日軍天津特高機關長浦野壽一郎中佐之助，方能脫險。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其後先生與洪炎秋、吳三連及同鄉會成員合力協助滯居華北的台灣軍伕返台。 •本年，先生於《新台灣》發表〈一台灣人的呼喚〉一文。
•九月一日，台灣實施「台民徵兵制度」。 •十月，全台遭猛烈轟炸，死傷慘重。	•一月廿二日，盟機五百餘架空襲沖繩及台灣，日後尤不斷加緊。 •三月十七日，日本訂立〈殖民地政治待遇案〉，決定撥眾院五席給台人。 •四月一日，總督府改善台籍官吏待遇，一視同仁。 •四月三日，勅選林獻堂、簡朗山、許丙三人為貴族院議員。 •八月十五日，日皇下詔無條件投降。 •八月廿九日，國府任命陳儀出任台灣行政長官。 •十月廿四日，陳儀抵台。翌日，行政長官公署成立。 •十月廿五日台北市公會堂（後改中山堂）舉行台灣區受降典禮。 •十月三十一日，台省接管委員會成立。 •十一月八日，州廳以下各級機關正式接收。

年份	年號・年齡	生平事蹟	時事
			・十一月十八日，台灣文化協進會成立。 ・十二月，各地物價騰貴，達到光復之初的數十倍。 ・十二月十七日，陳儀在「紀念週」集會中，辯明專賣制度的繼續和省營貿易的意義。 ・十二月廿七日，長官公署發布各縣縣長。其中僅高雄縣謝東閔、新竹縣劉啟光為台灣出身。
1946	民國卅五年 四十三歲	・春，先生携眷返台。 ・九月，受友人台中師範校長洪炎秋邀請，擔任該校教務主任。同時，郭德欽也應邀擔任總務主任。 ・本年，先生先後在《和平日報》發表〈四篇小詠詞〉〈記范烈士本梁〉。	・一月廿五日，開始公民登記。 ・七月二十日，毛澤東以「保衛戰」為名阻止蔣介石進攻，宣布準備正式交戰。 ・十月二十五日，廢止報紙雜誌日文版。
1947	民國卅六年 四十四歲	・二月廿七日，因緝查私菸事件，爆發「二二八事件」，全島各地群起反抗陳儀政權。 二二八事件期間，先生也曾參與其中。至三月中旬，國府軍隊進佔台中市時，先生得到友人通告，已遭通緝，先生遂避往南投其四弟鴻禧之中寮山中數月。依據國民黨中市黨部向南京	・三月二日，台中民眾假台中戲院召開「市民大會」，同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台北成立。 ・三月三日，「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成立。同時，鍾逸人也在台中師範成立「民主保衛隊」。 ・三月五日，謝雪紅聯合林獻堂、黃朝清等各界人士成立「台中地區時

		政府所提調查報告顯示：先生遭到通緝是因為「提議將外省人集中於台中師範加以保護，甚且意圖抵抗政府軍隊。為暴動首要分子，屬謝雪紅派系下之主要幹部」。先生此一「嫌疑」，至六、七月時得到省黨部委員、少將參謀蔡繼琨之助，得以洗脫，通緝令亦隨之撤銷。自此後，先生即不再涉足於政治，一心文化工作。 •先生避居山中期間，先後寫下《我與我的思想》《在廣東發動的台灣革命運動史略》等著作。就其內容而觀之，其背後實籠罩著陰影，有自我辯護意味。 •二二八事變，先生雖賴友人之助，逃過刼難，但自此後，迄於逝世為止，先生及家人都長時期遭到國府特務之跟踪監視。	局處理委員會。」 •三月九日，國府軍隊第廿一師在基隆登陸，開始鎮壓行動。 •三月十五日，台中治安狀態恢復常態。 •四月三十日，台中地區二二八事件參與者自首者合計一千三百多人。 •五月五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撤廢。 •五月十五日，新任台灣省政府主席魏道明抵台。 •七月卅一日，二二八事件參與者自首期限截止。 •十一月三日，「三七·五減租」名稱成立。
1948	民國卅七年 四十五歲	•一月，先生著作《我與我的思想》，由台中中央書局出版。 •十二月，著作《在廣東發動的台灣革命運動史略—附獄中記》由台中中央書局出版。	•四月三十日，國民大會通過「全國動員戡亂案」。五月十日施行。

1949	民國卅八年 四十六歲		·一月五日，陳誠就任台灣省主席。 ·二月四日，「三七五減租」公布實施。 ·四月六日，「四、六學生運動」爆發，台大、師院學生多人被捕。 ·六月十一日，省通志館改組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六月十五日，因各地物價大暴漲，市場秩序混亂，改幣制，發行一元、五元、十分新台幣。 ·十二月七日，中央政府遷台。 ·十二月廿一日，吳國楨就任省主席。
1950	民國卅九年 四十七歲	·本年三月十五日，先生在《進步論壇》發表〈教育革新芻議〉。	·三月一日，蔣介石復行視事，重新復職總統。 ·五月廿三日，二二八事件審理終結。 ·六月廿七日，美國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 ·十二月二十日，台大校長傅斯年逝世。
1951	民國四十年 四十八歲	·先生之劇本《霧社櫻花遍地紅》本年連載於《旁觀雜誌》，本作品原為西北影片公司之電影劇本。	·一月七日，各縣市第一回縣市長選舉。 ·九月十六日，林海音任聯副主編。 ·鍾肇政發表第一篇文章「婚後」。

年份	民國／年齡	事蹟	大事
1952	民國四十一年 四十九歲		‧三月八日，中日和約全文發表。 ‧四月一日，全省地籍整理完成。
1953	民國四十二年 五十歲		‧十一月八日，美副總統尼克森訪台。
1954	民國四十三年 五十一歲	‧十二月，先生著作《孔子哲學評論》，由台中中央書局出版。同年，該書即為政府當局查禁。	‧六月一日，俞鴻鈞就任行政院長。 ‧六月三日，嚴家淦就任省主席，接任三月十四日被免職的吳國楨。
1955	民國四十四年 五十二歲		‧三月三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交換批准書。 ‧八月二十日，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遭免職。
1956	民國四十五年 五十三歲		‧四月九日，省府通令實施都市平均地權。 ‧十二月一日，台灣省政府遷往南投中興新村辦公。
1957	民國四十六年 五十四歲	‧先生與友人陳逸松、劉啟光、林快青等人合組「藝林影業公司」，先生擔任講師及劇本寫作事務。然而公司日後卻因內爭之故，形同解體。其出品影片也僅《邱罔舍》一部。	‧鍾肇政油印刊行「文友通訊」。 ‧二月一日，「台灣省出入境管理辦法」公布。 ‧五月廿四日，因劉自然事件，台北市發生反美風潮。

年份	年代	事蹟	大事
		・本年，先生先後完成《邱罔舍》《人間與地獄》《生死門》《婚變》《荔鏡傳》等劇本。其中《邱罔舍》在11月時獲頒第一屆金馬獎特別獎—故事類。 ・八月十日，發表〈我編導邱罔舍一片的動機與目的〉於《民聲日報》。	・八月十六日，周至柔就任台灣省主席。 ・十一月五日「文星雜誌」創刊。
1958	民國四十七年 五十五歲		・四月二十日，台灣省議會由台北遷往霧峰。 ・八月廿三日，八二三砲戰發生。
1959	民國四十八年 五十六歲		・八月七日,台灣中部發生八七水災。 ・九月二日，「公論報」休刊。
1960	民國四十九年 五十七歲		・三月五日，「現代文學」創刊。 ・五月九日中部橫貫公路通車。 ・九月四日,「自由中國」雜誌社長雷震被捕，判刑十年
1961	民國五十年 五十八歲	・本年，先生在影業公司解散後，一度開設「聖林咖啡廳」於台中，其性質近於法式之文藝沙龍。往來出入者多為文化人士，如徐復觀等人。而後因營業狀況不佳而歇業。此後也曾往來霧社從事木材買賣。但不久即再回台中重新開設「古典咖啡廳」。 ・本年八月，著作《霧社櫻花遍地紅》	・六月九日，百元大鈔發行。 ・七月一日,第一次陽明山會議開幕。 ・九月，呂訴上《台灣電影戲劇史》出版。

年代	年齡	生平	大事
		修訂後，易名為《遍地紅》，由台中中央書局出版。十二月，自傳《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分四冊由台中聖工出版社出版。 ・發表〈如是我觀——歷史與戲劇〉於《民聲日報》。	
1962	民國五十一年 五十九歲		・二月廿四日，胡適病逝。 ・十月十日，台視開播。
1963	民國五十二年 六十歲	・六月廿四日，發表〈梁祝觀後感〉於《民聲日報》。	・五月二十日，台大學生發起青年自覺運動。 ・九月廿八日，高雄縣長余登發被停職。
1964	民國五十三年 六十一歲	・六月一日，發表〈殺犬記〉於《台灣文藝》第三期。	・一月二十日，日本電影禁映。 ・六月十四日，石門水庫開工。 ・九月二十日，台大教授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因發表「台灣自救宣言」，以叛亂罪嫌被捕。
1965	民國五十四年 六十二歲	・四月，受吳濁流邀請擔任《台灣文藝》台灣文學獎之評審委員。後以身體狀況不佳，辭謝。 ・七月，著作《我與我的思想》由台中中央書局增訂再版。	・三月五日，副總統陳誠逝世。 ・五月十日，在日本之「台灣共和國臨時大統領」廖文毅返台輸誠。 ・九月廿五日，詩人陳虛谷逝世。 ・十月廿九日藝術評論家王白淵逝世

·八月，結束台中雜務，遷往台北療養身體。不久再回台中，住進五弟張鴻標開設的「張外科」醫院養病。
·十一月八日，先生以肺癌去世。
·十一月廿一日，假台中市慈光圖書館舉行告別式，同日下葬。
·十二月卅一日，《台灣風物》十五卷五期出版先生紀念專號。
·一九六六年八月，遺稿《縱談日本》由台北泰山出版社出版。該書同時收有附錄—「張深切先生各方追悼文章」。

·文星雜誌停刊，發行九十八期。

張深切著作年表

張志相・黃英哲編

西元／日期	年代／年齡	發表刊物處所	作品名稱	備註
1924	大正十三年 廿一歲	（未以文字發表）	辜狗變相（舞台劇脚本） 改良書房（舞台劇脚本）	僅存目。有演出，但原脚本未見
1925	大正十三年 廿一歲	櫻草	總滅	日文
1926	昭和元年 廿三歲	櫻草	兩名殺人犯	日文
		（未以文字發表）	鬼神末路（舞台劇脚本） 舊家庭（舞台劇脚本） 愛強於死（舞台劇脚本） 浪子末路（舞台劇脚本） 啞旅行（舞台劇脚本） 小過年（舞台劇脚本）	1. 僅存目。有演出，但原脚本未見。 2. 以上演出係針對九月六日台北州、

年份	日期	年齡	發表刊物	作品	備註
					新竹州暴風雨釀成水災之賑災募款義演。
1927	4/1	昭和二年 廿四歲	台灣先鋒	台灣怎樣要革命？	筆名：紅草
1930		昭和五年 廿七歲	（未以文字發表）	論語博士（舞台劇脚本） 暗地（舞台劇脚本） 接木花（舞台劇脚本）	僅存目，有演出，但脚本已佚
1931	6/20～7/18	昭和六年 廿八歲	台灣新民報	鐵窗感想錄	
1932		昭和七年 廿九歲	（未以文字發表）	女人（電影劇本） 冷血英雄（電影劇本）	僅存目，脚本已佚
1934	8	昭和九年 卅一歲	台灣新民報	驅逐江亢虎出境	（未見）
	10/27		大溪革新會會刊	談吃錢官與神佛	（未見）
	11/5		台灣文藝	鴨母	
	11/5		台灣文藝	評《先發部隊》	
	11/5		台灣文藝	偉大詩人林幼春先生	

年份	月/日	年齡	刊物	篇名	
	12/18		台灣文藝	文聯報告書	
	12/18		台灣文藝	第一回全島文藝大會記錄	
	12/18		台灣文藝	〔小評〕文藝大眾化	
1935	2/1	昭和十年 卅二歲	台灣文藝	對台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	
	4/1		台灣文藝	對台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續篇）	
	5/5		台灣文藝	台灣文藝的使命	
	8/4		台灣文藝	歡迎文聯大會	
				泛論政治理論與實際	
1939	9/1	昭和十四年 卅六歲	中國文藝	創刊詞、編後記（創刊號）	
	10/1		中國文藝	卷頭言、編後記（1卷2期）	
	12/1		中國文藝	卷頭言、編後記（1卷4期）	
1940	1/1	昭和十五年 卅七歲	中國文藝	卷頭言、編後記（一卷5期）	
	2/1		中國文藝	隨便談談（1卷6期）	
	2/1		中國文藝	編後記（同右）	
	3/1		中國文藝	隨便談談（2卷1期）	
	3/1		中國文藝	編後記（同右）	
	4/1		中國文藝	廢言廢語（2卷2期）	
	4/1		中國文藝	編後記（同右）	
	5/1		中國文藝	一個聚會的雜談	
	5/1		中國文藝	戰爭與和平	

年月日	年齡	發表刊物	作品	備註
5/1		中國文藝	廢言廢語	
5/1		中國文藝	編後記（以上2卷3期）	
6/1		中國文藝	廢言廢語、編後記	
6/1		中國文藝	散言碎語（以上2卷4期）	
7/1		中國文藝	廢言廢語	
7/1		中國文藝	編後記（2卷5期）	
8/1		中國文藝	廢言廢語	
8/1		中國文藝	編後記（2卷6期）	
1941 2/26	昭和十六年 卅八歲	興南新聞	北京感想錄	
5/27		台灣文學	あの頃ての頃の思ひ出	
1942 8月	昭和十七年 卅九歲	現代日本短篇名作集（新民印書館）	秋（橫光利一原作，先生中譯）	
1943	昭和十八年 四十歲	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十卷6期）	點線面的關係	
		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十卷12期）	理性與批判	
		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	民族精神與民族性	
1945	昭和二十年 四十二歲	新台灣	一台灣人的呼喚	

1946		民國卅五年 四十三歲	和平日報	四篇小誄詞	
			和平日報	記范烈士本梁	
1948	1月	民國卅七年 四十五歲	台中中央書局	我與我的思想修訂稿初版	
	12月		台中中央書局	在廣東發動的台灣革命運動史略——附獄中記	
1950	3/15	民國卅九年 四十七歲	進步論壇	教育革新芻議	
1951	4/16	民國四十年 四十八歲	旁觀雜誌	霧社櫻花遍地紅	
1954	12月	民國四十三年 五十一歲	台中中央書局	孔子哲學評論	遭查禁
1955			民聲日報	悼張我軍	
1957	8/10	民國四十六年 五十四歲	民聲日報	我編導邱罔舍一片的動機與目的	
			（劇本未出版）	邱罔舍（拍成台語電影）	
			（劇本未出版）	人間與地獄	
			（劇本未出版）	生死門	
			（劇本未出版）	婚變	
			（劇本未出版）	荔鏡傳	
1961	8月	民國五十年 五十八歲	台中中央書局	遍地紅（電影小說）	
	12月		台中聖工出版社	里程碑（又名黑色的太陽，自傳）	

		民聲日報	如是我觀—歷史與戲劇	
1963 6/24	民國五十二年 六十歲	民聲日報	梁祝觀後感	
1964 6/1	民國五十三年 六十一歲	台灣文藝	殺犬記	
1965 7月	民國五十四年 六十二歲	台中中央書局	我與我的思想（增訂再版）	十一月八日，逝世於台中
1966 6月	民國五十五年	台北泰山出版社	縱談日本（遺稿）	
1977 7月	民國六十六年	夏潮三卷三期	給煜兒書（舊稿）	
1985 1/30	民國七十四年	台灣文藝	黎明前（僅存目錄）	由巫永福代為發表

張深切研究相關論著目錄一覽表（迄1997年）

張志相編

年代	作者	論著名稱	發表刊物、處所	備註
1959	劉枝萬編	南投縣革命志稿	南投文獻叢輯　冊七	
1961	呂訴上	台灣電影戲劇史	銀華出版社	片斷述及
1965	陳漢光編	張深切先生逝世紀念特輯	台灣風物（15卷5期）	
1966	洪尊元編	張深切先生死後各方追悼文章	縱談日本／泰山出版社	附錄
1971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台灣省通志　卷六　學藝志、藝文篇、文徵篇、藝術篇	台灣通志／眾文圖書公司	片斷述及
1973	顏元叔	台灣小說裏的日本經驗	文學的史與評	片段討論《里程碑》
1974	劉心皇	抗戰時代落水作家述論（八）	反攻月刊（389期）	片段
1975	尹雪曼編	台灣光復前的文藝概況	中華民國文藝史／正中書局	片段述及
1977	林載爵	黑色的太陽—張深切的里程	夏潮（三卷三期）	

1983	黃英哲	「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初探	史聯雜誌（二期）	
	陳芳年	張深切・張文環與我	台灣時報（5／18）	
1984	黃英哲	張深切及「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	台灣文藝（86期）	
	鍾政瑩	由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發展論張深切的戲劇活動	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5	黃英哲	孤獨的野人—張深切的一生	民眾日報（2／27）收入李筱峯編《台灣近代名人誌》／自立晚報	
	巫永福	未寫的「黎明前」	台灣文藝（93期）	
1986	林文龍	張深切傳	草屯鎮志	
	黃雁秋	孤獨的野人—張深切的一生	台灣文化（10月）	
1987	秦賢次	抗戰時期期刊編目—北平中國文藝月刊	當代文學史科研究叢刊第二輯〈抗戰文學專輯〉台北／大呂出版社	片斷述及
	若林正丈	台灣抗日運動中的「中國座標」與「台灣座標」	當代雜誌（第17期）9・1	片斷述及

年代	作者	論著	出處	備註
1987	向山川夫	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	中央經濟研究所	片斷述及
1988	黃國書	日據時代台灣左翼劇場運動的發展	當代（28期）8・1	片斷述及
	黃英哲	張深切年譜初稿	台灣風物（38卷1期）	
	王詩琅譯	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在華青年學生的思想運動／台灣文化協會）	稻鄉出版社	片斷述及
1990	陳芳明	亞細亞孤兒的聲音—張深切與《里程碑》	自立早報（1／21、22）	
	黃英哲	張深切略年譜（二稿）	台灣文學研究會會報（15、16合併號）	日本
	黃英哲	張深切における為政治と文學	野草（46期）	日本
1992	邱坤良	舊劇與新劇—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	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片斷述及
	張志相	張深切及其著作研究	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仁義	台灣觀點的「中國哲學研究」—《孔子哲學評論》與張深切的哲學思想	台灣文藝（總號133期）11・1	

1993	莊永明	台灣百人傳系列第008號：張深切	People	
	葉石濤	台灣文學史綱（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展／台灣文學年表II）	文學界雜雜社	片斷述及
1994	張　泉	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	中國和平出版社	片斷述及
1995	黃英哲	張深切北京日記序文（及日記原文）	野草（56號）8・1	日本
	木山英雄	張深切北京・の日記北京日記を讀む	野草（56號）8・1	日本
1997	下村作次郎	從文學讀台灣（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王詩琅談台灣新文學運動）	前衛出版社	片斷述及
		張深切文學特集	聯合文學（151期）5・1	日本

主編介紹（依年序）

陳芳明　一九四七年生，高雄左營人。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博士候選人。專攻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曾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現任教於靜宜大學中文系。主要著作：《探索台灣史觀》《謝雪紅評傳》《典範的追求》《危樓夜讀》等。目前正從事台灣左翼運動研究，並撰寫《台灣文學史》。

張炎憲　一九四七年生，嘉義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日本東京大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研究員，中央大學兼任教授。《台灣風物》雜誌主編，《台灣史料研究》雜誌編委。主要編著：《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兩冊（1993）、《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1996）、《北縣歷史與人物》五冊（1996）、《台北南港二二八》等二二八口述歷史(1993-1996)等。

邱坤良　台灣宜蘭人，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文學博士。曾任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副教授、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研究員、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中心主任、戲劇系教授兼系主任、劇場藝術研究所所長。現任國立藝術學院院長。主要著作：《中國戲劇的儀式觀》（法文，1991，法蘭西學院）、《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自立晚報，1992）、《台灣劇場與文化變遷》（台原出版社，1997）等。

黃英哲　一九五六生，台灣嘉義人。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畢業。日本立命館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了。櫻美林大學大學院國際學研究科研究員。立命館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講師。專攻台灣近現代歷史・文學。主要著作：《許壽裳日記》，（合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3年，日本）《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編，前衛出版社1994年，台灣）《よみがえる台灣文學——日本統治期の作家と作品》（合編，東方書店，1995年，日本）《グレーター・チャイナの政治變容》（合著，勁草書房，1995年，日本）《台灣新文學と魯迅》（合

著，東方書店，1997年，日本）及中、日文論文十餘篇。

廖仁義： 一九五八年生，台灣雲林人。輔仁大學哲學學士。台灣大學哲學碩士。法國巴黎大學哲學博士。主要著作：《異端觀點：戰後台灣文化霸權的批判》。譯作：《法蘭克福學派》、《胡賽爾與現象學》、《哈伯瑪斯本》、郭德曼的文學社會學》、《批判的社會會導論》《咫尺天涯：李維史院對話錄》等。

誌謝——

指導、撰稿——巫永福、木山英雄、鍾肇政、張良澤、莊永明、秦賢次、陳萬益、呂興昌、張志相、陳益源、莊紫蓉及本全集五位主編等。

資料、作品提供——秦賢次、莊永明、中島利郎、河原功、黃英哲、吳三連文教基金會、張士文、張勝語、張勝謀、張中南、連百中、洪英聖、吳瑞元、莊明勳、鍾豐義等。

編輯、校對協力——林秀梅、林美蘭、橋本昭典（日文）、管仁健、吳綉雲等。

文經社

文經社

文經社